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编者的话

当前，我国语言学（包括文字学）研究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投入不足、队伍不稳、论著发表难等问题困扰着整个语言学界。但是，社会生活迅速发展和文化建设的前景却不断地向语言学提出急需解决的问题。

任何学科，都有其发展和演变的规律。就其自身体系而言，在这一学科领域里先发展什么，后着力于什么，都要顺其自然；就与社会的关系而言，还有一个社会对该学科需求的规律。任何学科都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对各学科的这种需求，也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之一。因此，任何学科的发展都要满足社会的需要，这也是顺应社会发展规律之自然。在一些发达国家，语言学之所以被称作先行科学，是因为他们那里的语言研究在语言教学（母语和非母语教学，语言习得等）、社会语言（社区语言、法律语言等）、语言规划（语言规范等），特别是在计算机所需要的语言等方面解决了大量问题。这就是语言学自身发展规律和社会需求规律和谐统一的结果。

在中国，要使语言学走在其他相关学科的前头，就要大力倡导语言（还有文字）的应用研究。当然，只抓应用的研究是不行的，那将使语言学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此也要加强基础研究。"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常常是互相促进的，应用科学也常常能给纯粹科学提出新问题，开辟新园地。"（吕叔湘等）同时，随着语言学与社会生活的贴近，语言学的价值为社会所认识，语言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都会得到加强。语言学对社会发展的任何实际贡献，都比100篇宣传语言学重要性的文章力量大得多。

21世纪只剩下五年了，中国语言学将如何迎接下一个世纪？或者说，在未来的几年里，中国语言学应该有一个怎样的发展，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进入21世纪？这是每一个关心语言学命运的人不能不思考的问题。

这里收集的文章是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向上级报告近十年来我国语言学研究现状和对未来的展望时，请有关专家就语言学的各个分支写出的相应的报告。现在我们把这些文章汇编成书，希望能够使读者全面地了解中国语言学发展的概貌，而各篇文章所谈的对语言学各个分支在今后一段时间里如何加强研究的见解能给读者以启发。如果本书不但对我国语言文字工作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且能对关于语言学今后发展的决策有所裨益，间接地对把我国语言学提高到先导科学的地位起到一点作用，那就超出了我们和各位作者的预期目的。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在此谨表谢意。

编　者

一九九五年国庆

目 录

汉语篇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理论语言学 …………………………… **徐通锵　王洪君** 3
一、引进
二、结合
三、创新
四、展望
汉语史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许嘉璐　朱小健** 37
一、概说
二、研究现状
1. 音韵学
2. 语法学
3. 训诂学
三、展望
80年代以来大陆地区汉字学研究状况调查报告 …… **沈　培　裘锡圭** 68
一、一般性的汉字学研究
1. 通论性著作
2. 汉字性质的研究
3. 汉字起源的研究
4.《说文解字》和"六书"的研究
5. 异体字、古今字的研究
6. 其他
二、古文字研究
1. 甲骨文研究
2. 金文研究

3. 秦系文字研究
4. 战国文字研究
三、现代汉字研究
1. 现代汉字属性研究
2. 简化汉字研究
"八五"期间的现代汉语研究 ………………………… 邢福义　汪国胜　102
一、语音研究　吴振国　萧国政
1. 成果概观
2. 理论方法
3. 关于语调、声调和语气
4. 关于时长
5. 关于协同发音
6. 关于语音合成和语音识别
7. 关于轻声、重音和儿化
8. 关于节律
9. 问题和建议
二、词汇研究
1. 成果概观
2. 理论方法
3. 关于词义和语义
4. 关于词的构造
5. 关于词汇构成
6. 关于词汇发展和规范
7. 关于熟语
8. 问题和建议
三、语法研究
1. 成果概观
2. 理论方法
3. 词类研究
4. 动词、形容词研究
5. 结构和句式研究
6. 句子足句方面的研究

7. 复句和句群的研究
8. 语法现象的语用研究
9. 关于语法事实
10. 问题和建议
四、几点比较
1. 理论方法
2. 论著
3. 队伍
4. 现代化程度
近代汉语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 江蓝生 曹广顺 吴福祥 134
一、近代汉语的历史分期
二、近代汉语文献资料的发掘、整理与介绍
三、近代汉语知识的普及
四、近代汉语词汇研究
1. 早期的研究
2. 1949年前后的研究
3. 近20年的研究
五、近代汉语语法研究
1. 早期的研究
2. 五六十年代的研究
3. 近20年的研究
六、目前研究工作存在的问题
1. 理论风气淡薄
2. 研究视角狭窄
3. 研究领域有待拓宽
4. 研究方法单调
5. 资料选择不严
6. 信息不灵，课题分散
七、对今后研究工作的建议
1. 进一步做好基础工作
2. 加强专书和断代研究
3. 加强理论研究，丰富研究方法

4. 加强对宏观的、全局性问题的研究
蓬勃发展中的汉语方言学 ………………………………………… **张振兴** 162
一、汉语方言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
二、汉语方言研究的历史和发展
三、汉语方言研究的黄金时期
1. 在方言分区上取得重大突破
2. 在方言的重点研究上成绩显著
3. 方言的比较研究进展明显
4. 编纂《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地点方言词典)
四、“九五”期间汉语方言研究规划设想
1. 编纂《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综合本)
2. 加强对薄弱地区的方言调查
3. 拓展汉语方言研究领域
4. 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
5. 建立汉语方言电脑资料库
6. 编写最新的汉语方言学教材
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现状与发展 ………………………………… **黄　行** 190
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一般情况
1. 研究的性质和对象
2. 研究的历史和阶段
3. 研究的机构和队伍
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成就与问题
1. 理论与方法
2. 语言识别和方言划分
3. 共时描写研究
4. 历史比较研究
5. 社会语言学研究
6. 应用语言学研究
7. 翻译工作和新词术语规范化
8. 古文字古文献整理研究
三、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发展前景

应用语言学研究的现状和展望(上)
——汉语文教学及语言规划、术语学、语言的社会应用 …… 仲哲明 218
汉语文教学研究
一、中小学语文教学研究
1. 调查研究
2. 教改实验
3. 理论探索
4. 问题与建议
二、口语和口语教学研究
三、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1. 怎样教——教学理论研究
2. 教什么——汉语/交际文化研究
3. 如何学——汉语习得研究
4. 对今后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建议
语言规划研究
一、语言政策的研究
1. 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方针政策的研制
2. 新时期推广普通话工作方针的研制
二、关于现代汉字的研究
1. 汉字的定量研究与分析
2. 汉字结构及其构成成分的分析与统计
三、普通话等级标准和水平测试的研究
四、语言文字立法研究
五、现代语文改革史的研究
术语学研究
语言在社会其他领域的应用研究
一、广告语言研究
二、法律语言研究
三、广播电视语言研究
对"九五"规划的建议

应用语言学研究的现状和展望(下)
——中文信息处理 …………………………… 傅永和　刘连元　262
陈　敏　王翠叶
一、中文输入技术
1. 汉字键盘输入技术
2. 汉字识别技术
3. 语音识别技术
二、字符集及编码
1. 汉字编码字符集国家标准
2. 少数民族文字编码字符集国家标准
3. 国际标准 ISO 10646
4. 汉字内部码
三、中文输出技术
1. 汉字字形技术
2. 语音合成技术
四、中文信息处理基础研究及应用技术
1. 语料库
2. 汉字属性
3. 现代汉语自动分词与分词规范
4. 电子排版系统与文字处理机
5. 字、词频统计

外语篇

我国外语界语言学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 王福祥　刘润清　297
一、现代语言学的发展趋势
二、我国近十年来语言学取得的成就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四、对“九五”规划的建议和设想
我国语音学与音系学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 史宝辉　306
一、语音学与音系学的走向
二、我国语音学与音系学的研究现状

1. 概论性著作和教材
2. 专题研究
三、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发展趋势
1. 重视语音学与音系学的理论建设
2. 加强语音学的实用性研究
3. 语音学与音系学研究并重
4. 外语界的研究有待深入
外语语法研究:回顾和展望 …………………………………… **张会森** 325
一、外语语法研究概况
二、对语法交际功能的研究
三、对句子语义的研究
四、话语语法
五、虚词语法
六、对比语法研究
我国语义学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 **王逢鑫** 334
一、语义学的介绍与传播
二、我国语义学研究的现状
三、模糊语言学与语义研究
四、语义学的应用与未来
我国语用学研究 …………………………………………… **沈家煊** 345
一、语用学在我国的引进
二、我国的语用学的研究
1. 面向外语教学的语用学研究
2. 面向汉语语法的语用法的研究
3. 语用学理论的研究
三、今后的语用学研究
我国文体学研究现状 ……………………………………… **胡壮麟** 355
1. 什么是文体学?
2. 什么是文体?
3. 文体学的任务
4. 体裁的研究
5. 研究分析的不同方法

6. 对个人风格的研究
7. 文体学的发展方向
我国实验心理语言学的进展 …………………………………… **索玉柱** 369
一、认知作为研究中心
二、当前的状况和水平
1. 介绍与引进国外理论阶段
2. 结合国内实际研讨阶段
3. 形成初步模式阶段
三、成绩和问题
1. 基础研究
2. 应用研究
3. 研究方法
四、如何继续推进我国的认知心理语言学研究
我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现状及问题 …………………………………… **高一虹** 382
一、研究状况
1. 概论性著作和教材的出版
2. 国外社会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翻译介绍
3. 专题研究
二、存在的问题
1. 学科的界定
2. 学习与创新
3. 材料、方法、理论
三、结束语
我国宏观语言学部分学科的发展概况 …………………………… **王福祥** 408
一、话语语言学
二、语篇分析
三、文章学
四、跨文化交际学
五、文化语言学
六、对比语言学
英汉对比分析评述 ……………………………………………… **高　远** 442
一、理论和方法

二、语音
三、语法
四、词汇和语义
五、修辞
六、文化、思维方式和母语迁移
七、跨文化交际与应用
八、结束语

汉语篇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理论语言学

徐通锵　王洪君

人类的语言尽管多种多样，相互千差万别，但其中蕴涵着一般性的共同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理论语言学的任务就是要揭示人类语言的普遍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以及这些普遍性的规律在各种语言中的具体表现类型。中国语言学一直偏重于具体语言现象的研究，不大进行理论问题的探讨，因而理论语言学一直是一个薄弱的环节。解放以后，理论语言学作为一个独立的语言研究领域算是建立起来了，但由于当时封闭的学术环境，语言学家无法接触蓬勃发展的西方语言学，再加上受苏联语言学教条的影响，因而进展不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学术研究环境的变化和中外语言学交流的加强，我国的理论语言学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介绍和引进国外语言学的一些新理论比以前快；西方语言理论和汉语研究的结合取得了一些新进展；在某些领域的研究中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假设，为补正现行普通语言学理论的不足作出了一些积极的贡献。另一方面，新近发展起来的一些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如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实验语音学、认知语言学等，在这一时期不仅得到了确立，而且还得到了引人注目的发展。现在，设法在具体语言事实的研究基础上提炼语言普遍规律的假设，再放到具体语言的研究中去检验和修正，这种理论语言学的基本思路已经开始成为我国理论语言学界的自觉意识。这可能对我们建立具有自己特点的理论语言学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引 进

改革开放解除了理论语言学界长期的思想禁锢，学术研究的气氛从此活跃，国外语言理论的引进也随之出现了繁荣：停刊十多年的专门介绍国外语言理论的内部刊物《语言学资料》于 1978 年更名为《语言学动态》恢复出版，1980 年它又改名为《国外语言学》公开发行。《外语教学与研究》、《现代英语研究》等外语类刊物也先后复刊或创刊，它们为译介国外语言理论提供了必需的园地。不少高校的外语系、中文系或语言研究所还开设了介绍国外语言理论或某一学派的语言理论的专门课程，其中有些系、所已经成为研究某一学派或某一分支语言理论的研究基地，如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英语系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复旦大学、黑龙江大学英语系的生成语法学，天津师范大学英语系的生成音系学，北京语言学院的美国当代语言学等。以这些高校和刊物的学者为骨干，语言学的多个分支领域和学派在这一时期先后介绍到国内，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多元格局。这不仅为我国理论语言学的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参考，而且形成了语言理论研究的良好的学术空气。介绍的流派多，速度快，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但介绍和引进工作也出现了深度不够、选择不精、与汉语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联系不够密切等缺陷。现在，我们先就国外语言学的译介和评述工作及其相关的问题作一些介绍。

综合性述评　这一时期的综合性的、全面的评述文章不是很多，但也有一些有分量的介绍。赵世开的《近十年来美国语言学研究简介》（《语言学动态》，1978.1）和伍铁平的《近十年苏联普通语言学中的若干问题》（同上，第 3-4 期）是两篇比较早的评述文章，使我国的读者能大体了解我们十年动乱时期西方和苏联语言学的发展状况。80 年代晚期，陈平的《描写和解释：论西方现代语言学研究的目的和方法》（《外语教学与研究》，1987.1）和《当代语言学

中的统一和分化——第 14 届国际语言学家大会评述》(《国外语言学》,1987.4)是两篇重要的评述性论文。前一篇文章介绍和评述了 19 世纪以来在西方的语言研究中先后占据重要地位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派、结构主义学派、形式主义学派和功能主义学派,分析了这些学术思潮的主要目的和方法,读者可以从中了解百年来语言学发展的大致趋势;后一篇文章介绍和分析了第 14 届国际语言学家大会所讨论的现代语言学的方方面面,读者可以从中了解语言学的最新发展动态。这些综合性的评述以最简洁的语言介绍了国外语言学的新发展。

结构主义语言学 该学派是国外 60 年代以前的主流学派,现已被其他学派替代。但是替代包含着继承,现代的各种学派、分支都从结构主义理论中汲取了大量的营养。可以说,结构主义是现代意义上的语言学的共同鼻祖。该学派的理论介绍到中国来的时间很早,但除了 1964 年陆卓元译的萨丕尔的《语言论》外,其他代表性名著的中译本都是 1980 年以后问世的。如《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著,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商务印书馆,1980),《语言论》(布龙菲尔德著,袁家骅、赵世开、甘世福译,商务印书馆,1980),《现代语言学教程》(霍凯特著,索振羽、叶蜚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叶斯柏森和房德里耶斯虽然不属于结构语言学派,但他们是结构语言学诞生前夕的语言学大家。他们的名著《语法哲学》(叶斯柏森著,何勇、夏宁生、司辉、张兆星译,语文出版社,1988)和《语言》(房德里耶斯著,岑麒祥、叶蜚声译,商务印书馆,1992)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版的。这些名著的翻译和出版是建设中国理论语言学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在教学、科研中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些都是整部书的译著。胡明扬主编的《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则是有选择性的译述和整体的评介相结合的著作。它从阿尔诺、朗斯洛的《普遍唯理语法》开始,根据年代的先后顺序,介绍和评述了洪堡特、索绪尔、叶斯柏森、梅耶、萨丕尔、布龙菲尔德、房德里耶斯、泰尼埃尔、霍盖特和乔

姆斯基的一部代表作，大体上可以反映自中世纪以来理论语言学的发展大势。编著这本书的目的是为"在有条件的高等学校开设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的课程"，其介绍和评述都比较客观、平实、清楚，是一部比较好的学习西方语言学的基本理论的参考书。如果说，这本书以评述为主，那么刘润清、S. 麦基、赵桐、闫晓天主编的《现代语言学名著选读》(测绘出版社，1988)则以语言学名著的选读为主，从索绪尔到乔姆斯基，选录各派代表作的精华，辅之以客观的评述，以便"为广大语言学研究者，教师，研究生，英语系和中文系的大学生，特别是为数众多的语言学自修者所使用"。这本书选材精到，对了解语言学的发展脉络很有价值。这是一部很好的现代语言学读本。

生成语法学派　该学派诞生于50年代后期，是此后美国语言学的主流学派。这一学派的语言研究的目标不是描写具体的语言现象，而是解释人类语言的生成机制。它采用类似数学公式那样的形式化方法来表述这种机制。从60年代至今，该派理论经历了数次重要的修正，其几个阶段的代表性著作都有中译本出版：《句法结构》(乔姆斯基著，邢公畹、庞秉均、黄长著、林书武译，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乔姆斯基著，黄长著、林书武、沈家煊译，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深层结构、表层结构和语义解释》(乔姆斯基著，赵世开译，《语言学译丛》(二)，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支配和约束论集》(乔姆斯基著，周流溪、林书武、沈家煊译，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此外，较系统地评介生成语法的还有方立、宁春岩、侯方的多篇论文和徐烈炯的《生成语法理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等专著。在一些当代语言学史或某些分支学科的专著中对生成学派也有较多篇幅的介绍和评述，如，《数理语言学》(冯志伟，知识出版社，1985)，《现代语言学流派》(冯志伟，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美国语言学简史》(赵世开，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当代西方语法理论》(俞如珍、金顺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这些介绍和评述对了解生成语法学派的形成和发展

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生成音系学 这是生成语法学派的一个分支，但又有它自己独立的一面。它不像其语法分支那样只着重描写共时语言中某一部分语法现象，而倾向于全面描写语言里各种与语音有关的事实，并且注意语音与词法、句法的关系，共时规则和历史演变的关系。天津师大的王嘉龄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生成音系学的研究，在《国外语言学》等杂志上发表评介文章多篇。他的学生整理的《近年来美国大学汉语音系学博士论文简介》（陈丽萍、姜晖，《国外语言学》，1994.1-2）、MIT 历届音系学博士论文简介（《麻省理工学院与生成音系学》，李永华，《国外语言学》，1995.1）是系统地介绍生成音系学的发展和它在汉语研究中运用的评述性论文，资料十分宝贵，对发展汉语生成音系学很有价值。

系统功能学派 功能学派是欧洲语言学的主流学派。系统功能学派由结构主义、欧洲的重要学派之一——英国学派发展而来。它继承了欧洲学派重聚合、重功能、重意义、重篇章的传统，并使之模式化、形式化。它将功能抽象为三大元功能，以功能、意义两分的聚合系统作为语言运转机制的基础，形成了一整套以语义驱动为特点的语言生成机制，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应用前景。该理论关于语域、篇章的具体分析在教学等方面也很有实用价值。该派代表人物韩礼德曾留学中国，师从罗常培和王力学习中国语言学，有很好的汉学底子。他的原著翻译过来的不多，目前只能看到代表他早期思想的《语法范畴理论》（叶蜚声译，《语言学译丛》（二），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较为系统地介绍该派理论的时间较晚，是胡壮麟等学者出国师从韩礼德学习系统功能语言学之后的事情。他们学成回国以后，写了不少评介和研究性的论文，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韩礼德》（胡壮麟，《国外语言学》，1983.2），《系统功能语法概论》（胡壮麟，朱永生、张德录著，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语篇的衔接与连贯》（胡壮麟，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语言·语篇·语境》（朱永生著，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除了著述之外，他们还

成立了全国性的协会，举办过几次全国性的系统功能语法讲习班，自1989年起还隔年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

与形式语言学相对的学派中值得注意的还有近年来兴起的认知学派。它从研究语言表达时空概念的方式作为突破点，力图揭示语言、特别是语言的句法与现实世界的象征性关联，认为可以以人脑认知世界的神经网络的模式来使语言的描写形式化。这个学派在美国已有较大的影响，并开始在计算机处理语言方面加以运用。在我国，自《国外语言学》1990年第4期发表叶蜚声所译的《以认知为基础的汉语功能语法刍议》（戴浩一著）一文以来，这一学派的论述在国内也已有较多的介绍和评述。

除生成学派、系统功能学派、认知语言学派外，当代语言学还有许多其他学派。其中不少学派与生成学派一样同属形式学派，但更加注意对语言意义的研究，因而在计算机自然语言理解方面得到了很好的运用，如美国的格语法、广义短语结构语法、蒙太古语义学、功能合一语法、词汇一函项语法、中心词驱动语法以及欧洲的依存语法（配价语法）等等。遗憾的是这些新的语言理论在国内大多只有很简单的介绍。如《雷柯夫、菲尔摩教授谈美国语言学问题》（叶蜚声，《国外语言学》，1982.2-3），《现代语言学派》（冯志伟，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和方立的一系列评述性文章（大多收入专集《美国理论语言学研究》，方立著，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等。比较起来，格语法的译介较为全面。如《格辩》（Fillmore著，胡明扬译，《语言学译丛》（二），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这是格语法第一期的代表作；格语法第二阶段的主要思想也已由杨成凯的《Fillmore的格语法理论》（《国外语言学》，1986.1-3）做了较全面的介绍。

以上是语言学中心领域的引进情况。历史语言学是19世纪西方语言学的主流，20世纪虽曾一度冷落，但近几十年来又受到重视，取得了一些积极的进展；特别是汉藏系语言的研究，成果相当显著。徐通锵的《美国语言学家谈历史语言学》（《语言学论丛》

第13辑，商务印书馆）、石子强的《美国语言学家拉波夫博士的谈话》（同上，第15辑）和戴庆厦的《藏缅语族语言的研究和展望——马蒂索夫教授访问记》（《民族语文》，1990.1）等从不同的侧面介绍了历史语言学的最新发展。语言学还有一些外围的分支和与其他学科相结合的边缘学科。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近年来也都能比较快地介绍到国内，对我国建立这些新兴学科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参考。比如，语言类型学方面的代表性著作《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已译成中文（科姆里著，沈家煊译，华夏出版社，1989）；语义学方面的重要译著有《语义学引论》（沙夫著，罗兰译，商务印书馆，1979）、《语义学》（利奇著，李瑞华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而徐烈炯的《语义学》（语文出版社，1990）则全面、具体地介绍了现代语义学的各种学派。此外，在语用学、篇章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实验语音学等新兴边缘学科方面，近年来的《国外语言学》也发表了不少选译或评介的文章，说明这些学科在我国语言学中已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介绍和评述的同时，这一时期对西方语言学讨论的某些热门问题和新理论，也结合汉语的研究进行了一些讨论，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语言与思维、语义的模糊性等问题。这两个问题的讨论都是由伍铁平发起的。他在《中国语文》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引起了一些争论。这对中国读者了解语言与思维问题的研究的新发展、模糊理论在语言研究中的价值等都有积极的作用。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理论语言学在介绍、引进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方面确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前一时期无法比拟的。但是，在肯定这些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一时期的引进工作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的欠缺。

在国外，特别是在美国，语言学的特点是学派众多、理论不断翻新，但经过一定时间的筛选，有些学派在竞争中被淘汰，有些学派的理论则逐步完善，并经语言学家的总结而出现一些代表作。这一时期，我们虽然对国外语言学最新动态的介绍加快了，但是对

一些已经过时间的考验而被证明确有价值的理论精华的引进却放松了。从前面的介绍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有分量的译著数量不多，仅有的那几本，也大多是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早期代表作，而且其中的三本（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房德里耶斯的《语言》）还是60年代由教委组织翻译的旧稿的新印。较近期的译著大多集中在生成语法方面。一些在汉语研究、计算机语言处理、心理学等不同领域中有较重要意义的、运用前景良好的语言理论著作，至今还没有完全的中译本。例如，全面总结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国外曾一再重版的《理论语言学导论》(Lyons, 1968初版)，系统功能语法的《功能语法导论》(Halliday, 1985)，从属语法(配价语法)的《句法》(Matthews, 1981)，《语用学》(Levinson, 1983)，《认知语法基础》(Langacker, 1987, 1991)，《蒙太古语法概论》(Dowty, Wall & Peters, 1981)等。另外，国外有价值的语言理论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哲学或逻辑的基础之上、从某一个特定视角出发去观察语言、对语言规律进行独特的阐述，进而总结出一套新理论和新方法的。它们描写或解释语言规律往往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技术，只有真正深刻地了解它们的哲学或逻辑的基础，才能了解它们观察语言的独特视角，提炼出这一学派的理论精华。而我们这一时期的评介性文章大多或者偏重于介绍某派内部的观点分歧，或者偏重于介绍理论运用的具体实例、甚至是只适用于某一西方语言的实例。这种评介的作用充其量只能提供一些语言学的动态，虽然对语言理论研究有参考价值，但远远达不到提炼该派理论的精华和评述其不足的目的。

希望重点抓好代表作的翻译工作。语言学的代表性著作理论性较强，对不同语言的研究的普适性较广，并且在跨学科领域的研究中往往有重要的价值，因而有必要有计划地确定一批语言学代表作的书目，在依靠已经初步形成的、有学派特色的外语院校学科点的基础上组织多方面的学者联合攻关，再翻译出版一些理论经典。这种翻译不仅要求译者有很好的外语水平，而且还要求他们

有很好的语言学、数学、哲学的功底，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国内具备这样条件的人并不多，因而需要有类似60年代初期文科教材办公室那样的领导机构出面领导，组织有关专家进行这些代表作的翻译工作。这是一项推动中国语言学的发展的基础性工程，抓好了，对促进和发展中国语言学将会有重要的作用。

二、结　合

引进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固然重要，但基础性的工作还得根据汉语的特点进行自己的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理论语言学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有成效的探索，出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此前的中国语言学，人们的一般印象是：从事语言理论研究的学者满足于"空对空"的推导，很少进行实际语言现象的研究，脱离实际的倾向很严重，而从事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等研究的学者则很少考虑语言理论问题，只满足于具体语言现象的排比和分析。这些话虽然有点言过其实，但还是比较确切地反映了当时我国语言学家的研究状况。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有较大的改变，具体表现为：从事语言理论研究的学者尽量深入到具体语言现象的研究，并以此为基础提炼相应的理论假设，而从事现代汉语、方言、汉语史研究的学者大多也能自觉地运用相应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实际的语言现象。他们从不同的方向、不同的领域共同探索西方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和汉语研究相结合的最佳途径。理论水平的高低主要表现为这种"结合"的深浅和完善性的程度。所以，现在语言理论的研究已经渗入具体语言现象的分析，因而我们这里的评述也就不能只停留在几个理论语言学家的著作上，还得联系有关的研究探索我国理论语言学的发展。

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汉语实际的结合是《马氏文通》以后中国语言学的一条基本发展道路。理论语言学的基础差，只能先介绍和引进，并在此过程中逐步摸索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汉语研究相结合

的途径。早期的理论研究有点"脱离实际"，恐怕是在所难免的。改革开放以来，在综合性的语言理论研究方面，概论性的著作不少，计有20多部，但写得有特色、能结合汉语的研究并在不同程度上吸收当代语言学的新成果、产生较大影响的不多，比较起来，叶蜚声、徐通锵的《语言学纲要》(1981初版，1991二版)、李兆同、徐思益主编的《语言学导论》(1981)、胡明扬的《语言和语言学》(1985)和伍铁平主编的《普通语言学概要》(1993)等还差强人意，尚能满足高校的教学需要。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主要是理论语言学家一方面不满意以往语言理论研究"脱离实际"的弊端，另一方面是对汉语等实际语言现象还来不及进行有成效的研究。所以，这一时期的语言理论研究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没有出版过如高名凯的《语法理论》、《语言论》那样的专著，但在结合汉语的研究中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版和发表了一批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专著和论文。这些论著能根据汉语的特点吸收西方语言学中于我有用的理论和方法，探索汉语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有的学者还在结合性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了西方语言理论中的某些不足，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补正，从一个侧面丰富了普通语言学的理论。毫无疑问，语言理论研究在"结合"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

提取西方某一学派的语言理论的精华，有意识地用来研究汉语并取得重要成果的主要集中在汉语语法研究方面。吕叔湘、朱德熙等在以往的分布研究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吸取了生成学派的转换观念和语义特征、语义指向等理论来分析汉语的语法，发表了一批有理论深度的论文和著作，如朱德熙关于"附着"义动词、"给"类动词、自指和转指等的研究，而《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1982)、《语法答问》(同上，1985)则是他的理论总结。李临定的《汉语比较变换语法》(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现代汉语句型》(商务印书馆，1986)，马庆株的《汉语动词和动词性结构》(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李佐丰关于先秦词类划分的研究(《文言实词》，语文出版社，1994)，袁毓林的《现代汉语祈使句研究》，(北大出版社，1993)

等等大体上都是运用结构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汉语而取得的新成果。这一批著作，都有相当的理论深度，而陆俭明的《80年代中国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1993）则是对这一时期的汉语语法研究的理论总结。

这一时期，强调语言的功能和意义的语用学、系统功能语言学、从属语法（配价理论）、格语法、认知语言学等逐渐对汉语语法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突破了结构主义方法论的局限，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陈平的《现代语言学研究》除了一部分评述当前语言学的发展之外，主要是用西方功能学派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汉语和英语，提出了一种研究的新思路。《论现代汉语时间系统的三元结构》是这方面的代表作，系统地分析了汉语中的时相（phase）、时制（tense）和时态（aspect）的问题。时间在语言结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早期的汉语语法研究模仿印欧系语言的句法结构，把"了、着、过"等看成为汉语的时间标志，后来发现这种看法不对，于是只能放弃。但是，就像倒掉洗澡水把小孩儿也倒掉一样，此后的汉语语法研究基本上就不研究时间，实在是理论上的一大失误。自美籍华裔学者戴浩一发表了他的《时间顺序和汉语的语序》（译文见《国外语言学》，1988.1）之后，这个问题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如果说，这篇文章研究了时间的一个侧面，那么陈平的《论现代汉语时间系统的三元结构》一文则是对汉语语法中的时间进行系统的论述，揭示出一些重要的时间特征，其中的时相还是以往的研究不曾涉及过的一个重要问题。这种研究颇得吕叔湘先生的好评："在介绍西方语言学方面，他能做到融会贯通。在论述汉语和英语方面，也能够从新的视角出发，使读者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见为该书写的"序"）。郭锐的《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中国语文》，1993.6）也从同一角度对汉语动词的时间特征进行了细致、合理的分类。这些论著的发表打破了结构分析法的一统天下，使汉语的语法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面貌。此外，胡裕树、张斌、范晓等吸取符号学、语用学、系统功能语法的一些基本思想，提出句法

分析"三个平面"的理论，沈家煊、廖秋忠等关于汉语篇章结构的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解决了结构分析法难以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这些情况都说明，我国的语法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

生成学派的标准理论之后，句法语义现象的研究已经成为语法研究的一个重点，其中对汉语语法研究的影响比较深的是"格"语法及其相关的理论。朱德熙的语法研究已经开始运用格语法理论，不过基本上只是在主语、宾语等概念前加上"施事"、"受事"这些语义标签，解决的实质问题并不多。后来的研究在这方面有些进展。李临定的《宾语使用情况考察》(《语文研究》，1983.2)一文对汉语的语义格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察，而且还发现"格"可以由动词性词语充当等特殊的现象。这种特殊性可以成为深入探索汉语特点的一种重要线索。孟琮、郑怀德、孟庆海、蔡文兰合编的《动词用法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林杏光、王玲玲主编的《动词大词典》则都是以格语法的框架为基础全面描写汉语句子中词语搭配限制的著作，为计算机处理语义问题提供了有用的素材。鲁川、林杏光的《现代汉语语法的格关系》(《汉语学习》，1989.5)还提出格关系应先分为主体、客体、邻体、方式、根由、环境六大类，而后再分为18个具体的格的新设想。这种从大类到小类的格层级体系是一种语义聚合范畴的"格"，与菲尔墨的格理论的着眼点不同。这种理论可以弥补格语法的"格"的数目无限增多的缺陷，已在计算机上得到了很好的运用。与格理论相似的还有一种依存关系语法，现在一般都把它叫做配价语法。首先用它来研究汉语的是朱德熙的《"的"字结构和判断句》(《中国语文》，1978.1-2)。这篇文章成功地说明了如何用动词的搭配潜能("向")来控制"的"字结构的语义指向，但如何确定动词的"向"的方法则失之于简单，后来文炼、吴为章对此作出了重要的补正。吴为章对汉语动词的"向"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讨论了深层语义关系在表层句法位置上的种种限制与规律。张国宪对形容词的配价研究也发现了一些

重要特点。在理论上取得重要进展的还是袁毓林的名词配价的研究。他根据动词的配价要求控制"的"字结构的所谓例外，并从这里入手，发现了隐藏在例外中的整齐的规律：结构中的名词有特定的配价要求。他以此为基础提出名词配价的理论(《现代汉语名词的配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2.3)。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是根据汉语的结构特点对西方的语言理论进行改造和补正的一次有价值的尝试，它不仅是对"动词中心论"的挑战，而且是使配价理论趋于完善，向实现形式化的语义计算又前进了一步，在计算机语义理解方面有良好的运用前景。

认知语言学引进中国虽然是80年代以后的事情，但对汉语语法的研究已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出版和发表了一批很有分量的论著。石毓智的《肯定和否定的对称和不对称》(台湾学生书局，1992)是一部重要的语法理论著作，该书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研究汉语的语法，试图从"连续与离散"、"定量与不定量"两个方面全面梳理汉语的语法结构，找出其间的语义结构规律，开创了一条重解释的汉语语法研究的新途径。此书在台湾出版，大陆还未刊印，不过人们可以从他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如《现代汉语的肯定性动词成分》(《语言研究》，1992.2)、《时间的一维性对介词衍生的影响》(《中国语文》，1995.1)中看到这种理论的概貌。这是一条很有发展前途的研究途径。此外，刘宁生的《汉语怎样表达物体的空间关系》(《中国语文》，1994.3)、《汉语偏正结构的认知基础及其在语序类型学上的意义》(同上，1995.2)等等，也都是运用人类认知的普遍性语义或逻辑概念来描写和解释汉语语法规则的范例。袁毓林的《词类范畴的家族相似性》(《中国社会科学》，1995.1)、张伯江的《词类活用的功能解释》(《中国语文》，1994.5)则为用认知语言学的原则解决汉语词类划分问题找到了一条新的途径。

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生成学派一般认为是继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语言学之后的第三个有重要影响的语言学流派，不过它在中国的语言理论研究中影响不大。这主要是由于它的研究目标是

解释人类语言的内部生成机制，而我们描写的是现实的语言，难以直接从中吸取相关的理论。我国有些语言学家从生成理论中曾吸取某些概念(其中比较重要的是“空范畴”)，借以分析汉语研究中一种原来被忽视的现象。这方面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有徐烈炯关于空语类与语义关系的研究、赵世开关于空语类与代词关系的研究和沈阳关于汉语空语类与句法规则、语义解释对立关系的研究等。语言学上的生成理论的大思潮和在中国语言学中的小影响的矛盾说明，我们的语言理论研究的目标、方法等与生成学派都有比较大的距离，因而在汉语研究中难以全盘接受这一学派的理论。

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语法研究的主要特点是以西方的语言理论为参照点，自觉、深入地用普通语言学的理论来指导汉语的研究，从而取得了重要的进展。语言理论和汉语语法研究的关系，陈平认为，“事实上，迄今为止，我们在汉语语法研究中提到的所有重要理论、方法、概念、以致于一些术语，无一不在普通语言学理论著作中已经得到过详细的讨论和广泛的应用，在其他语言中已经有过深入的报道……普通语言学理论中的概念和方法运用于汉语往往非常成功”(《中国语文》，1989.1)。王力在1957年曾说过这样的看法，认为近50年来中国语言学的成就都是“普通语言学的恩赐”，是它“通过直接和间接的道路来影响中国语言学”(《中国语文》，1957.3)。陈平的观察和王力的论断一脉相承，甚至连用语都差不多，都强调西方语言学理论对汉语研究的决定性指导作用。

如果说，上述的“结合”性研究以西方的语言学理论为参照点的话，那么徐通锵的历史语言学、刘叔新的词汇学等则偏重于以汉语的研究为基础，吸收西方语言学中于我有用的理论和方法，探索语言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历史语言学在这一时期发展比较快，并且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就。我国原来没有历史语言学方面的理论著作，徐通锵的《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1991)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这本著作以及他和王洪君有关文白异读、语言变异

等的研究，除了比较好地解决了西方历史语言学理论、方法和汉语方言、音韵的研究相结合外，还在理论上取得了两点重要的进展。第一，以汉语的文白异读现象的研究为基础提炼出叠置式音变的理论和方法，使历史语言学继连续式音变、离散式音变之后又补充了一种新的音变方式，并据此对历史比较法和内部拟测法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补正性意见。第二，在汉语方言共存变异形式的研究中发现了一种新的“横向”计量时间的方法，可以从变异形式的相互关系中“看”到语言在几十年到几百年时间中的运转机制和演变历程。这一发现不仅为“从空间的差异中探索时间的演变序列”的历史比较法找到了语言事实的根据，而且也可以为改进语言理论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因为时间观是语言理论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根据这一假设进行语言理论研究并取得一些进展的问题有：把共时和历时统一起来，对语言系统进行动态性的研究，发现了结构与变异相互制约的一些规律；从共存变异形式的相互关系中进行音变规律的研究，找到了语言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对一些疑难问题（如语言演变的原因、方向、目标等）的研究也已取得了一些进展，提出了一些新的解释（参看《徐通锵自选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严学窘认为解放后在《中国语文》等刊物上发篇过三篇经典性的好文章（《语文导报》，1986.1），除第一篇丁声树的《谈谈语音构造和语音演变的规律》发表于1952年《中国语文》创刊号之外，其他两篇论文，即胡坦的《藏语的语素变异和语音变迁》（《民族语文》，1984.3）和徐通锵的《宁波方言的“鸭”[ɛ]类词和儿化的残迹》（《中国语文》，1985.3），都发表于80年代。这些历史语言学的论文都是从变异和不合语音结构规律的残存现象入手探索语言的演变规律的，进而发现了一些重要的音变原理，补正了原有理论中的某些不足。这是把国外以Labov为代表的语言变异理论和汉语研究相结合、历史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相结合进行语言理论研究而取得的一些积极进展。

词汇学原是语言理论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前苏联的一些

学者曾在这一领域进行过研究，而西方语言学则基本上没有词汇学。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学者对词汇学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出版了一批著作，其中最有分量的是刘叔新的《汉语描写词汇学》（商务印书馆，1990）。这是在他主编了我国最有分量的一部同义词词典《现代汉语同义词词典》（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之后写成的专著。他认为应该将词汇学与语义学、词典学分开，词汇学应重点研究：词汇单位；词汇单位的结构方式（"复合词的结构无论就其词素的顺序形式还是意义关系，都无句法性质，也非词法现象，而是词汇性的"）；词汇单位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系统网络。这种研究否定了现在流行的汉语复合词结构的语法性质，分析比较细致，重视词汇本身的结构特点，而且有理论色彩，比以往的词汇研究前进了一步。它为充实学术研究的薄弱环节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和词汇学有密切关系的是语义学。语义的研究在我国有悠久的传统，不过现代的中国语义学基本上是步西方语义学的后尘，与我国传统的语义研究基本上没有关系。由于此，我国的语义研究举步维艰，研究的成果也相对地不如其他的研究领域。这一时期出版的语义学著作主要有：《语义学》（徐烈炯，语文出版社，1990）、《汉语语义学》（贾彦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汉语词义学》（苏新春，广东教育出版社，1992）和《语义论》（石安石，商务印书馆，1993）与《语义研究》（石安石，语文出版社，1994）等。徐著偏重于国外语义学的评述，贾著主要运用西方语义理论中的义素、义场等的理论来分析汉语的语义，苏著偏重于汉语词义的理论研究。这方面比较有特色的研究还要推石安石的两本著作，因为它们能较好地联系汉语吸取西方语义学的一些精神，讨论语义单位及其组成成分、语义的聚合和组合、歧义、模糊、蕴含、寓意和预设等问题。其中对歧义、模糊这两方面问题的研究较为深入，说理也较为清楚。

在引进西方语言理论的同时，一些新兴学科在我国相继成立，逐渐形成了一些新的学科点，并结合汉语开展了自己的研究，其

中，实验语音学、心理语言学、计算机自然语言处理的成果较为显著。

实验语音学以社科院语言所、科学院声学所、北京大学中文系为主要力量。这些单位进行了大量的语音实验研究，并且在语音合成（包括单音节、多音节和儿化韵）、句调（如汉语疑问句的句调特征）、字调和句调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发现了大量以往国内外未曾发现的第一手材料，并以此为基础纠正了国外和国内音系学界的一些错误看法。这里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吴宗济先生在实验数据的基础上发现了汉语字调与字组调的关系好比音乐中的相对音阶（1 2 3）与绝对音调（C调、B调等）的关系，以一个简单的公式总结出许多复杂数据背后的规律，成功地说明了字调的心理基础。

心理语言学的研究集中在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的心理学系和安徽师范大学的中文系。已经出版了一批专著，如桂诗春的《心理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实验心理语言学纲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朱曼殊、缪小春主编的《心理语言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彭聃龄主编的《语言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等。这些著作，有些偏重于国外心理语言学的介绍，有些则结合汉语和汉人的思维特点进行一些语言心理理论的探索。在已经出版的著作中，特别值得介绍的是那些研究儿童语言习得的心理语言学，例如朱智贤的《儿童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儿童发展心理学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李丹主编的《儿童发展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许政援等的《儿童发展心理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李宇明的《汉族儿童问句系统习得探微》（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等。就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心理语言学主要是运用国外心理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汉语，精力集中在儿童汉语习得和汉字的知觉与理解两大方面。儿童语言习得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大量的事实（包括正常儿童和

聋哑儿童)说明，儿童习得汉语的发展规律和习得其他语言(主要是英语)基本相同。例如我国儿童发出各种语音的次序，早期的句子结构，对代词、空间词汇的掌握次序，对各种复句的理解过程以及儿童理解句子的策略等都和国外的研究基本一致，但是儿童习得汉语的过程也有自己的特点，这与汉语没有词形变化、有量词等有关。儿童习得语言的这种共同性和特殊性基本上决定于人类的认知机制和语言的特点：语言习得过程的共同性主要是由于认知发展规律的普遍性，而语言习得的特殊性可能是由于语言特点的不同。由此，朱曼殊、缪小春等学者提出认知是语言习得的基础，但不是语言习得的充分条件，语言本身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语言习得的过程。语言和认知的关系是双向的、辨证的，这种新理论向沃尔夫的语言决定论和皮亚杰的认知决定论提出了挑战。汉字的识别和理解的研究还证明：汉字的识别以字形编码为主，说明字形在字汇信息的储存和提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英语不论是视觉形式的习得还是听觉形式的习得，都以声音编码为主。这说明语言文字的区别具有心理现实性，表意文字和拼音文字的差异影响心理加工的方式。汉字识别还具有整体识别先于部件识别的倾向，这可能对认知的过程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实验还证明：已有的国外模式都不能完善地说明汉字语料的识别过程。这些情况说明，我国年轻的心理语言学从整体来看，还处在译介多、研究少、研究的方面不够广泛的阶段，但是在这么短的时间中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其意义恐怕已经超出了其实际成果所取得的价值。我国年轻的心理语言学现在已经在考虑更高层次的研究目标：如何设计出适合于汉字、汉语特点的实验方法，如何总结、抽象出其中的理论蕴涵等等。我们期待着心理语言学的快速发展。

西方语言理论和汉语研究的结合是发展中国语言理论的一条重要途径，但"'结合'二字谈何容易"(吕叔湘)，因为"结合"本身就是一种创造，而不是西方的语言理论加汉语或少数民族语言的例证。吕先生说的这八个字，字字千斤。现在，中国理论语言学在

"结合"的道路上已经进行了一些有成效的探索，积累了一些经验，纠正了以往对"结合"的片面理解。如和改革开放以前的语言理论研究相比较，那么应该说，这一时期的"结合"是很有成效的，而且在一些局部问题上已有所创造和发展。"空对空"的所谓"理论"已经没有什么市场，原来对语言理论研究批评得最厉害的"脱离实际"的弊端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改进。

三、创 新

中国的理论语言学在"结合"性研究的道路上已经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如果说，前一章所介绍的石毓智的认知理论、袁毓林的配价理论和徐通锵的音变理论等都只是对理论语言学的一些局部性补正，那么在语言论和汉藏语研究方面，我国学者已经开始了具有整体性意义的创新性探索。这两个领域的共同特点是近三四十年来积累了大量的描写性语料，其中不少语料用西方语言理论很难解释，只能靠自己去摸索建立新的方法、理论范畴和假设。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有了一些突破。例如，朱德熙的《潮阳话和北京话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方言》，1982.3)、王洪君的《汉语常用的两种语音构词法》(《语言研究》，1994.1)和《什么是音系的基本单位》(《现代语言学》，语文出版社，1994年)等论文，全面地梳理了汉语的语音构词法及其历史演变的规律，揭示了"-儿"等后缀词在汉语中的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及其演变过程，论述了汉语的重言、双声叠韵、嵌1词、"圪-"字头等语音词的特殊构造。他们从这些语音构词法的共时规则和历史演变的方向入手，又揭示出汉语基本结构单位的"一音节一义"的突出特点。徐通锵的《语义句法刍议》(《语言教学与研究》，1991.3)以这种"一音节一义"为基础具体考察它对汉语整个语法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提炼出"结构关联"这个重要概念。尽管徐文对汉语语言结构的具体描写还有待于进一步改进，但"结构关联"的概念在揭示语言结构的特点(不仅仅是汉

语)方面的作用已不容忽视。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弥补了组合、聚合两根轴只能反映性质相同的单层面(如语音单层面或语法单层面)上成分的相互制约关系的不足,而且也弥补了接口语法只处理不同层面间具体成分对应关系的缺陷。这一理论可以具体地揭示层面与层面之间所存在的模式化、一般化的系统联系,在普通语言学的语言本体论方面是很有理论意义的。

我国是汉藏语系的故乡,但是,如何确定汉藏语系的语言?侗台语、苗瑶语是不是属于汉藏语系?谱系树理论是不是适合于汉语和藏、缅、侗、台、苗、瑶等语言的关系的研究?这些问题困扰着汉藏语学界,在国际上存在着尖锐的争论。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应该根据什么标准来确定亲属语言?具体语言的系属划分问题仅仅是这一核心问题的具体表现形式。由于这一问题与中国理论语言学的发展方向、发展特点、它对普通语言学的贡献等问题的关系比较密切,因而我们这里需要多说几句。先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个领域的学术研究的发展历程,而后介绍我们的创新性研究以及它对普通语言学的贡献。

汉藏系语言的研究起步较晚,大体上始于本世纪的 20 年代。解放以前,我国学者已经开始做汉藏系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王静如 1931 年发表的《中台藏缅数目字及人称代词语源试探》(《史语所集刊》3 本 1 分)通过数目字和人称代词的关系来论证中台藏缅之间的同源关系。1937 年,李方桂在《中国的语言和方言》一文中提出了汉藏语系的假说,认为它可分为藏缅语族,壮侗语族,苗瑶语族和汉语族。美国的《中国语言学报》(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于 1973 年的创刊号上全文重新发表,而且编辑部还加了按语,明确认为这种系属划分仍旧适用于现在汉藏系语言的研究。李方桂划分汉藏系语言的标准是这些语言的单音节性和声调上的一致性。40 年代末,邢公畹的《汉语"子"、"儿"和台语语助词 luk 试释》、《汉台语构词法的一个比较研究》(《国文月刊》第 68 期,1948;第 77 期,1949)和俞敏的《汉语的"其"跟藏语的 gji》(《燕京

学报》第 37 期，1949）等文章，又从语法的角度论证汉语和藏语同源。这几篇文章是当时条件下讨论汉藏语系发生学问题的重要代表作，其中李方桂所提出的单音节性和声调一致性的标准被很多学者看成是确定汉藏语系的主要标准。解放后，一直到 60 年代，我国学者又根据量词、虚词、缺少形态变化、语序等共同的语言类型特征进一步认定侗台语、苗瑶语、藏缅语和汉语有同源关系。这方面比较重要的文章有：罗常培的《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系属和文字情况》（《人民日报》，1951.3），罗常培、傅懋勣的《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概况》（《中国语文》，1954.3），马学良、罗季光的《我国汉藏语系语言元音的长短》（《中国语文》，1962.5），邢公畹的《论调类在汉台语比较研究上的重要性》（《中国语文》，1962.1）和《现代汉语和台语里的助词"了"和"着"》（《民族语文》，1973.2-3）等。从解放前到解放后，我国汉藏系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广泛依赖语言类型标准来确定同源关系，并且在这一标准的基础上，集中精力进行语言调查、语言和方言的识别与划分，很少讨论汉藏系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的理论问题。

70 年代末，学术研究走向正轨，开始了对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的理论探讨，其中发生学问题的同一性是这种理论探讨的焦点。这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国内早期有关汉藏语系的假说尚未得到严格的证实，其次是因为国外许多学者认为苗瑶语和侗台语不属于汉藏语系，甚至有人认为藏缅语和汉语的同源关系也没有得到证实。国外的一些学者如白保罗、马提索夫等批评中国学者在确定汉藏系语言的系属问题时没有严格区分发生学关系和类型学关系，认为中国学者把侗台语、苗瑶语归入汉藏语系所依赖的标准主要是声调、单音节、量词和语序，而这些都属于类型学标准，不足以证明语言的同源关系；侗台语、苗瑶语和汉语在类型上的相似是借用的结果，应该把它们归入东南亚的南岛语或南亚语。我国大多数学者对此持异议的态度，认为语言结构的稳定性很强，少数借用是可能的，各层面广泛的相似不该简单地看成是借

用，而应该作为同源关系的重要证据。邢公畹《论汉藏语言的比较语法学》（《南开大学学报》，1979.4），俞敏《汉藏比较的范围应该扩大》（第15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论文，1982），赵衍荪《白语的系属问题》（《民族语言研究文集》，1982）、王敬骝、陈相木《傣语声调考》（云南民族研究所《民族语文》，1983.4），罗美珍《试论台语的系属问题》（《民族语文》，1983.2），俞敏《汉藏虚字比较研究》（《中国语文学论文选》，东京光生馆，1984），毛宗武、蒙朝吉《试论畲语的系属问题》（《中国语言学报》第2期，1984），张济民《从语音特点和词义生成看仡佬语与苗语的关系》（《贵州民族研究》，1984.3），王辅世《瑶语的系属问题初探》（《民族语文》，1986.1）等有代表性的系属问题的讨论文章中，都把类型标准作为重要的标准。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展开，人们发现语言之间的相互接触和语言发展的共同规律也可能产生类型的相似。这方面的重要文章有：

单音节方面 罗美珍《台语长短元音探源一得》（《语言论文集》，1985）认为侗台语是从多音节变为单音节的，作为一种补偿现象，产生了长短元音。孙宏开《羌语动词的趋向范畴》（《民族语文》，1981.1）、《羌语支问题初探》（《民族语言研究文集》，1982）、《六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及其系属分类》（《民族语文》，1983.3），瞿霭堂《嘉戎语的方言》（《民族语文》，1990.4-5）等文章的研究说明，羌语和嘉戎语也不是单音节的。

量词方面 梁敏《侗台语族量词的产生和发展》（《民族语文》，1983.3），孙宏开《藏缅语量词用法比较——兼论量词发展的阶段层次》（《中国语言学报》第3期，1989），徐悉艰《景颇语量词的产生和发展》（《民族语文》，1987.5），游汝杰《论台语量词在汉语南方方言中的底层遗存》（《民族语文》，1982.2），张公瑾《论汉语及壮侗语族诸语言中的单位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4），张元生《海南临高话》（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等从不同民族语言的研究中都证明了量词是较晚发展起来的词，有些侗台语和藏缅语的量词至今还没有完全虚化。这些都可以说明，侗台语、藏缅语和汉语的量

词没有同源关系，三者之间有少数相同的量词都是借用的结果。

形态方面　戴庆厦《载瓦语使动范畴的形态变化》(《民族语文》，1981.4)、《景颇语的句尾词》(《民族语言研究文集》，1990)，胡坦《论藏语比较句》(《民族语文》，1985.5)，瞿霭堂《嘉戎语动词的人称范畴》(《民族语文》，1983.4)、《藏语动词的屈折形态的结构及其演变》(《民族语文》，1985.1)、《论汉藏语言的形态》(《民族语文》，1988.4)，孙宏开《羌语动词的趋向范畴》、《我国藏缅语族动词的人称范畴》(《民族语文》，1983.2)、《藏缅语动词的互动范畴》(《民族语文》，1984.4)，谭克让《藏语动词的自动与使动态》(《民族语文》，1986.6)等文章说明藏缅语并不象人们过去假设的那样只用虚词而没有形态。

声调方面　这是讨论得最多的问题，因为李方桂曾把声调作为确定同源关系的最重要的标准，理由是不仅这些语言大多有声调，而且声调类型是一致的。比如侗台语的声调可以象汉语一样分成 A, B, C, D 四类，又按照声母的清浊再分阴阳。新的调查研究证明声调类型的相同不等于声调的同源。戴庆厦《我国藏缅语族松紧元音来源初探》(《民族语文》，1979.1)、《藏缅语族松紧元音研究》(《中央民族学院论文选》，1980)，胡坦《藏语(拉萨话)声调研究》(《民族语文》，1980.1)，瞿霭堂《藏语的声调及其发展》(《语言研究》，1981.1)，孙宏开《六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及其系属分类》，陈其光《汉藏语的几种声调》(《贵州民族研究》，1984.3)，戴庆厦、岳相昆《景颇语的声调》(《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5.3)，瞿霭堂《汉藏语言调值研究的价值》(《民族语文》，1985.6)，孙宏开《藏缅语复辅音研究》(美国《藏缅语区语音学》9 卷 1 分册，1987)，戴庆厦《载瓦语声调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1)，陈康《彝语支调类诠释》(《民族语文》，1991.3)，李永燧《彝缅语言声调比较研究》(《民族语文》，1992.6)，瞿霭堂《论汉藏语言的声调》(《民族语文》，1993.6-1994.1)，黄布凡《藏语方言声调的发生和分化条件》(《民族语文》，1994.8)，冯蒸《试论藏文韵尾对于藏语方言声调演变的

影响》(《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4.2),等等,所有这些学者有关藏缅语声调的研究都证明了藏缅语的声调是独立于汉语的声调系统而发生、发展起来的,而发生、发展的条件则和声母的清浊、辅音韵尾的脱落、前缀语素的脱落有密切关系,其中胡坦等学者对这种关系的解释尤其令人信服。至于侗台语的声调,罗美珍《黎语声调刍义》(《民族语文》,1986.3)发现,黎语虽然属于壮侗语族,但是声调和壮侗语族的其他语言不大一样,说明黎语从壮侗语族分化出去时,壮侗母语并未发展出现在的6个舒声调和4个促声调,而去声和阴阳调的分化都是后来产生的,就是说,这些声调都不是在一个层次上产生的。黎语的声调和汉语的声调也不对应。罗美珍在《对汉语和侗台语声调起源的一种设想》(《中国语文》,1988.3)一文中又进一步讨论了声调的发生学问题,认为侗台语声调的产生常常是语音结构简化的补偿,由其他音素的伴随物变成独立的音位。这说明原始台语的声调和原始汉语的声调也没有共同的发生学关系。

语序方面　梁敏《壮侗语族诸语言名词性修饰词组的词序》(《民族语文》,1986.5)经过比较后认为,早期壮侗语的语序比较一致,除了数词外,各种修饰成分基本上都在中心词之后,后来受汉语的影响,词序产生了不同的变化,以名词、代词和各种词组充当前置修饰成分的现象不断增多。这说明语序也会因为接触的影响而变得相似。

有关汉藏系语言的声调、量词、形态等类型特征的研究现在还在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材料说明,不能用类型特征来确定语言的同源关系。我国学者逐渐认识到这一点,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同源词和语音对应规律的比较研究。其实,早在1986年以前,已有不少学者在寻找同源词,比如陈其光《畲语在苗瑶语族中的地位》,严学宭《谈汉藏语系同源词和借词》(《江汉语言学丛刊》第1辑,1979),马学良《彝语"二十、七十"的音变》(《民族语文》,1980.1),郑贻青《黎语和壮、傣、侗、水等元音的比较试探》(向全国民族语言

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1980)，陈其光、李永燧《汉语苗瑶语同源例证》(《民族语文》，1981.2)，孙宏开《羌语动词的趋向范畴》，郑张尚芳《汉语上古音系表解》(油印稿，1981)，李钊祥《现代侗台诸语言声母和韵尾的对应规律》(《民族语文》，1982.4)，孙宏开《羌语支问题初探》(《民族语言研究文集》，1982)，邢公畹《汉语遇蟹止效流摄的一些字在侗台语里的对应》(《语言研究》，1983.1)和《"别离"一词在汉语台语的对应》(《民族语文》，1983.4)，罗美珍《试论台语的系属问题》(《民族语文》，1983.2)，李永燧《汉语藏缅语人称代词探源》(《中国语言学报》第2期，1985)，毛宗武、蒙朝吉《试论畲语的系属问题》(同前)，俞敏《汉藏虚字比较研究》，孙宏开《藏缅语复辅音的结构特点及其演变》(《中国语文》，1985.6)等。但是这一时期的多数文章在寻找同源词的时候都或明或暗地依赖着类型学的标准，因此很少对汉藏语系由四大语族构成的假说提出疑问。在1985年以后发表的一些有影响的文章中，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它们从语音对应规律出发寻找同源词，开始对汉藏语系四语族说的假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同时，由于不怎么依赖类型学的标准，比较的范围也开始扩大，一些和汉藏系语言相邻但在类型上不相同的语言，如南岛语和南亚语也纳入了比较的范围。

藏缅语和汉语有同源关系，国内外学者一般没有什么争议，俞敏《汉藏同源字谱稿》(《民族语文》，1989.1-2)进一步说明了汉语和藏缅语之间的同源关系。有关汉藏系语言的系属划分问题，分歧最大的是侗台语的归属，形成了几种不同的观点，相互的比较和争论促进了汉藏系语言发生学理论的研究。

一、邢公畹《汉语和侗傣语里的-m、-ng交替现象》(《民族语文》，1986.4)、《论汉语台语"关系字"的研究》(同上，1989.1)、《台语-am、-ap韵里的汉语"关系字"研究》(同上，1990.2)、《台语-ok韵是汉台语比较的关键》(同上，1992.6)，罗美珍《汉傣同源词辨》(《语言研究与应用》，商务印书馆，1992)，认为侗台语属于汉藏语系。

二、邢公畹《关于汉语南岛语的发生学关系问题》(《民族语文》,1991.3)、《汉语南岛语声母的对应》(同上,第 4 期)、《汉语南岛语声母及韵尾辅音的对应》(同上,第 5 期),进一步认为南岛语和侗台语都属于汉藏语系。

三、倪大白《中国的壮侗语与南岛语》(《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3)、《侗台语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南岛语与百越诸语的关系》(《民族语文》,1994.3),认为侗台语和南岛语有同源关系,但由于受汉语的强烈影响,发生了类型上的转换。

四、王敬骝、陈相木《论瓦语"街"和傣语"街"的同源关系》(《民族调查研究》,1985.4)、《论孟高棉语与侗台语的"村寨"、"姓氏"、"家"的同源关系》(《民族语文》,1982.3)、《瓦傣骈俪语比较研究》(《民族学报》,1983-1985)、《傣语声调考》、《西双版纳老傣文五十六字考释》(《民族学报》第 2 期,1988)等文章认为,侗台语和南亚语有亲属关系,但对侗台语和汉语的关系没有下结论。

至于苗瑶语,王辅世《苗瑶语的系属问题初探》(《民族语文》,1986.1),陈其光《苗汉同源词谱》(《中央民族学院学报》增刊,1990),主要从同源词的角度讨论了苗瑶语和汉语的同源关系,国内还没有人提出异议。

这些关于同源问题的讨论,不论其结论的可靠性如何,从依赖类型标准确定汉藏系语言的同源关系到通过寻找同源词和语音对应规律去确定汉藏系语言的同源关系,这应该说是我国历史比较语言学在理论上的重要进展,因为以汉藏系语言为中心的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语言在类型上很相似,很容易让人从类型上冒然得出同源的结论。这种进展是在通过和国外学者的争论、然后带着问题再进行调查和研究而得出的。

尽管我国学者在汉语和侗台语、苗瑶语之间找到了一些同源词,但国外以白保罗、马提索夫为代表的许多学者认为这些词不是基本词汇,尤其不是核心词,这又引起了一场理论上的争论:什么样的词才算是基本词汇和核心词?基本词汇和核心词可不可以借

用？基本词汇和核心词的借用会不会产生语音对应规律？古代借词和同源词在语音上有什么区别？这些问题不仅对我国学者是崭新的课题，对白保罗、马提索夫等国外研究汉藏语的专家来说也是新问题，甚至19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也没有碰到过如此复杂的问题。近年来，我国学者对此作了一些探索。严学宭《汉语同族词内部屈折的变换模式》(《中国语文》，1979.2)，郑张尚芳《汉语上古音系表解》，董为光、曹广衢、严学宭《汉语和侗台语的亲缘关系》(日本 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March, 1984)，提出了同族词比较的方法：先分别找出侗台语和汉语的同族词，再找同族词的语音对应规律，符合语音对应规律的就是侗台语和汉语的同源词。这种方法的理论基础是：同族词是同一语言中一组音义相关而又有语源关系的词，很难在同一时间和地点都被借用到另一语言中去，因此两种语言的同族词的语音对应可以用来证明它们之间的同源关系。宋金兰《汉语和藏缅语住所词的同源关系》(《民族语文》，1994.1)将住所词归纳成若干个词族系统，用词族比较法对汉语和藏缅语的住所词进行整体比较，发现汉语和藏缅语的住所词都源于洞穴和土地词，因而认为这是它们有同源关系的具体证明。

最近，邢公畹《汉台语比较研究中的深层对应》(《民族语文》，1993.5)又提出了一种比较法，叫做深层对应法，又叫语义学比较法，以与印欧系语言的“形态学比较法”相对立。例如：

广州　ɔːn¹ < $_c$*ʔan　“鞍”：　泰 ʔaːn¹ < *ʔ-　“马鞍”

广州　ɔːn¹ < $_c$*ʔan　“侒”：　泰 ʔaːn¹ < *ʔ-　“吃”

现代泰语的“马鞍”与“吃”是同音词，汉语广州话的“鞍”与表示“吃”义的“侒”也是同音词。邢公畹先生据此认为，这样的对应决不会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汉、台两种语言有共同的发生学关系的明证。所以，这种比较法的核心是同义的同音词对应。

同族词对应和深层对应是我国学者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的新探索，无论这些方法是否可行，它们可以加深对古借词和同源词

的关系的认识、加深对深层语音对应规律的认识，这是没有疑问的，比类型说前进了一大步，可以说，这是我国学者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所作的一种新探索。但是，要用这些方法来鉴别汉语和其他汉藏系语言之间的关系的性质，确定它们是接触关系还是同源关系，其中音与义都相似的词是古借词还是同源词，看来还有很大的困难，至少可以说，它们还不是理想的标准。面对这些语言关系的性质难以确定、古借词和同源词的区别难以区分的问题，有一些学者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了语言接触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文章有：游汝杰《论台语量词在汉语南方方言中的底层遗存》，张均如《广西中南部地区壮语中的老借词源于“平话”考》(《语言研究》，1982.1)，曹广衢《壮侗语中和汉语有关的词的初步分析——有关上古汉语阴声韵韵尾的一点线索》(《民族语文》，1983.2)和《从布依语的汉语借词考察汉语调值的变化》(《贵州民族研究》，1983.3)，孙宏开《六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及其系属分类》，罗滔《略谈壮语的汉语借词》(《龙岩师专学报》，1985.1)，张均如《广西中南部地区壮语中新借词读音的发展》(《民族语文》，1985.3)，张元生《海南临高话》(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吴安其《温州方言的壮侗语底层初探》(《民族语文》，1986.4)，张均如《广西平话中的壮语借词》(《语言研究》，1987.1)和《记广西南宁新圩平话》(《方言》，1987.4)，张均如、梁敏《广西壮族自治区各民族语言的互相影响》(同上，1988.2)，石林《侗语中汉语新借词的读音》(《民族语文》，1994.5)。通过语言接触的研究不仅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类型特征不能作为确定同源关系的标准，而且还让人们看到实词和虚词都可以借用，因而要确定同源词和古借词、鉴别语言关系的性质，还得采取一种更为谨慎的态度。

前面的一系列研究清楚地说明，现在流行的历史语言学理论难以解释汉藏系语言的相互关系及其与此相关的问题，因此人们逐渐认识到谱系树模式只考虑语言分化而不考虑语言接触是有其严重的局限的。王均在《民族语文创刊10周年学术交流会的发

言》(《民族语文》,1989.2)中对谱系树的一元论提出了怀疑,认为谱系树把现代诸亲属语言和方言看成从一个上古完全统一而无方言差异的原始母语分化的结果,势必会扭曲语言的实际状况,把母语构拟成无比复杂的体系。几代语言学家的艰苦研究、深入的学术讨论、多侧面的探索和理论上的怀疑,促使语言学家的注意力逐渐集中到如何判断语言的同源关系与接触关系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上,开始酝酿理论的突破。1994年夏,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博士研究生陈保亚的博士论文《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提出语言接触的"无界有阶"的理论,使如何判定语言的同源关系和接触关系有了一种全新的标准。

鉴于以往语言接触的研究过于零散,说服力不强,陈保亚在云南民族学院、云南大学任教和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生期间,跟踪调查了几种与汉语有不同接触程度的傣语方言,全面考察两种语言的接触机制。他发现,语言的接触只要密切到一定的程度,无论是核心词汇、同族词还是意义不相干的同音词,都有可能由一种语言借入另一种语言。针对这些接触的现象,经过缜密的理论思考,陈于1994年完成了30余万字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在讨论汉、傣两种语言相互影响的具体过程的基础上建立起语言借贷的"度"和"阶"这两个重要的理论概念,并进一步揭示出语言接触的机制:借贷的"度"的深浅决定于社会因素,借贷的"阶"则决定于语言内部的结构因素。接触是一种无界而有阶的互协过程:随着接触程度的加深,借贷逐渐向语言的核心部分渗入,不存在基本词汇不受借贷影响的界限(借贷无界);但是,基本词汇总是比一般词汇受到的影响要小一些、慢一些,从而呈现出不同的"阶"(借贷有阶)。作者据此对传统的理论提出了挑战,认为以往确定语言亲属关系的"语音对应"和"同构"这两条标准既可能是由发生学关系产生的,也可能是由语言接触关系产生的,它们只是确定语言亲属关系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足条件,因而不能作为鉴别语言的亲属关系和接触关系的标准。陈保亚根据这种"无界而有阶"的理论,提出了一种

鉴别语言同源关系与接触关系的新标准：关系词的阶曲线，即：首先确定两种语言确有语音对应关系的关系词，再根据与人类世世代代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程度，分出词汇单位由核心到外围的不同的阶；然后分别统计和计算关系词在不同阶的词汇中的比例，最后利用数学手段计算出关系词的阶曲线。核心词的选择以Swadish 语言年代学的100 词和200 词为准，这是由于这一材料具有较大普适性，而且可以避免作者本人选材的主观性。核心词的比较研究在确定语言关系的性质时占有重要的地位。根据这一鉴别的标准，语言的同源关系和接触关系的区别应该是：有同源关系的语言，越是核心的词汇，其关系词越多，阶曲线下倾；而接触关系则正好相反，越是核心的词汇，其关系词越少，阶曲线上扬。陈保亚用这一标准检查现在已经有所研究的语言关系（其中包括印欧系语言），全部适用，无一例外；以此验证汉、台两种语言的关系的性质，因其阶曲线的走向上扬，因而只能认为它们的相似性是由语言接触而形成的语言联盟，相互间没有发生学关系；由此也可以确定由法国沙加尔提出的、得到我国邢公畹、郑张尚芳等人支持的华—澳语系的假设也是没有根据的。

“无界有阶”的语言接触理论是历史语言学中的一种新的理论模型，可以和谱系树理论、波浪理论相匹敌而毫不逊色。这是我国学者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的一个重要贡献。这部著作即将由语文出版社出版，现在虽然还没有与读者见面，但它的雏形在《羌夏—澳越文化联盟论》（《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3）中已露端倪，阶曲线的思想已在文章中有所表述。这说明，经过几代语言学家几十年的艰苦探索，我们的语言理论研究已经开始摆脱单纯的模仿和介绍而走向独立的探索。

汉语和汉藏系的语言还有许多难以用西方的语言理论来解释的难点，有待于我们去探索，可以预见，这是我国的语言理论研究大有作为的一个重要领域。

四、展　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理论语言学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与西方语言学比较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种差距主要不是表现在具体领域的研究水平的差异，不是人家有生成语言学、功能语言学等，我们在这方面赶不上人家（因语言结构不同，有些不好直接相比），而是思路上有差距。语言理论不是空洞的说教，不是介绍和述评，而是要在具体语言现象的研究中提炼出其中所隐含的普遍理论原则，因而在富有"个性"的语言现象的研究中必须具有"共性"的眼光，这样才能总结出有价值的语言理论。乔姆斯基在创建转换生成语言学的时候所研究的语言主要就是英语，但他在这种具体语言的研究中因其具有普通语言学的眼光，想从中解决人类语言的内部生成机制，因而能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语言理论来。我们欠缺的主要就是这种从"个性"中悟察"共性"的思路和精神。汉字的声、韵、调分析法我们讲了千余年，但都只是就汉语论汉语，而美国语言学家却从这里发现了它的普遍理论意义，创立了韵律单位层级说，促进了生成音系学、非线性音系学的发展。据生成音系学的创始人 M. Halle 告知，他们在各种语言的韵律规则的研究中都发现了辅音在音节首和音节尾的功能不同，因而发现汉语音韵学的音节层次结构说原来是一种普遍的结构模式。这种结构原理现已被普遍接受，其惊人的解释力令许多音系学家震惊（王洪君：《汉语的特点与语言的普遍性》，《缀玉二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汉语的研究成果由外国语言学家来总结、提炼它的普遍理论意义，这对中国语言学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讽刺。我们的理论水平不如人家，恐怕主要就表现在这里。现在，我国的语言理论研究正酝酿着一次重大的理论变革，主要是想以汉语的"字"（口说的字）为基础进行汉语的研究。这是由赵元任先生于 1975 年首先提出来的。他认为字是中国人心目中的中心主题，汉语中没有词

而只有字的观念，应该以字（即文中的音节词）为基础研究汉语。遗憾的是，大陆的语言学家到1992年才看到这项研究。不过这种情况没有阻碍国内语言学家的思考。徐通锵于1991年冬在香港华语社会中的语言学教学研讨会上提出字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语音、语汇、语义、语法的交汇点（香港语言学学会：Newsletter, No.13 May 1992）。汪平在根本不知道赵、徐的观点的情况下在1992年初起草了《字本位语法》（尚未发表，这里据他于1993年冬送给我的打印稿）。这种不同层次、不同年龄、不同地区的语言学家在相互不知情的情况下向着共同的方向探索汉语的研究道路，说明客观研究的条件已经具备，要求语言学家的研究满足客观发展的需要。如果这一思路得以确认，这将是一项世纪之交的系统工程，会涉及到语言理论、方法的调整与改进。徐通锵、王洪君已经先后发表了四篇论文，不过还都是理论上的初步探索。这种思路与现在流行的理论大相径庭，人们一时自然难以接受。不管人们的看法如何，“字”的问题将是今后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可以以此为基础为汉语研究如何摆脱“印欧语的眼光”的束缚探索出一条前进的道路。

以字为基础的汉语的结构，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顽强的表义性。汉语为什么有悠久的语义研究传统，这不是偶然的，与字的特点密切相关；汉字没有通过假借而走上拼音化的道路和近代意译词代替音译借词的事实，也都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印证字的顽强的表义性特点。反映汉语这种结构特点的语义研究是中国语言学的优势，与印欧语突出语法研究的传统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语义研究在印欧系语言的研究中是比较薄弱的。从语言学的发展趋向来看，语言学的研究重点今后将会转向语义。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转换生成学派的理论前后为什么会经历如此激烈的动荡，理论模式一变再变，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解决不好语义与语法的相互关系问题。这方面的研究今后将会不断深化。现在，国外已有很多学派从不同的角度探索语法和语义的相互关系及其制约词语搭

配的普遍性规则，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由于印欧系语言缺乏语义研究的传统，今后很有可能会转向汉语的研究，从中吸取汉语语义研究的理论、经验和方法。由于语言的个性中隐含着共性，特别是语义的结构，这种共性将会更明显，因此我们今后以字为基础的汉语研究应该加强语义的研究，从中发现和提炼它的普遍理论意义，以丰富普通语言学的理论。希望这一次不再是由外国语言学家来为我们总结汉语语义研究的普遍理论意义。

语言学由于善于从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吸取自己所需要的理论和方法，因而它的理论和方法在人文科学中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其他学科往往需要从语言学中学习相关的理论和方法。随着现代交叉学科的发展，语言学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特别是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已向语言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特殊的要求，但现在语言学还无法满足这些要求。如何考察语言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使语言研究能适应其他学科发展的需要，这是今后语言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乔姆斯基的生成转换语法的诞生曾为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而现在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又反过来敲语言学的大门，我们的语言理论研究如能顺应这种科学发展的需要，必将有一个重大的发展。计算机的运作是以最小单位进行自左而右的扫描，因而语言最小结构单位的确定和研究自然就成为一项重要任务。汉语的最小结构单位是字，目前计算机学界为什么对字的研究比较感兴趣，其原因恐怕就在这里。所以，汉语的“字”的研究既是最传统的，但也是最现代的。字，恐怕是我们今后的语言理论研究想回避也回避不了的一个重要问题。

后记

本文的初稿原是为领导机构制定学科规划而起草的一个咨询报告。由于我们了解的情况有限，曾发函恳请各地的有关专家提供相应的资料和意见。我们先后收到的咨询意见书有（按姓氏的音序排列）：

1. 陈保亚，《文革以来汉藏语言历史比较研究理论的调查》
2. 冯志伟，《科学思潮的发展与理论语言学研究》
3. 胡壮麟，《国外语言理论的引入和应用》
4. 李宇明，《中国心理语言学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5. 刘大为，《对理论语言学研究的一点看法》
6. 刘叔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理论语言学发展情况的几个方面》
7. 缪小春、朱曼殊，《我国心理语言学研究概况》
8. 戚雨村，《文革后的语言理论研究和语言对比研究》（外语界）
9. 邵敬敏，《有关新时期汉语语法理论研究的简况》
10. 沈家煊，《几点意见》
11. 沈　阳，《关于生成语法汉语的现状与展望》
12. 孙宏开，《关于少数民族语言中开展比较语言学研究的一些情况和问题》
13. 邢公畹，《有关比较语言学、语义语法和文学艺术的关系研究的意见》
14. 游汝杰，《社会语言学》，《语言地理学》

本文是在参考这些咨询意见的情况下写成的。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和视角的差异，有些很好的意见可能没有吸收进来，这只能向有关的专家表示歉意了。对于大家的热情支持和帮助，我们在这里再一次表示诚挚的谢意。

汉语史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许嘉璐　朱小健

一、概　说

语言学界所说的汉语史研究，实际上包括对汉语通史的研究和对汉语研究史的研究。

我国古代学者很早就注意到了对汉语及其历史的研究。先秦时期，在诸子的著作中，有关语言的学说已肇其端；其后，经过两汉训诂学的兴盛，魏晋之后音韵学的发达，到了清代，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已经得到全面发展；以1898年《马氏文通》的问世为标志，汉语研究的各个分支逐步汲取了西方语言学营养，语音、语法、词汇等领域渐次独立，并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建国以后，汉语史的研究得到了加强。1955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教育部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中国科学院也召开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规定了我国语言文字工作的三大任务，即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围绕这三大任务的实施，语言文字学的各个分支学科都展开了自己的研究工作，汉语史的研究也随之展开并取得了不少成绩。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末，汉语史的研究停滞了一段时间；80年代以来，研究工作又重新恢复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本文就是对70年代末以来的汉语史研究状况的概括叙述，所依据的资料基本限于除台湾省、香港和澳门地区外的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

全面研究汉语通史的著作目前还很少，王力《汉语史稿》(中华

书局，1956)是这方面的开山之作，它为其后汉语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该书出版后，近40年间没有再出现过这方面的专门著作。1993年向熹的《简明汉语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是这方面的最新成果。向书分三编，分别论述了汉语语音、词汇、语法自上古至近现代的演变规律和时代特点。所谓"简明"，主要是论述扼要，其篇幅并不小，其中引例相当丰富；该书对运用口语材料来说明汉语的发展比较重视，并较全面地总结吸收了此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对中古和近代汉语的论述较为详尽。在绪论部分，还具体介绍了汉语史研究的归纳、比较、统计、实证、探源、转换、推演等研究方法。与王力先生的著作相比，向书可以说是青出于兰而胜于兰。此外，程湘清主编的论文集《先秦汉语研究》、《秦汉汉语研究》、《魏晋南北朝汉语研究》、《隋唐五代汉语研究》、《宋元明汉语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82—1992)是众多学者进行汉语断代研究的成果，但所收内容较为分散，并非全面系统的断代语言研究。

汉语研究史的研究则有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濮之珍《中国语言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李开《汉语语言研究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等著作。相对说来，这些论著都还比较"简要"，只是对2000多年来汉语研究历程的粗线条勾勒。

在这两方面的研究中，成果更多的还是汉语史各个部门(音韵学、语法学、训诂学)的具体研究。

二、研究现状

1. 音韵学

汉语音韵学是中国传统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从汉代开始，经过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100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具有古音学、今音学、等韵学三大部门的自成体系的学科。

建国以来，汉语音韵学的研究发展经历了50年代的初步繁荣、60年代中后期的停滞不前、70年代末以来重新发展的过程，目前在其研究的各个领域都获得了相当的成就。

介绍汉语音韵学的基本内容、评述汉语音韵学研究历史的状况，是音韵学界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70年代末以来，伴随着高等院校文科系和专业古代汉语、汉语史课程的开设，出现了一大批音韵学教材和通论性著作。其中有的较全面地介绍论述了汉语音韵学的基础知识，如陈复华的《汉语音韵学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史存直的《汉语音韵学纲要》（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陈振寰的《音韵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何九盈的《古汉语音韵学述要》（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赵振铎的《音韵学纲要》（巴蜀书社，1990）、汪寿明、潘文国的《汉语音韵学引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等；有的对汉语语音的发展演变作了简明的勾勒，如邵荣芬的《汉语语音史讲话》（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方孝岳的《汉语语音史概要》（商务印书馆，1979）、史存直的《汉语语音史纲要》（商务印书馆，1979）、任铭善的《汉语语音史要略》（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王力的《汉语语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等；有的分别就汉语语音史中的一段进行全面考察或介绍，在上古音方面如陈复华和何九盈的《古韵通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何九盈的《上古音》（商务印书馆，1991）等，在中古音方面如唐作藩的《音韵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李新魁的《中古音》（商务印书馆，1991）等；有的就音韵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进行研究或概述，关于反切，有殷焕先的《反切释要》（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林序达的《反切概说》（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许梦麟的《反切拼读入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等，关于等韵，有李新魁的《汉语等韵学》（中华书局，1983）等，在音韵学史方面，有周斌武的《汉语音韵学史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等。此外，还有不少论著对音韵学的基本知识或古代的韵书作了普及性的介绍。如王力的《音韵学初步》（商务印书馆，1980）、《汉语音韵》（中

华书局，1991）、李思敬的《音韵》（商务印书馆，1985）、张世禄和杨剑桥的《音韵学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唐作藩的《汉语音韵学常识》（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重印）以及赵诚的《中国古代韵书》（中华书局，1979）、李新魁和麦耘的《韵学古籍述要》（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等。而李葆瑞的《应用音韵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1988）、沈祥源和杨子仪的《实用汉语音韵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0）、殷焕先、董绍克的《实用音韵学》（齐鲁书社，1990）、郭启熹的《古音与教学》（福建教育出版社，1986）等，则从应用的角度论述了汉语音韵学的常识。这些著作在普及音韵学知识、指导音韵学学习与研究等方面都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整理、重印古代韵书、韵图、音韵论著，编印出版音韵学工具书，是普及音韵学、便于音韵学界的研究所必需的。到目前为止，古代的重要音韵著作，像《广韵》、《钜宋广韵》、《集韵》、《中原音韵》、《切韵指掌图》、《切韵考》、《音学五书》、《古韵标准》、《六书音均表》、《诗声类》，以及《切韵求蒙》等都已影印出版。

周祖谟编纂的《唐五代韵书集成》（中华书局，1983）、李新魁编写的《韵镜校证》（中华书局，1982）、宁忌浮校订的《校订〈五音集韵〉》（中华书局，1992）、照那斯图、杨耐思的《蒙古字韵校本》（民族出版社，1987）、康瑞琮校点的《毛诗古音考》（中华书局，1988）、陈振寰注评的《韵学源流》（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等，对前人的音韵学著作进行了重新整理。其中周著对其所集的唐五代全本和残本7类30种韵书的内容、体制、特点逐一进行了考释，并与有关韵书作比较，指出异同，阐明彼此之间的关系；收录了敦煌所出与音韵有关的书籍写本及唐代郭知玄诸家韵书的佚文，还附有《切韵系韵书反切沿革异同表》和《唐韵前韵书收字和纽数多少比较简表》。这是迄今收集最完备、考释最精当的《切韵》系韵书汇编本，对中古音的研究裨益甚大。李著参考各种韵书，对《韵镜》作了详细的校订、宁著对《五音集韵》作了全面深入的校订和研究，照、杨是对八思巴字汉语文献的整理。这些著作为人们学习、利用这些古韵书、

研究音韵学提供了较好的材料。

周祖谟的《〈广韵〉四声韵字今音表》(中华书局,1980)、丁声树和李荣的《古今字音对照手册》(中华书局,1981)、唐作藩的《上古音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郭锡良的《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向熹的《诗经古今音手册》(南开大学出版社,1988)、黄焯的《古今声类通转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曹述敬等的《音韵学辞典》(湖南出版社,1991)等一批音韵学工具书的编纂,也是音韵学研究的成果,对人们运用音韵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十分有用。

对古代韵书的专门研究,近年成果也很显著。如邵荣芬的《切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方孝岳、罗伟豪的《广韵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严学宭的《广韵导读》(巴蜀书社,1990)、葛信益的《广韵丛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蒋希文的《中原雅音纪略》(《中国语文》,1978.4)、冀伏的《中原雅音考辨》(《吉林大学学报》,1980.2)、邵荣芬的《中原雅音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何九盈的《中原雅音的年代》(《中国语文》,1986.3)、杨耐思的《中原音韵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李新魁的《中原音韵音系研究》(中州书画社,1983)、宁继福的《中原音韵表稿》(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周维培的《论中原音韵》(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等,对这些韵书分别进行了较全面乃至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被学术界普遍接受的论点。

在上古音研究方面,关于上古韵部,王力(1980a、1980b)认为《诗经》时代韵分29部,《楚辞》时代韵分30部,每一韵部只有一个主元音,等呼与中古基本一致,他的这些主张已基本上被学界接受。所不同的,是各家在构拟上古韵的音值时微有差异。

关于上古声母,研究的热点集中在有没有复辅音声母的问题上,其中尚玉河(1981)通过对朝鲜语词例的分析,论证了上古汉语中存在复辅音声母,并介绍了它们的四种演变情况;严学宭、尉迟治平(1986)提出上古汉语中存在鼻—塞复辅音声母,其结构模式

是 N-D，即由鼻音和同部位的的浊塞音组成；张世禄、杨剑桥(1986)分析了上古汉语中带 r 复辅音声母的组合类型以及它们的四种演变规律；主张上古汉语有复辅音声母的学者还有不少人利用方言或通过释读汉字(李格非，1984)、借助亲属语比较(邓方贵、盘承乾，1984；郑张尚芳，1987)等论证了上古汉语中复辅音声母的存在。刘又辛(1984)则从古今俗语、汉藏语系亲属语言、谐声声符等三方面论证了上古汉语有复辅音说的不可信，认为人们所说的复辅音现象，都可以用古代复音词演化规律加以解释，上古并不存在复辅音声母。目前较多学者倾向接受上古音有复辅音声母的主张。

在研究方法上，传统音韵学都是利用《诗经》等书的用韵和谐声等材料研究上古音，郭锡良(1988)则把殷商时代甲骨金文中已识的 1000 多字摆进周秦音系中，考察它的分布特点，进而上推殷商音系，初步提出殷商音系有 19 个声母、29 个韵部(分阴、阳、入三大类)，每个韵部只能分开口、合口各二等，最多四个韵母，声调可能与周秦时相同。这是上古音研究的一种新尝试。陈代兴(1993)继续了这种工作，将已识的 900 多甲骨文字放到中古 41 声类和王力上古 30 韵部的框架中，观察它的分布情况，认为殷商时代有单声母 17 个，复声母 10 个，韵部 5 类 15 部，入声韵不独立，无后代的平上去入四声区别，其方法与郭类似而结论不尽相同。史存直(1984)指出上古韵部各部之间的远近关系是古代方言差别和古音的音转关系的反映，给古音分部时对这一点应予以充分注意。李新魁(1991)则利用现代闽南方言中存在的某些单音词衍化为双音词的现象，来证明在上古汉语的入声韵字中，可能存在带-s 尾的复韵尾。此外，张清常(1981)、祝敏彻(1984、1988)、谢纪锋(1986)、周祖谟(1984)、刘宝俊(1986)等用汉儒的声训、读若、秦汉竹简与帛书等一些新的材料对两汉的语音状况进行了研究。其中张文分析了《释名》所反映的轻重唇声母不分、明晓两母互为声训、舌头舌上声母不分、泥娘日母不分、照二组照三组与端组精组都有

关系等五种声母现象；祝文(1988)则根据《释名》的声训分析了汉代音系与先秦音系的不同，提出汉代音系有32个声母，29个韵部，并作了拟音；谢文论证了《说文》读若的声类与上古音迥别，而与中古音基本一致；周文利用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和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的通假字，分析整理出了古声类的一个系统；刘文提出了帛书音系有单声母26个，复声母19个，韵部分30部，有平上去入四个调类，认为帛书音系是秦汉时代楚地方言音系。汉代及其后的语音的研究，过去是个薄弱环节，现在这方面的研究有了加强，除了以上提到的以外，还有邵荣芬(1982a、1983)、王显(1984)、周祖谟(1983)等人，对这一时期的汉语语音的演变情况作了有益的探讨。于安澜《汉魏六朝韵谱》(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归纳分析汉魏六朝所有有韵之文的韵脚材料，编制成两汉、魏晋宋、齐梁陈隋三种韵谱，探究了上古音到《切韵》音的演变轨迹。该书1936年出版后遭社会动荡，海内罕见，故虽是旧作新印，仍是这一段语音研究的重要成果。

俞敏(1984a)利用梵汉对音进行后汉音研究，对后汉三国时期佛典中有关资料作了精密的考订和整理，对后汉音的分类和构拟提出了很多新的见解，认为后汉入声收浊塞音，允许开音节和闭音节押韵，闭音节可以用i、u作主元音，又把梵汉对音整理出音谱，为研究古音提供了新的重要依据，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所创新，其成果引人注目。

关于中古音，《切韵》音系的性质仍被学界关注，讨论热烈但认识尚未统一。邵荣芬(1982b)、黄典诚(1982)主张单一音系论。邵著对《切韵》音系的分类和构拟作了全面的论述，编制了宋濂跋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和《广韵》对照的声母韵母表，提出了泥娘分立、娘母独立的主张，讨论了重纽问题，认为《切韵》音系大体上是一个活方言音系，也多少吸收了一些别的方言的特点。黄文则认为《切韵》所选之音切都有实际语音的依据。史存直(1985)等则主张综合音系论，其主要论据是：从《切韵序》看，作者的编撰原则

是参考采撷以前各家韵书，从分不从合；从同时代的域外译音看，如朝鲜译音、日本汉音、日本吴音、越南译音等，并不如《切韵》分韵之密；从后代等韵学中的“韵摄”和“韵等”看，也显示出《切韵》音系有综合的特点。

在关于《切韵》的一些具体问题上，有一些较深入的研究。如重纽问题，李新魁（1984）、潘悟云、朱晓农（1982）、刘广和（1987）、麦耘（1992）都有论文进行专门探讨。李新魁的论证比较详细全面，分析了重纽字的10大特点，将重纽字划分为11大类，探讨了重纽字在读音上的区别，并作了拟音；潘悟云、朱晓农用汉越语比较，对中古唇音开合、轻唇音分化条件问题进行研究，同时对重纽与汉越语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刘广和依据唐代不空和尚汉译梵咒材料，推测重纽三四等字语音区别在于介音，三等介音为[r]、四等介音为[i]；麦文从对重纽问题的探讨出发，认为根据反切，重纽两类读音上的区别在于介音，该文又通过梵汉对音、上古元音与《切韵》介音的关系、明清韵图和现代方音的反映等材料的分析，提出了《切韵》音系所有的韵母都可根据介音的不同分为四大类，并列出了《切韵》介音与主元音的配合表。

过去的音韵学在论述中古音时，往往讲的只是《广韵》音系，其实《广韵》音系以及《切韵》、《唐韵》、《集韵》等韵书的音系并不等于中古音系，两者相去甚远，所以研究中古实际音系还应利用其它材料。近年这方面的研究有了较多的进展，在分析中古注释书中的反切、利用梵汉对音、分析唐诗用韵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成绩。

利用反切材料研究中古音的，有王力（1982）、邵荣芬（1981）、钟兆华（1982）、谢纪锋（1992）等。王文通过对玄应《一切经音义》的反切的分析，探讨了唐初的语音系统；邵文提出了舌上音在唐天宝年间已经分了出来；钟文认为唐初颜师古的反切已经区分轻重唇音；谢文则将颜氏的音切与《切韵》音系进行了对比，指出《切韵》音系是一个包含了古音和方音的综合音系；这些结论都较有说服力。

运用梵汉对音研究中古音的，有尉迟治平(1982、1984)、施向东(1983)、刘广和(1984、1991)等。尉迟文整理了北周和隋代各天竺经师汉译佛经中的梵汉对音材料，据之构拟了当时长安方言的声、韵、调系统；施文通过玄奘所译梵文经书中的梵汉对音材料，分析考察了公元七世纪时中原方言的语音系统；刘文则利用不空和尚汉译梵咒材料，并佐以汉藏对音、日译汉音、现代关中方言等材料，对八世纪长安方言的声、韵、调系统进行了考察。这些论著都采用了俞敏的梵汉对音全面系统的整理方法，颇有创获。

通过唐代诗人实际用韵情况来分析探讨中古音，近年成果较多，像唐初四杰、杜甫、韩愈、白居易、李贺等人的诗韵都有专文进行分析。其中鲍明炜(1986、1990)利用《全唐诗》、《全唐诗外编》、《王梵志诗校辑》、《全唐文》中的有关韵文材料，分析了唐初(公元618—712年)诗文的韵系，按16摄分别排列了韵字、韵例和韵谱。居思信(1993)则用《全唐诗》中60位诗人的7000多首古体诗以及《敦煌变文》中的押韵材料分析中古韵部，对中古的实际语音情况进行探讨，提出中古韵部有舒声22部、入声9部，并列出了他所归纳的韵部与《广韵》韵目的对比表，具体分析了10个摄的韵部分合规律，指出唐代诗人很少用方音押韵。这些论著为中古音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子。与此相近的，是鲁国尧(1979、1981、1986、1989、1991、1992)用宋代1330余词人的近两万首词的用韵资料研究宋代韵部，采用穷尽的分析方法，把宋词用韵情况按词人生活地区分区进行整理，在方法上有所创新，结论令人信服。

关于近代音，讨论最热烈的是对于《中原音韵》的研究。杨耐思(1981)利用新发现的明正统刊《中原音韵》的新版本，参证八思巴字汉语和同期另外一些音韵资料，以及河北一些现代方言材料，提出《中原音韵》是当时官话的一种标准音，入声仍保持为一个独立的调位，但有三个调值。李新魁(1983)具体分析了《中原音韵》音系的特点，排列了《中原音韵》的小韵图表，认为《中原音韵》的语音基础是当时以洛阳音为代表的河南音，仍有入声。宁继福

(1985)用音、韵配合的表式列出了《中原音韵》的全部韵字，创立了研究《中原音韵》音系的“内部分析法”，提出《中原音韵》音系的语音基础是当时的大都音，其入声已经消失。其他关于《中原音韵》研究的论著还有不少，《〈中原音韵〉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收辑了这方面的主要成果。

除了对《中原音韵》的研究，对《中原雅音》、《中州音韵》、《古今韵会举要》、《洪武正韵》、《西儒耳目资》、《五方元音》、《音鉴》等音韵资料都有人撰文研究。这些论著有的是对具体韵书的作者、版本、性质等的探求，如许德宝(1989、1991)提出《中州音韵》就是《中原雅音》，周德清即二书的作者，龙庄伟(1991)、曾晓渝(1991)、慧生(1991)则提出完全相反的观点，就二书的关系展开了讨论。有的是对近代语音现象的研究，如忌浮(1988)、黎新第(1990)等对于近代语音中入声问题的讨论，忌文通过对现存全部元杂剧中见于《中原音韵》“末句”各曲煞尾字的材料的分析，认为《中原音韵》的“入声作上声”字在元曲中读上声的只有39%，周德清将古清音入声字除去影母一律归上声，与“中原之音”不符；黎文则提出忌氏的计算方法有误，他根据概率论的基本原理重新计算，得出了元曲中清入声作上声的比例约为73%的结论。有的对近代语音研究方法作了有益的探索，如李思敬(1986)以《金瓶梅》等俗文学资料研究儿化音的历史演变，通过与“参照音”的比较来确定某个音类在不同时代的音值；杨亦鸣(1992)提出《音鉴》的音系框架中“南北方音兼列”，是作者有意容纳两个彼此有区别的音系，杨耐思(1993)将其归结为近代音系研究“剥离法”；耿振生(1991)则指出对近代音韵书中复合性音系里不同来源的构成成分可以通过一定的手续分解出来，其中的时音部分才是语音史研究所需要的材料，进而(1993)提出“全面分解、逐类定性”法，从而重新解释了一些韵书、韵图呈现音系“杂糅”现象的原因。

在等韵学方面，有李新魁的《〈韵镜〉研究》(《语言研究》，1981.1)、谢伯良的《〈韵镜〉李校补遗》(《语言研究》，1993.1)、俞敏

的《等韵溯源》(《语言研究》,1981.1)、耿振生的《明清等韵学通论》(语文出版社,1992)、鲁国尧的《〈卢宗迈切韵法〉述评》(《中国语文》,1992.6、1993.1)等。李文论述了《韵镜》的体制、与《广韵》、《集韵》的关系以及撰写的年代;谢文纠正了《韵镜校正》中的疏漏;俞文则通过等韵的"七音、清浊、喉音、舌头舌上、转、内外、摄、轻重、重纽"等术语套用悉昙而来的情况的分析,指出等韵书大都是生搬硬套悉昙而来,又不真懂声明,所以弄出好多玄虚来;耿著考证分析了明清120多种韵图、韵书,对明清等韵学的一些理论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鲁文以宋代音韵学史为背景,对藏于日本的宇内孤本等韵学著作《卢宗迈切韵法》进行了深入详细的研究,发掘了新的音韵材料,对等韵学研究的领域有所扩展。

总起来看,当前音韵学研究较热的是近代音研究,这是与近代汉语研究热紧密相关的。研究的问题主要是就着某种音韵学材料进行具体音系、音素的分析,这种分析研究在材料和对象上显得丰富多采,同时也呈现出研究目标的分散。音韵学者们基本上都是各自为战,而音韵学的很多课题是需要较多人联合完成的。研究方法上较多的是运用历史比较方法,创新很少。利用古代音韵学材料来考证方言已被普遍运用,而利用方言来考察分析古代音系的工作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音韵学史的研究还很薄弱,需要加强。

2. 语法学

自《马氏文通》问世以来,在汉语语法研究者和教学者的不断努力下,古代汉语语法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80年代以来,学者们力图多角度、多方位地探索古代汉语语法知识的内部规律,试图描写、构拟出一个符合古代汉语自身特点的语法理论体系。但这种体系目前尚未建立起来,因而关于古代汉语语法知识体系通论性的著作较少。目前古代汉语语法知识的普及,实际上是通过众多《古代汉语》教材中有关章节的教学实现的。杨伯峻和何乐士的

《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语文出版社,1992)比较好地研究吸取了此前学者的研究成果,采用静态描写、历史比较、数量统计的方法,通过对 300 多种古籍作品中 8000 多例句的举证叙述,较为细致地对古代汉语语法特点进行了描述,为古代汉语语法学科体系的确立构拟了一个大的框架,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是部全面介绍古代汉语语法的著作。

研究汉语语法史的专著则有不少,潘允中的《汉语语法史概要》(中州书画社,1982)、史存直的《汉语语法史纲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王力的《汉语语法史》(商务印书馆,1989)、孙锡信的《汉语历史语法要略》(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等,对古代汉语语法的历史演变作了初步的勾勒。

汉语语法研究史也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先后有孙玄常的《汉语语法学简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林玉山的《汉语语法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马松亭的《汉语语法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龚千炎的《中国语法学史稿》(语文出版社,1987)、董杰锋的《汉语语法学史概要》(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邵敬敏的《汉语语法学史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朱林清的《汉语语法研究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等出版。

古代专书的语法研究是目前古代汉语语法研究收获较大的方面。《左传》、《诗经》、《论语》、《世说新语》、《孟子》、《史记》等书的语法都有较多的研究论文发表。其中尤以对《左传》语法研究的论著成果最多,何乐士的《〈左传〉虚词研究》(商务印书馆,1989)、《〈左传〉范围副词》(岳麓书社,1994)比较深入;管燮初的《〈左传〉句法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则是一部全面研究古代专书句法的专著。

在断代的语法研究方面,管燮初的《西周金文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1981)是部代表性著作。这一领域的研究,本应在对该时代文献逐书进行研究的基础之上进行。由于至今专书研究的成果还不理想,所以断代语法的研究也不可能深入全面。柳士镇的《魏

晋南北朝历史语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所作的有益探讨。此外还有不少论著就断代语法的某一方面进行了探讨。

一些词法、句法的专题研究,得到了较多的注意。有的问题出现了一些新的见解,有的问题引起了较热烈的讨论。如关于代词的发展,郭锡良(1980)提出秦汉以前没有第三人称代词,传统认为是第三人称代词的“之”、“其”、“彼”等都是指示代词,第三人称代词是魏晋以后才产生的;而先秦指示代词也不是像传统认为的那样只分成近指、远指两类,而是一个含有近指、远指、中指、泛指、无定等类别的更为复杂的系统(1989)。洪波(1991)则对先秦 18 部古籍中的指示代词的使用情况加以分析,对传统的指示代词二分说和郭锡良的新观点作了分析批评。关于动词的演变,潘悟云(1991)联系汉藏语的比较研究,提出上古汉语的自动词和使动词有内部屈折形式,与清声母相对立的浊声母、去声破读和加前缀[s-]、加后缀[-s]都表示使动意义。俞敏(1984b)则归纳了古代汉语派生新词的 11 种模式,提出了古人利用语音变化派生新词的规律。关于被动式的发展,唐钰明(1885a、1985b、1987、1988a)考察了先秦、汉魏六朝、唐至清的“被”字句,吴金华(1983、1984)、袁宾(1989)等也发表了有关论文,对被动式进行研讨,基本勾勒出了汉语被动句式在历史发展各个时期的概貌。关于处置式,陈初生(1983)、张华文(1984)、梅祖麟(1990)等探讨了处置式的来源和发展问题。其中,陈文认为“以”字有提宾的作用,在西周金文中就已出现的“以”字句是处置式的早期形式;张文则认为“以”字并没有提宾作用,“以”字句与“把”字句不能相提并论。关于动补结构,潘允中(1980)、杨平(1989)、武振玉(1991)对补语式的产生发展进行了研讨,其中武文提出助词“将”起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动词“将”的虚化,对“动·将·补”句式的起源发展作了较全面的分析:“动·将·补”句式在唐代形成,表现已实现了的动作,宋元时这种句式有很大发展,明代最兴盛,到清代被“动·了·补”式取代而衰亡。关于双

宾语，管燮初(1986)、何乐士(1980)、贝罗贝(1986)分别讨论了先秦到唐代不同时期有代表性的双宾语句式。关于前置宾语，俞敏(1981)认为原始汉语跟藏语都保留汉藏母语的特点：止词在前，动字在后；中心词在前，修饰词在后。这把原先关于原始汉语中代词宾语的正常位置是处于动词之前的结论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即远古汉语可能与汉藏语系的其它语言相似，不光是代词宾语，而且是整个宾语本来就处在动词的前面。许嘉璐(1983)认为"唯……是……"式句不是贯穿于整个汉语上古期的口语现象，作为全民语言的一种句式，它只通行于两周之交的几百年，春秋以后使用这种句式追求的是语言风格，而不是对宾语的强调，"是"、"之"、"于"、"焉"词性虽有不同，但都是修饰后面的状语；敖镜浩 (1983)又补充提出这种句式在先秦经历了发生、发展、衰亡三个阶段，初始时期是诗文为求押韵而变换词序，离开诗文进入散文后成为一个含典雅色彩的惯用句式。此外，关于构词法、词类活用、量词的发展、系词的发展、语气词的发展等问题的研究都取得了较多的进展。虽然一些问题仍未定论，但材料已较集中，讨论已经展开。其它诸如"所"字结构、定语后置等问题也都有文章探讨争辩。

虚词的研究成果较多，并且编纂了不少工具书。其中何乐士、敖镜浩、王克仲、麦梅翘、王海棻的《古代汉语虚词通释》(北京出版社，1985)影响较大；杨伯峻的《古汉语虚词》(中华书局，1981)较有深度；俞敏监修、谢纪锋编纂的《虚词诂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集纂乾嘉以来 10 部讲到虚词的著作的论述，方便实用。

整理研究前人的古代汉语语法研究成果，是语法学史研究不可缺少的课题。这方面的论著也有不少。如王克仲(1988)对《助语辞》的研究、俞敏(1987)对《经传释词》的研究等。其中俞著既借鉴了乾嘉学派的研究方法，又注重利用与现代方言的比较、与外语相应现象的对比，取得了不少令人信服的结论。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对《马氏文通》的学习、研究相当突出。80 年代有过一阵学习、研究《马氏文通》的高潮，发表、出版了不少专论。孙玄常的

《〈马氏文通〉札记》(安徽教育出版社,1984)、吕叔湘和王海棻的《马氏文通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王海棻的《〈马氏文通〉与中国语法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是这方面较为系统的成果。

在语法理论上,由于确立了语法发展的历时观念,系统的动态研究代替了以往的静态研究,从而促进了专书研究、断代研究、历时性专题研究的开展。在研究方法上,定量、穷尽性分析的方法已被普遍运用,还有一些学者尝试着运用了变换分析(蓝鹰,1987;唐钰明,1988b、1991、1994、1995)、句型转换(董治国,1994)等新的语法分析手段。这些尝试显示出一些学者多次指出的古代汉语语法学界轻视理论的现象已经引起人们的重视并开始得到改善。

如何建立科学的古代汉语语法体系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语法学界。鉴于这种体系短期内不可能建立,而古代汉语的教学又亟需一个共同遵守的语法体系,1992 年在太原举行的古代汉语学术讨论会上,曾就此进行了研讨。不少学者提出,应当建立古代汉语教学用的"暂拟语法体系"。1995 年《中国语文》为此特辟专栏,已有郭锡良(1995)、王克仲、黄珊(1995)、孙良明(1995)发表论文展开讨论,这是值得学界通力合作共同完成的任务。

3. 训诂学

训诂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传统训诂学在几乎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中,一直都基本围绕着"解经"这一目的向前发展。这一方面使它产生了实用性和综合性的突出特点,另一方面也给它带来了范围狭窄和理论不系统的局限。章太炎、黄侃将训诂学从经学的附庸地位独立出来,使之成为一门初具理论且极实用的学科。但其后训诂学的发展一直很缓慢,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训诂学基本处于一种备受冷落的地位,一直到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训诂学才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并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80 年代以来,出版了一大批训诂学通论性著作,其中陆宗达

《训诂简论》(北京出版社,1980)对训诂学的内容、方法作了简明准确的介绍;张永言《训诂学简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运用现代语言学的一些观点对训诂学进行了解释;洪诚《训诂学》(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强调了训诂学的实际应用;陆宗达、王宁《训诂方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对训诂学的原理、方法作了探索;陈绂《训诂学基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建立了较为系统的训诂学教学体系;周大璞《训诂学要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列举了较多的训诂学材料;郭在贻《训诂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重点介绍了俗语词训诂;刘又辛《训诂学新论》(巴蜀书社,1989)重点介绍了同源词的研究。

这一时期训诂学发展史的研究也受到学者们的重视。李建国的《汉语训诂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赵振铎的《训诂学史略》(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简明地勾勒了训诂学的发展演变。李著材料丰富,持论平允,赵著则十分注意对训诂方法的介绍评价。这些著作对当前训诂学的研究工作一直有着影响,不少人就是在阅读了这些著作之后才走上了训诂学研究的道路。

这种大量出版训诂学通论著作的时期到 90 年代初期已经过去,这一方面是因为已出的数十种这类著作不免有类似重复之处,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训诂学理论的研究还不深入,训诂学史的研究也还不全面。这两方面的工作都需要在专书训诂研究、断代训诂研究的基础之上进行;科学地阐述训诂学原理、详实地介绍评价训诂学的发展历史,尚待较长时间的努力。

训诂学和古籍整理工作的关系至为密切。古代文献的语言是训诂学的研究对象,训诂学需要以古籍的校勘等整理工作成果为基础,而古籍整理又要以训诂学为工具。七八十年代以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出现了高潮,大量的古籍得到影印、校点、今译。这一方面给训诂学工作者提供了学习研究的材料,同时也锻炼出了一支从事训诂学工作的队伍。虽然各类辞书的编纂都需要训诂学的知识,但至今还没有专门为训诂学研究和教学而编纂的工具书。

许嘉璐主编的《传统语言学辞典》(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有较多篇幅用于训诂学,是这方面的成果。

在对专书的训诂研究方面,训诂专著和注释书的研究都有较多的成果。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对古代训诂著作的介绍为主,如陆宗达的《〈说文解字〉的价值和功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8)、殷孟伦的《尔雅简说》(《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79)、赵振铎的《读广雅疏证》(《中国语文》,1979.4)等;此后,逐渐转为对专书作定量的、穷尽性的分析研究。虽然大量的论著都还是就专书的某个方面进行研究,但这种研究对全面详尽、体系严谨、材料丰富的训诂学史的撰写无疑是必要的积累。

对古籍专书词语的研究,也有较多成果,特别是魏晋以来笔记小说语词、俗语词的研究取得了令海内外学术界瞩目的成就。仅对上古汉语、中古汉语词语研究成果结集成书的就有杨伯峻的《春秋左传词典》(中华书局,1985)、向熹的《诗经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朱广祁的《〈诗经〉双音词论稿》(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张双棣的《吕氏春秋词汇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江蓝生的《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语文出版社,1988)、蔡镜浩的《魏晋南北朝词语例释》(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0)、方一新、王云路的《中古汉语语词例释》(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吴金华的《世说新语考释》(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吴金华的《三国志校诂》(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蒋绍愚的《唐诗语言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王锳的《诗词曲语辞例释》(中华书局,1986)、王锳的《唐宋笔记语辞汇释》(中华书局,1990)、袁宾的《禅宗著作词语汇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等一批著作。此外,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成果也是运用训诂学方法取得的结果。

在专题研究方面,关于训诂学的性质及研究对象,一直是争论热烈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训诂学是对古代文献语言的解释之学,它的研究对象包括古代文献语言的方方面面;也有人认为训诂学即古代汉语词义学,研究的只是词。许嘉璐《训诂学的性质及其

它》(《湖南师大学报》古汉语专辑,1986)较全面地论述了这个问题,提出训诂学是一门综合性、应用性、验证性的学科,对于古代的训诂学不应以不符合今天“学”的概念而否定,而对于未来可能出现的“理论训诂学”也应视为正常而予以支持。

关于训诂学方法和原理,主要是对章太炎、黄侃等前辈学者学说的传述,如许嘉璐《黄侃先生的小学成就及治学精神》(训诂研究》第一辑,1981)、《章太炎、沈兼士二氏语源学之比较》(《沈兼士先生诞生100周年纪念论文集》,1990)、陆宗达、王宁《章太炎与中国的语言文字学》(《百科知识》,1987.5)等,其中较突出的有黄焯整理的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等著作。在传统的声训、形训、义训等训诂方法之外,陆宗达、王宁(1981)又提出“比较互证法”,陈绂(1990)又提出“据文证义法”,周复刚(1991、1993)又提出“引据法”、“统计法”等。这些新的方法概念尚未全部被学术界接受,但显示出训诂学学科体系的建设普遍受到重视。许嘉璐(1988a)就训诂学的方法问题提出训诂学要站在现代科学的高度去认识和论证古人所使用的方法,要运用已被其它学科证明有效的方法说明已知的训诂学现象,要运用其它学科的一些方法去认识未知,并从宏观上提出训诂学研究的延伸问题,指出现代训诂学应该在更高层次上把训诂学与社会学、文化学等结合起来,从而使训诂学获得更广阔的应用领域,使训诂学注意到深层的语言背景,因而可以更深入地分析文献语言的演变规律。要把训诂学的对象作为一个统一与不统一相结合的矛盾体来研究,既注意到语言的社会性,也要注意到语言发展中的随机性。训诂学的微观研究则应一方面充分利用我们历史文献特别丰富、训诂学传统特别悠久的优势而努力前进,一方面也要吸收哲学、心理学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最新成就,试用于训诂学。单一的从西方语言学中直接借鉴的道路是不敷需要的,单靠引进我们就将永远跟在别人后头,训诂学理论的体系也将难以建立。而无论是宏观方面还是微观方面,训诂学方法上的进步都可能为语言学理论提

供新的营养。对于训诂学原理进行阐述探索虽然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但尚未有系统的论著发表。王宁(1986、1988、1993)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思考，提出训诂学要更新方法，加强和完成理论建设。而训诂学构架自己的理论体系时，在对语义单位所给予的不同层次的分析等方面吸取了现代语义学成果，使自己的方法和体系更严密、更科学；在现代语义学的启发下，训诂学对自己固有的方法和规律，如汉语的义素分析法等，有了新的认识，从而发掘出这些方法和规律的普遍意义，充实和丰富了现代语义学；而训诂学从古代汉语的经验事实中所总结出的规律，如训诂学中的类聚方法等，为现代语义学提供了更为可行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操作方法。

在文献语言内部规律的探讨上，取得较多成果的是同源词的研究和词义引申规律的探索。

关于同源词研究，朱星(1983)从转语入手对传统语源学进行分析，提出传统训诂学中的转语研究就是词源学研究，我国的词源学产生很早，先是《说文解字》的字源学(今天搞词源学也需包括字源学)，然后扩大为词源学(如清人程瑶田《果臝转语记》)。陆宗达、王宁(1984、1988)对传统字源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作了辨证评价，提出传统字源学是以平面系源为主要目的，以形音义统一的方法为基本方法，以探讨同源词之间的形音义关系为理论内容的一门学问，它属于词义学的范畴，而不属于词汇史。《释名》是最早的字源专书，是有意识地证明名必有源、源循音推的理论证实之作。陈建初(1990)则认为到清代为止的传统语源研究尚未真正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是黄侃和他的老师章太炎在语源研究方面的理论建树和实践才使它自成体系。王力的《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对同源词的形成与演变实际作了有益的探讨。从方法上看，学者们基本都是用传统的音义系联法来进行语源学研究，大多强调判定音义关系时要从严掌握，也有人提出只要严密考据，在义通的条件下，可以证明一些声音相距较远的词同源(陆宗达、王宁，

1984)。同时,形体在同源词研究中的作用与地位,也受到了学者们的注意。

关于词义引申,长期以来,训诂学家对词义演变的描述都停留在本义引申义的笼统说明以及词义扩大、缩小、转移三个类型的静态介绍上,没有从语言的内部和外部去寻找词义演变的动力和条件。80年代以来,训诂学家们开始对词义引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不仅注意对单个词意义延伸状况的描写,还注意到了相关的词在意义演变过程中彼此渗透和伴生的现象。陆宗达、王宁(1983)探讨了词义引申的因果、时空、动静、施受、反正、实虚、同状、同形、同态、同用、同所、同感、礼俗等众多形式。许嘉璐(1987)提出了"同步引申"的理论,在传统的词义引申的纵向分析之外,提出了词义引申还有横向联系;认为词义的引申并不是词的个体孤立地、彼此隔绝地进行的,一个词意义延伸的过程常常"扩散"到与之相关的词身上,带动后者也沿着相类似的线路引申。这种引申是一种历时现象,是词在其演变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现象。具有同步关系的诸方面在此阶段之前或之后具有不同的源头与趋向,一个词在其意义演变的不同阶段可以和不同的词发生同步关系。词义的自由发展和同步引申是词义引申过程中矛盾的统一,其结果是促进了某些词义的演变发展,同时又限制了引申线路的过于歧异与紊乱。这对引申理论有所发展。孙雍长(1985)、蒋绍愚(1989)也提出了类似的见解。孙文分析了相关词意义之间的相互渗透现象,蒋著则运用义位分析的方法,指出了甲词有a、b两个义位,乙词原来只有一个乙a义位,由于乙a与甲a同义(或反义),逐渐地乙词也产生出一个和甲b同义的乙b义位的"相因生义"的现象。"同步引申"的理论已被用来解释"反训"现象(张猛,1987),说明近代语词演变(袁宾,1992),分析词的特殊义和断代义的形成(王小莘,1993),显示出其理论的实用价值。

关于"反训",自郭璞注《尔雅》、《方言》以来,一直有人关注。徐世荣(1980)将收集到的500例反训材料分为10类进行了分析;

徐朝华(1981)提出反训是由于词义特点变化、同音假借而造成；蒋绍愚(1989)认为反训是由反用词义、施受同词、词义引申而造成；王宁(1990)则认为反训不是训释，只是反义共词，并分析了反义共词的必要条件。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还没得出最后定论，但较之以往谈到反训时仅限于资料的罗列，已经前进了一大步。

在已经发表的训诂学论文中，数量最多的是对于古籍中具体字词的训释考辨，这些文章80年代以来每年都在百篇以上，其考释对象涵盖了从先秦至近代的各种文献，论证时综合使用了训诂学的各种方法，很多论著都采用了定量、定性、穷尽、系统的方法，有的采用方言和古语互证的方法，体现出训诂学的实证、应用特性，所得结果对汉语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训诂学史的研究，在专人专书训诂研究方面已有不少成果，而断代的训诂学研究则还很薄弱，需要更多的努力。

由训诂学派生出的汉语文献注释和汉语辞书编纂学科，有一些论著发表。许嘉璐(1984、1988b)呼吁创建注释学，汪耀楠《注释学纲要》(语文出版社，1992)则是"注释学"的第一部著作。论文集《词书与语言》(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词典和词典编纂的学问》(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和黄建华的《词典论》(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等，对词典编纂中的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刘叶秋的《中国字典史略》(中华书局，1983)、林玉山的《中国辞书编纂史略》(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等，则试图总结我国词典编纂的经验，以对今后的词书编纂工作有所裨益。但至今，注释学、词典学与训诂学的界线并未完全划清，因而其理论体系尚不成熟。

总之，训诂学自70年代末复兴以来，在加强、促进汉语史研究，丰富、发展语言学理论，继承、宏扬民族传统文化等方面起着积极、重要的作用的同时，本身也在不断发展完善。学科的基本框架已形成，术语已较明确统一，方法有所更新，各部门研究成果累累。目前需要加强的是在积极进行训诂学原理的阐述、历史的描写的同时，使训诂学进一步与社会、时代的实际(如辞书编纂、古代文化

研究）紧密结合。在语言学科中，训诂学是较易与社会实践结合的学科，也只有服务于社会、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它的作用，训诂学才能有自己的旺盛生命力。

三、展 望

汉语史研究成就的取得，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拥有一支比较稳定的研究队伍。中国音韵学研究会 1980 年成立，现有会员 300 多人，已举行过 8 次学术年会，举办过 5 期音韵学研究班，培养了不少音韵学工作者；中国训诂学研究会 1981 年成立，现有会员 400 余人，已举行过 8 次学术年会和多次专题研究会，举办过 3 次训诂学讲习班，培养了一批训诂学工作者；加上近年来各高校也培养了一大批汉语史研究生，全国已形成了相当稳定的汉语史研究队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支队伍的成员也在不断变化，但基本队伍仍能保持。保持并不断发展建设这样一支队伍，需要队伍成员本身的甘于寂寞、勇于坚持，也需要有关领导和全社会的关心支持。

我国的语言学研究，一向注重对具体语言现象的研究，缺乏对理论问题的探讨，包括对所使用的方法，也很少提升到规律性、理论性的高度加以总结。100 年前西方语言学的方法和理论传入中国后，情况有所改变；50 年代和 80 年代又出现了两次引进国外语言学的高潮。汉语史研究领域在这过程中实际上也在潜移默化地吸收了语言学理论中对自身有用的东西。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汉语史和语言学理论的研究彼此脱节的现象至今还没有显著的改变。一方面语言学理论界对汉语史缺乏研究和了解，另一方面汉语史界的理论修养比较欠缺。这一情况实际在局限着我国语言学研究的发展和根植于中国语言的理论的建设。近年来这一问题已经引起语言学界的重视，一批汉语史年轻学者正在朝着二者的结合方面努力。这可能预示着我国的汉语史研究将出现一个较大的飞跃。

汉语史研究的材料主要是古代的书面语言，即使是俗语，也是见诸文字的。这样在研究时就应该而且比较容易运用穷尽、定量的方法。为此，在研究中计算机的使用就是必然的了。遗憾的是这一问题至今在我国语言学界还没有得到基本的解决。即使有些语言学家已经使用了计算机，但也还只是"换笔"，还不能用计算机对语料进行处理。要解决研究手段的现代化问题，就需要国家的支持、语言学界的通力合作。我们估计，到本世纪末，用计算机处理古代文献语言材料，将要成为汉语史学界比较普遍的情况，学者们对此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用扎实的工作迎接并促进这一时期的到来。

汉语史与其他学科的综合研究和比较研究，值得倾注更多的力量。像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化学、文艺学、心理学、教育学以至数理等学科，不仅它们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可以被汉语史的研究汲取和借鉴，这些学科研究本身也可以与汉语史研究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诸如汉语出土文献研究、汉语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研究、汉语文学语言史研究、汉语词汇演变与汉民族心理关系研究、汉语习得与汉语阐释原理研究、汉语的机器解读研究等，都是正在或可能引起人们注意的课题。

在1990年香港浸会学院（现已改为浸会大学）举行的中国声韵学国际研讨会、1991年武汉华中理工大学举行的汉语言学国际研讨会、1993年台北举行的中国训诂学学术研讨会上，海峡两岸汉语史工作者进行了学术交流，彼此互通信息，加深了了解。另外，一些境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也翻译介绍到中国来，如日本学者太田辰夫的《中国语历史文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汉语史通考》（重庆出版社，1991）等，这对我们的研究无疑也是有益的。在汉语史研究中，如何加强全国学者包括港台和域外学者之间的合作，加强和其他各国同行的交流，也是学术界都在关心的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

1．郭锡良，四十年来古汉语语法研究述评，《中国语文研究四十年纪念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
2．王克仲，四十年古汉语虚词研究的回顾，《中国语文研究四十年纪念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
3．唐钰明，四十年来的古汉语语法研究，《中国语言研究四十年纪念文集》，北京语学院出版社，1993。
4．郭锡良，1991 年的古汉语语法研究简述，《语文建设》第 5 期，1992。
5．郭锡良，1992 年的古汉语语法研究，《语文建设》第 12 期，1993。
6．唐作藩、杨耐思，四十年来的汉语音韵学，《语文建设》第 5 期，1989。
7．唐作藩，1991 年的汉语音韵研究，《语文建设》第 5 期，1992。
8．李新魁，四十年来的汉语音韵研究，《中国语文》第 1 期，1993。
9．杨耐思、张渭毅，1992 年的汉语音韵学研究，《语文建设》第 11 期，1993。
10．邵荣芬，欣欣向荣的汉语音韵学，《中国语文研究四十年纪念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
11．唐作藩，四十年音韵研究的回顾，《中国语文研究四十年纪念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
12．张渭毅、唐作藩，1993 年的汉语音韵研究，《语文建设》第 11 期，1994。
13．王宁，1991 年的训诂学研究，《语文建设》第 11 期，1992。
14．许嘉璐，对训诂学发展的思考，《语文建设》第 12 期，1994。

引用文献目录:

王力,1980a,《诗经韵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980b,《楚辞韵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玄应一切经音义》反切考,《语言研究》第1期,1982。

尚玉河,"风曰孛缆"和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的存在,《语言学论丛》第八辑,1981。

严学宭、尉迟治平,汉语"鼻—塞"复辅音声母的模式及其流变,《音韵学研究》第二辑,1986。

张世禄、杨剑桥,论上古带r复辅音声母,《复旦学报》第5期,1986。

李格非,释"苏"、"棘",《武汉大学学报》第4期,1984。

邓方贵、盘承乾,从瑶语论证上古汉语复辅音问题,《民族语文论丛》,第一集。

郑张尚芳,上古音构拟小议,《语言学论丛》第14辑,1987。

刘又辛,古汉语复辅音说质疑,《音韵学研究》第1辑,1984。

郭锡良,殷商时代音系初探,《北京大学学报》第6期,1988;

汉语第三人称代词的起源和发展,《语言学论丛》第6辑,1980;

论上古汉语指示代词的体系,《语言文字学术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89;

关于建立古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浅见,《中国语文》第2期,1995。

陈代兴,殷墟甲骨刻辞音系研究,《甲骨语言研讨会论文集》,华中师大出版社,1993。

史存直,古韵"之、幽"两部之间的交涉,《音韵学研究》第1辑,1984;

《汉语音韵学纲要》,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

李新魁,从方言读音看上古汉语入声韵的复韵尾,《中山大学学报》

第 4 期，1991；
重纽研究，《语言研究》第 2 期，1984；
《中原音韵音系研究》，中州书画社，1983。
张清常，《释名》声训所反映的古声母现象，《训诂研究》第 1 辑，1981。
祝敏彻，从汉儒声训看上古韵部：兼论阴、阳、入三声分立，《兰州大学学报》第 2-3 期，1984；
《释名》声训与汉代音系，《湖北大学学报》第 1 期，1986。
谢纪锋，《说文》读若声类考，《河北师院学报》第 4 期，1986；
《汉书》颜氏音切韵母系统的特点——兼论《切韵》音系的综合性，《语言研究》第 2 期，1992。
周祖谟，汉代竹书与帛书中的通假字与古音的考订，《音韵学研究》第 1 辑，1984；
魏晋宋时期诗文韵部的演变，《中国语言学报》第 1 期，1983。
刘宝俊，《秦汉帛书音系》概述，《中南民族学院学报》第 1 期，1986。
邵荣芬，1982a，古韵"鱼、侯"两部在后汉时期的演变，《中国语文》第 6 期，1982；
古韵"鱼、侯"两部在前汉时期的分合，《中国语言学报》第 1 期，1983；
1982b，《切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晋书音义反切的语音系统，《语言研究》第 1 期，1981。
王显，古韵"阳"部到汉代所起的变化，《音韵学研究》第 1 辑，1984。
俞敏，1984a，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中国语言学论文选》，日本光生馆，1984；
1984b，古汉语派生新词的模式，《中国语文学论文选》，日本光生馆，1984；
倒句探源，《语言研究》创刊号，1987；
《经传释词札记》，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黄典诚，切韵性质的探讨，《厦门大学学报》第 3 期，1982。

潘悟云、朱晓农，汉越语和《切韵》唇音字，《语言文字研究专辑》（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刘广和，试论唐代长安音重纽——不空译音的讨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6期，1987；
唐代八世纪长安音声纽，《语文研究》（太原）第3期，1984；
唐代八世纪长安音的韵系和声调，《河北大学学报》第3期，1991。
麦耘，论重纽及《切韵》的介音系统，《语言研究》第2期，1992。
钟兆华，颜师古反切考，《古汉语研究论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尉迟治平，周隋长安方音初探，《语言研究》第2期，1982；
周隋长安方音再探，《语言研究》第2期，1984。
施向东，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和唐初中原方音，《语言研究》第1期，1983。
鲍明炜，初唐诗文的韵系，《音韵学研究》第2辑，1986；
《唐代诗文韵部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居思信，"中古韵部系统"试拟，《齐鲁学刊》第3期，1993。
鲁国尧，宋代辛弃疾等山东词人用韵考，《南京大学学报》第2期，1979；
宋代苏轼等四川词人用韵考，《语言学论丛》第8辑，1981；
宋词阴入通叶现象的考察，《音韵学研究》第2辑，1986；
宋代福建词人用韵考，《语言文字学术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89；
论宋词韵及其与金元词韵的比较，《中国语言学报》第4期，1991；
宋元江西词人用韵研究，《近代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1992。
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近代汉语语音研究中的三个问题，《中国语文研究四十年纪念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

宁继福,《中原音韵表稿》,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
许德宝,《中州音韵》的作者、年代以及同《中原雅音》的关系,《中国语文》第4期,1989;
王文璧校正《中州音韵》的初刻年代和诸版本的关系问题,《中国语文》第1期,1991。
龙庄伟,论《中原雅音》与《中州音韵》的关系,《中国语文》第1期,1991。
曹晓渝,"《中原雅音》就是《中州音韵》"质疑,《中国语文》第1期,1991。
慧生,周德清不是《中州音韵》的编者,《中国语文》第4期,1991。
忌浮,曲尾及曲尾上的古入声字:周德清"入派三声"验证,《中国语文》第4期,1988。
黎新第,《中原音韵》清入声作上声没有失误,《中国语文》第4期,1990。
李思敬,《汉语"儿"[ɚ]音史研究》,商务印书馆,1986。
杨亦鸣,《李氏音鉴音系研究》,陕西教育出版社,1992。
耿振生,《青郊杂著》音系简析,《中国语文》第5期,1991;
论近代书面音系研究方法,《古汉语研究》第4期,1993。
洪波,上古汉语指示代词书面体系的再研究,南开大学《语言研究论丛》第6辑,1991。
潘悟云,上古汉语使动词的屈折形式,《温州师院学报》第2期,1991。
唐钰明,1985a,论上古汉语被动式的起源(与周锡韫合作),《学术研究》第5期,1985;
1985b,论先秦汉语被动式的发展,《中国语文》第4期,1985;
汉魏六朝被动式略论,《中国语文》第3期,1987;
1988a,唐至清的"被"字句,《中国语文》第6期,1988;
1988b,古汉语被 动式变换举例,《古汉语研究》第1期,1988;
上古判断句的变换考察,《中国语文》第5期,1991;

古汉语“动＋之＋名”结构的变换分析，《中国语文》第3期，1994；
古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变换”问题，《中国语文》第3期，1995。
吴金华，试论“R为A所见V”式，《中国语文》第3期，1983；
《试论“R为A所见V”式》补正，《中国语文》第1期，1984。
袁宾，《祖堂集》被字句研究，《中国语文》第1期，1989。
陈初生，早期处置式略论，《中国语文》第3期，1983；
《近代汉语概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张华文，《早期处置式略论》质疑，《广州师院学报》第3-4期，1984。
梅祖麟，唐宋处置式的来源，《中国语文》第3期，1990。
潘允中，汉语动补结构的发展，《中国语文》第1期，1980。
杨平，“动词＋得＋宾语”结构的产生和发展，《中国语文》第2期，1989。
武振玉，动·将·补句式的历史演变，《吉林大学学报》第1期，1991。
管燮初，殷虚甲骨刻辞中的双宾语问题，《中国语文》第5期，1986。
何乐士，先秦“动·之·名”双宾式中的“之”是否等于“其”，《中国语文》第4期，1980。
贝罗贝，双宾语结构从汉代至唐代的历史发展，《中国语文》第3期，1986。
许嘉璐，关于“唯……是……”式句，《中国语文》第2期，1983；
1988a，关于训诂学方法的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1988；
论同步引申，《中国语文》第1期，1987；
中学课本文言文注释商榷(续)，《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1984；
1988b，注释学刍议，《古汉语论集》第2辑，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
敖镜浩，略论先秦时期“O/是/V”句式的演变，《中国语文》第5期，1983。

王克仲,《助语辞集注》,中华书局,1988。
蓝鹰,"变换"在古汉语语法研究中的运用——古汉语语法研究方法初探,《天津师大学报》第6期,1987。
董治国,试论古代汉语句型转换,《中国语文》第4期,1994。
王克仲、黄珊,古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刍议,《中国语文》第2期,1995。
孙良明,关于建立古汉语教学语法体系的意见,《中国语文》第2期,1995。
陆宗达、王宁,谈比较互证的训诂方法,《训诂研究》第1辑,1981;
浅论传统字源学,《中国语文》第5期,1984;
论字源学与同源字,《古汉语论集》第2辑,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
《训诂方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陈绂,《训诂学基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周复刚,论训诂引据法,《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第1期,1991;
论训诂统计法,《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第2期,1993。
王宁,训诂原理概说,《训诂学的研究与应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
试论训诂学在当代的发展及其旧质的终结,《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1988;
训诂学理论建设在语言学中的普遍意义,《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1993;
"反训"析疑,《学术之声》第3辑,1990。
朱星,论转语与词源学,《河北大学学报》第4期,1983。
陈建初,论黄侃先生的语源学思想,《湖南教育学院学报》第1期,1990。
孙雍长,古汉语的词义渗透,《中国语文》第1期,1985。
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张猛,晋郭璞义相反而兼通例新析——古汉语词义的图系分析法

之应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 5 期,1987。
袁宾,《近代汉语概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王小莘,《颜氏家训》中反映魏晋南北朝时代特点的语词的研究,《华南师大学报》第 4 期,1993。
徐世荣,反训探源,《中国语文》第 4 期,1980。
徐朝华,反训成因初探,《南开大学学报》第 2 期,1981。

80 年代以来大陆地区汉字学研究状况调查报告

沈培撰文　裘锡圭审订

本文介绍 80 年代以来大陆地区汉字学研究的主要状况，在有必要时，也涉及 70 年代甚至更早的某些状况。全文分成三个部分：一、一般性的汉字学研究（包括《说文》研究）；二、古文字研究；三、现代汉字学研究。

一、一般性的汉字学研究

1．通论性著作

80 年代以来，有不少关于汉字学的通论性著作相继出版，如杨五铭《文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蒋善国《汉字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王凤阳《汉字学》（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詹鄞鑫《汉字说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许长安《汉语文字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李大遂《简明实用汉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等。这些著作有的很有深度，不仅全面介绍了汉字学的基本知识，还试图建立较新的汉字学体系，如对汉字基本类型的划分采取新的看法，比较注重汉字和汉语的关系的研究等等，反映了当代研究汉字学的特点。《简明实用汉字学》一书是专门为留学生学习汉字学而编写的一本教材，书中对各种文字学的名词术语以及难字、难词都注有英文。

需要指出的是，在近年出版的各种汉字学通论性著作中，还有

一些著作体例陈陈相因,内容缺乏新意,既不能吸收过去汉字学研究的优秀成果,也不能反映当代汉字学研究的最新动态。这种情况在以后是应当力求避免的。

2. 汉字性质的研究

研究汉字的性质,就是要弄清汉字属于哪一种文字类型。这个问题早在50年代就受到了注意。70年代末期以后,一度曾成为文字学研究的热点,参加讨论的人很多,意见颇为分歧。

人们基本上采用两种方法来给汉字定性。一种是根据汉字字形所能起的表意、表音等作用来为它定性,另一种是根据汉字字形所能表示的语言结构的层次(也可以说语言单位的大小)来为它定性。属于前一种的,主要有表意文字说和意音文字说,此外还有极少数人主张表音文字说。不少人认为汉字的性质自古至今没有本质变化,但也有人认为汉字的性质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从后一角度提出的观点主要有:商代甲骨文为形意文字周代以后汉字为意音文字说、古汉字为表形文字隶变后汉字为表意文字说。[1]根据汉字字形所能表示的语言结构的层次给汉字定性的,主要有语素文字说和语素—音节文字说。持语素文字说者,一般都承认在单音节词占绝对优势的古代,汉字可以称为表词文字。持语素—音节文字说者一般也承认那个时代的汉字可以称为表词—音节文字。

裘锡圭首先提出要分清作为词或语素的符号的文字和文字所使用的符号(裘氏称之为"字符")这两个不同层次。词和语素都是音义结合体。作为词或语素的符号,不管哪种文字都是既表音又表意的。要划分表音、表意等类型,必须从文字所使用的符号即字符的性质着眼。[2]虽然以前研究汉字性质的人也常常根据汉字所用的符号的性质来给它定性,如说形声字的形旁是表意的,声旁是表音的等等;但是他们之间的有些分歧确定是由于对两个层次的区分没有明确认识引起的。例如说汉字是表音字,就不是着眼于汉

字所使用的符号的性质，而是着眼于汉字作为词或语素的符号具有一定读音这一点的。因此，明确汉字的性质应当由汉字的字符的性质来决定，可以说是近年汉字性质研究上的一个比较大的进步。裘氏主张汉字在早期阶段（隶变以前）基本上是使用意符和音符的一种文字，可以称为意符音符文字（即意音文字）；隶变后由于汉字里的很多意符、音符，已经变为既无表意作用也无表音作用的“记号”，这时的汉字可以称为意符音符记号文字。但隶变后的汉字所使用的符号仍以意符和音符为主，所以汉字的性质自古至今没有本质上的变化。

明确了汉字性质应当由汉字字符的性质来决定以后，对“语素文字”“语素—音节文字”这些说法的内容也需要作重新考虑。过去多数认为汉字是语素文字或语素—音节文字的人，是以每个汉字通常都是一个语素符号这一点为立说根据的。裘锡圭认为，即使根据文字所能表示的语言结构的层次来为它定性，也必须着眼于文字所使用的符号，而不能把作为语素符号的字当做单位来考虑问题。他认为汉字所用的意符只跟语素的意义有联系，没有表意表音作用的记号只能起区分不同语素的作用，所以都是附属于语素这个层次的。由这两类符号构成的字，只能表示出语言中语素这一层次的结构（即表示出词和句子由哪些语素构成），而不能表示出语言的语音结构。至于汉字使用的音符，虽然跟音节文字的字母有很大区别，却应当看作属于音节这一层次的符号（如“隍”“喤”“惶”“湟”等形声字的声旁“皇”，是表示这些同音节字的音的，加上“阜”“口”“心”“水”等意符作形旁，才构成分别代表不同语素的字）。所以他得出了汉字是语素—音节文字的结论。这种语素—音节文字说跟以前多数人所持的语素—音节文字说貌同实异，但是跟意音文字说在实质上则是一致的。

认为汉字是表意文字的人，主要着眼于汉字与表音文字的本质差别，并不是否认形声字声旁等有表音作用。

此外，还有人提出了关于汉字性质的一些新的说法，但影响不

大，这里就不具体介绍了。

跟汉字性质有密切关系的、汉字是否适合汉语的问题，也有不少人加以讨论。在五六十年代，人们往往强调汉字与口语脱节的一面。近年来则有很多人认为，由于在汉语里迄今为止单音节语素仍占优势，而且新词大都由已有的语素合成，所以作为语素文字或语素—音节文字的汉字，跟汉语基本上仍是适合的。[3]

3．汉字起源的研究

50年代以来，在原始社会时代的遗址（这里所说的“遗址”包括墓葬）里发现了不少刻划或描绘在器物上的符号，例如在属于仰韶文化早期的一些半坡类型遗址里发现了很多形状大都比较简单的刻划符号（多作几何形），在大汶口文化晚期的一些遗址里发现了一批象实物的图形符号等等。学者们对这些符号是否是文字的问题已经作了很多讨论，但迄今还没有一致的意见。有些人认为它们是文字，甚至直接把它们当作早期的汉字加以辨释[4]。有些人认为它们都还是非文字的标记。[5]有些人认为半坡类型遗址出土的以及与之相类的那些符号不是文字，大汶口文化象形符号则是原始的汉字。[6]从各方面看，上述前一类符号大概不可能是文字。不少人根据半坡遗址发现的符号，说汉字有6000年以上的历史，恐怕是不妥当的。

在偃师二里头等可能属于夏代的遗址里也发现过一些刻划符号。很多人认为是夏代文字，但并没有提出足够的证据。

80年代在西安市郊区的龙山文化晚期遗址里发现了一些刻有符号的骨片和骨器（也有人认为这些所谓“符号”是天然腐蚀而成的）。有人称这些符号为甲骨文，认为跟殷墟甲骨文有渊源关系。在河南舞阳县距今七八千年的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里发现的龟甲上的简单刻划符号，也有人称为“原始文字”。这些说法都嫌轻率。

大汶口文化象形符号在外形上跟古汉字相当接近。同类型的

以至完全相同的符号，在传世的良渚文化古玉器上也有发现。[7]但是迄今为止也还没有发现这类符号确已用作文字的证据。

最近两年讨论得最多的是1992年山东邹平丁公龙山文化遗址出土陶片上排列成数行的符号，但专家们的看法仍相当分歧。[8]有些人把它们当做文字释读，甚至还有人认为是古彝文。[9]但也有不少人认为它们不是文字。有人甚至认为这些陶文是伪刻的。[10]

有些文章对原始社会时代使用的符号作了比较全面的讨论。[11]

在汉字起源的研究中，研究者除了大量使用考古资料外，还普遍把兄弟民族的各种原始记事方法和纳西原始文字（或称纳西图画文字）用作比较的资料。有些人还提出了关于汉字形成过程的一些比较具体的设想，如认为在汉字形成过程之初，假借方法就已普遍应用；在汉字的原始文字阶段，文字和图画曾混杂在一起使用；形声字在原始文字阶段就已出现等等。[12]

汉字起源的问题虽然讨论得比较热烈，但是如果没有更新的重要资料发现，恐怕很难取得突破性的新进展。

70年代末以来，有越来越多的人明确地认识到，汉字从萌芽到形成能完整记录汉语的文字体系，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的。有些学者提出了“原始文字”这一概念，以指称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文字。

对汉字最后形成完整记录语言的文字体系的时代，目前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形成于夏商之际[13]，一种认为形成于夏初[14]。

4.《说文解字》和“六书”的研究

80年代以来，出版了一些研究《说文》的通论性著作，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陆宗达《说文解字通论》（北京出版社，1981）、姚孝遂《许慎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83）、蒋善国《说文解字讲稿》（语文出版社，1988）。1985年4月中国训诂学会在河南郾城召开首

届纪念许慎学术讨论会，并成立了许慎研究会。会后，中国训诂学会和许慎研究会编辑了论文集《许慎与〈说文〉研究论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1990年12月河南省社科院又在郾城设立了许慎研究所。1991年9月河南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许慎研究会、漯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许慎与《说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论文集《说文解字研究》（第一辑）（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为了普及《说文》学的知识，王宁、董希谦主编了《许慎与〈说文〉小丛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包括有《〈说文解字〉与汉字学》（王宁）、《〈说文解字〉与文献词义学》（宋永培）、《〈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谢栋元）等九本书。

近年发表的有关论文，有研究《说文》、《说文》段注和其他《说文》学重要著作的，也有研究与《说文》有关的字体、六书、声韵以及部首与检字等方面的问题的，涉及的范围很广。我们只简单介绍一下跟字体和六书有关的研究情况。

《说文》中收有小篆、古文、籀文三种字体。讨论得比较多的是其中的古文。[15]。关于小篆的来源也有人作了研究。[16]

在六书中，讨论得比较多的是转注和假借。

《说文》所说的“转注”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是争论了一千多年的老问题。直到90年代还有人写这方面的专著。[17]但也有人认为，在今天再花大力气讨论这一问题，意义不大。从古到今对转注的不同解释非常多，几乎所有可能想到的解释都已经有人提出过了。有些说法所涉及的语言文字现象是有研究价值的，但是完全没有必要把对这些现象的研究跟“转注”定义问题纠缠在一起。[18]

对假借的看法也存在分歧，其症结在于假借和引申的分合。传统文字学曾把字义引申看作典型的假借现象，直到现在还有人如此主张。但是，字义引申毕竟是语言现象而不是文字现象，所以现在多数文字学者主张把二者区分开来。

跟假借有密切关系的通假字的问题，有比较多的人进行研究。“通假”有狭义、广义之分。一般认为狭义的“通假”指本有本字的

假借。广义的"通假"跟古人所说的"通用"相当，不同的字被用来表示同一个词的各种现象，几乎都可以纳入其范围。但也有人主张把"通假"看作通用和假借的合称，认为"通用"不包括假借。[19]通假字的读音问题，即本读A音的字用作一个读B音的字的通假字时，究竟应该改读B音还是仍读A音的问题，曾引起较多的讨论。经过讨论，多数人认识到，一个字用作另一个字的通假字，意味着这个字被用来表示通常由后者表示的一个词，两者应该读同一个音。[20]此外，还有人对古代文献如秦汉帛书简牍中的通假现象进行了研究。[21]近年来，通假字字典性质的专著已出版了好几种。[22]其中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的《古字通假会典》(齐鲁书社，1989)比较重要。

形声字结构方面的一些现象，如省声、多形多声、"右文说"等，也有不少人写文章或在文字学通论性著作里作过研究。研究省声的文章比较多。[23]《说文》中的"多形多声"也有人作了全面的调查和分析。[24]有人对"右文说"的产生、发展及其优缺点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25]

虽然现在讲汉字结构的人大多数仍然沿用六书说，但也有人想以"三书说"来代替"六书说"。早在30年代，唐兰就提出过把古汉字的结构分为象形、象意、形声三书的主张[26]。50年代陈梦家提出了新的三书说，主张把古汉字分为象形、假借、形声三种基本类型。[27]80年代，有人在陈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表意、形声和假借的三书说。[28]

此外，还有人从新的角度分析汉字的构造。王宁等人提出"汉字构形学"的说法。[29]王宁认为：汉字的构形的基本元素是形位。形位是由个体字符中依层次切分出来的最小的、具有独立的表现和区别造字意图功能的构形单元。其中大部分是独体字(成字构件)，少部分是不成字的绘形或指事符号(非字构件)。宋金兰还专门分析了小篆的"形位"。[30]

5. 异体字、古今字的研究

过去很少有人去研究汉字跟汉语里的词的各种具体关系。五六十年代以来由于对异体字、古今字的研究受到重视，这种状况才逐渐有了改善。

80年代以后，有人对50年代所整理的异体字进行了更加细致的研究，提出了不少改进的意见。有人还对《康熙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两部大型工具书中的异体字进行了研究。[31]

在异体字整理问题上，不少人注意到不仅要整理单个字的异体，还应该整理双音节或多音节词的异形(如“交代”和“交待”、“折中”和“折衷”等)。这无疑是正确的。不少研究词的异形的人，为了强调自己的观念跟旧的以单字为本位的异体字观念的不同，使用了“异体词”或“异形词”的名称。[32]这种名称其实并不很恰当。[33]

古今字指同一个词的、通行时代有古今之别的不同书写形式。在古今字的范围应该怎样划的问题上有分歧意见。有些人主张把古今字跟通假字分开来，只把有“造字相承的关系”的那些字(如“县”和“悬”、“说”和“悦”等)定为古今字。[34]有些人认为古今字跟通假字是从不同角度对同词异字现象作出的“不同归类”，二者“不是平行关系”，古今字应该包括通行时间有古今之别的通假字，而且古今字不但“可以指形义不同的两个字，也可以指形不同但义同的异体字”。[35]后一种意见符合历史上使用“古今字”这类说法的实际情况。有人指出，“古今字”本来是在解释古书中的难字时所用的一种术语，并不是用来说明文字产生的先后的。我们似乎没有必要赋予这个旧术语以新的意义，把古今字限制在有造字相承关系的范围里。[36]

6. 其他

80年代以来还出版了一些汉字学的普及性读物。李乐毅编著的《汉字演变500例》(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列举了500

个汉字在几种主要字体中的写法，“并对这些字例的字源作图解和浅释”（见该书“前言”），在同类的读物中是比较好的一种。

关于汉字研究的历史，也出版了两三种较新的专著，如黄德宽、陈秉新《汉语文字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孙钧锡《中国汉字学史》（学苑出版社，1991）。

汉字是汉民族文化的载体，而且很多字的构造就是跟一定的文化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近年来有不少人注意到从汉字探索有关的文化现象，写了很多以“汉字与文化”为主题的文章和著作，其中江西教育出版社的“汉字文化丛书”（陈海洋主编，1995）以及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中国汉字文化大观》（何九盈、胡双宝、张猛主编，1995）可看作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几年前就有人提出建立“汉字文化学”的主张。但是，至今“汉字文化学”的界定还不是很清楚，在一些人所写的有关论著中，有不少内容其实可以归入文化语言学的范围里去，有的内容甚至很难说跟汉字和汉语有什么联系。

二、古文字研究

建国以来，尤其是 70 年代以来，由于新资料的发现和研究者的努力，先秦秦汉文字的研究有了比较明显的进展。有人主张把“古文字”的范围扩大到秦和西汉前期的文字，即把小篆和古隶也包括在古文字里。1978 年成立了中国古文字研究会，至今已召开过 11 届学术讨论会，研究会与中华书局合编的《古文字研究》已出版到第 19 辑。

近年来，出现了不少古文字学通论性著作。如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中华书局，1985）、林沄《古文字研究简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文物出版社，1987）、陈炜湛、唐钰明《古文字学纲要》（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陈世辉、汤余惠《古文字学概要》（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等。唐兰在 30 年代写成的《古文字学导论》也在 1981 年由齐鲁书社正式出版。这些著

作除了全面介绍古文字知识以外，还都探讨了古文字学的一些理论问题，对于建立科学的古文字学有重大的意义。此外，80年代以来还出版了一些包括多种古文字资料的古文字字典和文编，如高明《古文字类编》（中华书局，1986）、徐中舒主编的《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等。

附带要提到的是1990年出全的《汉语大字典》。这部字典在楷书字头下收列了能够反映形体演变关系的有代表性的甲骨文、金文、小篆和隶书的形体，并且附有简单的字形解说。

古文字研究已经形成了四个主要领域，即：1.甲骨文研究；2.金文研究；3.秦系文字研究；4.战国文字研究。以下我们依次介绍这四方面的情况。

1．甲骨文研究

中华书局1979—1982出版了以郭沫若为主编胡厚宣为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收甲骨拓片41956片，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殷墟甲骨文资料著录书。1973年在河南安阳小屯南地，1991年在安阳花园庄先后发现了重要的甲骨文资料。前一次发现的多达5000余片，已由发掘者编成《小屯南地甲骨》（中华书局，1980）公布于世。这些重要资料书的出版，大大推进了甲骨文的研究。

50年代以来，还发现了西周时代的甲骨。其中以70年代在陕西岐山、扶风一带古代周原地区发现的为最重要。已发现的刻字西周甲骨总计有300多片，上有刻辞1000多字，其中少量卜甲的时代可能属于商代末期。[37]已经出版了两种全面研究西周甲骨文的专著，即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徐锡台《周原甲骨文综述》（三秦出版社，1987）。

80年代后期以来，出版了一批甲骨文研究的工具书。其中以姚孝遂、肖丁主编的《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中华书局，1989）、徐中舒主编的《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赵诚《甲骨文简明词典——卜辞分类读本》（中华书局，1988）、崔恒升《简明甲骨文

词典》(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等为比较重要。新的甲骨学通论性著作也出版了几种。[38]

殷墟甲骨文的分期断代是甲骨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50年代,陈梦家从董作宾所说的“文武丁时代卜辞”中分出了“午组”“德组”和“子组”卜辞,并考订其为武丁时代之物,纠正了董氏以为“文武丁复古”的错误。越来越多的考古材料证明陈梦家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近年还有人对这一说法进行了补充论证。1976年殷墟发现了商王配偶“妇好”的墓葬,其名见于武丁时代卜辞和被一般人认为属于武乙、文丁(即文武丁)时代的有“贞人”历之名的卜辞,由此引起关于“历组卜辞”的时代的讨论。参加讨论的人分成观点对立的两派,一派认为这种卜辞应当属于武丁和祖庚时代[39],另一派维持这种卜辞是武乙文丁卜辞的旧说。[40]这次讨论虽然还没有结束,但是促使人们对断代的标准进一步作认真的考虑,对甲骨文分期断代的研究已经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早在1957年,就有学者指出甲骨的分类与断代应当分成两个步骤来进行,分类要依据字体、字形等特征。[41]这在甲骨断代的理论研究上是一个突破。但是直到70年代以后在关于历组卜辞的讨论中,这一观点才真正受到重视。按照这种观点进行甲骨分期断代研究的代表性专著有黄天树的《殷墟王卜辞分期分类研究》(文津出版社,1991)和彭裕商的《殷墟甲骨文断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在甲骨文字的考释和甲骨文语法研究方面,80年代以来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比较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学者在文字考释和语法研究中较多地使用了甲骨分类断代和语言学方面的知识,从而提高了研究的质量。在甲骨文语法研究方面,张玉金、赵诚等人发表了关于句法、虚词等问题的一系列文章。[42]张玉金还出版了第一部甲骨文虚词方面的专著《甲骨文虚词词典》(中华书局,1994)。

近年还出现了从文字学角度研究甲骨文的专著,如赵诚《甲骨文字学纲要》(商务印书馆,1993)和李圃《甲骨文文字学》(学林出版社,1995),这在汉字的断代研究方面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利用甲骨文进行社会历史等方面研究的论著数量很多，其中不少涉及文字的考释和卜辞的释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写的《甲骨文与殷商史》已出版了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986、1991）。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对商代的周祭制度作了很好的研究。宋新潮《殷商文化区域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从商代考古学资料出发，结合甲骨文和历史文献，对商代政治地理结构进行了研究。杨升南《商代经济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全面研究了商代的经济。陈炜湛《甲骨文田猎刻辞研究》（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是专门研究田猎刻辞的著作。

这里附带谈一下古文字中所谓"易卦"的问题。在殷周时代的甲骨、铜器和其他物件上，有时可以看到一种用 6 个或 3 个数字组成的符号，其意义长期以来没有确解。李学勤在 1956 年曾敏锐地意识到它可能同《周易》的"九"和"六"有关。[43]1978 年冬，张政烺在长春举行的中国古文字研究会首届年会上，指出这种数字符号并非什么"奇字"，而是"易卦"。此后，张先生发表了《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等文，其他学者也发表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章。[44]虽然各家讨论的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但甲骨、铜器上的这些由数字组成的"奇字"已不再是不可理解的神秘之谜了。

2. 金文研究

这里所说的金文指商周金文。

建国以来，地下发现的重要金文资料层出不穷，研究工作也不断向前推进。

80 年代以来，在金文方面有不少重要著作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的《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1984—），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金文资料著录书，共 18 册，已出版 15 册。容庚《金文编》出版了经过增订的第四版（张振林、马国权摹补，中华书局，1985）。陈汉平的《金文编订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对《金文编》的错误多有匡正，是阅读《金文编》时有用的参考书。戴家祥主编的《金文大字典》也于最近出版(学林出版社，1995)，该书的特色是所收金文都选自拓片，保证了字形的准确性。马承源主编的《商周青铜器铭文选》(1-4册，文物出版社，1985—1990)、唐兰的《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都是金文研究方面的有价值的专著。

80年代以来还整理发表了几批80年代之前通过正式的考古发掘获得的重要青铜器铭文。例如1976年在陕西扶风庄白一号西周青铜器窖藏共出103件铜器，是解放以来发现的数量最多的西周青铜器窖藏，其中74件铜器有铭文，内容十分丰富，对研究西周历史和西周铜器的断代以及古文字学都有重要参考价值。尹盛平主编的《西周微氏家族青铜器群研究》(文物出版社，1992)集中反映了研究者对这批铜器铭文研究的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一书，收录了解放以来殷墟所出的有代表性的200多件铜器(其中约有1/4是首次发表)，对殷代铜器研究意义重大。卢连成、胡智生编写的《宝鸡弜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9)著录了1974—1981年宝鸡茹家庄、竹园沟、纸坊头等地出土的全部有铭铜器。其中除了少量商代铜器以外，都是西周早期和中期铜器，是研究西周王朝与古代少数民族建立的弜国关系的珍贵史料，也是探讨弜国与周围方国关系的新资料。

金文的分国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刘彬徽、李零等人对楚国铜器加以收集研究。[45]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单位编写的《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公布了七座墓葬出土的117件有铭文的青铜器，大都是新材料，对楚史及楚与各国关系的研究很重要。此墓所出有铭铜器的年代，大体从春秋中期后段至春秋晚期后段，前后延续了约140余年。发掘报告的作者，对这些铭文作了全面的报道和研究。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也是有用的著作。此外，徐少华等人在这方面做了许多

工作。[46]属于战国时代的中山王墓中所出铜器上的铭文十分重要，不少研究者对它进行了研究。张守中还编写了《中山王𰯼器文字编》(中华书局，1981)。

近年来，从位于山西曲沃和翼城之间的天马一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盗掘出土的晋侯铜器，在香港等地的古玩市场上屡有出现。1992年以来，由北京大学考古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合组的曲村考古队，在对墓地进行的抢救性发掘中，确定西周早中期至春秋早期晋侯墓地即在此处。发掘中发现了一些晋侯铜器，这些铜器对研究晋国历史有重大价值。[47]

青铜器断代研究对金文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一直是金文研究者注意的重点。近年来，青铜器断代研究的一个较大的特点是比较充分地发挥了窖藏和墓葬出土的铜器群的作用，学者们往往选择具有标尺作用铜器群，通过同群和异群各器间的纵横联系来进行断代研究。[48]

有人尝试利用金文的记时资料来推定铜器的年代。周代铜器铭文有些具备王年、月份、月相和记日干支，可以结合历法研究推定其年代。但“月相”所指日期问题一直是争论的焦点。[49]由于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由于西周各王在位年代也没有统一的看法，所以这方面的研究虽然相当热闹，但目前还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商周金文中有一种象形意味特别浓厚的符号，多数用作族的标记。郭沫若最早指出它们就是族名。现在一般学者都认为这种符号大都是文字。对此有人作了比较深入细致的研究。[50]

80年代以来，对周代金文语法的研究也有进展。管燮初《西周金文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1981)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对金文语法作全面研究的专著，采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比较细致。此外，马国权、张振林、陈永正、杨五铭、唐钰明等人对代词、语气词、联结词、被动式、复音词的研究，[51]都可以补正现有汉语史著作中的某些结论。崔永东《两周金文虚词集释》(中华书局，1994)是第一部金文虚词词典。

利用金文进行社会历史等方面研究的著作也有不少，如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华书局，1986)、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学林出版社，1986)。这些著作对于青铜器铭文研究有较重要的参考价值。

3．秦系文字研究：

秦系文字包括秦代文字和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

70年代以后，秦系文字资料大量发现。其中秦简是前所未见的新资料。1975年12月湖北云梦睡虎地第11号秦墓出土竹简1100多枚。其内容有编年记、语书、秦律18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日书甲乙二种，是战国末期至秦始皇时期之物。1975年12月至1976年1月湖北云梦睡虎地四号秦墓出土家书木牍二件。1979年至1980年间四川青川县城郊郝家坪50号战国时代秦墓出土一块木牍，正反面均有墨书文字。1986年9月甘肃天水放马滩一号秦墓出土460多枚竹简，有日书甲乙二种和墓主记两种资料。1993年3月在湖北江陵县荆州镇郢北村王家台15号秦墓出土竹简800余枚，内容包括效律、日书和易占三部分。易占的部分卦名与今本《易经》不同，解释多援用古史，是研究《易》的重要资料。[52]睡虎地秦简整理小组编写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发表了1975年底睡虎地秦墓出土的全部竹简，对研究有很大推进作用。到目前为止，以这批秦简为资料的文字编已经出版了三种。[53]

由于大量用古隶书写的秦和西汉早期的简牍和帛书的发现，大家才认识到早期隶书的真正面貌，并且认识到隶书不是秦统一后在小篆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是在战国晚期的秦国，以秦国文字的简俗体为基础而形成的。这在隶书的研究上是一个突破。[54]

秦系文字的金文、石刻、陶文等资料，也有不少人加以研究，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王辉《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三秦出版社，1990)按时代顺序

安排秦系金文资料，全书合计收器 270 件。考释中能对已有成果加以总结，并提出了自己的不少新见解。

秦石刻文字的研究，集中在对石鼓文上。1983 年出版的罗君惕的《秦刻十碣考释》（齐鲁书社，1983），是数十年前的旧作。李铁华的《石鼓新响》（三秦出版社，1994）是对石鼓文作全面研究的一部新著。近几年来，石鼓文的时代是讨论的热点，[55]至今还没有统一的结论。陕西凤翔南指挥一号秦公大墓曾出土一批石磬，铭文残存 100 余字，对研究石鼓文的时代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可惜资料还没有全部公布。秦文字中另一种有名的石刻是诅楚文，近年有人对它的时代作了进一步的研究。[56]虽然有人怀疑它是伪刻，[57]然而所提证据不足，难以成立。

秦陶文的研究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袁仲一《秦代陶文》（三秦出版社，1987）收集了很多陶文拓片，还附有字表，便于使用。著名的秦封邑瓦书也有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58]

秦玺印、漆器文字、货币等也有人作了研究。[59]

汉语大字典字形组编的《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四川辞书出版社，1985），收入了一些秦和西汉早期的简牍、帛书文字的字形。袁仲一、刘钰《秦文字类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对出土的秦文字做了较全面的整理，可惜摹写错误太多。

这里附带谈一下秦代之后的篆文资料的搜集整理。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罗福颐的《汉印文字征》（文物出版社，1978）及《补遗》（同上，1982），还有施安昌的《唐代石刻篆文》（紫禁城出版社，1987）。

4．战国文字研究

这是古文字学中较晚形成的一个分支，但发展得很快，80 年代末出版了第一部战国文字通论性专著——何琳仪的《战国文字通论》（中华书局，1989）。现在，研究者对战国文字形体的特点及各地区文字之间的差别，已有了较前深刻得多的认识。

关于战国文字的研究论著数量很多，比较分散。不少古文字研究者的论文集中都有关于战国文字研究的文章。[60]

战国竹简是研究者极为重视的资料。50 年代至 70 年代先后在湖南长沙、河南信阳、湖北江陵、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现了大量竹简，其内容大部分是送葬物品的记录，小部分是为病者占卜祷祝的记录，只有很少是古书。80 年代以来有新的重要发现，如湖北荆门包山楚简中有司法文书，对于了解楚国的司法制度和社会情况很有价值。[61]1994 年底在湖北荆门郭店 1 号楚墓出土了《老子》等竹简典籍，这是通过正式发掘而发现的古书，十分珍贵。近年来的楚简研究，在古代简册的制度、职官和器物的考订以及奇字难句的释读等方面，都有不少突破。[62]

楚帛书自从 60 年代拍出红外线照片以来，由于字迹较前大为清楚，研究工作有明显进步。近年来，帛书文字上的部分疑难问题得到了解决。[63]

在战国陶文研究方面，某些带关键性的常见字的考释有所突破，[64]过去无法理解的一些文辞得以通读。新出版的资料书和工具书，主要有高明的《古陶文汇编》（中华书局，1990）以及高明和葛英会的《古陶文字征》（中华书局，1991）。

战国玺印文字的研究，近年来也有较大进展。80 年代出版的资料书和工具书，主要有罗福颐主编的《古玺汇编》（文物出版社，1981）和《古玺文编》（文物出版社，1981）。这两本书相互配合，为古玺文研究提供了较好的条件。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康殷、任兆凤主编的《印典》（1-4 册）（国际文化出版社，1993—1994），它从一百多种印谱中采选了 4 万余方古印（包括一些封泥），其中有不少是战国古玺。此书的特点是编排以单字为纲，在每字下（少量常用字除外）收有出现此字的全部古印的整方印文，合印谱与玺印文字编于一书，资料集中，便于使用。罗福颐《近百年来对古玺印研究之发展》（西泠印社，1982），综述古玺文字的源流和特征，对前人的研究成果作了系统的总结。吴振武《〈古玺汇编〉释文订补及分类修

订》(《古文字学论集》初编，香港中文大学，1983)一文，广泛吸收近期战国文字研究的成果，补订《汇编》的释文1300多处，修订分类250处，是使用《汇编》时必需参考的文章。考释古玺文字的单篇论文数量很多，精彩纷呈。[65]古玺的分国研究也有进展。[66]

战国货币文字的研究，进步也比较明显。80年代出版的资料书和工具书，主要有汪庆正主编的《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货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和张颔的《古币文编》(中华书局，1988)。

战国玉石文字的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一些成绩。[67]

对研究战国文字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汗简》和《古文四声韵》二书，也有人作了整理和研究。[68]

这里我们附带谈一下一般认为属于春秋晚期的侯马盟书的研究情况。1965年底在山西省"侯马晋国遗址"发现的5000余件写在玉石上面的"盟书"，对于研究春秋晚期的字体和当时的社会经济等情况有重大意义。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编辑的《侯马盟书》(文物出版社，1976)发表了其中比较完整的600余件，并对它们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一些专家也发表了有关的论文。[69]现属河南温县的西张计村，在三四十年代就发现过盟书(当时此地属沁阳县)，70年代末80年代初又发现了大量墨笔写的盟书，[70]时代跟侯马盟书相近，这批资料对研究晋国历史非常重要，可惜至今还没有全部公布。

在这一节最后，我们附带谈一下对汉代以后、清代以前的文字的研究情况。

有关这一时期字体的各种工具书出版了不少。[71]但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不多，直到近几年来才有所改善。80年代以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敦煌卷子所用文字和其他唐代文字上。[72]晚明刻本小说用字也有人进行了研究。[73]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涌泉的《汉语俗字研究》(岳麓书社，1995)。这是迄今为止第一部俗文字学的概论性著作，作者不仅全面地介绍了俗字学的各种知识，还通过对大量俗文字资料的深入研究，揭示了前人未曾注意

到的很多文字现象，指出了语文著作中与俗文字有关的很多疏失，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

三、现代汉字研究

80年代初，周有光提出了建立现代汉字学的建议。[74]近年来，已有几本专著问世，如张静贤的《现代汉字教程》（现代出版社，1992）、苏可育和费锦昌合著的《现代汉字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苏培成的《现代汉字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到目前为止，现代汉字方面的研究工作已经有了相当快的进展。我们分现代汉字属性研究和简化汉字研究两个方面作一些简单的介绍。有关汉字教学、汉字信息处理等应用方面的问题集中另有专文介绍，这里不谈。

1. 现代汉字属性研究

① 字频　近年来曾进行过几次大规模的字频统计，主要成果见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现代汉语频率词典》的《汉字频率表》（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和国家语委、国家标准局《现代汉语字频统计表》（语文出版社，1992）。有人指出目前的字频统计由于样本选择和语料抽样未达到最佳选取的要求，因而影响了统计结果的科学性。[75]

② 字量　在字量的研究上，多年来各有关机构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多数据。国家语委汉字处经过研究，制订了包含2500个常用字和1000个次常用字的《现代汉语常用字表》，于1988年1月由国家语委和教委联合发布。他们还制订了包含7000个字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于同年3月由国家语委和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布。这两个表的科学性比过去的同类字表有所提高。不但所用的数据比较精确，而且选字时较多地考虑了字的构字和构词能力等方面的条件。为了了解现行汉字的总数量及其使

用情况，国家语委汉字处（前身为文改会汉字处）等单位还进行了姓氏、地名等方面用字情况的调查研究，对方言用字也有人作了一些调查研究。1990 年至 1991 年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汉语水平考试部和北京语言学院汉语水平考试中心联合研制了《汉语水平·汉字等级表》（见《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

③ 字形　字形研究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个方面是笔画、部件等构形单位的研究，其中部件的定义和归属是讨论的焦点。但迄今还无统一的意见。对现行汉字的构形成分，也就是构成全部字形的单元，一直有人在研究。构形成分有不同的层次。层次不同，单元数量大小不一样。如果以传统文字学所说的偏旁为构形成分，即使只以一般所谓通用字为统计范围，单元数量也要多到 1000 左右。如果不顾六书结构，把本身由偏旁组成的偏旁全部分拆开来，单元数量就会大大减少。如果以笔画为构形成分，并对相似的笔形加以归并，单元数甚至可以降到 10 以下。1985 年，文改会汉字处跟武汉大学合作，用电脑对《辞海》1979 年版所收汉字的"结构、部件"等进行了统计，部分统计成果已在《中国语文》1985 年第 4 期上发表，。研究构形成分的人，尤其是具有某种实用目的（如想为汉字信息处理的机械化、电脑化服务）的研究者，在分解全部字形时往往同时采用不同层次的构形成分。如王竹溪《新部首大字典》（上海翻译出版公司、电子工业出版社，1988）有 56 个部首（大多数有变体），它们同时也是"汉字组成的单元"，其中就既有笔画和笔画结构，也有偏旁。[76]

另一方面是现代汉字构字法的研究。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的，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几本现代汉字学的专著以外，还有一些单篇论文。[77]在专类研究中，大家注意得比较多的是现代汉字的形声字。声旁的表音作用和形旁的表意作用都有人进行了定量的研究。[78]有人认为现行汉字中的形声字与字源上的形声字有区别，他们把通过字源分析而确认的形声字叫做"形声结构"，属于"形声结构"的字在现代汉字中是否形声字，还要参看其他条件来确定。在

确立具体的分析原则以后，他们进行了统计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在现代汉语 7000 个通用字中，属于形声结构的有 5363 字，其中现代汉语形声字 3975 字，占 70.53%。[79]

现代汉字的字序、字音、字义等问题也有人作过研究。

2. 简化汉字研究

1986 年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对个别字作了调整。1991 年是《汉字简化方案》公布 35 周年，为纪念这一事件，语文报刊发表了一批有关汉字简化的论文。在讨论中，多数人对简化字持肯定态度，但同时也指出了简化字的一些缺点。有人从纯文字的角度对比简化字和繁体字，认为：从汉字字形的表意表音作用来看，有不少简体优于繁体，但也有不少的简体是通过破坏或削弱繁体的字形的表意表音作用来达到简化目的的。[80]很多人指出由于简化，汉字体系里又增加了一些基本结构单位，这是不利于汉字的使用的。此外，同音替代增加了一字多义的现象，有时还增加一字多音的现象。极少部分人对简化字基本上或完全持否定态度。[81]

近几年，袁晓园在语文学界提出的一些观点有较大的影响。1988 年，袁晓园提出“识繁写简”，主张“把繁体正字作为印刷体，把简化字作为手写体”。[82]这个主张提出之后受到不少人的批评。[83]。1992 年，袁氏还对“识繁写简”重新做了解释。她说：“以繁体字为正体的地方，允许印刷一些简体字读物；以简体字为正体的地方，允许印刷一些繁体字读物。用繁用简，主要应由印刷读物的性质决定，不必完全统一。”“这就叫各行其便，各得其所。”[84]对袁的新解释，也有人进行了批驳。[85]

袁晓园及其主编的《汉字文化》杂志在近几年中一直主张汉字优越的观点，对此也有人进行了评论。[86]

此外，由于海峡两岸以及国际交流不断增多，对汉字文化圈内汉字的比较研究也逐渐开展了起来。[87]

注释：

1. 陆锡兴，近年来关于汉字性质的讨论，《语文导报》第10期，1985。
2. 裘锡圭，汉字的性质，《中国语文》第1期，1985。
3. 裘锡圭，四十年来文字学研究的回顾，《语文建设》第3期，1989。
4. 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第2期，1973。
5. 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第1期，1981。
6. 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文物出版社，1987。
7. 李学勤，论新出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文物》第12期，1987。
8.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四、五次发掘简报，《考古》第4期，1993；
   专家笔谈丁公遗址出土陶文，《考古》第4期，1994。
9. 冯时，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解读，《考古》第1期，1994。
10. 张政烺，文字与书法，《中国书法》第1期，1994。
11. 裘锡圭，究竟是不是文字——谈谈我国新石器时代使用的符号，《文物天地》第2期，1993；
    王蕴智，史前陶器符号的发现与汉字起源的探索，《华厦考古》第3期，1994。
12. 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第1期，1981；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
13.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第27页。
14. 孟维智，汉字起源问题浅议，《语文研究》第1期，1980。
15. 祝鸿熹、黄金贵，《说文》所称古文中的假借字，《语言研究》第2期，1982；
    曾宪通，三体石经与《说文》古文合证，《古文字研究》第7辑，1982；
    李天虹，《说文》古文校补29则，《江汉考古》第4期，1992；

《说文》古文新证，《江汉考古》第2期，1995等文。
16. 徐无闻，小篆为战国文字说，《西南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1984；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第64—67页。
17. 孙雍长，《转注论》，岳麓书社，1991。
18.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第100—102页。
19. 刘又辛，大型汉语字典中的异体字、通假字问题，《中国语文》第4期，1979。
20. 盛九畴，通假字小议，《辞书研究》第1期，1980。
21. 钱玄，秦汉帛书简牍中的通借字，《南京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1980；
赵平安，秦汉简帛通假字的文字学研究，《河北大学学报》第4期，1991；
王美宜，睡虎地秦墓竹简通假字初探，《宁波师范专科学校学报》第1期，1982；
许仰民，敦煌变文假借字音义关系研究，《信阳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1984；
刘方，试析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同音假借，《宁夏大学学报》第4期，1985；
钟旭元等，甲骨文金文通假字释例，《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1987；
张儒，关于竹书、帛书通假字的考察，《山西大学学报》第2期，1988；
罗福颐，临沂汉简通假字表，《古文字研究》第11辑；
吴九龙，银雀山汉简中的古文、假借、俗省字，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出土文献研究续集》，文物出版社，1989；
晓晴，汉碑中的通假字，《淮北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1990等文。
22. 曹先擢，《通假字例释》，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高启沃，《古籍通假字选释》，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
刘又辛，《通假概说》，巴蜀书社，1988；
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会典》，齐鲁书社，1989；
郑权中遗著、徐宗涛等整理修订，《通假字萃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
马天祥、萧嘉祉编，《古汉语常用通假字字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
何耿庸，《古代汉语的通假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
马天祥、萧嘉祉编、李毅夫校订，《古汉语通假字字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周盈科，《通假字手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 等。

23. 吴东平，试论《说文解字》"从某、某省声"，《武师孝感分院学报》第 2 期，1982；
万业馨，《说文解字》中同声源字"省声"的初步分析，《南京大学学报》第 3 期，1983；
尹靖，《说文解字》省声字初探，《天津师范专科学校学报》第 2 期，1985；
王英明，《说文解字》的"省声"，《辞书研究》第 1 期，1986；
姚炳祺，《说文》中之"省声"问题，《广州民族学院学报》第 2 期，1988；
车先俊，《说文》省声字研究，《徐州师范学院学报》第 1 期，1989；
郝兴宙，《说文》"省声"分类及得失，《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第 2 期，1989；
曹先擢，《说文解字》的省声，《王力先生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
杨择令，从字形学看《说文》省声字，《郑州大学学报》第 5 期，1989；
李润，《说文》"省声"字说略，《四川师范学院学报》第 1 期，

1990；
顾之川，论《说文解字》中的省声字，《青海民院学报》第 3 期，1990；
何九盈，《说文》省声研究，《语文研究》第 1 期，1991；
李家祥，《说文解字》省声类字疑误析辨，《贵州文史丛刊》第 3 期，1991；
包浩然，试论《说文解字》中的省声字，《许慎与〈说文〉研究论集》，中国训诂学会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
金钟赞，说文的归类方法与一些省声字，《语言研究》，1991 年增刊；
李敏辞，"省声"说略，《古汉语研究》第 2 期，1995 等文。
24. 汤可敬，《说文》"多形多声"说研究，《益阳师范专科学校学报》第 4 期，1991。
25. 刘又辛，"右文说"说，《语言研究》第 1 期，1982。
26. 唐兰，《古文字学导论》(增订本)，齐鲁书社，1981。
27.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
28.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第 106—107 页。
29. 《中国教育报》的《语言文字》副刊从今年年初开始连载的、由王宁撰写的"汉字构形学讲座"。
30. 宋金兰，论小篆字中的形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 6 期，1991。
31. 陈宜民，《康熙字典》的异体字及其整理，《四川师范学院学报》第 1 期，1991；
陈抗，评《现代汉语词典》对异体字的处理，《中国语文》第 4 期，1994。
32. 高更生，谈异体词整理，《中国语文》第 1 期，1966；
再谈异体词整理，《语文建设》第 6 期，1993；
朱泳燚，"异体词"的斟酌取舍，《中学语文教学》第 6 期，1980 等。

33. 裘锡圭,《四十年来文字学研究的回顾》一文。
34. 洪成玉,古今字概说,《中国语文》第2期,1981;
    古今字概述,《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1992。
35. 陆锡兴,谈古今字,《中国语文》第5期,1981。
36. 裘锡圭《四十年来文字学研究的回顾》一文。
37. 陈全方,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甲骨文概论,《古文字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0辑,1982。
38. 萧艾,《甲骨文史话》,文物出版社,1980;
    孟世凯,《殷墟甲骨文简述》,文物出版社,1980;
    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吴浩坤、潘悠,《中国甲骨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王明阁,《甲骨学初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范毓周,《甲骨文》(祖国丛书),人民出版社,1986;
    陈炜湛,《甲骨文简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王宇信,《甲骨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马如森,《殷墟甲骨文引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等。
39. 李学勤,论"妇好"墓及其相关问题,《文物》第3期,1977;
    小屯南地甲骨与甲骨分期,《文物》第5期,1982;
    裘锡圭,论历组卜辞的时代,《古文字研究》第6辑,1981;
    林沄,小屯南地发掘与殷墟甲骨断代,《古文字研究》第6辑,1981;
    彭裕商,也论历组卜辞的时代,《四川大学学报》第1期,1983等文。
40. 萧楠,论武乙、文丁卜辞,《古文字研究》第3辑;
    再论武乙、文丁卜辞,《古文字研究》第9辑;
    张永山、罗琨,论历组卜辞的年代,《古文字研究》第3辑;
    谢齐,试论历组卜辞的分期,《甲骨探史录》,三联书店等文。
41. 李学勤,评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考古学报》第3期,1957。

42. 张玉金，甲骨文辞中“惠”和“唯”的研究，《古汉语研究》第 1 期，1988；

卜辞中“气”的意义和用法，《文物研究》第 5 期，1990；

论卜辞中表示一事为另一事时间背景的虚词，《古汉语研究》第 1 期，1990；

卜辞中“暨”的用法，《中国语文》第 1 期，1990；

卜辞中表示两事时间关系的词的意义和用法(上)，《文物研究》第 7 期，1991；

论宾字句的句法结构，《古汉语研究》第 2 期，1993；

甲骨文“不”“弗”异同论，《中国语文与文化论集》，香港亚太教育书局，1993；

赵诚，甲骨文行为动词探索，《殷都学刊》第 3 期，1987；

甲骨文虚词探索，《古文字研究》第 15 辑，1986；

沈培，《殷墟甲骨卜辞语序研究》，文津出版社，1992 等。

43. 李学勤，谈安阳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文物参考资料》第 11 期，1956。

44. 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第 4 期，1980；

徐锡台，西周卦画探原，《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

管燮初，商周甲骨和铜器上的卦爻辨识，《古文字研究》第 6 辑，1981；

张亚初、刘雨，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考古》第 2 期，1981；

曹定云，新发现的殷周“易卦”及其意义，《考古与文物》第 1 期，1994 等文。

45. 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李零，论东周时期的楚国典型铜器群，《古文字研究》第 19 辑，1992。

46. 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47.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第1期,1994;
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文物》第8期,1994;
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文物》第7期,1995。
48. 李学勤,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周原庄白、强村两处青铜器窖藏的综合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期,1979;
刘启益,微氏家族铜器与西周铜器断代,《考古》第5期,1978;
李零,论东周时期的楚国典型铜器群,《古文字研究》第19辑,1992等。
49. 刘启益,西周金文中的月相与共和宣幽纪年铜器,《古文字研究》第9辑,1984;
西周康王时期铜器的初步清理,《出土文献研究》,1985;
再谈西周金文中的月相与西周铜器断代,《古文字研究》第13辑,1986;
马承源,西周金文和周历的研究,《上海博物馆集刊》第2期,1986;
西周金文中一月四分月相再证,《上海博物馆集刊》第3期,1986;
黄盛璋,从铜器铭刻试论西周历法若干问题,《亚洲文明论丛》,四川人民出版社等文。
50. 林沄,对早期青铜器铭文的几点看法,《古文字研究》第5辑,1981;
张亚初、刘雨,商周族氏铭文考释举例,《古文字研究》第7辑,1982。
51. 马国权,两周铜器铭文代词初探,《中国语文研究》第3期,

1981；

张振林，先秦古文字资料中的语气词，中山大学中文系主编《古文字学与语言学论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

陈永正，西周春秋铜器铭文中的联结词，《古文字研究》第15辑，1986；

杨五铭，西周金文被动式简论，《古文字研究》第7辑，1982；

唐钰明，金文复音词简论，《人类学论文选集》，1986等。

52. 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文物》第1期，1995。

53. 张世超、张玉春，《秦简文字编》，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90；

陈振裕、刘信芳，《睡虎地秦简文字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张守中，《睡虎地秦简文字编》，文物出版社，1994。

54.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第67—72页。

55. 韩伟，北园地望及石鼓诗之年代小议，《考古与文物》第4期，1981；

裘锡圭，关于石鼓文时代的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第1期，1995。

56. 陈伟，诅楚文时代新证，《江汉考古》第3期，1988。

57. 陈炜湛，诅楚文献疑，《古文字研究》第14辑，1986。

58. 郭子直，战国秦封宗邑瓦书铭文新释，《古文字研究》第14辑，1986；

黄盛璋，秦封宗邑瓦书及相关问题考辨，《考古与文物》第3期，1991。

59. 王辉，秦印探述，《文博》第5期，1990；

陈振裕，略论睡虎地出土秦汉漆器，《云梦睡虎地出土秦汉漆器》，湖北美术出版社，1986；

雒雷，秦代货币考，《中国钱币》第1期，1989。

60. 裘锡圭，《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

裘锡圭、李家浩整理,《朱德熙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5;
张颔,《张颔学术文集》,中华书局,1995等。

61.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文物出版社,1991。

62. 李家浩,信阳楚简"浍"字及从"关"之字,《中国语言学报》第1辑,1982;
刘雨,信阳楚简释文与考释,《信阳楚墓》"附录",文物出版社,1986;
黄盛璋,包山楚简中若干重要制度发复与争论未决诸关键字解难、决疑,《湖南考古辑刊》第6集,1994等文。

63. 饶宗颐、曾宪通,《楚帛书》,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5;
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中华书局,1985;
曾宪通,《楚帛书文字编》,中华书局,1994;
陈邦怀,战国楚帛书文字考证,《古文字研究》第5辑,1981;
李学勤,论楚帛书中的天象,《湖南考古辑刊》第1辑,1982;
曹锦炎,楚帛书《月令》篇考释,《江汉考古》第1期,1985;
高明,楚缯书研究,《古文字研究》第12辑,1985;
何琳仪,长沙楚帛书通释,《江汉考古》第1-2期,1986;
朱德熙,长沙帛书考释五篇,《古文字研究》第19辑,1992;
李零,楚帛书的再认识,《中国文化》第10期,1994等。

64. 朱德熙,战国文字中所见有关厩的资料,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古文字论集》,香港,1983;
释桁,《古文字研究》第12辑;
裘锡圭,战国文字中的"市",《考古学报》第3期,1980;
吴振武,试说齐国陶文中的"钟"和"溢",《考古与文物》第1期,1991等。

65. 李家浩,楚国官印考释(四篇),《江汉考古》第2期,1984;
楚国官印考释(两篇),《语言研究》第1期,1981;
战国官印考释(两篇),《文物研究》第7辑;
吴振武,古玺合文考(18篇),《古文字研究》第17辑,1989;

汤余惠，楚玺两考，《江汉考古》第4期，1984；
曹锦炎，战国玺印文字考释（三篇），《考古与文物》第4期，1985；
释[illegible]——兼释续、渎、窦、郙《史学集刊》第3期，1983；
林沄，释古玺中从“朿”的两个字，《古文字研究》第19辑，1992；
于豪亮，古玺考释，《古文字研究》第5辑；
刘钊，玺印文字释丛（一），《考古与文物》第2期，1990；
楚玺考释（六篇），《江汉考古》第2期，1991；
释战国“右骑将”玺，《史学集刊》第3期，1994；
石志廉，战国古玺考释十种，《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第2期，1980；
尤仁德，春秋战国八玺考释，《考古与文物》第3期，1982；
董珊，古玺中的燕都蓟及其初封问题，《江汉考古》第4期，1993；
郑超，楚国官玺考述，《文物研究》第2期，1986；
胡仁宜，“大莫嚣”古官玺，《文物》第2期，1988；
徐宝贵，战国玺印文字考释七篇，《考古与文物》第3期，1994等。

66. 叶其峰，战国官玺的国别及有关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第3期，1981；
吴振武，战国“亩(廪)”字考察，《考古与文物》第4期，1984等文。

67. 陈邦怀，战国“行气玉铭”考释，《古文字研究》第7辑，1982；
黄盛璋，平山战国中山石刻初步研究，《古文字研究》第8辑，1983。

68. 李零、刘新光整理，《汗简·古文四声韵》，中华书局，1983；
黄锡全，《汗简注释》，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

69. 李裕民，侯马盟书疑难字考，《古文字研究》第5辑，1981；

吴振武，读侯马盟书文字札记，《中国语文研究》第6期，1984。
70.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温县东周盟誓遗址一号坎发掘简报，《文物》第3期，1983。
71. 秦公，《碑别字新编》，文物出版社，1985；
洪钧陶，《草字编》，文物出版社，1983—1984等。
72. 郭在贻、张涌泉，俗字研究与敦煌俗文学作品的校读，《近代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1992；
杜爱英，敦煌遗书中俗体字的诸种类型，《敦煌研究》第3期，1992；
张涌泉，敦煌写卷俗字的类型及其考释方法，香港《九州学刊》第3期，1992；
施安昌，从院藏拓本探讨武则天造字，《故宫博物院院刊》第4期，1983；
关于武则天造字的误识与结构，《故宫博物院院刊》第4期，1984；
语文字典如何处理武则天造字，《辞书研究》第4期，1984；
武周新字"圀"制定的时间：兼谈新字通行时的例外，《故宫博物院院刊》第3期，1991等。
73. 李荣，《文字问题》，商务印书馆，1987；
张鸿魁，《金瓶梅》与近代汉学研究，《东岳论丛》第6期，1992；
《金瓶梅》"扛"字音义及字形讹变（近代汉语词语训释方法探讨），《中国语文》第3期，1994等。
74. 周有光，现代汉字学发凡，《语文现代化》（丛刊）第2期，1980。
75. 李兆麟，汉语计量研究与语文辞书编纂，《辞书研究》第3期，1991；
字词频统计及存在的问题，《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第1期，1993。
76. 裘锡圭，《四十年来文字学研究的回顾》一文。

77. 苏培成,现代汉字的构字法,《语言文字应用》第 3 期,1994;
张玉金,现代汉语常用字的结构类型,《汉语学习》第 2 期,1995 等文。
78. 周有光,《汉字声旁读音便检》,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
倪海曙,《现代汉字形声字字汇》,语文出版社,1982;
雷鸣捷,现代汉语通用字中所含的理想声旁,《语文建设》第 3 期,1993;
孙化龙,常形符表义功能,《丹东师范专科学校学报》第 4 期,1993;
施正宇,现代形声字形符表义功能分析,《语言文字应用》第 3 期,1992;
李大遂,形声字声符表义问题的探索,《语文建设》第 6 期,1990;
孔祥卿,试论形声字形符的表义作用,《语言研究论丛》第 6 辑,南开大学中文系《语言研究论丛》编委会编,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
黎千驹,形声字声符表义问题浅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 年增刊等文。
79. 李燕、康加深、魏励、张书岩,现代汉语形声字研究,《语言文字应用》第 1 期,1992。
80. 裘锡圭,从纯文字学角度看简化字,《语文建设》第 2 期,1991。
81. 田惠刚,汉字简化质疑,《语文建设通讯》第 6 期,1993。
82. 袁晓园,识繁写简书同文字,共识互信促进祖国统一,《汉字文化》第 1-2 期,1988。
83. 戴昭铭,繁体风、"识繁写简"和语文立法问题,《语言文字应用》第 1 期,1992;
史有为,汉字辩证四题,《语文建设》第 8 期,1992 等。
84. 袁晓园,论"识繁写简"与"文字改革",《汉字文化》第 2 期,1992。

85. 陈一、詹人凤，评对“识繁写简”的新解，《语文建设》第 1 期，1993。
86. 王开扬，汉字优越诸说献疑，《语文建设》第 4 期，1992；
论研究汉字的立场、方法与学风，《语文建设》第 8-10 期，1993 等。
87. 谢世涯，《新中日简体字研究》，语文出版社，1989；
傅永和，《中日朝汉字字形对照》，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
许长安，海峡两岸用字比较，《语文建设》第 1 期，1992；
李青梅，海峡两岸字音比较，《语言文字应用》第 3 期，1992；
费锦昌，海峡两岸现行汉字字形的比较分析，《语言文字应用》第 1 期，1993；
胡双宝，海峡两岸用字异同议，《汉字文化》第 1 期，1993；
李葆嘉，汉字文化圈与汉字的科学研究，《徐州教育学院学报》第 3 期，1991；
陈泰夏，东方文化圈内汉字使用的新方向，《汉字文化》第 2 期，1993 等。

“八五”期间的现代汉语研究[①]

邢福义 汪国胜 吴振国 萧国政

说　　明

本文包括语音研究、词汇研究和语法研究三个部分。每个部分的前头都是“成果概观”和“理论方法”，末尾都是“问题和建议”，中间则根据实际情况对几个较为重要的问题分别进行述评。所涉及的论文或著作绝大多数是1994年年底以前发表或出版的。

本文的撰写，由邢福义主持。语音、词汇和语法三部分分别由汪国胜、吴振国和萧国政负责。

一、语音研究

1. 成果概观

以我国语言学界的主要期刊为基本依据，尽可能地查阅高校学报和其他相关专业刊物，得到了以下不很精确的统计数字：“八五”期间共发表现代汉语语音方面的研究论文116篇（不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语音室每年一册的《语音研究报告》）。其中，理论方法的22篇，占18.96%；韵律特征（即超音段，包括语调和声调、轻声和重音、时长等）的32篇，占27.58%；协同发音、语音识别与合成的11篇，占9.48%；儿化的7篇，占6.03%；节律的12

① 本文撰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林茂灿先生、南开大学刘叔新先生和石锋先生的帮助，谨致谢意。

篇，占 10.34%；语音教学和语音对比的 13 篇，占 11.20%；其他的 19 篇，占 16.37%。根据搜集到的资料进行统计，这几年出版著作 7 部。

综观研究成果，得到以下两点最基本的认识：

第一，有明确的研究重点。"八五"期间的语言研究继续面向人机对话展开，韵律特征、协同发音以及语音识别与合成等成为这一期间的研究重点，学者们进行了专题性的攻关研究。

第二，呈现多元的研究角度。有静态的描写，也有动态的分析；有共时的研究，也有历时的考察；有从传统语音学和声学语音学的角度进行的探讨，也有从心理学、美学、文化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病理语言学以及对比语言学的角度进行的探索。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反映了研究视野的开阔，同时也是由语音学的跨学科性质所决定的。

2. 理论方法

"八五"期间，许多学者结合具体语音问题的研究，阐述了自己的理论见解和研究方法。

理论方面探讨得较多的是音位问题，也有讨论音系和其他问题的。杨顺安《从声学语音学的角度对普通话元音音位系统的初步研究》（《语文研究》，1991.2）从声学语音学的角度出发，提出归纳音位的"可派生性"原则，认为在归纳音位时，除了考虑相似性、对补性和系统性原则之外，还应考虑"可派生性"原则，即从所归纳出来的音位系统出发，在某种"派生模型"或"派生算法"的作用下，应能派生出该语言所有语境中的音位变体。作者还根据普通话韵母的声学参数，归纳出了一套普通话的元音音位系统，并通过语音合成考核了该系统的完备性。陈其光《音位标音的几种选择》（《中国语文》，1994.4）根据归纳音位的基本原则，提出了归纳和标写音位的 6 种选择。

徐通锵《音系的结构格局和内部拟测法》（《语文研究》，

1994.3-4)着眼于介音对汉语声母系统演变的影响来讨论音系结构格局所支配的音变机理与内部拟测法的关系,提出了一些理论性的设想。王洪君《什么是音系的基本单位》(《现代语言学》,语文出版社,1994)讨论了音系分析的目标、音系的基本单位、找出音系基本单位的程序等有关音系的基础理论问题。石锋《试论语音的层次》(《中国语言学报》[4],商务印书馆,1991.10)论述了音子的表现及分析方法,音子与音位、音素之间的相互区别和联系,提出现代语音学的逻辑起点应该是音子的语音观。

关于研究方法,学者们重视了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周同春《语音学的一种研究方法》(《方言》,1993.3)提出"分析——合成——听辨"的语音研究方法,即靠仪器取得分析的数据,靠合成验证分析的结果,靠感知分辨语音的性质。

传统语音学以听辨为手段,对语音进行定性描写;现代语音学以实验为手段,对语音进行量化分析。"八五"期间的语音研究主要是通过实验手段来进行的,同时结合运用传统的语音研究方法。由于科学实验方法的运用,人们能够观察到汉语语音现象的微观状态,取得了精确的实验数据,从而得出了一些新的认识,为汉语人机对话系统的研制提供科学的依据。

3. 关于语调、声调和语气

语调是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重点。沈炯《汉语语调模型刍议》(《语文研究》,1992.4)和《汉语语调构造和语调类型》(《方言》,1994,3)通过实验手段对语调进行了专题研究。前文拿口语样品做材料,提出用"对偶音高"来估测声调音域,认为高音断层跟语势重音有关,而低音断层跟节奏重音有关,并给出了调语模型,如陈述语调由高音线骤落形式和低音线下延形式结合而成,疑问语调由高音线渐落形式和低音线上敛形式结合而成。这种语调模型在普通话语音合成中获得了初步应用。后文把汉语语调分为调冠、调头、调核和调尾四个部分,具体描写了语调构造的有声表现,例

举了口气语调的一些类型。

劲松《北京话的语气和语调》(《中国语文》,1992.2)根据北京话的口语材料,对北京话的语气和语调进行了实验研究。实验表明,北京话的语调是出现在句子末一节奏单位中重读音节上的音高变化,是不同于字调的独立系统;北京话的语调分高语调、轻低语调和低语调3种,呈趋降型。贺阳、劲松《北京话语调的实验探索》(《语言教学与研究》,1992.2)进一步考察了陈述句、质疑问句、求证问句、一般祈使句、命令句、感叹句等6种功能句型的句终语调,认为北京话的语调不仅与音高有关,而且也与音长、音强有关,其音高特征是通过改变声调调域的高低来表现的,虽然它会改变声调的音高值,给声调带来不同的量的特征,但并不改变声调的区别特征而使其发生质的变化;并且给出了5种功能句型(一般祈使句使用陈述语调)语调构成因素(音高、音长、音强)的级别。

对于声调,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新的探索。石锋写出系列文章,集中从声调格局的角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北京话的声调格局》(《语言研究·增刊》,1991)利用刘复、白涤洲、林茂灿、石锋有关北京话声调调值的四种实验数据,作成北京话声调格局模式图,并通过四种资料的对照考察了声调的声学表现,认为声调所占据的不是一条线,而是一条带状的声学空间,只要一条声调曲线位于这个声学空间之中,符合这个声调的特征,就不会混同应该区别的声调。文中提出的这种声调格局的分析方法不光可以用来分析北京话(普通话)的声调,在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的声调分析中同样也可应用。《声调格局和声调分类》(《语音丛稿》,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进一步给出了可以用来构成各种声调格局的30种声调形式。

杨顺安《关于普通话声调知觉中心的初步研究》(《心理学报》,1992.3)则是从心理感知的角度考察声调问题。作者通过辨认试验,初步确定了"调型段"在音节基频(F_0)曲线上的位置,即声调知觉中心的位置位于韵母段中部;而且,只要"调型段"的长度为

浊音段的一半左右,就可能被感知成相应的调类。这一研究结果对普通话语音教学,对开发语音识别和语音合成系统,都显示出重要的实用价值。

以往研究上声的连读变调大都是在音境的层面上对变调规则作出描写,沈炯《北京话上声连读的调型组合和节奏形式》(《中国语文》,1994.4)则把上声连读放到节奏范围里来考察,揭示了上声连读变调跟节奏的关系。文章看到:节奏处理决定音节之间有松或紧的关系,只有在节奏关系为紧时上声连读才会有变调;从语言的树型关系可以推导出上声的连读类型,节奏的高层调节使它们形成不同的调型组合;上声连读的节奏形式跟声调音高的对偶变化有关。该文为节奏研究找到了一条新的途径。

有关语气问题的文章不多,对这一问题讨论得比较细致的是劲松的《北京话的语气和语调》(《中国语文》,1992.2)。该文通过实验手段重点探讨了北京话语气的韵律特征,并对语气的语法意义及其表达方式进行了综合考察。认为北京话的语气是由句子末一节奏单位中的重读音节的韵律特征(语调和重音)变化,或配合使用语气助词、疑问助词、副词和固定的疑问格式等辅助手段来表示的;还根据语气意义和语法表达形式的结合关系,把北京话的语气细分为陈述(平叙、应答、表态),疑问(询问、质问、求证、诧异),祈使(征询、央求、命令)和表情等 4 类 11 种,初步建立了一个北京话的语气系统。贺阳《试论汉语书面语的语气系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2.5) 根据书面形式标志和语气的不同意义领域,也建立了一个包含 3 个子系统(功能语气系统、评判语气系统和情感语气系统)的汉语语气系统。

4. 关于时长

语音的时长问题在"八五"期间进一步受到重视,取得了一些新的实验结果。杨顺安《北京话多音节组合韵律特性的实验研究》(《方言》,1992.2)对同一音节处于多音节组合中各种位置上

的时长情况进行了声学分析，发现音节时长上有三种效应：一是"音节数效应"，声母时长、韵母时长和音节时长大体随该组合的音节数的增多而减短；二是"组末韵母伸缩效应"，非去声音节处于组末位置时，韵母时长比其他位置的长，去声音节处于组末位置时，韵母时长比其他位置的短；三是"组首声母伸长效应"。王晶、王理嘉《普通话多音节词音节时长分布模式》(《中国语文》，1993.2)对普通话语流中多音节词音节时长分布特征所作的实验研究表明，与单音节时长相比，多音节词内每一音节时长都有不同程度的缩短，并且形成双音词前长后短及三、四音节词特有的分布模式；时长分布模式的形成既与组合数目和组合位置相关，更与组合结构相关。石锋《关于音节内部时长关系的几个问题》(《中国语言学报》6)从实验中看到，汉语和水语音节内部具有两种时长补偿关系：一是韵母对于声母的时长补偿；二是韵母中的韵尾对于主要元音的时长补偿。

5. 关于协同发音

以往研究协同发音主要集中于音段方面，"八五"期间，学者们开始了对超音段声调的协同发音的研究，并取得了高水平的成果。沈晓楠《汉语普通话声调的协同发音》(《国外语言学》，1992.2)通过对普通话不同四声组合的/pa/三音节序列所作的声学分析，看到了声调协同发音的一些特性。林茂灿、颜景助《普通话四音节词和短语中声调协同发音模式》(《声学学报》，1992.6)研究了用正常重音念的普通话四音节词和短语的声调协同发音问题。从实验中看到，声调协同发音只限于相邻的两个音节，只影响声调基频的高度而不改变其方向，因而不会改变声调本身的特征，这些结果跟沈晓楠的实验结果是一致的。还进一步看到，声调协同发音的作用是单向的，顺向作用和逆向作用一般不会同时发生，顺向作用一般只影响后接声调的起点，逆向作用一般只影响前接声调的终点，它所引起的音高变化具有一定的模式，其模式既受词重音模式的

制约，还跟发音速度有关。

6．关于语音合成和语音识别

语音合成是实现人机对话的重要环节，也是研究语音特性的重要手段。在这方面杨顺安的研究很值得重视。《普通话儿化音节规则合成的初步研究》(《中国语文》，1991.2)、《普通话轻声音节的规则合成》(《应用声学》，1991.1)根据传统语音学对儿化韵音变规律和轻声音节特性的描写，并参考声学语音学的语图分析结果，归纳出了一套合成儿化音节和轻声音节的规则，初步实现了儿化音节和轻声音节的规则合成。《语音合成和语音学研究》(《语文建设》，1992.8)从普通话语音的特点与合成单元的选取，音节的协同调音效应与合成语音的流畅性，普通话的韵律特征与合成语句的自然度，文本—语音转换系统与语言学研究等方面，讨论了普通话语音合成技术中的语音学和语言学问题。

语音识别主要致力于普通话语音识别系统和方法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陈韬、李昌立等《孤立字全音节实时识别系统》(《声学学报》，1993.3)在大量语音实验数据的基础上，对普通话语音的识别方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并建立了一个采用分层识别策略的特定人的普通话全音节实时识别系统。关存太、陈永彬《非特定人四声识别》(《声学学报》，1993.5)提出了一种非特定人的普通话四声识别方法。该方法已作为实时非特定人普通话语音输入系统的声调识别部分，性能可靠，对发音人没有任何限制。

7．关于轻声、重音和儿化

关于轻声，有对某一具体现象的考察和分析，有对其来源或成因的探讨。王旭东《北京话的轻声去化及其影响》(《中国语文》，1992.2)对北京人口语中的“读轻为去”的现象提出了新的认识，认为它不是一种语音错误，而是一种语流音变现象，是“轻声去化”。

文章具体讨论了轻声去化的发音学依据、分布情况及所引起的相关语音变化。[日]平山久雄《从历史观点论吴语变调和北京话轻声的关系》(《中国语文》,1992.4)比较了若干吴语的广用式变调和北京话的轻声,拟测两者都是从汉祖语的前重格式字组发展而来的,即在祖语中前重格式两字组的后字因不带重音,声调调值后来蒙受弱化,结果才造成今天吴语的广用式变调和北京话的轻声。

重音问题讨论得较多的是语句重音。在实验研究中,学者们对语句重音的声学特征的认识不尽一致。劲松《北京话的语气和语调》的实验结果表明,语句重音的区别特征首先是音长加长,其次是音高升高,音量上的差异较小。沈炯、[荷兰]J.H.v.d. Hoek《汉语语势重音的音理(简要报告)》(《语文研究》,1994.3)的实验结果显示,在语势重音(即语句重音)中,时长的作用并不显著,音高的作用却很重要。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语势重音的音理是声调音域高音线上移,使声调音域向上扩张,声调音域低音线与语势重音没有明显的关系。

关于儿化,学者们在研究中有了一些新的认识。王理嘉、王海丹《儿化韵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与李思敬先生商榷》(《中国语文》,1991.2)就儿化韵的韵类和声学性质、儿化韵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趋势以及普通话和北京话的关系、音位分析的基本原则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余志鸿《儿化和语言结构的变化》(《江苏社会科学》,1991.2)讨论了北方话的儿化及其对现代汉语语言结构变化的影响,同时讨论了儿化的地理类型和儿化的扩散。孙德金《北京话部分儿化韵读音调查》(《语言教学与研究》,1991.4)在老北京人中调查了五组有争议的儿化韵读音的分合情况,发现两读情况与年龄因素有密切关系;随着年龄的减小,某些原来合并在一起的儿化韵越来越多地分开了,而造成由合到分这种变化趋势的主要原因来自标准音(普通话)的影响。贾采珠《北京话轻声儿化韵》(《中国语文》,1992.1)讨论了北京话的轻声儿化韵及其构成,分析了北京话儿化韵因轻读音变而发生的合并现象。

8. 关于节律

长期以来,汉语的节奏规律未能得到全面深入的考察,虽也有过这方面的研究,但往往局限于韵文,很少涉及散文和口语。“八五”期间,吴洁敏开始了对汉语节奏规律的系列研究。她以诗文、口语为材料,通过对汉语语音链上的节奏模式的考察,探讨汉语节奏的规律,寻找汉语节奏的主要特征。她在《汉语的节奏形式》(《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1.11)、《汉语节奏的周期及层次》(《中国语文》,1992.2)、《汉语节奏中的套叠现象》(《杭州大学学报》,1991.9)、《汉语节奏规律的条件限制》(《杭州大学学报》,1994.1)等系列论文中分析了汉语节奏的 7 种形式和 3 种模式;探讨了由音节周期、音步周期、基本节奏周期和节奏群周期组成的汉语语音链上的 3 大节奏层次;说明了汉语语音链上节奏套叠的种种情形和节奏规律运用上的种种限制。此外,文炼《汉语语句的节奏问题》(《中国语文》,1994.1) 从节拍特点与节奏焦点、上句与下句的平衡、意群安排的常规与变例等方面论述了汉语语句的节奏问题;史有为《汉语文化语音学》(《世界汉语教学》,1992.4)论及汉语的音节结构及节奏、格律对文化形成的重要作用;刘丹青《汉语形态的节律制约》(《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3.1)分析了汉语形态平面的节律制约以及这些制约的原因和影响,从而认为汉语语法学有必要建立“语音平面”。

9. 问题和建议

(一) 问题

① 语音学和音系学缺少结合。语音学和音系学有区别,但有密切联系,它们有着一致的目标,应该结合起来。有的学者在二者的结合上作过很好的探索(如杨顺安《从声学语音学的角度对普通话元音音位系统的初步研究》,《语文研究》,1991.2),但这方面的成果还不多。

② 韵律特征研究不够充分。在韵律特征的研究方面虽然作了不少工作，但对多音节词、意群单元以及句子的韵律特征的研究仍不够充分。在韵律特征的研究方法上也未能统一，比如要不要引导句，用什么样的引导句，怎样发音，如何进行测听实验等等。只有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做法一致了，对于实验结果才能有共同的评判标准。

③ 研究队伍不够壮大。"八五"期间出成果的学者尚未形成群体。有必要加强文、理合作，加强人才的培养。

（二）建议

"九五"期间，人机对话要向连续语句发展，语音学的研究重点应放在自然语句中音段和超音段之间的相互作用上面。研究工作须要特别重视以下几点：

① 要建立普通话自然语句的语音库。这个语料库至少要包括 2000—3000 个各种语气的语句。对这些语料作句型、元音、辅音、音节间结构类型等的频率统计。

② 要深入研究包括各种句型的语调，建立语音学上和音系学上的语调模型。

③ 要研究音段在音境中、轻重音中及不同语速中的变化规律及其制约条件，建立起音段和超音段的协同发音规则。

二、词汇研究

1. 成果概观

依照与调查语音研究同样的原则，得到了以下不很精确的统计数字："八五"期间发表文章共 582 篇。其中，概论 15 篇，占 2.5%强；词义 102 篇，占 17%强；词的构造 86 篇，占 14%强；词汇的构成 144 篇，占 24%强；词汇的发展 36 篇，占 6.1%；词汇的规范 47 篇，占 8%强；熟语 48 篇，占 8.2%强；词汇与辞书 84 篇，占

14%强;词汇与社会文化85篇,占16%强。根据搜集到的资料进行统计,这几年出版著作15部(不包括辞书)。

综观研究成果,得到两点最基本的认识:

第一,论著数量较多。词汇研究在"八五"期间有了初步的繁荣。这同现代语义学、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等新兴学科的带动分不开。

第二,论著作者的分布面相当广。论文有的发表于权威性刊物,但更多地发表在一般性刊物和各个学校(包括师专)的学报上。

2. 理论方法

"八五"期间,许多学者就词汇研究所涉及的总体性问题阐明各自的见解。继《汉语描写词汇学》(1990)之后,刘叔新出版了《语义学和词汇学问题新探》(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12)和《刘叔新自选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11),其中关于词汇问题的理论构想,富于创造性。胡明扬《语汇研究和语法研究》(《河北师院学报》,1993.1)、刘叔新《对准词汇的重要方面——现代化词汇研究取向刍议》(《中国语文研究40年纪念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10)《语义学的对象问题》(《语文研究》,1993.4)等文章,对词汇学和语义学的对象、任务、发展等问题提出了看法。就专题性理论问题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 关于词汇系统层级的论述。徐国庆《略论现代汉语词汇层》(《北方论丛》,1992.4)认为,词汇应分造句的和构词的两个词汇层,此外还有潜在词汇层,如方言词语、古语词语、外来词等。文章把词汇的层级问题与词汇的构成问题结合起来考虑。② 关于区分语言词汇与言语词汇的论述。如王希杰《略论语言的词汇和言语的词汇》(《杭州大学学报》,1993.1)。③ 汉语词汇特点的新角度探讨。苏新春《汉语词汇结构的具象性和辨证性》(《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1.3)和王绍新《从"难译词"看汉语词汇的表现力》(《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集》)二文都联系社会文化讨论了汉语词汇的特点。

在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上，“八五”期间词汇研究比较注意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和与一些新兴的综合性学科相结合，与社会生活实际需要相结合。比如：借鉴现代语义学中语义场理论和义素分析方法，促进了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研究和词义研究的发展；与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结合，开拓了研究视野，不仅对现代汉语词汇系统本身进行研究，还研究了词汇与社会文化的相互关系，特别是社会文化因素对词汇系统的影响；与应用语言学结合，自觉联系新时期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不仅开展了新词语、港台词语、方言词语、外来词语、专名术语、熟语等方面的研究，而且推动了词汇学的分支词典学的繁荣发展。计算语言学与词汇学的结合也对词汇研究有所推动，不少学者注意使词汇研究适应计算机的需要，并且利用计算机统计分析语料和字词频率。由于思路方法的开拓更新，一些传统研究课题，如关于词的构造、词汇构成及词汇演变的研究等，也有较好的进展。

3. 关于词义和语义

词义和语义的研究，是词汇研究的重点之一。论著较多，有不少创新。上面所谈“理论方法”，实际上已包容有这方面的内容，这里有必要再列项介绍。

在这方面的著作中，石安石《语义论》（商务印书馆，1993.5）和贾彦德《汉语语义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在运用普通语义学理论分析汉语事实上有所开拓创新。苏新春《汉语词义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2.8）偏重于词义与文化关系，既有词义结构系统的分析，又有人文背景的揭示。周荐《同义词语的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8）和《词语的意义和结构》（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8）二书，对以往的研究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和评论。

在这方面的论文中，成绩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类：① 关于词义类型的研究。有一般理论的探讨，如林杏光《论词义分类和词语搭配》（《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1.5）。更多的文章，探讨各种

具体的语义类型。如吴振国《关于词义的性质与词典释义的原则》(《语言学通讯》,1992.1-2)对词的理性意义进行论说,指出词语的理性意义可分为通俗意义和专门意义两种;又如郭先珍、王玲玲《褒义、贬义词在搭配中的方向性》(《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1.6)、周荐《也谈词语的形象色彩问题》(《南开学报》,1992.5)、何杰《现代汉语量词的形象色彩》(《逻辑与语言学习》,1991.3)等文章,从多种角度对词语的感情意义和形象意义进行了探讨。② 关于语素义与词义相互关系的研究。范可育《从"生词熟字说"看词义和构词语素义的关系》(《语言文字应用》,1993.1)、王树斋《汉语复合词词素义和词义的关系》(《汉语学习》,1993.2)等,观察角度较新颖,分析较细致。③ 关于词语间意义关系的研究。梅立崇《从模糊理论看汉语词的同义关系与词性》(《汉语学习》,1993.1)、《再谈汉语词的同义聚合与词性的关系问题》(《世界汉语教学》,1994.2)、严廷德《反义词的同一》(《四川大学学报》,1991.3)等文章,使同义反义研究有所深化;岳长顺《上位词下位词研究》(《语言研究论丛》第六辑,1991.3),对上下义问题作了比较细致的分析;刘叔新《词语对比的聚合及其与反义聚合的比较》(《语文研究》,1991.4)、《词语意义之间的依赖关系》(《汉语学习》,1992.5)、徐盛恒《论词义的包含关系》(《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3)等文章,发掘出了一些新的意义关系,使语义关系有所突破。此外,王欣《语义结构的层次分析》(《逻辑与语言学习》,1994.2)探讨了义素分析中的义素间的结构层次问题,杨金华《静态义素和动态义素》(《外国语》,1991.4)探讨了静态义素和动态义素的区别,朱景松《现代汉语中义项平行的多义复合词》(《语文建设》,1992.1)挖掘出不分本义转义,没有派生关系的特殊多义词,也颇有新意。

4.关于词的构造

一些文章对词的构造进行理论探讨。如刘叔新《词的结构问

题》(《语文学习》,1993.2)、胡裕树《深化汉语的词法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1994.3)等。

不少文章对词的结构材料语素进行研究。主要有四类:① 有的重在语素的辨别。如白俊耀《语素识别中的问题》(《河北师大学报》,1992.3),韩赤军《试论现代汉语复音词中语素的确定问题》(《宁夏大学学报》,1991.3),钱惠英《特殊语素辨识谈》(《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1.3)等。② 有的重在语素的分类。如[德国]柯彼德《试论汉语语素的分类》(《世界汉语教学》,1992.1),刘公望《汉语语素的特征及功能分类》(《兰州商学院学报》,1993.1)等。③ 有的重在语素的构词能力。如石安石《论语素的结合能力与一用语素》(《语文研究》,1993.1),谢世涯、苏启祯《构词能力与偏误分析》(《语言文字应用》,1993.2)等。④ 有的重在词缀的考察。如祝鸿杰《汉语词缀研究管见》(《语言研究》,1991.2),张宁《"儿"语缀的语境语义分析》(《汉语学习》,1993.2),施丕兴《"于"的后缀化构词特征及未来》(《江苏教育学院学报》,1992.2)等。

不少文章研究合成词。如周荐《几种特殊结构类型的复合词》(《世界汉语教学》,1992.2)分析了三类特殊类型的复合词,范新干《汉语复合词的词义构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3 专辑)、张国宪《并列式合成词的语义构造原则与中国传统文化》(《汉语学习》,1992.5)等,既注意合成词的语义构造问题,还联系文化背景进行分析。再如崔亮《并列式双音词的结构模式》(《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集》)、王政红《名词语素构词格分析:复合词构词格式研究之一》(《南京师大学报》,1992.4)、李赓钧《三语素合成词说略》(《中国语文》,1992.2)等,探讨了特定类型的合成词。再如李伯超《汉语语素融合与融合词论兼议汉语词汇的历史发展规律》(《湘潭大学学报》,1992.1),指出大量复合词的结构和意义不能直接从构词语素中推导出来,即语素发生了融合,形成了融合词。

此外,也有文章讨论造词理据,以及讨论缩略语和简称,但研

究不够深入。

5. 关于词汇构成

词汇构成问题与当今的社会生活实际密切相关，涉及面较宽。

(1) 常用通用词语研究——突出特点是密切联系计算机信息处理和对外汉语教学需要。在方法上，重视利用计算机进行统计分析，重视进行中外语言对比。代表性文章，如刘英林、宋绍周《汉语常用字词的统计与分级》(《中国语文》,1992.3)，王又民《汉语常用词分析及词汇教学》(《世界汉语教学》,1994.2)，李泉《汉语常用词汇与日语相应汉字词汇对比》(《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集》,1991.11)，胡明扬《现代汉语通用语料库的建库原则和设想》(《语言文字应用》,1992.3)，方世增《现代汉语通用词研究的若干原则和方法》(《语文建设》,1994.4)等。

(2) 新词语(包括旧词新义)研究——触角多，思路活。主要包括：① 新词语的成因。如于夏龙《从方言吸取营养——普通话新词语产生的重要途径》(《语言文字应用》,1992.2)，刘一玲《寻求新的色彩，寻求新的风格：新词语产生的重要途径》(《语言文字应用》,1993.1)，诸宰亮《简析现代汉语词语新义形成的规律和趋势》(《辞书研究》,1991.1)，韩臻《近年来汉语"新词爆炸"的特点及原因》(《逻辑与语言学习》,1994.1)。② 新词语与社会文化。如陈建民《口语里的新词新语与社会生活》(《语文建设》,1991.9)，王希杰《从新词语看语言与社会的关系》(《世界汉语教学》,1991.3)等。③ 流行语。如苏金智《近年北京的青年流行语》(《修辞学习》,1992.3)，叶骏《上海青年的新潮词语》(《修辞学习》,1991.4)，陈慧英《广州青年流行语说略》(《修辞学习》,1992.3)，李向农《略说京沪穗青年流行语的特点》(《双语双方言》[三]，汉学出版社，1994.8)等。④ 新词语的构造方式。如高健平《从北京流行的新语汇说到"肌肉感觉 + 心理感觉"构词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2.5)，岳长顺《论类推创造新词》(《世界汉语教学》,1993.2)，杨

晓黎《仿拟型新词语试析》(《修辞学习》,1993.5)等。⑤ 新词语研究的思考。如王铁昆《10 年来的汉语新词语研究》(《语文建设》,1991.4),新词新语新用法研究课题组《整理汉语新词语的若干思考》(《语言文字应用》,1993.3)等。

(3) 方言词汇研究——有两个重点:① 北方话词汇的系统调查研究。如陈章太《北方话词汇的初步考察》(《中国语文》,1994.2),胡双宝《北京话语汇研究略论》(《世界汉语教学》,1992.3)。② 港台词语研究。这方面的文章特别多。如黄国营《台湾当代小说的词汇语法特点》(《语言·社会·文化》,1991.1),游汝杰《台湾与大陆华语文书面语的差异》(《语文建设》,1992.11),朱广祁《港台词语研究和大汉语词汇研究》(《山东大学学报》,1992.2),王健伦、梁道洁《穗港新词试析》(《中国语文》,1992.2),苏金智《台港和大陆词语差异的原因、模式及其对策》(《语言文字应用》,1994.4)《海峡两岸同形异义词研究》(《中国语文》,1995.2),黄长著《从某些外语专名的汉译看海峡两岸语言使用的同与异》(《中国语文》,1994.6)等。

(4) 外来词研究——内容相当丰富。① 理论方法。史有为《外来词研究的十个方面》(《语文研究》,1991.1)《外来词研究之回顾与思考》(《语文建设》,1991.11)、张德鑫《第三次浪潮外来词引进和规范化刍议》(《语言文字应用》,1993.3)等文章都有深度。② 外来词与社会文化。史有为《异文化的使者外来词》(《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4)是成功之作。王铁昆《汉语新外来语的文化心理透视》(《汉语学习》,1993.1)、孟华《译名和译名方式的文化透视》(《语文建设》,1992.1)、高增良《语言借贷与文化交流:兼述丝绸之路的影响与贡献》(《中国文化研究》,1994 冬)、吴礼权《汉语外来词音译的特点及其文化心态探究》(《复旦学报》,1994.3)等文章都有分量。③ 外来词的来源。代表性文章,如张清常《一种误解被借的词原义的现象兼论“胡同”与蒙语水井的关系》(《语言教学与研究》,1991.4)、《胡同借自蒙古语水井答疑》(《语言教学与研

究》,1994.3),赵杰《北京话中的满汉融合词探微》(《中国语文》,1993.4),周一民、朱建颂《关于北京话中的满语词(一)(二)》(《中国语文》,1994.3)等。④ 译借方式和技巧。代表性文章,如张德鑫《汉译取字用词漫品》(《语言教学与研究》,1994.2),周荐《汉语外来成分译借方式之我见》(《[香港]语文教育学院学报》,1991.7),吴礼权《汉语外来词音译艺术初探》(《修辞学习》,1993.5)等。⑤ 其他角度。值得注意的文章,如王珏《汉语对外来词的词义驯化》(《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3.2),梁晓虹《佛经翻译对现代汉语吸收外来词的启迪》(《语文建设》,1992.3),[香港]肖正方《从新外来概念语词到词库建设》(《语言教学与研究》,1992.4)等。

(5) 专用词语研究——包括两个方面的探讨。① 科技术语。较重要的文章,如肖群英《科技词语在社会生活领域中运用的方式及其词义变化》(《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3.2),王吉辉《论科学术语进入共同语词汇的条件及方式》(《汉语学习》,1992.2)等。② 专用名称。较重要的文章,如王希杰《专名义变》(《淮北煤师院学报》,1991.3),杨月蓉《汉人姓名的两重意义与语素分析》(《逻辑与语言学习》,1992.3),郭龙生《地名学》(《语文建设》,1991.12)等。总的说来,这方面的研究稍弱。

6. 关于词汇发展和规范

词汇发展的研究,以词义的演变为重点,文章不少,多有创见。① 有的文章探讨词义变化原因,多联系社会文化。如周光庆《汉语词义引申中的文化心理》(《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5)以大量实例论述了价值系统、思维方式和审美意识对词义引申的影响。② 有的文章从系统联系的角度探讨了词义引申问题。如董为光《词义引申组系的"横向联系"》(《语言研究》,1991.2),在以前的研究基础上有所前进。③ 有的文章着重发掘特殊的词义演变现象。如张联荣《词义引申的遗传义素》(《北京大学学报》,1992.4)、刘宝

俊《语言中异质共存的矛盾统一:谈词义羡余》(《湖北民族学院学报》,1993.1),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④ 有的文章分析偏义复词的成因。如钟如雄《偏义复词成因初探》(《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5),不乏新意。

关于词汇系统的发展变化,学者们对汉语词汇的双音节化表现出较大兴趣。董为光《汉语词汇双音代换管窥》(《语言研究》,1992.2)集中对双音代换作了相当细致的分析。

关于词汇的规范,文章也不少。① 有的文章探讨一般理论。数量不多,但意见较中肯。如赵怀印《词汇规范化应有层次观念》(《语文建设》,1993.4),周元琳《历史性原则,描写性方法》(《语文建设》,1993.8)。② 许多文章讨论异体词的规范问题。马彪《从定量分析的角度看异体词的规范》(《语文建设》,1994.11)角度新颖,有启发性。③ 较多文章讨论外来词的规范问题。陈恩泉《论双语交融过程中词语的规范》(《双语双方言》[三],汉学出版社1994.8)、刘涌泉《谈谈字母词》(《语文建设》,1994.10)等文章,提出了有启示性的见解。④ 也有文章讨论新词、方言词、拟声词等的规范问题。如:王铁昆《新词语的规范与社会、心理》(《语言·社会·文化》,语文出版社 1991.1),刘叔新《从词汇规范化看方言词的吸收》(《语文建设》,1991.6),杨碧珠《现代汉语拟声词的规范问题》(《语文建设》,1994.1),王希杰、关英伟《复合量词的规范和偏离》(《汉语学习》,1993.5),杨碧珠《现代汉语缩略语的规范问题》(《宁德师专学报》,1992.2)等。

7. 关于熟语

熟语研究仍以成语为主。① 对成语形式变化的研究,是一个热点。倪宝元、姚鹏慈《等义成语四题》(《中国语文》,1995.1)、卢卓群《四字格成语的有形断裂及其作用》(《世界汉语教学》,1992.4)《毛泽东著作中的成语变异现象》(《湖北大学学报》,1993.5)、谢芳庆《试论成语的形式变化》(《安徽师大学报》,

1992.2)等，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深入了一步。② 成语意义和表现方式的研究，也是一个重点。祝鸿熹《汉语四字成语的意义切分》(《语文建设》，1992.8)、周光庆《成语内部形式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4.5)，分析较细。③ 有的文章探讨成语与文化的关系。梁晓虹《汉语成语与佛教文化》(《语言文字应用》，1993.1)材料丰富，分析细致。

讨论俗语的文章不多，进展不大。

有几篇总论熟语的文章，角度比较新颖。如姚锡远《熟语文化论》(河北大学学报，1994.3)，武占坤、张莉《论熟语的民族气质》(《河北大学学报》，1991.4)，周荐《熟语的经典性和非经典性》(《语文研究》，1994.3)。

8. 问题和建议

(一) 问题

① 对词汇系统本身的研究不够全面和深入。大多数人的研究还没有摆脱传统原子主义的老路，注重个别现象的分析，缺乏宏观理论的思考。关于汉语词汇系统的内部组织结构，没能建立起严密的体系。

② 词汇与社会文化的联系，从词汇学的角度来看，应该着重研究社会文化因素对词汇的影响，而多数文章却是谈词汇对文化的反映。关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的讨论，一些文章还停留在漫谈、例话的层次上，缺乏宏观理论框架的指导，而且内容多有重复。

③ 运用语义学的理论方法如语义场理论和义素分析方法来研究汉语的词义，从总体看，只停留在例析的层次，仅仅找一些典型的例子，套上现成的公式，而未能作深入而系统的分析。

④ 词汇研究应提供适用于计算机的形式化的精密研究结果。目前多数人尚缺乏计算机意识，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此外，一些传统研究领域，如词汇构成、词汇发展的研究，都存在进一步拓宽思路更新方法的问题。

（二）建议

① 加强现代汉语词汇体系的考察研究。首先建立现代汉语常用词的词汇体系，全面考查其内部的组织结构网络，建立起基本体系框架，然后再逐步扩展完善。

② 加强汉语语义场研究和汉语义素系统研究。鼓励用语义场理论和义素分析方法来全面系统地研究汉语词义系统和义素系统，使研究结果能为计算机所利用，并在发展和完善普通语义学理论上起到积极的作用。

③ 加强社会文化因素对词汇发展演变的制约作用及其规律的研究，进一步探讨社会文化因素对词义的演变、新词的产生、方言词与外来词的吸收的制约影响，以及相应的规范化问题。

④ 利用计算机建立现代汉语语料库，进一步进行多方面的词汇统计分析，以改善词汇研究手段和提高词汇的实际运用的效率。

三、语法研究

1．成果概观

用同样的调查方法得到了以下不很精确的统计数字：1991-1994 年发表的现代汉语语法文章共 734 篇。其中，理论方法的 127 篇，占 17.3%；句子、句式的 160 篇，占 21.8%；结构、成分和短语的 197 篇，占 26.84%；词类、时态的 156 篇，占 21.25%；语序、词序的 7 篇，占 0.95%；歧义问题的 13 篇，占 1.77%；句群、篇章的 21 篇，占 2.86%；其他 53 篇，占 7.22%。根据所搜集到的资料进行统计，这几年出版著作 40 余本。其中，个人著作近 20 本，会议论集近 10 本，教学参考书 10 多本，词典 2 本。

综观所有成果，得到两点最基本的认识：

第一，论著数量相当多，研究工作相当活跃。论文中“实”“论”比例较为合理，70.84% 着重研究实际问题，将近 20% 则从理论方法上作宏观的探索。

第二，从倾向看，越来越注重思路与方法的思考。就论文而言，许多文章注重汉语语法事实的多层面多角度的描写和解释，在多角验证上作了有效的尝试；许多文章注重汉语语法理论和方法的探索，在引进国外理论方法的同时注意了结合汉语语法特点进行反思、总结和创造。

2. 理论方法

研究问题有更多的理论思考，不拘泥于某一种方法，这是语法研究的重要进展。这个阶段特别值得注意的理论和方法有三种。它们并非相互对立，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促进，共同发展。

(一)"三个平面"

"三个平面"，指语法的句法平面、语义平面和语用平面。胡裕树《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语文学习》，1992.11)解释道：语法的句法平面，是指对句子进行句法分析；语法的语义平面，是指对句子进行语义分析；语法的语用平面，是指对句子进行语用分析。

"三个平面"是受到符号学和语用学的启发而形成的语法研究理论，"八五"期间成了我国语法学界最大的热门话题。从基本趋向看，三个平面的理论主要表现为关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对象的理论。三个平面的内容，可以说是由三个方面的语法组成：(句法方面的)构形语法、(语义方面的)释义语法和(语用方面的)传息语法。

三个平面理论在我国语法研究中提出，最先见于1981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增订本。目前，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有关的理论都还在发展之中。阐述三个平面理论的代表性论文，如文炼《与语言符号有关的问题——兼论语法研究中的三个平面》(《中国语文》，1991.2)，施关淦《关于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中国语文》，1991.1)，王维贤《句法分析的三个平面与深层结构》(《语文研究》，1991.4)，何伟渔《有关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学说》(《上海师

范大学学报》，1991.4)，范晓、胡裕树《有关语法研究三个平面的几个问题》(《中国语文》，1992.4)，常理、王跃滨《语法的三个平面献疑》(《北方论丛》，1992.4)、邵敬敏《关于语法研究中三个平面的理论思考》(《南京大学学报》，1992.4)，沈开木《语法、语义、语用的联系》(《语法研究和探索》[六]，语文出版社，1992.11)，杨成凯《句法、语义、语用三平面说的方法论分析》(《语文研究》，1993.1)，徐思益《再谈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语法研究原则：兼论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新疆大学学报》，1994.2)等。

(二)“两个三角”和“三个充分”

“两个三角”包括“表—里—值”小三角和“普—方—古”大三角。“小三角”理论主张：弄清一个语法事实，有必要由表察里，由里究表，表里验证；往往还有必要考察它在语言表达系统中特定的语用价值，即语里同义，语表异形，究其语值。“三大角”理论主张：为了对普通话的事实作出更加令人信服的解释，可以借助于“方”“古”事实。既可以立足于普，横看方言，以方证普；又可以立足于今，上看古汉，以古证今。“两个三角”三角验证是事实观察和规律发掘的方法论。对于现代汉语共同语的语法事实来说，“表—里—值”是事实本身的立体验证，是内证；“普—方—古”三角验证则涉及外部事实，是外证。

“三个充分”，指观察充分、描写充分和解释充分。三个充分是对语法研究的要求，属于价值论。“三个充分”和“两个三角”互为条件，互成因果。

“两个三角”和“三个充分”的理论还在发展之中。代表性论述，如邢福义(华萍)《现代汉语语法问题的两个“三角”的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1991.3)《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三个“充分”》(《湖北大学学报》，1991.6)《从基本流向综观现代汉语语法研究40年》(《中国语文》，1992.6)《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小三角”和“三平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4.2)，眸子(李宇明)《语法研究中的“两个三角”和“三个平面”》(《世界汉语教学》，1994.4)，储

泽祥《“务实”学风和“表—里—值”验证方法》(《语言文字应用》,1995.5)等。

(三)“语义特征分析”

语义特征分析,着眼于分析概括同一句式的各个实例中处于同一关键位置上的词(总是属于某类实词中的一个小类)所共有的语义特征,以解释说明代表这些实例的句式之所以独具某些特点,之所以能满足该句式跟与之同构的句式加以分化的原因。不仅动词可以进行语义特征分析,名词和形容词也可以进行语义特征分析。

语义特征分析法,是一种句法分析方法。随着汉语语法研究的不断深入,汉语句法分析方法也按以下顺序不断发展:句子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变换分析法→语义特征分析法。从成分分析法到语义特征分析法是一种发展,而不是简单的替代。不同分析方法各有用处,但由于语义特征分析法能够为阐明有关规律提供可靠的语法、语义依据,有利于“表里验证”,因而受到普遍的重视。

在我国语法学家中,陆俭明多次从理论上总结了语义特征分析法。代表性论述,如陆俭明《语义特征分析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运用》(《汉语学习》,1991.1)《汉语句法分析方法的嬗变》(《中国语文》,1992.6)《80年代中国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1993.9)等。

3. 词类研究

词类问题是汉语语法研究的重要课题。词类问题的研究,“八五”期间形成了一个小高潮,发表了不少文章,出版了一本专集(《语法研究与探索》[五],语文出版社,1991)。学者们的注意力,比较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词类系统和分类标准

有新的尝试。比如陆俭明《关于词的兼类问题》(《中国语文》,1994.2),把汉语词类划为15个。15类词不是用一种语法功能标

准(或依据)一次划分出来。换句话说,是先后运用不同的"语法功能"多次划分的结果。如用"是能否与别的词组合"划分出叹词与非叹词,用"能否作句法成分"划分出成分词与非成分词,又用各个特定标准不断划分出下位的词类。

(2) 词类内部的小类

一个共同的倾向是分类标准向功能靠拢。比如饶长溶《再说次动词》(《语法研究和探索》[五]),在次动词的再研究中,改变通常按介词表义特点分类的做法,用带宾语后整个"介宾"的语法功能作标准给介词分出 4 个次类。又如马庆株《顺序义对体词语法功能的影响》(《中国语言学报》[4]),发现含有顺序义的体词能带"了"作谓语,能受时间副词、范围副词的修饰,在这些方面和不具顺序义的体词形成全面对立,找到了体词能作谓语的一种理据。

(3) 词的兼类与活用

汉语的词兼类情况究竟怎样,必须对大量的语言材料进行调查。马彪《运用统计法进行词类划界的一个尝试》(《中国语文》,1994.5)以《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试用)》等的词类系统为语法根据,对上百万字各种语体资料词语兼类情况作了调查。情况表明:现代汉语词的兼类情况相当突出。到底是汉语的词类面目本来如此,还是统计办法欠科学,这是学者们十分关心的问题。

很久以来有一个所谓"量"的考虑常规:兼类的词只能是少数。陆俭明《关于词的兼类问题》(《中国语文》,1994.2) 在这方面作了努力。文章提出了一些近于硬性规定的处理。至于兼类问题的复杂性何在,兼类的纠葛如何,哪些情况不属兼类,徐枢《兼类与处理兼类时遇到的一些问题》(《语法研究和探索》[五])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兼类现象,邢福义《词类问题的思考》(《语法研究和探索》[五])叫做同形异类现象。文章指出:"特别需要强调一条必须始终遵守的原则:同一意义并且在组合能力上具有共性的同一形式,不得分化为不同的类。"

与词的兼类相关的是词的活用。词的活用受哪些方面的制约，至今知之不多。张伯江《词类活用的功能解释》(《中国语文》，1994.5) 作了努力。文章用名词的空间性(前加名量词)和动词的时间性(后加时体成分)为参照标准，进行了体词谓词化活用或谓词体词化活用的连续性观察。

(4) 词性判别

词性判别是从单个词入手研究词类问题，是词类研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词性判别工作应该理论化。邢福义《词类问题的思考》(《语法研究和探索》[五])指出：词性判别的根本依据是语法特征。应该研究和区别可以作为主裁性标准和辅助性标准的特征，并且应该有效使用“面大特征”和“面小特征”。词的词性最终是看词的入句结果，因此要注意句法格式对词性的决定作用。运用标准判别词性，论证词的归属，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用直判法、排他法和类比法。

(5) 解决词类问题的思考

词类问题何以成为问题，怎样解决，也有不少文章加以论说。杨成凯《词类的划分原则和谓词“名物化”》(《语法研究和探索》[五])、李临定《“依句辩品，离句无品”及其他》(同上)、沈开木《名、动、形分类问题未能解决的原因》(同上)、陆俭明《现代汉语不及物动词之管见》(同上)等，都富于启示性。

4. 动词、形容词研究

动词研究，除了继续有文章作“价”的考察外，比较突出的是从构成不同句式的动词次类切入研究，如：尹世超《说标题动词及相关的标题格式》(《中国语文》，1993.4)，彭利贞《论使宾动词》(《杭州大学学报》，1993.2)，周有斌、邵敬敏《汉语心理动词及其句型》(《语文研究》，1993.3)，杨锡彭《粘宾动词初探》(《语言文字学》，1992.12)，王安龙《略说显示状态功能的动词》(《中国语文》，1993.3)。也有从句子句式角度切入研究的，如袁毓林《祈使句“V

+ 着"分析》(《中国语文》,1993.2)。

形容词研究,反映出的新特点是:从连用、组合、成句和"价"等特定角度进行词的语法探讨,不是笼统地作概括性的描述。研究形容词连用的,如邢福义、李向农、丁力、储泽祥《形容词的 A A B B 反义叠结》(《中国语文》,1993.5);研究形容词组合的,如石毓智《现代汉语的肯定形容词》(《中国语文》,1991.3);从构句角度研究的,如谭锦春《双向和多指形容词及相关的句法关系》(《中国语文》,1992.2);从"价"的角度研究的,如张国宪《论单阶形容词》(《语言研究》,1995.1)。

5. **结构和句式研究**

对于汉语结构句法语义分析和探讨,从比较注重理论推导发展到注重语言事实的纵横印证。如对"像……似的"层次怎么切分的合理性,素来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但哪一种更合理?这涉及到语法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合理性尺度问题。通过"七五"到"八五"的努力,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注重语言事实的客观印证。认为现代汉语语法分析合理性的根据存在于语言事实中,不仅存在于共时平面的语言事实中,而且还存在于近代汉语甚至更远的语言史实中,历史和共时应该相互印证。如吴竞存、梁伯枢《现代汉语句法结构分析》(语文出版社,1992)指出"像……似的"切分为"像……|似的"比切分为"像|……似的"更合理。石安石《评〈现代汉语句法结构与分析〉》(《中国语文》,1993.6)支持这一论断。

对基本句式的描写和描写的理论与方法,也有新的探讨。如王维贤《动词小句的基本短语结构形式》(《中国语文》,1994.1)把整个句子作为短语从语境中抽离出来,探讨了动词小句的基本短语结构形式。其短语结构包括句子所有的词、词的排列形式及整个句调。短语结构进一步抽象为基本短语结构形式,即从具体的词抽象为用词类符号和句法关系符号以及语调(包括句调)符号表示的形式。

6. 句子足句方面的研究

以往一般认为:疑问句和祈使句都在不同程度上取消了句子的“现实性”,成句条件不同于陈述句。“八五”期间的研究成果表明,在足句问题上不仅要区别陈述句和非陈述句,还有必要考虑句子的行为类型和对语境的依赖情况。影响句子自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根本上讲是句子的传息性质决定的。足句问题研究不仅扩大了汉语语法的外延,也把我们对汉语“句”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不再停留在结构主义理论框架中比照英语建立起来的汉语句子观:句子和词组共一套规则,句子只不过是独立的词组或带成句语调的词组。代表性论文,如孔令达《影响汉语句子自足的语言形式》(《中国语文》,1994.6),黄南松《试论短语自主成句所应具备的若干语法范畴》(《中国语文》,1994.6)。

7. 复句和句群的研究

复句研究在“八五”期间有所深化。邢福义《汉语复句格式对复句语义关系的反制约》(《中国语文》,1991.1)、《现代汉语转折句式》(《世界汉语教学》,1992.2)、《汉语复句与单句的对立和纠结》(同上,1993.1)等文章,跟作者以往的复句文章相比较,有更多的理论概括和思考,提出了“语义关系具有二重性”等重要观点。还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撰写了研究复句的论文。如:王维贤《论转折句》(《中国语言学报》[4]),李晓琪《现代汉语复句中关联词的位置》(《语言教学与研究》,1991.2),李向农《前加特定形式词的“一X,就Y”句式后项否定式》(《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5),丁力《毛泽东著作中的选择问复句》(《毛泽东著作语言论析》,湖北教育出版社,1993.12),梅立崇《现代汉语的“即使”假言句》(《世界汉语教学》。

句群研究出现了跟复句研究联系起来的苗头。邢福义《选择问的句群形式》(《汉语学习》,1993.6),把选择问分为正反选择问

和列项选择问，在此基础上研究选择问句群，发现选择问句群的格式多于选择问复句的格式。这项研究表明，句群研究在语法研究中并不是完全没有位置的。

8. 语法现象的语用研究

语法现象的语用研究，是把语法研究引向深入的一个方面。“八五”期间有不少值得重视的成果。如：沈家煊《“语义的不确定性”和无法分化的歧义句》（《中国语文》，1991.4）、《“语用否定”考察》（《中国语文》，1993.5）、《“好不”不对称用法的语义语用解释》（《中国语文》，1994.4），张旺熹《“把字结构”的语义及其语用分析》（《语言教学与研究》，1991.3），徐杰、李英哲《焦点和两个非线性语法范畴：“否定”“疑问”》（《中国语文》，1993.2），吕文华《“了 2”语用功能初探》（《语法研究和探索》［五］），崔希亮《“连”字句的语用分析》（《中国语文》，1993.2），郭志良《试论能愿动词的句法结构形式及其语用功能》（《中国语文》，1993.3），萧国政《右向传递句的凝缩和延展——关于传息语法的思考》（《语法研究与语法应用》），吴振国《选择问句的删除原则》（同上）等。

9. 关于语法事实

“八五”期间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总的说来，以“务实”为本，重视对事实的描写和解释。前面所讲的各个侧面的研究都反映了这一特点。

如果换个角度来观察如何对待和利事用语法事实，那么，可以看到学者们有“三种取向”。

取向一：抓住一个个具体事实，发掘其内在规律性。例如：张万起《试论现代汉语复合量词》（《中国语文》，1991.4），邢福义《现代汉语的特殊格式“V 地 V”》（《语言研究》，1991.1）、《现代汉语数量词系统中的“半”和“双”》（《语言教学与研究》，1993.4）、《NVN 造句结构及其 VN、NV 简省形式》（《语言研究》，1994.2），尹世超

《试论粘着动词》(《中国语文》,1991.6),赵金铭《"我唱给你听"及相关句式》(《中国语文》,1992.1),方梅《宾语与动量词的次序问题》(《中国语文》,1993.1),张伯江《"N的V"结构的构成》(《中国语文》,1993.4),范晓《复动"V得"句》(《语言教学与研究》,1993.4),储泽祥《毛泽东著作中"像"字结构的同形异构现象》(《毛泽东著作语言论析》),郑懿德、陈亚川《"除了……以外"用法研究》(《中国语文》,1994.1),陆俭明《同类词连用规则刍议——从方位词"东、南、西、北"两两组合规则谈起》(《中国语文》,1994.5)等。

取向二:抓住一个个具体事实,从新的侧面探索其规律。例如:范晓《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的区别及其再分类》(《中国语言学报》[4]),邢福义《汉语里宾语代入现象之观察》(《世界汉语教学》,1991.2),杨成凯《广义谓词性宾语的类型研究》(《中国语文》,1992.1),廖秋忠《现代汉语并列名词性成分顺序》(《中国语文》,1992.3),李临定《试谈汉语语法分析方法》(《中国语文》,1992.5),邵敬敏《量词的语义分析及其与名词的双向选择》(《中国语文》,1993.3),李宇明《毛泽东著作设问句研究》(《中国语文》,1993.6),萧国政《毛泽东著作中是非性反问句的反意形式》(同上),吴为章《关于句子的功能分类》(《语言教学与研究》,1994.1)等。

取向三:联系事实,思索理论性问题。例如:龚千炎《现代汉语的时制表示和时态表述系统》(《中国语文》,1991.4)、《现代汉语的时间系统》(《世界汉语教学》,1994.1),史有为《施事的分化与理解》(《中国语言学报》,1991.4),黄国营、石毓智《汉语形容词的有标记和无标记》(《中国语文》,1993.6),刘宁生《汉语怎样表达物体的空间关系》(《中国语文》,1994.3),袁毓林《正反问及相关的类型学参项》(《中国语文》,1993.2)、《一价名词的认知研究》(《中国语文》,1994.4),萧国政《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语料对象及语料提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4.2),石毓智《时间一维性对介词衍生的影响》(《中国语文》,1995.1),李向农《时点时段内涵及构成与汉语社会的时间观念》(《世界汉语教学》,1995.2)等。

不管是哪种取向，都有利于深化对汉语语法特点的认识，有利于促进汉语语法研究的发展。必须特别提出的是：吕叔湘以90高龄还写出了《试论含有同一[一N]两次出现前后呼应的句子的语义类型》(《中国语文四十年纪念刊文集》，商务印书馆，1993)等文章，为后辈树立了“务实”学风的榜样。

10．问题和建议

（一）问题

① 对于实质性问题的研究，“火力”嫌分散，还没有真正做到“各个击破”。

② 深入揭示规律的论实结合的高质量论文略少。一方面，有的文章仍然停留在事实描写上面，缺乏理论深度；另一方面，泛论性文章增多，有的文章注重运用某种理论来解释汉语语法现象，却不怎么注意事实的细致检验和规律的深入发掘。

③ 开始注意了语法研究跟现代化需要接轨的问题，但还没出现相关的重要成果。

（二）建议

① 加强补缺性研究。有的课题，比如数词系统、感叹句系统的研究，对弄清汉语语法面貌很有好处，但一直被忽略。

② 加强系列性研究。有的重大课题，比如关于词类研究、句型句式研究的课题，要咬住不放，连续支持，使之形成研究系列。

③ 加强发掘汉语语法特点的专题性研究。鼓励脚踏实地研究汉语实际问题，在充分观察、充分描写的基础上，生发出带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有的问题，比如词类问题，如果不跟汉语语法特点的研究联系起来进行探索，不可能得到理想的效果。

④ 加强为现代化服务的“设施性”研究。比如，研究成果的计算机应用，研究成果的计算机录入的查询，研究成果和研究信息的机用共享系统的研制，等等。

四、几点比较

1. 理论方法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已经初步形成带有体系性的理论，并且初步形成能够笼罩全局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与此相联系，已经初步出现研究工作中的不同风格特点。

现代汉语语音研究，提出了若干重要理论问题，特别是研究中运用了科学实验的方法；现代汉语词汇研究，提出了若干重要理论问题，但是，严格说来，在学科研究方法上尚未有重要建树。

2. 论著

就数量而言，"八五"期间语法研究的论著最多，词汇研究的论著稍少于语法研究论著，语音研究的论著不到语法研究论著的六分之一。

就质量而言，语法研究论著大约二分之一左右质量较高，词汇研究论著大约四分之一左右质量较高，语音研究的论著起码有三分之二是质量较高的。

3. 队伍

语法研究队伍最大，而且同时具备两个特点：第一，研究队伍和教学队伍基本上是结合的。全国高等学校和一部分中等学校的教师，是研究队伍的基本力量。第二，由于经常举行全国性研讨活动，队伍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聚集性。

词汇研究队伍也相当大，全国高等学校和一部分中等学校的教师也是研究队伍的基本力量；不过，也许由于没有什么全国性研讨活动，队伍力量显得比较分散。

语音研究队伍较小。不仅队伍力量比较分散，而且能够参加高水平语音研究工作的人员一般都只集中在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和

三两所著名高等学府里。由于目前高水平研究和全国高等学校的教学有所脱节，研究队伍和教学队伍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脱节。

4. 现代化程度

在研究工作与现代化手段相结合，研究结果能适应现代化的要求方面，语法研究和词汇研究处在起步阶段，或者说，处在“意识到”和“刚开始”的阶段。在这一点上，语音研究走在了前头。

总之，“八五”期间语音研究、词汇研究和语法研究都有长足发展，只是由于基础不同，发展情况自然也有差异。从总体看，语法研究较为成熟，然而，不能评价过高。汉语语法的许多重要问题，目前仍然处于迷迷茫茫的状态之中。因此，即使是语法研究，离学科发展的真正成熟还极为遥远。

近代汉语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江蓝生　曹广顺　吴福祥

近代汉语是汉语史的一个分支学科。这门学科在科学意义上的起步较晚，大约开始于本世纪40年代，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是这一学科的拓荒者和奠基人。如果说，几十年以前，我们对汉语史的认识还比较粗疏，只停留在把汉语简单地分为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两大块，那么，随着对汉语历史的深入研究，现在语言学界都承认，在汉语的发展历史中，除了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这两个阶段之外，还有一个近代汉语时期，尽管在这三个时期的具体划分上以及这三个时期之间的关系是鼎足而三还是一分为二(即把现代汉语看成近代汉语的一个阶段)等问题上看法还不完全一致。

半个多世纪以来，近代汉语研究经过40年代的初创、五六十年代的发展以及70年代末以来的兴盛等阶段，迄今已发展为汉语史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下面从五个方面回顾和分析近代汉语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并对当前和今后的近代汉语研究提出一些建议，希望能对从事近代汉语研究的学者起到一些参考作用。

一、近代汉语的历史分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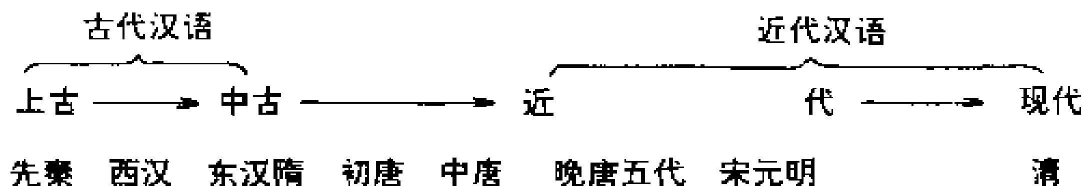
近代汉语是汉语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跟任何历史研究一样，时段划分问题也是近代汉语研究所遇到的基本问题之一，因为它直接涉及到近代汉语研究的取材范围和结论的适用范围。建国以后，近代汉语历史分期问题不断引起讨论。王力先生在50年代成书的《汉语史稿》里首先提出“公元13世纪到19世纪(鸦片战

争)为近代(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为过渡阶段)"[1]的意见。8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讨论逐渐多起来。潘允中的分期意见与王力先生接近,认为"自宋、元、明、清至鸦片战争以前是汉语史的近代时期"。[2]胡竹安在《中古白话及其训诂的研究》(《天津师大学报》,1983.5)一文中提出以"词汇—词义"为主的分期标准,认为:"把自唐迄明前期的白话定为中古白话是比较科学的。"1983年吕叔湘先生在为刘坚《近代汉语读本》[3]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提出:"建议把近代汉语的开始定在晚唐五代即第九世纪。"次年,吕先生在他《近代汉语指代词》[4]一书的序中,又进一步提出:"以晚唐五代为界,把汉语历史分成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两个大的阶段是比较适合的。至于现代汉语,那只是近代汉语内部的一个分期,不能跟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鼎足三分。"吕先生是以口语跟书面语的分化程度作为分期标准的,他指出:"尽管从汉魏到隋唐都有夹杂一些口语成分的文字,但是用当时口语做基础,而或多或少地搀杂些文言成分的作品是直到晚唐五代才开始的(如禅宗语录和敦煌文学作品)。"[5]吕先生的意见引起近代汉语研究工作者的普遍重视,并在1986年上海举行的第二届近代汉语研讨会上对此进行了专门的讨论。胡明扬在研讨会上详细论述了他的看法。他认为近代汉语的上限不晚于隋末唐初,下限不晚于《红楼梦》以前。1987年,杨耐思、袁宾等也对这个问题发表了意见。杨耐思在《加强近代汉语研究》(《语文建设》,1987.1)一文中认为,由于"语音、词汇和语法三者的发展不平衡,所以近代汉语的上限与下限不能一刀切。"在具体时间的划分上,他也同意大致上是"晚唐五代到清代的1000余年。"袁宾在《论近代汉语》(《广西师大学报》,1987.1)一文中提出,近代汉语的历史范围不宜采用划线切分、规定上下限的方法。他认为,汉语的历史阶段由主干部分和交替重叠部分组成,以南宋、元、明、清为近代主干,上下可推沿几个世纪。蒋冀骋不同意胡明扬的"隋末唐初"上限说,也不赞成王力的13世纪上限说。他同意吕叔湘的晚唐五代为近代汉语上限的意见,但

不赞成吕氏的“古代、近代二分说”。蒋冀骋的意见是把晚唐五代到明末清初(9—17 世纪)定为近代,古代、近代、现代鼎足而三[6]。蒋绍愚在他的近著《近代汉语研究概况》”[7] 里也讨论到近代汉语的历史分期问题。他也不同意吕先生的“古代、近代二分说”。而倾向于古代、近代、现代的“三分法”。他认为近代汉语的上限或许可以提前到唐代初年,而下限定为 18 世纪中期。

从 1986 年上海讨论会和近年来有关的文章看,目前大部分近代汉语研究工作者倾向于接受近代汉语的上限定在晚唐五代,下限定在清代前后的意见。现在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尚未结束,由于对近代汉语的研究还不够全面、深入,我们对近代汉语本身还缺乏一个细致、充分的了解,近代汉语的历史分期问题自然也就难以找到一个尽善尽美的答案。相信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我们对这个问题会逐渐获得一个清楚、合理的认识,从而会进一步推动近代汉语研究工作的进展。

近代汉语阶段的划分,是对汉语史分期问题的重大突破,引出了汉语史分期的新思路。近年有学者把古汉语分成上古和中古两块,“前者以先秦、秦汉的书面语为代表,后者以自东汉到隋末约四五百年间含有较多口语成分的典籍的语言为代表”,“西汉可以看作是从上古汉语向中古汉语演变的过渡阶段,初唐、中唐则可以看作是从中古汉语向近代汉语演变的过渡阶段。”(见王云路、方一新《中古汉语语辞例释·前言》)把这一看法跟吕叔湘先生的意见综合起来,即为:



这一思路大多数学者能够接受。

二、近代汉语文献资料的发掘、整理与介绍

近代汉语研究的文献资料是与文言相对的古白话文献材料。但在文言占统治地位的古代，很少有人用纯粹的白话来写文章，多数文献材料是文白夹杂，反映口语的程度参差不齐。同时，由于这些材料在传统语言学中不被重视，常有时代不明、传抄讹误或后人删改等情况。因此近代汉语研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发掘、整理和介绍有关的文献材料。几十年来，不少学者在这方面投入了辛勤的劳动，并取得了一些成果。

早在40年代，吕叔湘先生在近代汉语语法专题研究中即从古代典籍中披沙拣金，多方搜罗，发掘、整理出一批有用的资料并科学地加以使用。附在《汉语语法论文集》之后的引书目录就是经过严格筛选、可资利用的近代汉语的基本资料。这份目录以时间为次，收录文献近200种，有的一种之下又含数种或数十种（如《元曲选》下列29个剧目）。从体裁来看，举凡笔记、小说、佛经、野史、诗集、词集、文集、释儒语录、变文、平话、诸宫调、散曲、杂剧等无不毕载。可以说，吕先生对资料的发掘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是空前的。他所做的开创性工作为近代汉语研究奠定了相当规模的资料基础。他的引书目录为初学者指引了门径，以致很多学者都曾按图索骥，由入门而登堂入室。

继吕叔湘先生之后，对近代汉语文献资料的发掘、介绍做出杰出贡献的当推日本著名汉学家太田辰夫先生。他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8] 所附的引书目录以时间为次，收录汉语文献近300种。多数一种之下又含多种（如全唐诗下列111位诗人的作品，敦煌文献下含53篇，元曲选下列84个剧目）。无论是体裁范围、还是文献数量，太田先生的引书目录都超过了吕氏。而收在该著后面的《跋》则是一篇介绍近代汉语文选材料的重要论文，集中反映

了作者在语料选择和鉴别问题上的观点。作者首先指出，在语言史的研究中，最主要的是资料的选择，资料选择得怎样，对研究的结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太田氏在列举了有人以《洞山悟本禅师语录》来研究唐代语法及以明藏本《六祖坛经》来研究唐代语词的实例后指出："现存的唐代禅宗语录几乎全是后代编纂的，即使不是，也是经过后代修改的，似乎不能把它作为唐代口语研究的基本资料。"

太田氏在《跋》中将历史文献分为"同时资料"和"后时资料"，这是一个重大发明。他指出："所谓'同时资料'，指的是某种资料的内容和它的外形(即文字)是同一时期产生的。甲骨、金文、木简等，还有作者的手稿是这一类。法帖只要不是伪造的，也可看作这一类。……所谓'后时资料'基本上是资料外形的产生比内容的产生晚的那些东西，即经过转写、转刻的资料，比如唐代集子的宋刊本就是'后时资料'。"可见，在语言史研究中，"同时资料"与"后时资料"的价值是不同的。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应当尽量利用"同时资料"。但"中国的资料几乎大部分是'后时资料'"，"同时资料"是有限的，在实际研究中难免要使用某些"后时资料"。因此在使用"后时资料"时，必须进行认真的选择和鉴别，避免因使用不正确的材料而使研究工作误入歧途。

在这篇《跋》中，太田先生还就书后所引的文献作了简要的介绍和评议，指出各个朝代的重要文献及其在研究中的使用价值、版本特点等。

1985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刘坚编著的《近代汉语读本》。该书选录了魏晋南北朝到明代的40种接近口语的文献材料，逐篇加以校勘和注释，每篇篇首还以题解的方式对写作年代、作者、版本、作品的主要内容、反映实际语言的程度及作为近代汉语研究资料的价值等作了简要的介绍。该书展示了丰富多采的近代汉语研究资料，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材料线索。

80年代以来，还出现了一些介绍近代汉语文献的文章。刘坚

《古代白话文献简述》(《语文研究》,1982.1)从敦煌文献、禅宗语录和宋儒语录、诗词曲、文籍、史籍、笔记小说、白话小说、会话书等八种体裁,介绍了近百种文献作为近代汉语研究资料的史料价值及其内容、年代、作者、版本等情况。梅祖麟《敦煌变文里的"熠没"和"黍(举)"字》(《中国语文》,1983.1)介绍了现存最早的禅宗语录集《祖堂集》。刘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里的白话资料》(《中国语文》,1985.1)介绍了这类史籍在近代汉语研究中的资料价值。江蓝生《〈皇明诏令〉里的白话敕令》(《语文研究》,1988.3)介绍了明初诏令中的白话资料。刘坚《〈训世平话〉中所见明代前期汉语的一些特点》介绍了古时朝鲜学习汉语的教科书《训世平话》。

这些文章的发表使人们了解到过去较少知道的文献资料,开阔了学术视野,拓宽了资料范围,对近代汉语的研究起到了促进和推动作用。

《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的编校出版是近代汉语文献整理、研究工作中的一项重要成果。这套《资料汇编》由刘坚、蒋绍愚主编、中国社科院语言所和北京大学中文系部分同志合作编校。全书分唐五代、宋代、元明三卷,选录唐至明代中叶在不同程度上反映汉语口语实际情况的文献资料 69 种。在每种文献的校记(一)里,均以简洁的文字介绍作者、年代、版本等情况。选材合理、校勘精细是这套《资料汇编》的突出特点。

此外,1990 年岳麓书社出版了郭在贻、张涌泉、黄征的《敦煌变文校议》;1991 年语文出版社出版了王锳、曾明德编辑的《诗词曲语辞集释》。

这些资料的出版对近代汉语研究的意义极为重大,不仅免去了研究者检索资料之难,而且为他们提供了经过标点、比较可信的版本,减少因使用不可靠资料而带来的失误。

三、近代汉语知识的普及

近代汉语是汉语研究中的一个新的领域。80年代以前，人们对这门学科所知甚少，从事这门学科研究的学者更是寥寥。所以介绍和普及近代汉语知识以吸引更多的学者从事这门学科研究，便成了近代汉语研究、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8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富有成效的工作。

前面提到的刘坚所著《近代汉语读本》收录了近代汉语的各类作品，为初学者全面认识近代汉语面貌提供了一本很好的教课书，在近代汉语知识介绍、普及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近年来还陆续出版了一些有关近代汉语的通论性著作。如张永绵的《近代汉语概要》(沈阳出版社，1989)、袁宾《近代汉语概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杨建国《近代汉语引论》(黄山书社，1993)等。这些通论性著作与刘坚的《近代汉语读本》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在近代汉语知识普及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91年，杨耐思、曹广顺应约在《承德教育学院学报》撰写了近代汉语研究的系列讲座。《讲座》共分八讲，详细介绍了近代汉语文献资料、近代汉语的词汇研究、语法研究和语音研究。《讲座》材料丰富，分析透彻，深入浅出，引人入胜。作者在充分介绍近代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时，还以大量的篇幅讨论了近代汉语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特色。《讲座》刊出后，在中学语文教师中产生了较大反响，为普及近代汉语知识、提高中学语文教学质量做出了贡献。

199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蒋绍愚著《近代汉语研究概况》。此书的写作宗旨是“为了吸引和帮助更多的青年朋友从事近代汉语研究，从而扩大我们的研究队伍，也有必要向他们介绍近代汉语研究的现状和问题，介绍近代汉语研究的资料和方法。”作者在详尽占有资料的基础上首次总结了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外在近代

汉语语音、词汇、语法以及作品的断代和方言成分的考察方面的研究成果，并就某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意见。作者在介绍近代汉语研究成果的同时，还致力于近代汉语研究方法的介绍和评析。《近代汉语研究概况》是一部研究近代汉语必读的入门书籍，也是一部系统总结近代汉语研究的重要的学术专著，受到了同行学者的重视和好评。

四、近代汉语词汇研究

1.早期的研究

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导源于方俗语词的考索和训释。这种工作很早就已经开始，唐宋以来相当数量的古代笔记文字里可以见到对一些近代汉语词汇的考辨。不过，这种资料零碎而散漫，还不能算是系统的词汇研究。有清一代，一些学者试图以治训诂的精神来研究近代汉语词汇，如翟灏的《通俗编》、钱大昕的《恒言录》、郝懿行的《证俗文》等，这些著作收集词语要比前人丰富，但基本上是资料纂集性质，方法上也未能摆脱俗语求证或方言证古的窠臼，系统性和科学性都还不够。本世纪20年代以后，出现了胡朴安《俗语典》、徐嘉瑞《金元戏曲方言考》、朱居易《元剧俗语方言例释》等三部俗语词研究专著。《俗语典》搜集各种古今俗语，只注出处而不加训释，只能算是资料汇编，谈不上严格意义上的词汇研究。《金元戏曲方言考》和《元剧俗语方言例释》都是考释元曲语词的专著，但材料搜罗面窄且少，考释也不够精确。

2．1949年后的研究

真正从语言学角度研究近代汉语词汇的发轫之作当推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该书完稿于1945年，195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作者广泛搜集“唐宋金元明间流行于诗词曲”而其意义“非雅

诂旧义所能赅，亦非八家派古文所习见"的"特殊语辞"，运用"体会声韵""辨认字形""玩绎章法""揣摩情节""比照意义"等方法，诠释其意义，剖析其用法。该书材料丰富，引证详审，释义也大体准确。自出版以来一直是研究近代汉语词汇、语法，欣赏古典文学作品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书和参考书。本书的不足之处主要在于：对一些虚词的解释缺乏明确的语法观点；在处理部分词条的各种不同用法时义项划分过细，归纳探源不足；考释词义时对语音注意得不够；此外，作者所用的材料大体上局限于诗词曲，其他文献涉及不多，从而影响了对部分词语考释的准确性。尽管本书存在上述不足，但仍不失为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它的出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继《诗词曲语辞汇释》之后，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又把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推进了一步。该书是考释敦煌变文字义的专著，但在取材上作者的眼光并没有局限于敦煌变文上。而是广泛搜集、使用了上至先秦、下至近代的诗、词、曲、赋、笔记小说、文集、杂著、民谣、语录、史籍、诏令、奏状、佛经、碑文、字书、韵书等各种体裁的文献材料。材料搜罗宏富，为变文中大量疑难词语的准确训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方法上，作者除沿用张相在《诗词曲语辞汇释》中提出的五种之外，还特别注意从语言角度进行探索，注重从音韵上寻求词语的不同形式间的关系，从纷繁复杂的书写形式中归纳、概括出词义。作者在对变文字义作出解释的同时，还力求运用不同历史时期的材料探索这些词语的语源和发展线索，"从而把词语的断代研究纳入词汇史和语言学史的轨道"，"为汉语词汇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9]

3.近 20 年的研究

70 年代末以来，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发表和出版了一批有相当质量的论文和专著，并出现了一些为众多研究者所重视的"热点"课题：

1）诗词曲语词训释

这方面的专著主要有：

王锳《诗词曲语词例释》

陆澹安《戏曲词语汇释》

顾学颉、王学奇《元曲释词》

《诗词曲语词例释》（中华书局，1980）的"资料来源、取例汇义以至编排体例方面，大率不出《汇释》序言中所指示的蹊径和范围。"[10]内容主要是补《汇释》的不足，搜集其失收的条目，完善、修正其欠妥的释义。全书收录条目400余个，其中许多释义都有新的发明，是继《汇释》之后，在诗、词、曲语词研究方面的一个重要成果。

《戏曲语词汇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材料较为丰富，但考释欠精，疏漏时见。

《元曲释词》是研究元曲词汇的专著。收词以元杂剧为主，兼及散套、小令，并以经史子集、笔记杂著、南戏、诸宫调、明清戏曲、话本小说等材料为佐证。材料宏富，考证周详，被认为是同类著作中的后出转精之作。

有关诗词曲语词考释的论文甚多。其中，郭在贻的《杜诗札记》（《文史哲》，1981.2）、《唐代白话诗释词》（《中国语文》，1981.2）、《唐诗与俗语词》（《文史》，第25辑），蒋绍愚《杜诗词语札记》（《语言学论丛》，第6辑）、《唐诗词语札记》（《北京大学学报》，1980.3）、王锳《诗词曲语词举例》（《中国语文》，1978.3）、《唐宋诗词语零札》（《中国语文》，1982.1）、《诗词曲语词释义补》（《中国语文》，1983.2）、《元明剧曲语释》（《文史》，第16辑）、王贞珉《元人杂剧语词考释》（《文科教学》，1981.4）、李崇兴《词义札记》（《中国语文》，1983.5）等等，都多所发明，解决了许多诗词曲中没有注意到或未能正确解决的问题。

2）敦煌文献词语校释

这方面的专著主要有：

项楚《敦煌变文选注》[11]、《王梵志诗校注》[12]

郭在贻、张涌泉、黄征《敦煌变文集校议》[13]

蒋冀骋《敦煌文书校读研究》[14]

《敦煌变文选注》收录变文27篇。所选变文"包括了变文中思想和艺术比较杰出的名篇,也兼顾了不同体裁和不同题材的各类作品",使读者"手此一篇,精华在握"。作者凭借自己多年潜心研究的心得,并融汇了近年来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入选的每篇论文详加校释,创获良多,被认为是目前敦煌变文研究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王梵志诗是近代汉语研究的重要资料。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张锡厚编辑的《王梵志诗校辑》。该书对敦煌写本王梵志诗作了比较全面的辑录、校勘和注释。它的出版引发了一些学者对考释、校勘王梵志白话诗的兴趣,而校注最完备、质量最高的当推项楚的《王梵志诗校注》。作者以自己对俗语词研究的深厚功力和对释藏的渊博知识,给王梵志诗中不少难以索解的词语作出了正确的解释,并以大量的例证使人信服。此外,作者对王梵志诗中所表现的思想和所涉及的习俗也援引大量的资料予以说明,从而丰富了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

《敦煌变文集校议》校勘精细,在词语考释方面也多发前人所未发,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是治敦煌变文者不可或缺的参考书。

《敦煌文书校读研究》是一部侧重于敦煌文书文字校勘的专著。作者使用比勘文例、审辨文字、考订音韵等方法,在已往学者校勘成果的基础上又能有所发明。

有关敦煌文献词语校释的论文,举其要者有:项楚《敦煌变文语词札记》(《四川大学学报》,1981.4)、《敦煌变文校勘商榷》(《中国语文》,1982.4),刘坚《校勘在俗语词研究中的运用》(《中国语文》,1981.6),陈治文《"浑塠自扑"校释》(《中国语文》,1981.4),郭在贻《敦煌变文校勘拾遗》(《中国语文》,1983.2),江蓝生《敦煌写本燕子赋二种校注》(《关陇文学论丛·敦煌文学专辑》)、《"望空便

额"别解》(《中国语文》,1983.2),袁宾《敦煌变文校勘零拾》(《中国语文》,1984.1),《变文词语考释录》(《敦煌语言文学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蒋绍愚《〈敦煌变文集〉(上册)校补》(《敦煌语言文学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赵和平、邓文宽《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注》(《北京大学学报》,1980.5-6),项楚《〈王梵志诗校辑〉匡补》(《中华文史论丛》,1985.1),《〈王梵志诗校辑〉匡补》(《敦煌研究》,第4期),蒋绍愚《〈王梵志诗校辑〉商榷》(《北京大学学报》,1985.5),袁宾《〈王梵志诗校辑〉校释补正》(《社会科学》,1985.6)。这些文章对敦煌文献的校释都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

3)笔记文字和白话小说词语训释

近十余年,笔记文字和白话小说的词汇研究也取得了可喜成果,出版了一批专书词典和语词研究著作。如周汝昌主编的《红楼梦辞典》(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王利器主编的《金瓶梅词典》(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白维国《金瓶梅词典》(中华书局,1990),李法白、刘镜芙《水浒语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胡竹安《水浒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9),李申《金瓶梅方言俗语汇释》(北京师院出版社,1990),吴士勋等主编《宋元明清百部小说语词大辞典》(陕西教育出版社,1992),张惠英《金瓶梅俚俗难词训释》(社科文献出版社,1992),王锳《唐宋笔记语辞汇释》(中华书局,1990)。

单篇论文也有不少,比较有影响的有:郭在贻《〈太平广记〉里的俗语考释》(《中国语文》,1980.1),《〈游仙窟〉释词》(《杭州大学学报》,1981.4),刘坚《语词杂说》(《中国语文》,1978.2),江蓝生《"影响"释义》(《中国语文》,1985.2),王锳《唐宋笔记语词释义》(《中国语文》,1987.1),钟兆华《〈红楼梦〉"白"字来源探疑》(《中国语文》,1987.1),白维国《〈小说词语汇释〉误释举例》(《中国语文》,1981.6),弥松颐《〈儿女英雄传〉词语汇释》(《中国语文》,1981.5),隋文昭《〈醒世姻缘传〉词语注释商略》(《中国语文》,1988.4),蒋冀骋《读〈水浒词典〉札记》(《语言研究》,1993.2),张涌泉《〈金瓶梅〉

词语校释》(《杭州师院学报》,1993.4),张鸿魁《〈金瓶梅〉某些词语释义和字形问题》(《中国语文》,1993.2)等。

4)佛经和禅宗语录词汇研究

汉译佛经和禅宗语录是俗语词的渊薮。过去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对这类文献重视和开掘都很不够。近年来一些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开拓性工作。袁宾《禅宗著作词语汇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是这方面研究的第一部专著。重要的论文有:蒋绍愚《〈祖堂集〉词语试释》(《中国语文》,1985.2),、袁宾《〈五灯会元〉词语释义》(《中国语文》,1986.1),《禅宗著作词语释义》(《中国语言学报》,第4期),梁晓虹《佛经词语札记》(《南京师大学报》,1984.2),董志翘《〈五灯会元〉语词考释》(《中国语文》,1990.1)等。

5)中古口语词汇研究

为建立起历史的联系,研究者们还对与早期近代汉语相邻界的魏晋南北朝的小说、史书、笔记等多种文献的词语进行了考释,如江蓝生《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语文出版社,1988),蔡镜浩《魏晋南北朝词语例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方一新、王云路《中古汉语词语例释》(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朱庆之《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吴金华《世说新语考释》(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等。

6)断代语言词典的编纂

最近十年中,还出版和编纂了几部断代语言词典。如龙潜庵《宋元语言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刘坚、江蓝生主编的《唐五代语言词典》(江蓝生、曹广顺编)、《宋代语言词典》(袁宾编)、《元代语言词典》(李崇兴等编)即将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些词典初步反映了某一时代的词汇面貌,对于建立近代汉语乃至整个汉语的词汇发展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外,1992年还出版了高文达主编的《近代汉语词典》(知识出版社),这部词典在收词和释义两方面,还可以进一步充实和提高。

与过去的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相比,70年代末以来的近代汉语

词汇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在近代汉语词汇研究中，已经形成了一支以中青年为主的研究队伍，涌现了一批学力坚实、成果丰硕的中青年研究人员。

2. 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课题。如与近代汉语词汇相关的魏晋南北朝词汇研究、禅宗语录词汇研究等等。

3. 开始了一些专书词汇研究。如《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专书词汇研究。

4. 使用材料更加广泛，方法上有所改进，研究内容日趋深入。如《王梵志诗校注》、《敦煌变文选注》、《诗词曲语词例释》等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

五、近代汉语语法研究

近代汉语语法是近代汉语这门学科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开展得较晚、研究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从本世纪 50 年代吕叔湘先生发表的一组有关近代汉语语法的文章，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这期间，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经过了初创、发展和兴盛的三个阶段，取得了一批可喜的成果，并逐渐形成了一些颇具特色的研究方法与理论。

1. 早期的研究

1940 年，吕叔湘先生发表了《释〈景德传灯录〉中“在”“著”二助词》。文章以《景德传灯录》为基本材料，旁及唐宋其他文献，以丰富翔实的语料，准确严密的分析论证了“在”“著”二助词在唐宋之际的使用情况和发展变化。该文的发表揭开了以现代语言学方法研究近代汉语语法的序幕。尔后，吕先生相继发表了《论“底”“地”之辨兼及“底”字的由来》(1943)、《与动词后“得”与“不得”有关之词序问题》(1944)、《说“们”》(1949)、《说代词语尾“家”》(1949)等一系列重要论文。这些论文在详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

对所研究的语法事实作了细致周密的分析和精确严密的论证。不仅论文本身是有很高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而且在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文献、理论和方法上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为汉语语法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为此后的近代汉语语法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吕先生的研究成果在当时的语言学界并没有引起很大反响，整个40年代从事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语言学家寥若晨星，成果也屈指可数。

2.五六十年代的研究

五六十年代，近代汉语语法研究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研究工作取得了一些进展。这个时期有数十篇论文发表，出版了三部专著。

王力《汉语史稿》(中册)(科学出版社，1958)是我国第一部汉语语法史专著。书中对近代汉语的许多重要的语法现象，像"使成式"、"处置式"、"被动式"的产生、发展过程，代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疑问词在近代的发展变化等等，都作了分析和描写。《汉语史稿》(中册)首次从整体上勾画出汉语语法历史发展过程的轮廓，也首次简要地描绘出汉语语法体系在近代的一些概貌特征。作为汉语语法史研究的发轫之作，该书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抹灭的。但由于当时对汉语语法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在今天看来，《汉语史稿》(中册)对近代汉语语法特点的描写分析还显得过于简略，近代汉语中一些特有的语法格式，一些语法格式在不同历史时期中的使用特点和发展变化，一些特有虚词的意义和功能都还没有触及到。对"处置式"、"使成式"等语法格式形成和发展过程的描写也显得不够深入。这些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是研究工作历史发展阶段的局限性使然。

吕叔湘《汉语语法论文集》汇集了吕先生40年代发表的有关近代汉语语法的重要论文。集子的出版对推动和促进近代汉语语

法研究工作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太田辰夫的《中国语历史文法》(1958 年由日本江南书院出版,1987 年蒋绍愚、徐昌华译成中文,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是一部从现代汉语出发来研究汉语历史发展中与之相关问题的重要专著,作者对近代汉语语法的各种语法现象都作了十分深入的描写分析。该书材料丰富翔实,描写详尽精到,结论稳妥可信,是近代汉语语法研究中一本必备的重要参考文献。

这一时期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成果除了上述几种专著外,还有数十篇论文发表。较有影响的有:王力《汉语被动式的发展》(《语言学论丛》,1957.1)、许绍早《〈水浒传〉中的"被字句"》(《东北人民大学学报》,1956.3)、祝敏彻《论初期处置式》(《语言学论丛》,1957.1)、何融《汉语动词词尾"将"的研究》(《中山大学学报》,1955.1)、向熹《〈水浒传〉的"把"字句、"将"字句和"被"字句》(《语言学论丛》,1958.2)、余健萍《使成式的起源和发展》(《语法论集》,1957.2)、杨建国《补语式发展试探》(《语法论集》,1959.3)等。

3.近 20 年的研究

70 年代末以来,近代汉语语法研究获得了迅速发展,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在这段时间里,出版了数部专著,发表了 200 余篇论文,不少课题研究都取得了新成果。

这个时期发表的专著主要有:

潘允中《汉语语法史概要》(中州书画社,1982)。这是文化大革命后出版的第一部语法史方面的专著。作者比较注意吸收 20 多年来语法史研究方面的成果,体现了当时的研究水平。在近代汉语语法方面,像对一些语法格式(如"述补结构")产生、发展过程的分析描写、对一些虚词语源的探讨都颇有新意。但从整体上看,《汉语语法史概述》对汉语语法史,无论是古代汉语语法还是近代汉语语法的描写分析,都还不够深入。

吕叔湘著,江蓝生补《近代汉语指代词》(学林出版社,1985)。

本书是吕先生40年代的旧稿，1983年以后由江蓝生补充整理，再经吕先生调整后出版。全书对人称指代词、名词性、定语性指代词、状语性指代词和数量指代词作了全面的论述。作者对每个历史时期中的指代词的使用和发展变化都列举了丰富的资料加以说明，同时还从用法、语音等方面探求其语源。全书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近代汉语指代词系统，描绘出近代汉语指代词使用和发展的一个完整面貌。梅祖麟评论说："无论从内容看，还是从方法看，《指代词》都是汉语语言学的一个里程碑。"

赵克诚《近代汉语语法》（陕西师大出版社，1987）是国内第一部近代汉语语法专著。该书以近代汉语语法为研究对象，对整个近代汉语语法系统都有所涉及，论述比较全面。但作者所采用的材料以近代白话小说为主，研究方法也仅限于"例证式"。由于材料和方法的局限，使人感到作者对语法现象的历史发展变化的研究还显得简单粗略，缺乏深度。这也说明，要写出一部全面详尽、体系严谨、材料丰富、结论稳妥的近代汉语语法专著需要以坚实的专书语法研究、断代语法研究作为基础，这些工作还有待于大家今后进一步的努力。

太田辰夫《汉语史通考》（日本白帝社，1988年出版，江蓝生、白维国中译本，1991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本书是作者继《中国语历史文法》之后又一部以近代汉语法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重要论著。书中所收论文内容上可分为通论性和概论性两类。前者如《上古汉语略说》、《中古汉语概说》，后者如《〈祖堂集〉语法概说》《〈老乞大〉的语言》等。这些论文材料丰富，选例精审，结论精当，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显示出作者在汉语语法史特别是近代汉语语法方面深厚的功力。同时，作者对断代、专书的语法描写也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个可供参照的系统。

冯春田《近代汉语语法问题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一书结合相关句式讨论了近代汉语时期一些新兴虚词的用法及其发展变化。材料丰富，分析细致，立论平稳，是同类著作中比较有特

色的一部。

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近代汉语虚词研究》(语文出版社,1992)一书对30多个虚词作了深入全面的探讨,勾划出近代汉语虚词系统的大致轮廓。作者以丰富、翔实的文献材料为依据,以历史发展观、语法系统观为指导,详细考察了各个虚词在各历史阶段中的使用和变化情况,力求对虚词产生和消失的时间作出准确的判断。此外,对一些虚词的来源和语法化义理也进行了有价值的探讨。

孙锡信《汉语历史语法要略》(复旦大学,1992)一书分为称代、实词、虚词、称数、造句等五篇,勾画出汉语语法发展变化的大致轮廓。其中与近代汉语语法有关的论述,如"述补式"、"处置句"等,不乏新意。

《隋唐五代汉语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宋元明汉语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这是程湘清主编的汉语史断代专书、专题研究丛书的后两部。这两部书运用静态描写、历史比较、定量分析等方法,围绕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开展专书或专题研究,其中有些语法史专题写得深入扎实,颇见功力。

70年代末以来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成果除了上述几部专著外,还充分体现在国内刊物发表的二百余篇学术论文上。这些论文围绕一些近代汉语的句型、语法格式、虚词等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

1)句型研究　这类文章又可分为对某一句型在某一文献中或在某一时期内使用情况的共时描写和对某一句型产生、发展、变化的历时性研究两种。前者如胡明杨《〈老乞大〉复句句式》(《语文研究》,1984.3)、李思明《〈水浒传〉的因果句》(《中国语文》,1987.2)、徐正考《唐五代选择疑问句系统初探》(《吉林大学学报》,1988.2)等等,这类文章将研究对象限定于特定文献或特定时期,对所研究的问题作全面的分析描写。后者如梅祖麟《现代汉语选择问句法的来源》(《史语所集刊》,第36辑)、《现代汉语完成貌句式和词尾

的来源》(《语言研究》,1981.1)、岳俊发《得字句的产生和演变》(《语言研究》,1984.2)等,这类文章是从历时角度来观察某一句型的发展变化,在考察某一句型在不同历史时期使用特征的基础上,描写出它演变,发展的过程。

2)语法格式研究 “动补式”、“被动式”、“处置式”等语法格式是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传统课题。70年代以前,已有一些文章在这方面进行了多角度的探索和研究。70年代末以来,语法格式的讨论仍是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重点之一,不少文章在这方面都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如潘允中《汉语动补结构的发展》(《中国语文》,1980.3),贝罗贝《双宾结构从汉代到唐代的历史发展》(《中国语文》,1986.3),唐钰明《唐至清的“被”字句》(《中国语文》,1988.6),袁宾《〈祖堂集〉的“被”字句研究》(《中国语文》,1989.1),梅祖

注意过的新问题，加深了我们对近代汉语虚词的了解和认识。

70年代末以来的近代汉语语法研究不仅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也表现出鲜明的特色：

1)重视近代汉语跟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的紧密联系，在研究中把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注重追溯现代汉语语法现象的源流。梅祖麟《现代汉语选择问句法的来源》和《现代汉语完成貌句式和词尾的来源》两篇文章在这方面具有示范作用。这种溯源性研究成果，不仅使我们能比较清楚地了解汉语的历史，同时也为现代汉语语法分析提供了依据。

2)把近代汉语跟现代汉语方言联系起来考察，注重方言口语与文献材料的比较互证。由于语言发展变化具有不平衡性，不少近代汉语语法现象虽不用于普通话，但却活在某些现代方言里，或在某些现代方言里能得到印证。这就为现代方言口语和近代历史文献的比较互证、综合考察提供了可能和条件。朱德熙《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中国语文》，1985.1)，和《v－neg－vo与vo－neg－v两种反复问句在汉语方言里的分布》(《中国语文》，1991.5)，梅祖麟《汉语方言里虚词“著”字三种用法的来源》(《中国语言学报》，1989.3)等文章是这方面的典范。这种把死的文献材料与活的方言口语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方法是一条正确也是十分有效的路子，值得大力提倡。

3)突破过去在语法研究中单纯研究虚词的传统，从语法格式和虚词两方面着眼进行语法史研究。梅祖麟《现代汉语完成貌句式和词尾的来源》、唐钰明《唐至清的“被”字句》、曹广顺《〈祖堂集〉中的“底”(地)、“却”(了)、“著”》和《魏晋南北朝到宋代的“动＋将”结构》(《中国语文》，1990.2)等文章都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

4)注重语法变化的形式标志，力求以形式标志来验证语法成分的意义变化。语法变化常常是依靠虚词的出现来实现的，而新的虚词又常常是由实词逐渐语法化而来。因此，在讨论语法变化时，某一个词是否已完全语法化，其词义是否仍保留着原来的实词

意义是常要碰到的问题。这个问题，一般都是通过对例句的分析、理解来解决。但对例句的理解常常要受到分析者主观意识的影响，分析结果见仁见智，难以统一，也难于检验。因此，利用形式标志来检验某一词虚化与否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可靠的办法。赵金铭《敦煌变文所见的"了"和"着"》、梅祖麟《现代汉语完成貌句式和词尾的来源》、曹广顺《〈祖堂集〉中的"底"(地)、"却"(了)、"著"》在讨论完成貌助词"了"时都强调助词"了"的形成是以"动＋了＋宾"格式的出现为标志的，都以"动＋了＋宾"格式作为判定"了"已虚化的形式标志，指出在这一格式出现之前的"了"都还不是完成貌助词。这种形式和语义相结合的分析方法自然要比单纯从意义上判别要精确、可靠得多。

5)在研究中引进数量统计方法，并进而把数量变化的规律作为语言现象在时间中变化的尺度来使用。近年来发表的许多文章都不再满足于举例性质的分析，而是同时作了精确的数量统计和定量分析。不同时期内语言现象出现的量的变化，既可以更准确地显示出质的变化情况，又可以作为语言材料的时间标志。梅祖麟《从语言史看几本元杂剧宾白的写作时代》(《语言学论丛》第13辑)、唐钰明《唐至清的"被"字句》、袁宾《近代汉语"好不"考》(《中国语文》，1984.3)、杨平《"动词＋得＋宾语"结构的产生和发展》等许多文章都广泛应用了数量统计的方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6)重视语法变化的地域特征，力求揭示出语法变化的共时性差异，使研究结果更加精确深入。语言演变的不平衡性往往会导致某些语法现象的产生、变化、消失在不同地域方言内表现出不一致性。因此，在语法史研究中只有弄清楚语法变化的共时性地域差异，才能把研究引向深入。梅祖麟在《〈三朝北盟会编〉里的白话资料》(《中国书目季刊》，第14卷第二本)一文中曾讨论过"动＋了＋宾"格式使用的地域差异，他指出："早期的'动＋宾＋了'12世纪初在汴京、燕京一带已经变成'动＋了＋宾'。"进而推测"'动＋宾＋了'到'动＋了＋宾'这个词序的变化先发生在汴京、燕京为中

心的中原及华北，渐渐传播到江南。”曹广顺《魏晋南北朝到宋代的“动＋将”结构》在考察魏晋南北朝到宋代的“动＋将”格式的变化时，也看到了某种地域差异，作者指出，晚唐到宋“动词＋将”结构的发展北方较南方慢，这一发展差异甚至可能直接影响到现代。这类文章都从时间和地域的角度去考察某一些语言现象的发展过程，使我们对这些语言现象的历史情况有了更清楚、更全面的了解。

7）重视描写和解释相结合，在描写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语法变化作出动态性解释。对语法事实进行描写是研究的基础，把纷繁复杂的语法现象准确清楚地描写出来本身就包含着对语法现象的探索。但对整个研究来说，仅有描写是不够的，还应该在描写的基础上对语法现象作出解释：揭示语法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影响，说明以前没有的结构为什么在那个时期产生。梅祖麟《现代汉语完成貌句式和词尾的来源》、曹广顺《〈祖堂集〉中的“底”（地）、“却”（了）、“著”》、唐钰明《唐至清的“被”字句》等不少文章在这方面做出了富于启发性的探索。

8）把语法研究与白话文献的断代研究结合起来，利用语法研究的成果来为成书时间不明的白话文献确定写作时代。语法研究要以年代确凿的文献为材料，反之，如果根据语法史的研究成果确知某一语法成分或语法格式产生的年代，那么就可以以此为标准来判定一些时代不明的文献的写作时代。刘坚《〈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写作时代蠡测》（《中国语文》，1982.5）、梅祖麟《〈从语言史看两本元杂剧宾白的写作时期〉》、江蓝生《八卷本〈搜神记〉语言的时代》（《中国语文》，1987.4）、曹广顺《试说“就”“快”在宋代的使用及其有关的断代问题》（《中国语文》，1987.4）等文章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9）重视语法变化的历史文化背景，从语言接触对汉语影响的角度来研究近代汉语中一些特有的语法现象。余志鸿《元代汉语的后置词系统》（《民族语文》，1992.3）、《〈蒙古秘史〉的特殊语法》

等文章，对元代北方汉语受蒙古语影响，在语言结构方面发生的变化作了研究。尽管其中的某些结论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但这种研究视角无疑是值得肯定和重视的。

六、目前研究工作存在的问题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半个世纪以来近代汉语研究确实取得了十分令人鼓舞的成绩，近代汉语研究的蓬勃发展推动了整个汉语史研究的深入。但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近代汉语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

1．理论风气淡薄

理论和事实是语言研究两个互相依从、相得益彰的组成部分。由于受传统语言学的影响，近代汉语研究历来看重语言事实，而轻视语言理论，理论风气比较淡薄。这种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不善于运用业经证明行之有效的理论来指导研究工作。如研究词汇，而不关心语义学理论；研究语法，而不过问历史语言学、现代语言学以及现代汉语语法学的理论。由于在实际研究中缺少理论这把“利刃”，致使多数研究成果学术价值不太高。二是对已发掘到的、重要的语言事实或已得出的、有价值的结论不善于进行理论的概括，上升为理论形态的语言规律，致使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因缺少理论化的概括和提炼而减少了本有的学术价值。

2．研究视角狭窄

有些文章常常孤立地讨论某一问题，缺乏语言系统的意识和历史发展的观点，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善于把所要研究的问题与相关的问题联系起来观察，纳入系统的框架来审视，从历史变化的角度来探讨。

3．研究领域有待拓宽

近些年来近代汉语研究在词汇、语法方面确实解决了大量的问题，但应该看到，迄今仍有一些课题未曾涉及或很少涉及。词汇研究多热衷于词语考释，而对常用词的历史演变，构词法的演变，各阶段词汇系统的面貌以及近代汉语词汇发展史等课题都缺乏研究。语法研究的空白也同样存在。如汉语一些重要的句型像受事主语句、主谓谓语在近代汉语中的使用情况及发展变化，兼语式、连谓式等语法格式的历史演变，介词系统的历史变化，副词系统的历史变化，一些重要助词的虚化过程及其所在句式的历史演变（如结构助词“得”的产生过程及其相关句式“动＋得＋宾＋补”、“动＋得＋补”的演变）等，目前还都缺乏认真、深入的研究。

4．研究方法单调

一些词语考释的文章仍沿用传统训诂学的方法，只排比材料，归纳词义，不做进一步的“溯源”、“达变”的工作；也很少参证方言，因声求义，以增加释义的可信度。相当数量的语法研究的文章只停留在平面描写，甚至是“例证式”的定性分析之上。

5．资料选择不严

近年来的近代汉语研究确实取得了一批质量较高的成果，但无庸讳言，也有一部分成果质量不高。除了有些论文或专著选题不当、方法陈旧之外，主要是对所使用的材料缺乏严格的鉴别，往往使用一些不太可靠的伪劣资料，在下结论时也很少考虑文献资料的方言地域背景，更不管版本的优劣变迁等因素，对这一致命问题应该引起充分警惕。

6．信息不灵，课题分散

由于学术界缺少必要的交流沟通，从事近代汉语研究的学者

之间信息不通，各自为战，课题分散，缺乏通盘规划，造成一些课题的重复研究，浪费了人力、财力。

七、对今后研究工作的建议

1．进一步做好基础工作

1)继续做好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

资料是研究工作的基础。几十年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近代汉语资料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已取得可喜的成绩。但应该看到，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目前的资料规模是远远不够的。今后应在资料的发掘、整理和研究上花大力气，继续做更扎实的工作，争取不断有新的突破。

2) 继续做好近代汉语知识的普及工作，组织人力编写一部适合高等学校中文系学生使用的《近代汉语概论》，以适应文化教育的需要。

3) 进一步拓宽研究课题，填补空白

A 词汇方面

a 继续进行广泛深入的词语考释工作，下大力气攻克一批疑难词。

b 开展近代汉语常用词发展变化和构词法发展变化的研究。注意探索和总结词汇演变的规律，为建立近代汉语词汇系统奠定基础。

B 语法方面

a 在句型、语法格式和虚词等方面开展更广泛研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加强一些专题研究。如处所词位置的历史变化，介词系统、副词系统的历史变化；受事主语句、主谓谓语句在近代的使用情况和发展变化等等。

b 要结合现代方言考察近代汉语或现代汉语中一些语法范畴和语法成分的来源和发展。

2. 加强专书和断代研究

A 扩大已有的专书词汇研究和断代词汇研究的成果，组织编写《近代汉语大词典》，以弥补大型语文词典对这一段词语释义的不足。

B 对一些重要的文献如《敦煌变文集》、《祖堂集》、《朱子语类》、《元刊杂剧三十种》等，进行全面的专书语法研究。在此基础上，着手进行断代语法研究，如晚唐五代语法研究，宋代语法研究等等。在此基础上，争取尽早编写出一部系统完备、结构合理、材料翔实的《近代汉语语法》。

3. 加强理论研究，丰富研究方法

近年来，已有一些学者在汉语史研究中注重理论的探讨和方法的更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梅祖麟先生运用"结构变化"、"词汇兴替"动态解释等理论和方法，对汉语完成貌句式和虚词的来源作出了颇可信据的解释[15]。蒋绍愚先生运用"语义场"、"义素分析法"等现代语义学理论对汉语历史词汇学作了系统的理论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16]刘坚、曹广顺先生等运用语法化理论探讨了虚词产生的原因和过程，总结出语言演变的若干规律。[17]这些研究都很富有启发意义，值得我们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加以借鉴。此外，近些年来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已逐渐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分析方法，如变换分析法、语义特征分析法、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分析法等等，这些研究方法也同样值得我们在近代汉语语法研究中有选择地加以利用。

4. 加强对宏观的、全局性问题的研究

如近代汉语时期官话系统的南北方言问题，少数民族语言对近代汉语的影响等等。这类问题复杂而又重要，需要作深入、扎实的研究。

注释:

1. 王力,《汉语史稿》(上册),中华书局,1958。
2. 潘允中,《汉语语法史概要》,中州书画社,1982。
3. 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
4. 学林出版社,1985。
5. 《近代汉语指代词序》。
6. 蒋冀骋,《论近代汉语的上限》,《古汉语研究》,1990 年第 4 期—1991 年第 2 期。
7.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8. 蒋绍愚、徐昌华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9. 郭在贻,《读新版〈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天津师大学报》第 5 期,1982 。
10. 王锳,《诗词曲语词例释·前言》
11. 巴蜀书社,1990。
12.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3. 岳麓书社,1990。
14. 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
15. 梅祖麟,《现代汉语完成貌句式和词尾的来源》,《语言研究》第 1 期,1981。
16. 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17. 刘坚、曹广顺、吴福祥,《试论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若干因素》,《中国语文》第 3 期,1995。

主要参考文献：

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近代汉语虚词研究·绪论》，语文出版社，1992。

刘坚、曹广顺，《建国以来近代汉语研究综述》，《语文建设》第6期，1989。

杨耐思、曹广顺，《近代汉语研究讲座》，《承德教育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1992年第1期。

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江蓝生，《试述吕叔湘先生对近代汉语研究的贡献》，《中国语文》第1期，1994。

蓬勃发展中的汉语方言学

张振兴

一、汉语方言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

汉语方言具有高度统一性的一面，使用全国统一的文字，从北边的哈尔滨到西南的昆明，从东部的沈阳到西部的乌鲁木齐，在如此广阔的地域内，人们日常通话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困难。但汉语方言又有极其复杂的一面，尤其东南各省方言差别很大，有“五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音”之说。因此，对汉语方言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广泛的实际意义，是研究汉语的基础。对汉语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研究，对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研究，都离不开汉语方言的研究。汉语方言研究的成果，也可以多方面地应用于人文科学的其他领域，能够对文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提供许多有益的帮助。

汉语方言研究的成果还有很多实际用途。例如可以直接应用于各类语文性辞书的编纂；可以作为一种语言识别的手段，广泛应用于公安侦察部门的侦审工作。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在语言学方面的开发应用，方言研究在对外汉语教学、语音合成、现代通信技术的应用方面，也完全有可能发挥自己的作用。这方面的一些尝试性工作，现在已经开始了。

方言学是语言学中的基础学科。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对我国语言学工作者是一种知识上和技能上的全面训练和考验。事实证明，一个优秀的方言工作者，往往可以胜任语言学其他许多部门的

研究工作。因此,从学术价值和实际用途两方面说,汉语方言研究在我国语言学科的建设中,是应该给予优先考虑的一个部门。

二、汉语方言研究的历史和发展

我国有调查和研究方言的优良传统。西汉扬雄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被公认为是世界最早的一部记录和研究方言的著作。在此后的2000多年里,以各地方言为主要记录和研究对象,或与此有关的作品,不断刊行于世,至清代达到鼎盛。例如清末著名学者章太炎的《新方言》,陈澧的《广州音说》等著作,直到今天还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到了本世纪20年代以后,我国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罗常培等人,把现代语言学的方法,应用于方言的调查研究,并且一起步就显出了不凡的身手。他们采用国际音标记音,根据切韵系统制定了适合于汉语方言的语音调查表格,并且进行了大规模的田野调查活动。例如,当时的清华学校在1927年组织了对吴语的调查,并于1928年出版了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1935年至1946年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赵元任为首的一批研究人员,相继调查了湖北、湖南、江西、云南、四川五省的方言,其中湖北的调查材料整理成《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于1948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湖南、江西、云南、四川等四省的调查材料,由杨时逢整理,50年代以后在台湾先后出版。除此之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批单点的研究报告,如罗常培的《厦门音系》(1931年)和《临川音系》(1941年),赵元任的《钟祥方言记》(1939年)和《中山方言》(1948年)。这些调查报告,对后来的汉语方言调查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三四十年代所开展的方言调查,不但积累了大量的语料,而且在人员培养、调查方法、材料整理等各个方面也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为后来的方言研究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后,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由于文字改革、

推广普通话、汉语规范化这三大语文政策的贯彻执行，现代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受到更加普遍的重视。1956 年制定的《语言科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提出汉语方言调查是汉语研究的三个中心问题之一，并且指出首先要进行方言普查。根据这个设想，当时的汉语方言研究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1956 年，根据胡乔木同志的提议，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联合举办普通话语音训练班，先后培养了一大批方言调查研究的专业人才，他们后来大都成为本学科的骨干。由著名语言学家丁声树撰文，李荣制表的《汉语音韵学讲义》是这次训练班的主要教材，受到了学员的广泛欢迎，一直到现在仍然是方言音韵方面不可替代的权威著作。

（二）随后开展了全国范围的，一县一个调查点的汉语方言普查工作，为推广普通话、汉语规范化、文字改革做了贡献。据不完全统计，在 1956—1960 年期间，全国有方言记录的调查点多达 1800 多个，编写的学习普通话手册达数百种，正式出版的也有几十种。在这次普查的基础上，还相继整理出版了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汉语方言著作和论文，例如《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1960 年）、《四川方言音系》（1960 年）等。

（三）在普查的基础上，特别注意到个别方言点的重点调查。这里应该特别提到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组的研究人员，在丁声树和李荣带领下对昌黎（1959 年）和张家口（1960 年）两个地点的方言调查。这两个地点的深入调查，为后来的方言调查积累了非常丰富的集体工作经验。事实证明，参加过这两次调查的研究人员具有很强的田野工作能力和整理研究能力。昌黎调查后来整理出版了《昌黎方言志》（1960 年），成为汉语方言研究的经典之作。

可以看出，这个时期汉语方言研究的成绩是十分显著的。按照发展的势头，本来可以期望做出更多的成绩，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却不如人愿。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三、汉语方言研究的黄金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汉语方言研究重现蓬勃生机，一派兴旺景象，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黄金时期。

首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于1979年创办《方言》季刊。这是我国方言学界唯一的全国性专业刊物，办刊17年来，共出刊68期，刊登方言研究方面的调查报告、研究论文、译文、书评、会议报道等各类文章700多篇。《方言》季刊提倡实事求是，注重调查，互相切磋的严谨学风，相继发表了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学术论文和调查研究报告。在培养和发现方言研究人才，提倡和引导方言研究方向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国内外方言学界乃至语言学界具有广泛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厦门大学等有关院校发起，于1981年成立全国汉语方言学会。这是我国方言学界第一个由民政部注册登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指导和资助的学术团体，也是我国语言学界内仅次于中国语言学会的规模最大的学术组织，至1995年底，已拥有正式会员520多人。学会成立以来，已举行了八次学术研讨会。学会在团结学界同仁，组织方言研究的攻关合作，普及方言学科，扶持新人，以及加强本学科的国际联系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受到好评。在全国方言学会的带动下，1981年以后，福建、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湖南、湖北、山西等省相继成立了省一级的方言学会，并且积极地开展了各种学术活动。与此同时，厦门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山东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还相继成立了方言研究室或方言研究中心，成为所在地区汉语方言研究的中心。随着汉语方言研究的深入发展，随后又组织了吴语方言、粤语方言、闽语方言、客家方言、晋语方言等专题方言的定期学术研讨会。港澳台地区及日美等国汉语方言学家经常应邀参加这些学术研讨会。

这个时期方言学科相继承担了一批社会科学"六五"、"七五"、"八五"等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以及其他重要研究课题。在这些项目和课题的推动下，方言研究硕果累累。根据聂建民、李琦编纂的《汉语方言研究文献目录索引》和其他有关材料统计，1979年至1994年16年中，本学科发表的各类论文达1700多篇，出版的各类专著达600多种，大大地超过了本世纪前70年的总和。其中不乏优秀的作品。从这些科研项目和研究课题的成果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的方言研究，在以下四个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1. 在方言分区上取得重大突破

这里不妨首先回顾一下从本世纪初到50年代这前半个世纪汉语方言分区的历史。

清末著名学者章太炎著有《检论》，作于1900至1901年间，其中卷五《方言》把汉语方言分为九种。以下节录部分原文，后加括弧略作说明：

①河之朔，暨于北塞，东傅海，直隶、山西、南得彰德、卫辉、怀庆为一种。（黄河以东以北地区是一种方言。直隶省包括今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彰德、卫辉、怀庆指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这三个府的治所分别在今安阳、汲县、沁阳。）

②陕西为一种，……甘肃宵[属]之。（陕西、甘肃两省是一种方言。）

③开封以西，……汝宁、南阳，今曰河南。…及江之中，湖北、湖南、江西为一种。（河南省黄河以南地区与湖北、湖南、江西三省是一种方言。汝宁府治所在今汝南。）

④福建，⑤广东，各为一种。……福建之汀附属于江西而从赣。（汀州府治所在今长汀。赣指赣州府。这一带是客家话区。）

⑥开封而东，山东曹、沇、沂至江淮间，大略似朔方而具四声为一种。（沇即兖州府的兖。曹州、沂州两府治所在今荷泽、临沂。所说大致相当于江淮官话区东部，即安徽、江苏两省长江以北有入

声的地区。但曹、兖、沂三府今并无入声。)

⑦江南苏州、松江、太仓、常州，浙江湖州、嘉兴、杭州、宁波、绍兴为一种。……浙江温、处、台附属于福建而从福宁。(处州、台州与福宁三府治所分别在今丽水、临海、霞浦。浙江温州、处州、台州今属于吴语区而不属于闽语区。)

⑧东南之地独[安徽]徽州、宁国处高原为一种。厥附属者浙江衢州、金华、严州，江西广信、饶州也。(徽州、宁国、严州、广信、饶州五府治所分别在今歙县、宣城、建德、上饶、鄱阳。此种方言指徽语，区划的范围较宽泛。)

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音皆大类湖北为一种。……湖南之沅州亦与贵州同音。(这一种指的是西南官话区。)

1934 年赵元任等编的《语言区域图》，把“中国语系”分为“华北官话区、华南官话区、吴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海南方言”七个单位。图里海南岛方言的颜色和线条跟粤方言相同。台湾西部和广东东部都归为闽方言。

1948 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的《语言区域图》，把“汉语”分为北方官话、西南官话、下江官话、吴语、湘语、赣语、客家话、粤语、闽南语、闽北语、徽州方言等十一个单位。其中“闽南语”包括：①福建省厦门及厦门以南地区，②广东省潮汕地区和海南岛(中部为黎语)，③台湾省大部分地区(西北角一小片为客家话，中部为高山语)。

1955 年丁声树和李荣在《汉语方言调查》一文中，把汉语方言分为八区，即官话区、吴语区、湘语区、赣语区、客家话区，闽北话区、闽南话区、粤语区。后来有人把其中的闽北话区和闽南话区合併为闽语区，这就是七区。很显然，丁声树和李荣的分区比较符合汉语方言的实际情况，也更具有概括性。不过，限于当时对汉语方言事实了解不足等客观原因，无论是七区说或八区说，对分区界线都是不太明确的。一直到了 80 年代，由李荣、熊正辉、张振兴担任主编的《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分区图)》(“六五”国家重点项

目)提出了"大区——区——片——小片——方言点"的五级概念，把汉语方言分为官话、晋语、吴语、闽语、粤语、湘语、赣语、徽语、客家话、平话等十种，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把汉语方言分区提高到一个全新的学术水平，并且分区的界线大大明确了。总起来说，《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分区图)》的贡献在于：(1)把官话大区再分为东北官话、北京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江淮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西南官话等八个区；(2)把山西及其毗邻地区有入声的方言从官话中独立出来，自成晋语区；(3)把安徽南部16县市的方言从吴语或官话中划分出来，自成徽语区；(4)把广西境内的平话(包括桂南平话和桂北平话)自成平话方言；(5)把赣语和客家话严格区分开来。这个分区比前人前进了一大步。地图集1987—1989年由香港朗文(远东)出版公司出版，胡绳同志赞誉为"语言学界的一件盛事"，"是我国科学文化领域的一项基本建设"，获首次(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这里需要着重讨论一下《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分区图)》划分方言区的标准，主要是根据两条：一个是古入声字的演变；一个是古浊音声母的演变。按古入声字演变的情况，可以把官话和非官话分开，官话方言绝大多数地点古入声字今读舒声(江淮官话和西南官话一些点除外)，非官话方言古入声字今仍读入声；根据古清音声母入声字的演变，又可以把官话大区分为八个官话区。按照古浊音声母的演变，可以划分九个非官话方言，当然也可以用来把官话大区分开。例如：

官话大区——除江淮官话及西南官话一些点外，官话方言没有入声，古入声字今读舒声。

东北官话：古入声清音声母字今读上声的字比北京多。

北京官话：古入声清音声母字今分归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声调。

冀鲁官话：古入声清音声母字今读阴平，或多数读阴平。

胶辽官话：古入声清音声母字今读上声。

中原官话：古入声清音声母字和次浊声母字今读阴平。

兰银官话：古入声清音声母字今读去声。

西南官话：大多数地方古入声字不论清浊都读阳平。

江淮官话：古入声字今读入声。

晋语区——古入声字今仍读入声。根据这个特点，晋语区和江淮官话表面上似乎相同，实际上不一样，详见下文。

吴语区——古全浊声母今仍读浊音声母。就是说吴语方言今声母读塞音塞擦音时有清音不送气，清音送气，浊音之分。

徽语区——古浊音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时，大多数读送气清音，但也有读不送气清音的。

赣语区——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时，今读送气清音；古浊音声母上声字不读阴平，这一点可以区别于客家话。

湘语区——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时，不论平仄清浊，都不送气。

闽语区——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时，今多数读不送气清音，少数读送气清音。

粤语区——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时，多数地点今逢阳平、阳上读送气清音，逢阳去、阳入读不送气清音。

平话区——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时，今读一般都是不送气清音。

客家话——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时，今读送气清音，但一些口语常用字（如"渠笨"）往往读不送气清音；部分古浊音声母上声字今读阴平。

当然，划分方言区除了上述两条主要根据之外，也还要参照其他因素，例如晋语区和江淮官话的特点，都是古入声今仍读入声，似乎无法分开。但是需要考虑地理因素，晋语是指山西及其毗邻地区有入声的方言。在广阔的北方地区，山西及其毗邻地区有入声的方言连成一片，不能不承认这是晋语的最显著特征。江淮官话主要分布于湖北省东南部，以及安徽、江苏等省内长江中下游地

区，显然是官话和吴语等南方方言的过渡地带，有入声正是江淮官话具有某种吴语等南方方言特点的反映。因此，不能把晋语的入声和江淮官话的入声等同看待。再从其他因素来看，晋语有构词方面的一些特点，如分音词很多，词缀“圪”的构词能力很强，远指词用“兀”，这些都是其他官话区方言所不具备的特点，所以把晋语从传统的官话区里划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方言区，而江淮官话则仍从属于官话大区，其中的理由还是充分的。

2.在方言的重点研究上成绩显著

由贺巍、张振兴主持的“汉语方言重点调查”（“七五”国家重点项目），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研究成果，选择洛阳、武汉、博山、嘉定、舟山、黎川、福清、漳平、江永等12处有代表性的方言进行重点的深入的调查研究，并于1991—1992年出版了九处方言的研究报告。这九处是：张振兴的《漳平方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贺巍的《洛阳方言研究》，黄雪贞的《江永方言研究》，汤珍珠、陈忠敏的《嘉定方言研究》，钱曾怡的《博山方言研究》，冯爱珍的《福清方言研究》，方松熹的《舟山方言研究》，颜森的《黎川方言研究》（以上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朱建颂的《武汉方言研究》（武汉出版社，1992年）。总字数约400万字，内容非常丰富。

作为国家“七五”社科规划的重点科研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要求对各个点的语音、词汇、语法作深入的调查，详细的分析，而不像过去作面上的调查时只作简单的记录。而且，为了便于作比较研究，就要求各个点所调查的字音和词汇等材料大体上要能对比得起来，因此，作为语音的调查，就都以《方言调查字表》所列单字为基本标准，在词汇方面则编制了2000多条词汇调查表作为各点的必须调查条目。除此之外，还要求各点根据本方言实际情况作补充调查。语法方面则根据调查记录的长篇故事、语法例句等，对本方言的语法特点作适当的描写。作为九个点的调查报告，在

编写体例上，也有明确的规定。各点的报告都分八章来编写：第一章是导言，对调查点的地理人口概况、历史沿革、方言调查经过、方言的内部差别等作简要的叙述；第二章是本方言的特点，从语音、语法、词汇等三方面，分项例举，说明本方言跟其他方言的差别；第三章是本方言的语音系统，从声母、韵母、声调、声韵调配合关系方面，作系统的分析；第四章是同音字表，先按韵母分类，再以声母、声调为序排列，要特别注意有音无字的词语及其用法；第五章是本地音和北京音比较，说明本地音和北京音的关系；第六章是本地音和古音比较，说明本方言的历史演变状况；第七章是记音材料，包括儿歌、谚语、对话、故事、语法例句等；第八章是方言词汇，词条按意义分类，和北京话有差别的要加注释。所以，这九种重点方言的调查报告，体例很一致，内容既丰富，又有各方言点的特色。下面举洛阳、嘉定、福清等三种方言研究为例，加以说明。

(1)贺巍的《洛阳方言研究》，把洛阳作为中原官话的一个代表点，着重指出它不同于北京话的一些特点。

从语音上看：①洛阳方言古微母字今读[v]声母，如“无武舞鹉鹉～务雾尾未味晚万袜文纹蚊闻问勿物網忘妄望”等，古影母字今读零声母。这样，古微母字和古影母字就有区别，例如“晚[van˦]≠碗[uan˦]，务[vu˨˩˨]≠误[u˨˩˨]”。北京话古微母字古影母字都读零声母。②洛阳方言古精组字今读[ts ts‘ s]声母，能拼开齐合撮四呼的韵母，这样，在拼细音时，就和古见晓组字的今读不同音，例如“细[si˨˩˨]≠系[ɕi˨˩˨]，焦[tsiɔ˧]≠骄[tɕiɔ˧]，箱[siaŋ˧]≠香[ɕiaŋ˧]，津[tsin˧]≠金[tɕin˧]，全[ts‘yan˧˩]≠拳[tɕ‘yan˧˩]，聚[tsy˨˩˨]≠巨[tɕy˨˩˨]”。就是说洛阳方言分别尖音和团音。北京话古精组和见晓组字拼细音时都同音，就是说北京话不分尖音和团音。③古入声清音声母字和次浊声母字今读一般为阴平，只有少数例外，如“胁急察乙膜鄂樸捉责忆亿抑翼亦译液”今读阳平。

从词汇和语法方面看，洛阳方言常常用“可、歇、怪”作副词，例如：他长的可高他长得很高|这条街可长这条街很长|一条可长的马路—

条很长的马路｜桌上搁一碗可甜的水桌上搁一碗很甜的水｜他可看不起人他很看不起人｜洛阳有一座可高可高的楼洛阳有一座很高很高的楼｜睡了一夜，他可不睡了睡了一夜，他再也不睡了‖他的脸歇黑他的脸很黑｜这水歇热，没法喝这水很热，没法喝｜他歇能说，谁也说不过他他很能说，谁也说不过他‖他走的怪快他走得很快｜他怪敢买呀，真舍得花钱他怎么那么敢买呀，真舍得花钱。

(2)汤珍珠、陈忠敏的《嘉定方言研究》描写了上海郊区嘉定方言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不同于上海市区。例如嘉定话有六个调：阴平、阳平、阴去、阳去、阴入、阳入(古上声清声母字今并入阴去调，古上声浊音声母字今并入阳去调)，而上海话只有五个调：阴平、阴去、阳去、阴入、阳入(古平声、古上声的浊音声母字和古去声浊音声母字合并为一个舒声阳调)。古鱼虞韵知组、章组、日母字的韵母，嘉定话老派读[ɥ]。如"书[sɥ˥˧]，处[ts'ɥ˧˦]"，这和苏州话一致，新派则受上海话影响读[ɿ]，反映了嘉定话介于上海话和苏州话之间的过渡性特点：

	诸　之	处　齿	书　诗
老派	tsɥ˥˧≠tsɿ˥˧	ts'ɥ˧˦≠ts'ɿ˧˦	sɥ˥˧≠sɿ˥˧
新派	tsɿ˥˧	ts'ɿ˧˦	sɿ˥˧

嘉定话的词汇、语法的主要特点是：

①少数老年人口中三个人称代词带有词头"实[zəʔ˨]"。复数无词头：

	单　数	复　数
第一人称	我 ɦŋ˧(老：实我 zəʔ˨˩ ɦŋ˧˦)	我伲 ɦŋ˧˩ ȵi˨˦
第二人称	侬 noŋ˨(老：实侬 zəʔ˨˩ noŋ˨˦)	侬搭 noŋ˨˩ tAʔ˥˦
第三人称	伊 i˧(老：实伊 zəʔ˨˩ i˥˩)	伊搭 i˥˦ tAʔ˥˩

②量词的定指用法，例如：隻瓜大来海外这个瓜大极了｜桩事体办好则那件事办好了｜隻鸡个肉蛮鲜个那隻鸡的肉很鲜｜条鱼个鳞爿刮刮脱把那条鱼的鳞刮了｜拿隻床卖脱则把那张床卖了｜侬吃吃隻菜你吃吃这个菜｜叫伊来修一修扇门叫他来修一下那扇门｜部旧个胡梯这个旧楼梯｜块三

尺长个布那块三尺长的布｜只卖脱伊吧这一只卖了吧。

嘉定话中这种量词用作指示词的用法，表现得非常突出，名量、动量都有这种定指用法。我们如果再参照粤语、闽语中类似的用法，可以看到汉语指示词的一种来源及其演变途径。

(3)冯爱珍的《福清方言研究》，在闽语研究领域有新的建树。福清方言属闽语闽东话系统，比较接近福州话，但跟福州话又有明显不同。例如古入声在福清话中有一部分仍保留为入声调，并依古声母的清浊而分为阴入和阳入；而古入声另一部分字则失落入声韵尾，变为舒声韵，其中古清音声母入声字变为阴去调，古浊音声母入声字则变为阴平调，而在邻近的福州话中，这些入声字今仍读入声，请看比字：

	伯 坝	格 嫁	白 疤	局 锅
福州	paʔ˨˧≠pa˨˦	kaʔ˨˧≠ka˨˦	paʔ˥≠pa˥	kuoʔ˥≠kuo˥
福清	pa˧˩＝pa˧˩	ka˧˩＝ka˧˩	pa˦＝pa˦	kuo˦＝kuo˦

福清话古入声字口语读作舒声的将近 100 个(文读仍读入声)，列举如下：宕摄　粕拓作索阁搁胳各恶郭廓扩鹊约泊箔薄膜落乐昨缚镬着箬若掠药钥｜江摄　剥桌镯岳学｜曾摄　仄值食｜梗摄　伯柏百擘拍窄册策格隔客摘拆迹锡折赫吓益尺白麦脉译籴额石席搦只｜通摄　烛粟曲沃曝绿录局玉狱蜀｜咸摄　锸｜深摄　揖｜山摄　澈泄舰。

福清话古入声的演变，反映了古入声在南方方言中一种发展趋向，这对我们了解和研究汉语音韵的规律和汉语史都有重要的意义。

福清方言在语法方面的一个特点是助动词“有”的用法：

①“有”加动词表示动作行为是一个客观事实，如：

伊有煮饭他煮饭了。

我有种菜我种菜了。

②“有”加动词表示动作行为已经发生，或已完成，所叙述的是一件过去的事情，如：

伊以前有来我厝他以前来过我家。
我有通知伊他已经通知他了。

③"有"加动词表示动作行为将要发生，如：
这车有去福州，有坐无这车要去福州，要坐吗？
有买鱼其快掏钱要买鱼的快拿钱来。

④"有"加上介词"[kaʔ˥](在)"，放在动词前面，表示动作行为正在进行或将继续一段时间，如：
伊有在做作业他正在做作业。
伊有在椅咧坐咧，安安心他在椅上坐着，放心吧。

福清方言"有"字的助动词用法，在福建、台湾、海南、广东的闽方言中都能见到，反映了闽语的共性。

除了上述方言的重点调查之外，还有一些研究项目跟重点调查有关。例如：

①编纂《上海方言志》。本课题由复旦大学许宝华、汤珍珠教授主持，列为上海市方志办项目。本方言志包括上海市区及郊区的方言材料，包含有语音、词汇和语法等三个方面的广泛比较，计划1995年底完成，约60万字。在此之前，他们曾联合主持了国家"六五"社科重点项目《上海市区方言志》的编纂工作，该志于1988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共88万字。这里顺便指出，这种以一个省(市)或地区县(市)为范围的方言志的编写工作，在"八五"期间得到很大的发展，除了《上海方言志》，山东大学钱曾怡教授等主持的《山东方言志》(40万字)，湘潭大学李永明教授、湖南师大鲍厚星教授主持的《湖南省方言志》(上下卷，120万字)都已完成，正在排印中。

②由叶祥苓撰写的《苏州方言志》("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也于1988年正式出版，为苏州方言研究之集大成者。

这些方言的重点研究报告出版后，都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

在进行方言重点调查工作的同时，面上的调查继续得到重视。

这方面最突出的工作是：

①编录《现代汉语方言音库》。本课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侯精一主持，1992年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科研项目。计划编录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南京、苏州、福州、厦门、海口、长沙、南昌、梅县等40处方言的语音音档。每处方言音档都有统一的规划和要求，录音部分主要包括本处方言的声韵调、200条左右常用词汇、若干语法例句和长篇语料；书面部分还包括本处方言概况，主要是简略介绍本方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特点。截止1995年四月，《上海方言音档》已正式出版，福州、梅县、广州、长沙、苏州、南京等处方言书面部分已完稿，音档部分正在录制中。

②广东北江流域、西江流域粤方言调查。本课题由暨南大学詹伯慧教授、香港理工学院中文系张日昇教授、张显群教授合作主持，列入广东省"八五"社科重点项目。1992年—1993年调查了北江、西江20个地点的粤语，整理编写出《粤北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共128万字，已于1994年底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另一成果《西江流域十县市粤语调查报告》正在整理中，可望于1995年底付印。在对北江、西江流域粤方言调查之前，詹伯慧、张日昇教授曾联合主持了广东省"七五"社科重点项目"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出版了三卷本150万字的《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包括三十一个方言点3810个字的字音对照，1401个词的词汇对照，以及综述篇（详下文）。以上两个调查，比较全面、系统地对珠江三角洲，以及北江、西江流域的方言进行了综合分析和比较研究，勾划出一大片地区汉语方言的大致轮廓和主要特征，把对广东地区，特别是对粤语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

3.方言的比较研究进展明显

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出以下几个研究项目的研究成果：

(1)由侯精一、温端政主持的《山西省各县市方言志》的编纂工作（"六五"国家重点项目），截止1994年底，共完成了山西境内38

个县市方言志的编写和出版工作。列举如下：

侯精一	平遥方言志	乔全生	洪洞方言志	马文忠	广灵方言志
	长治方言志		汾西方言志		大同方言志
温端政	怀仁方言志	陈润兰	襄垣方言志	田希诚	和顺方言志
	忻州方言志	李唯实		潘家懿	临汾方言志
杨述祖	太谷方言志	赵秉璇	寿阳方言志	蔡　权	吉县方言志
	祁县方言志	胡双宝	文水方言志	郭文亮	平鲁方言志
沈慧云	晋城方言志	吴建生	万荣方言志	张振铎	沁县方言志
金梦茵	陵川方言志	吴建生	永济方言志	杨增武	山阴方言志
	原平方言志	李改样		朱耀龙	新绛方言志
谢自立	天镇方言志	张益梅	介休方言志	宋欣桥	盂县方言志
史素芬	武乡方言志	李小平	临县方言志	孟庆海	阳曲方言志
李　奇		吕枕甲	运城方言志	江荫禔	朔县方言志
潘耀武	清徐方言志	张振铎	屯留方言志	王希哲	左权方言志
胡福汝	中阳县方言志	刘　毅		郭建荣	孝义方言志

以上 38 种方言志，总字数约 350 万字，各志体例一致，基本要求也大致相同。如果把这些材料放在一个平面上来考察，可以对山西省方言作出有效的比较研究，因此有重要价值。在此基础上，他们又主持了"山西省方言通志"的编纂工作("七五"国家重点项目)，并于 1993 年以《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为题正式出版。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分上下卷。上卷介绍山西方言概况，分析山西方言四十二个地点方言的声母特点(如 ts tsʻ s 和 tʂ tʂʻ ʂ 的分合，尖团是否对立，xu 和 f 的分合，n 和 l 的分合等)、韵母特点(如败—贝的分合，多—河—锅的分合，借—介的分合，儿—梨—驴—鱼的分合，搬—班的分合，"三山桑"的韵母读音，"心新星"的韵母读音，"剑箭借"的韵母读音，"煤门"的韵母读音，"打党"的韵母读音，"等党""红黄"的韵母读音，"钢光"的韵母读音等)、声调特点(如入声的有无，入声是否分阴阳，平声是否分阴阳，阴平和上声是否合流，去声是否分阴阳等)；分析历史音韵(即古今音韵比

较)、文白异读、词汇特点、语法特点,进行了山西方言字音和词汇的对照,提供了语法例句,长篇语料,画了50幅方言地图以突出山西方言在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的一些特点。下卷提出山西方言分成中区、西区、东南区、北区、南区、东北区共六个区,提出分区的标准是有无入声和古四声在今方言中的演变情况,然后按区交代各点的声韵调系统及方言词汇,最后是31张方言分区地图。从以上内容介绍,可以看出《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的内容非常广泛,非常全面,是几十年来,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来,山西方言研究的成果的总结,对于今后进一步深入比较研究山西方言,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近年来汉语方言研究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2)由钱曾怡主编的《山东方言志丛书》,1988年以来,已正式出版了杨秋泽的《利津方言志》,赵日新、沈明、扈长举的《即墨方言志》,曹延杰的《德州方言志》,罗福腾的《牟平方言志》,于克仁的《平度方言志》,钱曾怡、罗福腾的《潍坊方言志》,孟庆泰、罗福腾的《淄川方言志》、张鹤泉的《聊城方言志》,王淑霞的《荣城方言志》,张树铮的《寿光方言志》等十种方言志,另有新泰、沂水、诸城等方言志正在出版中。山东各市县方言志的编写,也都有统一的大纲,统一的条目,这是为将来的方言比较研究准备材料的。

(3)在这方面,还应该特别提到由詹伯慧、张日昇主持的珠江三角洲方言的调查研究工作,现已出版综述报告、字音对照、词汇对照三大册,1994年被评为广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5年被评为广东省高教系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是由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室和香港中文大学语言研究室于1986年协商合作提出的计划,在为期三年的工作中,调查了东起惠阳地区的惠州市,西迄“四邑”的西端恩平县,北至广州市郊从化、增城、花县,南抵深圳、珠海两市及香港、澳门地区,共选取了31个点,其中广州(市区)、香港(市区)、香港(新界锦田)、澳门(市区)、番禺(市桥)、花县(花山)、从化(城

内)、增城(县城)、佛山(市区)、南海(沙头)、顺德(大良)、三水(西南)、高明(明城)、中山(石岐)、珠海(前山)、斗门(上横水上话)、斗门(斗门镇)、江门(白沙)、新会(会城)、台山(台城)、开平(赤坎)、恩平(牛江)、鹤山(雅瑶)、东莞(莞城)、宝安(沙井)为粤语点,惠州(市区)、东莞(清溪)、深圳(沙头角)、从化(吕田)、中山(南蓢合水)为客家话点,中山(隆都)为闽语点。

调查报告的第一部分《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对照》于 1987 年出版。所收的字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的《方言调查字表》为基础,并略加补充,共 3810 个字,由 31 个方言点再加上北京音共 32 个点加以比较,书后还附有所收字的普通话拼音索引和笔画索引,便于查阅。编者在调查整理过程中,一方面参阅前人的调查成果,一方面又尊重实际调查,以现实读音为准而不拘泥于前人之说。标音用国际音标,标调用数目字,以便排印。

调查报告的第二部分《珠江三角洲方言词汇对照》于 1988 年出版。词汇调查既吸取前人研究词汇的成果,又适当结合珠江三角洲地区方言词汇实际,共收入 1401 条方言词语加以对照。书中用字采取从众从俗的原则,不着力于考求本字。同一方言在不同报刊著作中如有不同的写法,则斟酌取用其中的一种写法。无方言字可写的采取写同音字的办法。无同音字可写的就作框框"□"。书后也有拼音索引和笔画索引。

调查报告的第三部分《珠江三角洲方言综述》于 1990 年出版。书中根据调查所得的资料,对珠江三角洲一带方言的分布情况作了概括的说明,并对那个地区的三种方言——粤方言、客家话、闽方言进行了描写和分析。在此基础上,还把各方言点和中古音在声韵调诸方面都列表作了古今的历史比较。书中还有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提供了 42 幅语言地图,从方言点中粤、客、闽三种方言的分布,入声是三个还是两个,古全浊上声的今读走向,到"鱼"字的韵母,明天、一口饭、什么、这个、那个、他(她)、他(她)们等等,把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方言所特有的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的特点,都概

括地反映了出来。书的最后还提供了大量故事、对话、民谣、民歌、谜语、谚语、童谣等口语语料。

总之，珠江三角洲人口众多，方言复杂，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的完成，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4)由陈章太、李行健主持的“北方话词汇调查”(“七五”国家重点项目)，调查了官话方言区近100个地点方言的常用词汇，目前已经完成。一部数百万字的研究报告正在出版中。这些研究，对于一大片地区的方言比较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除此之外，“八五”期间还出版了一批专题的方言研究著作，这里特别应该提到的是钱乃荣编著的《当代吴语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该书编著者对我国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年)一书的方言调查点，重新进行了一次调查。把《当代吴语研究》和《现代吴语的研究》两书的材料加以比较，可以看到吴语近70年来发展的大致面貌，这是很有意思的。

4.编纂《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地点方言词典)

1988年新闻出版署把编纂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的课题列入1991－2000年重点出版书目。1991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协商，共同成立《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编纂委员会，由著名语言学家李荣任主编，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熊正辉、张振兴，江苏教育出版社编审赵所生等人任副主编。1992年本课题正式列为“八五”国家重点项目。已经动员全国各地近五十名专业的方言工作者参加本课题的工作。计划第一步先编写40册分地点方言词典，每册35－50万字。这些地点几乎覆盖了全国各主要方言区，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南京、杭州、福州、厦门、海口、长沙、柳州、济南、哈尔滨、西安、银川、西宁、乌鲁木齐等重要城市。截止1995年十月，已经出版的方言词典有12部：张惠英的《崇明方言词典》、叶祥苓的《苏州方言词

典》、鲍厚星等的《长沙方言词典》、周长楫的《厦门方言词典》、颜清徽等的《娄底方言词典》、熊正辉的《南昌方言词典》、沈明的《太原方言词典》、汪平的《贵阳方言词典》、张成材的《西宁方言词典》、黄雪贞的《梅县方言词典》、周磊的《乌鲁木齐方言词典》、朱建颂的《武汉方言词典》。

四、"九五"期间汉语方言研究规划设想

从上文所说可以知道，"八五"期间以若干重点课题为龙头，已经出现或正在出现一批高质量的科研成果，比先前积累了更多的方言资料；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逐渐形成若干个方言研究中心；拥有一批具有丰富科研工作经验的学科带头人，同时一支以中青年为骨干的科研教学队伍正日臻成熟。在这个基础上，汉语方言研究在"九五"期间应该有更大的发展。从"九五"的研究课题来说，我们提出以下设想。

1.编纂《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综合本)

关于本课题的第一步计划编纂40册分地点方言词典，详见上文。在分地点方言词典的基础上，编纂《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综合本)，是汉语方言研究在"九五"期间的重中之重的项目。编纂这样一部大词典对汉语方言研究本身的价值和意义，自不待言。从广义来说，它可以填补我国辞书建设方面的一项空白，可以为其他辞书，特别是语文类辞书提供丰富的基本材料，可以为汉语研究的其他学科提供可靠的根据。同时，对语文现代化建设，包括语言文字在现代科技方面的应用等方面，都可能提供某些有益的帮助。"九五"期间，我们将继续从全国范围内调动汉语方言学界的骨干力量来从事本项目的工作。现在设想大词典内容大致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汉语方言词汇的对照，这些词汇都相对简单，用不着很多注释和举例。下面以"房子(整座)、厨房；儿子、女儿"为例，举

厦门、苏州、长沙、贵阳、西宁、太原、崇明等七处方言的说法:

	房子(整座)	厨房
厦门	厝 ts'u˩	灶骹 tsau˩˥ k'a˥
苏州	房子 vã˨˧ ·tsɿ	灶披间 tsæ˥˩˧ p'i˥˧ kɛ˥˨
长沙	屋 u˨˦	灶屋 tsau˥ u˨˦
贵阳	房子 faŋ˩ tsɿ˥˧	厨房 ts'u˩ faŋ˩
西宁	房房 fɔ̃˨˦˨ fɔ̃˨˦˥	厨房 tʂ'u˨˦˧ fɔ̃˩˧
太原	房子 fõ˩ ·tsəʔ	厨房 ts'u˩ fũ˩
崇明	房子 vã˧˩ tsɿ˦˨˧	灶屋 tsɔ˧˦˨ ʔuoʔ˥
	儿子	女儿
厦门	後生 hau˩˨ sĩ˥	查囝 tsa˥˩ kiã˧
苏州	儿子 ȵi˨˦ ·tsɿ	囝五 nø˨˦ ·ŋ̍
长沙	崽 tsai˩	女 ȵy˧˨
贵阳	儿子 er˩ tsɿ˥˧	女娃儿 li˦˧ ua˩ er˩˥
西宁	尕娃 ka˧˥ ua˩˥	姑娘 ku˧ niɔ̃˨˦˧
太原	儿子 ər˩ ·tsəʔ	闺女 kuei˩ ny˥
崇明	儿子 ɦŋ̍˨˦ tsɿ˦˨˧	丫头 ʔuo˥ de˧˥

另一部分是以通语(普通话)出条,排列汉语方言的各种说法及用法,这些词汇都相对复杂,需要有一定的注释和举例才能明白。下面以"妻、夫"为例,仍举厦门、苏州、长沙、贵阳、西宁、太原、崇明等七处方言的说法。音标方括弧内是方言条目,标北京话读音。

妻 tɕ'i˥

[老婆 lau˨˩˦ p'o˧]太原 lau˥ p'ɤ˩

[婆娘 p'o˧ niaŋ˧]西宁 p'ɔ˨˦˨ niɔ̃˨˦˥|贵阳 p'o˩ liaŋ˩˥ 是一种粗俗的说法

[女人 ny˨˩˦ ʐən˧]长沙 ȵy˩ ʐən˩|苏州 ȵy˧˨ ȵin˨˦˧|崇明 ɦŋ̍i˧˨ ȵin˨˦˥|贵阳 li˦˧ zən˩ 是一种不太客气的说法

[女的 ny˨˩˦ ·tɤ]贵阳 li˦˧ le˥ 背称,无感情色彩|长沙 ȵy˧˨ ·ti

[女客 ny˨˩˦ k'ɤ˥˩]崇明 ɦŋ̍i˧˨ k'ɑʔ˥

[堂客 t'aŋ˧˥ k'ɤ˨˦]长沙 tan˧˩ k'ə˧˩ 通称
[屋里 u˥ ·li]苏州 oʔ˥˦ ·li
[家婆 tɕia˥ p'o˧˥]苏州 ka˥ bu˨˦
[某 mou˨˩˦]厦门 bɔ˥˧,通称。写作"某"是同音字,本字当作"母"
[牵手 tɕ'ian˥ ʂou˨˩˦]厦门 k'an˥˩ ts'iu˥˧,年轻人的说法
[娘子 niaŋ˧˥ ·tsɿ]崇明 ɦɳiã˨˦ ·tsɿ
[女个 ny˨˩˦ ·kɤ]崇明 ɦɳi˨˦ ·go
夫 fu˥
[男人 nan˧˥ ʐən˧˥]贵阳 lan˨˩ zən˨˩ 新起的说法,口气上较生硬|
长沙 lan˧˩ ʐən˧˩|苏州 nø˨˦ nin˨˦
[男的 nan˧˥ ·tɤ]贵阳 lan˨˩ le˥ 较普通的说法|长沙 lan˧˩ ·ti
[丈夫 tʂaŋ˥˩ fu˥]厦门 ta˨ pɔ˥
[男客 nan˧˥ k'ɤ˨˦]崇明 ɦɳie˨˦ k'ɑʔ˥
[当家的 taŋ˥ tɕia˥ ·tɤ]贵阳 taŋ˥ tɕia˥ le˥ 老的说法|西宁 tɔ̃˦
tɕia˦ ·tsɿ|太原 tɒ̃˨ tɕia˨ ·təʔ
[老汉儿 lau˨˩˦ han˥˩ ·ər]太原 lau˥˧ xar˧˥
[汉子 han˥˩ ·tsɿ]贵阳 xan˨˩ tsɿ˥˧ 旧时说法,口气较生硬
[门前人 mən˧˥ tɕ'ian˧˥ ʐən˧˥]贵阳 mən˨˩ tɕ'ian˨˩ zən˨˩ 旧时说法

2.加强对薄弱地区的方言调查

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是不平衡的,有些地区,有些方言点做得早,资料多,研究水平相对较高;有些地区,有些方言点过去注意得不够,资料缺乏,研究水平相对低。后者是汉语方言研究的薄弱地区,这些地区和汉语方言主要包括:

(1)海南岛的汉语方言。整个海南岛是语言和方言的宝库,就境内的汉语方言而论,已是十分复杂。据初步调查,海南岛的汉语方言有闽语、粤语、客家话、官话等,其中海南闽语是最主要的,通常称为海南话,学术上定名为闽语琼文话,下分五个片:

①府城片,包括海口市中心区及东部、南部,琼山府城镇及府

城西南部分地区，澄迈中部、南部，定安，屯昌大部分地区，琼中北部汉语地区。

②文昌片，包括文昌，琼海，琼山靠近文昌的部分地区。

③万宁片，包括万宁大部分地区，陵水南部地区。

④崖县片，包括三亚市南部，乐东南部。

⑤昌感片，包括东方县的西部，昌江县的北部。

除了闽语之外，今三亚市沿海渔村、岛屿，乐东莺歌海一带的水上渔民说迈话；儋县大部分地区，昌江县南罗等地说儋州话。迈话和儋州话属于粤语系统，但是和广东的粤语（如广州话）还是有明显的差别。儋县南中、兰洋一带说客家话，口音和梅县一带的客家话近似。儋县、昌江、东方、崖县的一些地方还说军话。军话实际上是几百年前传入海南岛的一种西南官话，至今还保留着一些官话词语。临高县的大部分地方和琼山县、昌江县、海口市郊区的一些地方说临高话；东方县和昌江县交界的沿海地区说村话。临高话和村话的语言系属须要进一步研究，有一种意见认为临高话与壮语相近，村话和黎语相近。崖县回辉乡有居民数千人，所说的回辉话语言系属也待研究。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所辖大部分地区，主要语言是黎语、瑶语等。

过去国内外学者对海南岛的方言曾有过一些调查，《中国语言地图集》也有海南岛汉语方言分布图，但都不够全面，更欠深入，所以我们今天来看海南岛的汉语方言，面貌仍不清晰。需要每种方言进行逐点的面上的调查研究，实地记录方言材料，弄清方言分布区域，方言特点，跟全国各地相关方言进行比较等等。

（2）皖南地区的汉语方言。这个地区主要指安徽省长江以南全部地区，安庆地区的江北皖河流域各县市，同时包括毗邻的浙江、江苏、江西三省的部分地区，整个范围包括四省 41 个市县。根据初步调查，皖南地区的汉语方言主要有徽语、赣语、吴语、江淮官话以及河南和湖北两省来的移民官话。此外还有湘语、闽语、客家话、畲话等。徽语、吴语、赣语是土著方言，其他的方言都是从别的

地区移来的。在四省 41 个市县里，只有屯溪、休宁、绩溪、黟县、怀宁、太湖、岳西、潜山、马鞍山九个县市方言比较单一，其余 32 个县市在一县范围内都有不同的方言区或方言片的方言，或者含有移民方言点。因此，呈现十分复杂的状况。

我们要重点关注皖南地区的徽语和吴语。徽语分布于新安江流域的旧徽州府、浙江的旧严州府，以及江西的德兴、旧浮梁县等地，位于整个皖南地区的南部，包括绩溪片、休黟片、祈德片、严州片，旌占片等五个方言片，共 16 个县市。徽语鼻尾多脱落，但又以带[-n]尾作小称，如屯溪"燕 iaːn˩˥|蚕 tsʻɔːn˥˧|群 tɕʻyan˥˧"的[-n]都是儿尾，跟"舌 tɕiaːn˩˩"一样，这一点是徽语跟皖南地区其他方言的重要差异。皖南的吴语主要是土著的宣州话，分布于长江以南、黄山九华山以北青弋江秋浦河流域，即唐代宣州总管府所辖地区，包括宣州片和太湖片，共 18 个县市。宣州话具有吴语的基本特征，古全浊声母今读音自成一类，与古全清、次清声母的今读对立。但浊塞音的闭塞成分都很轻微，很多已向通音转化，并带上清送气；浊塞擦音大都已转化为擦音。有的地方一部分字读清音。这些是宣州话区别于其他吴语的重要特点。

对皖南地区的方言，特别是其中的徽语和吴语宣州话，过去调查研究很不够，只有绩溪、铜陵、休宁、太平等地有一些记录材料。因此，对这个地区方言的全貌也是不清楚的，极需作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

(3)湘南地区的汉语方言。湘南地区通常指湖南省南部和西南部的郴州、郴县、宜章、桂阳、临武、嘉禾、新田、蓝山、宁远、江华、江永、道县、双牌、永州、零陵、东安等 16 个市县。这个地区过去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当地人对内说"土话"，对外说西南官话。

关于湘南土话，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它在汉语方言中的归属。过去调查研究得很不够，记录材料极少，近年有明显进步。其中黄雪贞《江永方言研究》和李永明的《临武方言——土话与官话的比较研究》，是湘南土话研究的最详尽的报告。从这两份报告中，我

们可以知道，湘南土话的字音不仅与北京话有较大的距离，与其他常见的方言，如湘语、客家话、粤语、闽语、吴语等的差别也很大，外地人要听懂土话相当困难。例如江永土话“出去 ɕya˥ hu˧，二月 na˧ ȵy˧，关门 kuom˥ mai˨，简单 kuow˦ luou˥，写信 sie˦ sai˧，声音 ɕioŋ˥ ie˨”。再说，土话内部差别也很大，互相之间要达到通畅交际也不容易，例如临武县只有 27 万多的人口，但境内的土话，从大类分也有五种之多：临武(城关)话，楚江话，麦市话，汾市话，金江话，至于小的分歧，那就更多了。临武土话和江永土话之间的差别就更大了，例如江永土话是七个单字调(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入声)，临武土话只有五个单字调(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两处土话都管鼻叫“鼻头”，江永说[pa˧ tou˨]，临武说[pi˩ tai˦]；“太阳”江永说“热头”[ni˧ tou˨]临武说“日头”[ie˧ tai˦]。可见，两地土话从语音到词汇，差别很大。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对湘南土话都应该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这不仅对汉语方言研究本身有重要意义，而且对语言学或其他人文学科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对江永土话的研究，是揭开近年在湘南发现的《女书》之秘的必要手段之一。

(4)粤北地区的汉语方言。粤北地区的汉语方言也十分复杂，其中土著居民所说的一种方言，当地人称为“老韶关话”或“曲江话”，学术名称上我们暂时统称为“韶州土话”。它在汉语方言里的归属也待研究。韶州土话主要分布在广东省北部连县、连南、乐昌、乳源、曲江、韶关、南雄等七个市县，人口约 80 多万人。

由于客家人不断迁入，韶州土话的地区日渐缩小，在上述七个市县内成为互不相连的若干小块。因此韶州土话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名称，例如有“虱乸话、长江话、附城话、虱嫲话、长来话、北乡话、黄圃话、老坪石话、乌迳话、珠玑话、水口话、百顺话、星子话、蛮话”等十多种叫名。内部差别也很大。但各地的韶州土话有显著的共同特点，例如古入声字今韵母通常读开尾，少数地区带一个喉塞音[-ʔ]。此外，一些字的韵母读法在其他汉语方言中也不常

见，如：

	爬	头	长~短	共	灵	直
连县连州	pau˥	tiəu˥	tɕʻiɛi˥	kʻiɛ˧	la˥	tɕʻia˨˩
乐昌皈塘	po˥	tɛ˥	tɕʻieu˥	kʻɛu˩	lai˥	tsʻei˧
韶关静村	pʻa˨˩	tʻɔ˨˩	tɕʻin˨˩	kʻaŋ˩	lan˨˩	tsʻɛiʔ˧

关于韶州土话的调查，可以说还处于起步阶段。可供参考的资料非常少。近年广东韶关大学中文系成立了方言研究室，主要从事粤北一带方言，特别是韶州土话的调查研究，这是十分令人鼓舞的。这里还要特别指出，韶州土话区在地理上跟上文所说的湘南土话区相连，这两种土话之间有无关系，是什么关系，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总这，我们希望在“九五”期间，把方言调查研究工作的重点，放在过去了解比较少，资料相对缺乏的地区上面。除了上述海南岛、皖南、湘南、粤北等地区的方言外，赣南、浙南、湘西、桂东，以及西北的某些地区，也应该分别列入今后方言调查研究工作的重点。我们设想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或有关省区汉语方言研究中心牵头，与这些地区的方言工作者紧密合作，进行调查研究工作，整理出版一批比较详细的调查报告。

3.拓展汉语方言研究领域

把汉语方言的研究和汉语音韵学，汉语史等学科的研究贯通起来的工作，过去已经做了许多，下面举方言字词和语源的考订为例加以说明。

早在40年代，丁声树有《“碚”字音读答问》一文。四川有个地名叫“北碚”，这个“碚”当地人皆读去声，音如加倍的“倍”，外乡人常读阳平，音如栽培的“培”，由于字书未收无法查考，加之旧籍中也未见“北碚”这个地名，所以要考订“碚”音之正误，自非易事。丁先生首先重视当地人口耳相传的口语读音，再证以宋人欧阳修、苏东坡、黄庭坚、陆游等人诗文中的“虾蟆碚”的“碚”字，也作“背”，

"倍"，证实"碚"应是去声"倍"。文中说明，南宋人丁朝佐、项安世所作"碚"字音如"佩"的音注，由于"佩"古並母字，今音也应读如"倍"，北方话"佩"读如"配"是特殊音变。

丁声树于1962年在《中国语文》发表的《说"匼"字音》，则对山西南部匼河镇的"匼"字作了考订。按晋南方音，折合成北京话应是 kē，但《康熙字典》及以后的字书如老《辞源》、老《辞海》，《中华大字典》、《国语字典》等，凡是收"匼"字的，都只有"邬感切"的 ǎn 音一读。而辽代僧行均的《龙龛手鉴》的"匼"字音是"苦合反"，和今读 kē 音正相合。丁先生还证以北宋董衝（衡）的《新唐书注音》卷11卷109"匼"字是"苦合切"的注音；以及六朝和唐代的诗文中"匼匝"的"匼"是"口荅切"的音注。"苦合切"音同"口荅切"。还证以"匼匝"的异文"唅匝、铪匝、磕匝"，以及宋代匼河镇写作"峆河"，《广韵》入声合韵"峆"是"唅"的重文，音渴合切。批评了《韵会举要》、《洪武正韵》、《康熙字典》等书审音既不根据当地口语实际读音，又缺乏辨别文献资料正误的能力。

李荣1965年发表的《语音演变规律的例外》、《方言语音对应关系的例外》（均已收入《音韵存稿》），对"赴水游泳"的"赴"、"腌菜"的"腌"、"酒盅"的"盅"、"值钱"的"值"，以及"箍、块、稻、松、堤、擘、蟹、㛹、敨、怵、渠"等字的方言读音，都作了深入细致的考订。例如北京、河北的深县、献县，辽宁的凤城，山东的滕县，江苏的赣榆等地都把游泳叫作"fù 水"，有的人就认为这个"fù 水"就是"浮水"，是阳平调的"浮"不合规律地读成了去声的 fù 了，李先生根据《水浒》，《红楼梦》写作"赴"或"洑"的字形，又据《庄子·秋水篇》"赴水则接腋持颐，蹶泥则没足灭跗"的用例，及成玄英就用游泳解释赴水的疏文，肯定北京等地的"fù 水"即源自《庄子》的"赴水"。李荣1982年发表的《论"入"字的音》（已收入《语文论衡》），指出"入"字有两个读音，一是 rì，是个专用的禁忌字（也写作"日"），语音演变符合常例；二是 rù，是个通用字，大概是回避 rì 这个音而分化出来的。这个专用的粗字眼"入"rì，不只用于宋元以后的诗歌、戏

曲、小说等的早期白话中，也用于当代的方言和文学作品中，如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就是“狗日的”和“狗入的”并用；北方话、西南官话，还有吴语如松江、奉贤、杭州、湖州等地都用“入”作禁忌用字，声音和“日”相同。

上述丁声树、李荣在方言字词及语源考订方面的贡献，开拓了汉语方言研究的新领域。后来的许多中青年学者也在这个方面做了许多尝试，例如张惠英 1982 年发表的《释“什么”》，以及 1990 年发表的《广州方言词考释》、1993 年发表的《“兀底、兀那”考》、1994 年发表的《闽南方言常用指示词考释》、1995 年发表的《复数人称代词尾“家、们、俚”》等文，对汉语方言中的疑问代词、人称代词、指示代词的语源，进行了较全面的探讨。她从语音构造和演变规律出发，利用方言资料，对现代方言及早期白话中的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的代词部分，提出自己的看法。在《释“什么”》一文中，她提出北京话疑问词“什么 shén ·me”源自指称各种东西的“什物”，“什(十)”读阳平调 shén，再加轻读的“物” ·me。在《广州方言词考释》一文中，通过粤语和吴语的比较，提出广州话的远指词“嗰”[kɔ˧]，和吴语、赣语等方言一样，都来自量词“个”，用声调的变异来区别指示词和量词。而通过粤语和客家话的比较，指出广州话的疑问词“乜野”[mɐt˥ iɛ˩]就是客家话的“脉介、乜个”，都源自“物个”。在《“兀底、兀那”考》一文中，提出山西方言中的指示词“兀”，及近代汉语早期白话所用指示词“兀底、兀那”的“兀”，都是“个”失落 k- 声母而致。在《闽南方言常用指示词考释》一文中，提出闽南方言近指词“即[tsit˩]、则[tsiaʔ˩]、遮[tsia˧]”，来源于“一”和“只”，远指“迄[hit˩]、赫[hiaʔ˩]、遐[hia˧]”来源于“或”和“许”。这样，“一、只”和吴、粤、客、赣的指示词“个”正相类，“一、只、个”是一组同义词，“或、许”也是一组同义词，整个南方方言的指示词的系统和概貌也就清楚地显现出来了。同时，这对汉语史代词部分的讨论也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及值得参考的意见。

4.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

“七五”、“八五”期间已经很注意这方面的研究了，“九五”期间应该继续给予重视。在这方面，有些项目正在进行中。例如，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正在从事广东省高等教育重点研究课题《岭南方言——高雷方言研究》，暨南大学与汕头大学合作正在组织大规模的《粤东方言调查研究》，都是属于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山西省、山东省继续各县市方言志的编纂工作，也是一种比较研究的工作.如果全国有一半以上的省区或方言区做好这项工作，那么汉语方言的研究，乃至整个汉语的研究水平，将会有极大的提高。

5.建立汉语方言电脑资料库

以已经积累起来的大量材料为基础，初步建立以方言区为主的汉语方言电脑资料库(包括语音库和词汇语法资料库)。本项目必须从“九五”开始，大约用五至十年或再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完成。同时积极创造条件，准备建立全国性的方言电脑资料库，并且积极采取措施，逐步提高方言研究手段现代化的科学水平。这是属于中远期的学科规划。在这方面现在已有一些基础，例如利用电脑处理方言调查资料的手段已经可以实用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内已初步建成“汉语方音数据库处理系统”。

6.编写最新的汉语方言学教材

争取尽早编写一部能够全面反映汉语方言最新研究成果的著作，提供给高等院校有关科系，作为教材。

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现状与发展

黄 行

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一般情况

1. 研究的性质和对象

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是我国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从语言学研究的基本着眼点看，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系属的多元性、类型的多样性和丰富的社会人文内涵堪称中国和世界语言研究的宝库。据最新研究成果，我国境内现行语言的数量有120种左右，其中使用主体在中国的汉藏语系的壮侗语族、苗瑶语族、藏缅语族有近80种语言；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族、蒙古语族、满—通古斯语族共约20种语言；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有5种语言；南岛语系的高山族语言有10多种，另外还有2种印欧语系的语言。学术界经过40多年的研究，已经形成了关于我国境内各种少数民族语言的分布情况、结构特点和谱系关系的基本认识。但是与国内汉语研究和国外语言学研究成就相比，总体研究水平还存在明显差距，少数民族语言自身许多深层次的结构特征和规则、发生发展机制和演变规律都还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

语言是构成民族的一个基本特征，在我国语言和民族具有特定的含义和关系，因此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也是我国民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绝大多数少数民族有本民族语言，有些还使用相应的民族文字。这些民族语言和文字历来是少数民族主要的社会交际工具和认知工具，大量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典籍对记录和传承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建国初期开展

的全国性的少数民族语言普查结果为我国民族识别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党和政府制定的民族语文政策充分地体现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平等的社会地位，保障了它们使用和发展的自由。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汉语文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形成了大范围的民族语和汉语互相补充格局的双语社区。在这种新的语言环境下，少数民族语文和汉语文在不同的社会使用领域互有分工，相辅相成，但是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少数民族语言将继续发挥其汉语文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因此无论是从语言结构角度研究语言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还是从语言的社会功能角度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发展问题，我国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都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主要研究机构的历史沿革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对这一研究领域学科的性质和分类认识的变化。1952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组是这个学科最早的研究机构，当时是把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研究归在一个大的学科里的；1956年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标志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和汉语研究因性质和任务的不同而相对地分离开；1962年根据机构调整的需要，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和民族研究所合并，成为民族研究所设置的两个研究室之一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室，这种调整表明民族语言研究对我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重要性；1993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语言研究室和《民族语文》编辑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依托在民族研究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这次调整是出于民族语言研究对于其他民族问题研究学科具有特殊性和独立性的考虑，有利于学科科研工作的组织管理和学科自身的建设和发展。

2. 研究的历史和阶段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研究工作开始于本世

纪二三十年代，但是到 1949 年以前，研究的规模很有限，研究成果也比较片面。建国以后，党和国家为了贯彻执行民族政策，需要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历史和现状，帮助少数民族解决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问题。为此，50 年代从中央到地方，陆续建立了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等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机构，成立了包括少数民族语言专业系科的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作为一项科学事业从此建立和发展起来。

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组织了 700 余人参加的 7 个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分赴全国 16 个少数民族分布的省区进行少数民族语言普查，基本摘清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分布情况，为民族识别工作提供了客观依据；调查了各民族语言的使用状况和文字状况，在此基础上帮助 10 个少数民族制订了 14 种文字方案，帮助 3 个少数民族制订了 4 种文字改进方案。各种创制和改进的文字方案由少数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通过以后，经国家民委批准在有关的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或试验推行。

50 年代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工作带有明显的国情调查和贯彻党的民族语文政策的性质，与少数民族地区的语文规划工作有着密切的联系。任务带动了学科的发展，培养锻炼了一支实际工作能力很强的专业研究队伍，为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60 年代和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和民族语文工作逐渐恢复并有了新的发展，近十几年来的科研成就大大超过文革前的水平。80 年代以来研究的特点是注重学科的内涵发展，调整充实学科结构，拓宽学科研究领域。大致以五年计划为阶段，每一阶段都有比较明确的研究方向，并且完成了一批比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六五”期间，以继续深入调查研究各少数民族语言的结构面

貌为重点。在50年代语言普查和1978年以后语言补充调查的基础上，完成了国家重点课题《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包括59种少数民族语言），发表了100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的语言概况，编写了《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民族卷和《辞海》修订本中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词条。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完成了包括我国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中国语言地图集》。这些描写性研究成果，全面反映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结构、类型、谱系、方言、文字和社会人文方面的基本情况。

"七五"规划期间，为适应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状况和发展问题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需要，利用几年时间开展了全国范围的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各种社会领域使用状况的调查，完成了国家重点课题《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和文字问题调查研究》，还和加拿大拉瓦尔大学国际语言规划研究中心合作完成了《世界各国语言的构成（中国部分）》。这两部成果从语言的社会功能角度系统地描述和分析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社区、民族语言使用、兼用和转用的情况以及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不同社会领域的使用情况，反映了建国30多年来少数民族语文工作的成就，为进一步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民族语文政策和语文工作规划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在此期间，还组织有关专家开展少数民族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其中苗瑶语族、壮侗语族、孟—高棉语族在多年调查和准备的基础上，完成了语族内部语言、方言之间建立语音对应规律和构拟原始共同语的基础研究。藏缅语族和阿尔泰语系诸语族内部的专题比较研究以及少数民族古文字古文献的语言史研究也较以前更加深入。

"八五"规划期间，在调查研究我国少数民族语言规划方面投入了主要力量，其他研究领域继续向纵深发展，同时还开创了一些以跨学科和现代化手段为标志的新的分支学科。为了总结50年代开始的创制和改进的少数民族文字的试验推行工作，落实全国民族语文工作会议的工作部署，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国

家民委、地方民族语文工作机构联合开展了《我国新创和改进的少数民族文字试行工作经验总结和理论研究》这一国家重点课题的调查研究。解决我国无文字和文字不完备的少数民族的文字问题是一项艰巨的社会语言工程，30多年的试行工作的实践表明，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走的是一条符合我国社会实际的创制、改进和推行少数民族文字的道路，形成了一套联系实际和分类指导的理论和经验。少数民族语言的描写研究出版了若干种重要语言的系统描写专著，同时开展了一些语言方言层次的研究和一批新发现的空白语言的调查研究。由中华社科基金资助的重点课题《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和《少数民族空白语言调查研究》已经搜集整理了丰富的语言材料，研究成果将陆续问世。内蒙古大学承担的《蒙古语方言研究》课题，以苏木(乡)为单位，绘制了我国蒙古语的方言地图。运用跨学科和自然科学方法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一些新兴学科开始建立并取得了初步的成就。实验语音学侧重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特殊语音现象的声学分析，建立少数民族语言语音参数数据库和进行文—语合成系统的研究，完成了几项有较高水平的课题。计算语言学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开发了若干非拉丁字母形式的少数民族文字以及国际音标的处理系统，在一些语族开展静态信息语料库、真实文本语料库研究和民族语—汉语机器翻译系统的研制。古文字文献研究在东巴文、契丹文、八思巴字、回鹘式蒙古文、古藏文、古彝文、满文、西夏文的研究方面完成了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研究成果。为了少数民族语言教学、翻译、整理和研究文化遗产的需要，编纂出版了27个语种的160多部少数民族语言的词典和工具书。中央和地方的民族语文工作机构和翻译机构在几十年的工作实践中总结了一套具有中国民族语言特色的、有效处理和解决少数民族语言新词术语规范化和语言翻译工作的经验和理论，促进了少数民族语言的繁荣和发展。

1979年创办了全国性的学术刊物《民族语文》。这份刊物和地方的民族语文刊物一起，对活跃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起了重要作

用。

据不完全统计，1979年以来，出版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专著20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5000余篇。

3. 研究的机构和队伍

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机构比较集中地分布在中央和地方社会科学院系统的研究所，中央和自治区、省的民族大学、民族学院、民族师范院校的民族语文系和研究所，以及各自治区、有世居少数民族的省、自治州的大专院校及少数民族语文工作机构下设的研究所和研究室。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大学语文学院以全国少数民族语言为研究对象，综合研究实力强，研究成果多，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大影响。地方的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多以研究本地区少数民族语言为主要任务，在某些具体语种方面，地方的研究机构有一定的优势。

根据全国民族语言学会和几个主要的民间学术团体的成员人数，并参考80年代以来全国民族语文研究论著作者人数统计，目前国内从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在职专业人员大约有500多人，其中具有高级专业职称的人员占一半左右。他们大多受过严格的语言学训练，能够较熟练地掌握语言实地调查的理论和方法。通过他们的研究成果展示出来的语言材料的全面性和准确性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从研究队伍的年龄结构看，目前在职的研究人员一部分是建国后培养的大学毕业生和50年代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培养的少数民族专业干部，他们现在仍是学科研究的主体力量；另一部分是80年代以来毕业的一些大学本科生和硕士、博士研究生，这些新生力量知识结构较新，不但较好地继承了前代人的传统和学风，同时在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上又有所创新，经过十多年来的实践锻炼，正在走向成熟，逐渐成为科研的中坚力量。目前研究队伍的年龄断层问题比较突出，一批50年代培养的专家和学科带头人已

到退休年龄，各级民族院校的生源也不够充足和稳定，因此有些研究领域由于后继无人开始出现空白。

民族语言研究队伍的另一个特点是，少数民族专家占的比例较大，他们不但精通少数民族语言，还熟练掌握现代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在本学科研究领域里建树颇丰。

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成就与问题

1. 理论与方法

40 多年来，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经过两三代人的努力，初步了形成了具有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特色的理论、观点和方法。

我国学者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理论方法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二三十年代学科初创时期由李方桂、罗常培等学者引进的美国描写语言学理论。受这种理论的影响，研究工作比较重视实地语言材料的调查，尤其是对大量没有文字语言口语的共时调查描写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不仅比较系统地描述了这些新发现语言的语音语法词汇的基本面貌，还对它们的系属分类提出了初步的看法。第二是建国以后国内汉语研究的影响。由于汉语诸领域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超过任何一种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因此对民族语言研究产生了深刻的指导作用。从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对比研究和对比教学的需要看，用统一的框架和范畴来描写分析汉语和各少数民族语言有不少便利之处。目前已出版的各种少数民族语言简志、语言概况和语言教材与汉语的描写框架有明显的一致性。但是过多地照搬汉语研究框架也有其不利的一面。少数民族语言发生学来源要比汉语复杂得多，结构类型特征也比汉语丰富得多，用汉语结构框架来描写少数民族语言，必然不能充分反映少数民族语言特有的许多结构特点和规律。近年来有些学者提出要加强各民族语言的本色研究，即是出于对这种生搬硬套方式消极影响的反思。第三，50 年代苏联语言学理论对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

也产生过重要影响。苏联是多民族多语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语言学有良好的研究基础，与欧洲语言学流派的渊源关系更为密切一些，苏联学者介绍和推荐的理论和经验对我国民族语言研究曾经起过不少积极的作用。比如在音位学、历史比较法、语言底层理论、语言识别方法、建立基础方言和标准音点、创制和改革少数民族文字、政府民族语文工作规划和政策的制订等方面，我国早期的研究实践都带有明显的苏联模式的痕迹。

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基础任务是调查研究各民族语言的结构特点、发生发展规律以及和语言文字使用有关的各种社会问题，比较强调理论方法对处理具体语言现象的实用性，因此长期以来给人以一种重语言材料轻语言理论的印象。尽管近年来也出现了少数尝试用转换生成语法、生成音系学、格语法、语言普遍现象、词汇扩散等理论分析研究具体民族语言的论文，但都影响不大，占主流地位的仍是基于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这种比较陈旧单一的研究方法已经落后于当前国际国内语言学发展的总体水平，不能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描写和解释各民族语言自身复杂的结构特点和发展规律，因此理论方法的突破和更新是关系本学科今后发展的一个关健性问题。

2. 语言识别和方言划分

70 年代以前，我国已经调查和确认了大约 80 种少数民族语言。近年来随着空白语言的不断发现和及时调查，国内现存语言的总数已初步确认为 120 种左右。各民族语言内部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地区方言变体。我国少数民族语言识别和方言划分工作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从语言结构看，不同语言之间，尤其是有发生学联系的语言之间的结构特征往往表现为连续型的而非离散型的差异，并且差异程度有很大的不同，有些语言间的结构差异不一定比有些语言方言间的差异大。从语言身份看，许多语言使用群体历史上并未形成明确的语言意识，什么话是独立的语言，什么

话是某种语言的方言需要进一步规范。从语言共同体看，普遍存在语言群体和民族群体相互交叉的复杂情况，不能简单地把二者等同起来。由于有这样一些复杂的情况和背景，对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进行划分只能采取综合标准，既要考虑语言结构的异同，也要兼顾语言使用的社会历史因素和语言使用者的认同意识，对不同语言可以侧重不同的标准。尽管对个别语言和方言的划分问题目前仍存在分歧意见，总体上看已形成的语言识别和方言划分结果是合理的，符合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实际情况，得到了各语言使用民族的认可。

3．共时描写研究

我国少数民族语言资源非常丰富，有许多特殊的语言现象。我国学者在具体语言的研究过程中，使用和创造了一些描述和分析各种复杂的语音现象、构词构形现象、句法现象的范畴和方法，概括出不少我国民族语言特有的发生发展规律。

汉藏语系语言的基本特点一般是单音节词根，声韵调的音节结构，词法结构和句法结构关系比较一致，虚词和词序是表示语法意义的主要语法手段。80 年代以来汉藏语系的语音描写研究几乎涉及音系学和发声类型学的所有领域，并且以语音研究为突破口，带动了其他语言结构层面的研究。其中比较有特色的是藏缅语复辅音声母、韵尾，松紧元音，声调的发生发展机制的研究；壮侗语的前喉塞音声母，长短元音韵母，声调的分合规律的研究；苗瑶语的浊音清化、清音浊化，连续变调，鼻冠音声母的研究，并从音系学的角度分析了不同音类之间互相补偿和制约的关系。藏缅语保留了一定的形态变化，许多音类有表现形态变化的语素音位功能。音节之间的限制关系也有了新的发现，例如一些藏缅语和苗瑶语在没有特定语法语义限制关系的双音节词中存在着元音、辅音或声调的语音和谐现象。汉藏语系语言普遍表现出因音类的分化向合并演变而引起音系结构由繁复到简化的发展趋势。语法研究相

对语音研究要薄弱一些，这可能和汉藏语系内部的语法结构有较强的一致性，因此经常套用汉语的语法体系有关。不过在词法方面，少数民族语言的构词构形要比汉语丰富得多，在各种词法范畴及表现形态和一些语族特有的词类和构形语素的研究方面，还是取得了有较高学术水平的成就。

阿尔泰语系各语族语言都或多或少有一些古代文献，并且都有一定的早期研究成果，因此对现代口语结构的研究显得不像汉藏语言那样重要。这个语系的词由多音节构成，词内音节之间存在元音和谐律是语音上的特点。目前对元音和谐律的性质、功能、对应的严整程度及对立中和现象已做了较全面的分析和描述，对语音的长短和弱化等超音段特征也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阿尔泰语系语法问题研究成果相当丰富。这个语系语言的词类、词法和句法单位表层结构有明显的形态标志，因此传统语法研究方法比较适用。近年来有些学者开始注意到有些语言中分析形态的出现和词法成分向句法成分转移这样一些新起的现象，通过这类现象来研究所谓粘着型语言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4．历史比较研究

历史比较语言学是在印欧语言的研究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这种方法对研究词形变化发达并有丰富历史文献的语言是比较有效的。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具备这两种条件的并不多，因此不能照搬印欧语的比较研究方法。壮侗、苗瑶语族语言均无古代语言的文献记录，并且都是非常典型的词根型语言，对它们的比较研究基本是依据大量现存语言和方言的口语材料。同时因为壮侗苗瑶语言的发生机制和结构类型与汉语非常近似，因此比较研究很大程度是移植汉语历史比较和构拟的方法。李方桂的《台语比较手册》构拟了原始台语的语音系统，其他学者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壮侗语族的语言和方言做了广泛的比较研究，初步完成了建立语音对应规律、构拟原始壮侗共同语的音系以及进行语族内谱系分类的研

究工作。有的学者还根据某些音类产生分化的过程，并参考古代百越人的历史迁徙踪迹，提出了该语族语言年代学的意见。苗瑶语族的比较研究先后经过张琨、王辅世、毛宗武等学者的多年研究，也大致完成了原始苗瑶语音系的构拟研究，并根据语音对应规律找到了语族内的一批同源词。壮侗苗瑶语族语言方言之间词的意义和语音形式对应关系都比较严整，因此语族内的构拟结果基本是可以信服的。通过严格的比较方法构拟的原始音系和同源词系统相当于古代语言的韵书，可以用来描述和解释现代语言方言的结构特征和历史演变规律，并且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汉语历史语音学的研究结果提供有参考价值的旁证。原始语言音类和音值的构拟一般是以现代方言口语音类最大分化音值为依据，即凡现代方言中对立的音位都假设是原始语言的音位；如果方言之间的音类为一对多的对应，构拟原始音类即从多不从少。这样构拟出的原始语言音类的数目必然大大多于现有方言的音类数目。人类语言音系的音位信息负担量应该有一定的范围，如果把现有方言的音位差异看作是多次分化，而不是从原始语言一次分化的（甚至可能是从其他语言融合的），这样构拟出的原始语言音系可能比较符合语言的普通性原则。藏缅语族比较研究可资参考的古代文献也很少，并且诸现行语言和方言的个体发生学规律独立性较强，因此全面构拟原始藏缅语的音系和同源词系统尚无总结性成果。但各种藏缅语言不同程度地保留了一定的形态变化，因此以范畴为单位对各种词法及其相应的词法手段进行跨语言比较研究是认识藏缅语发生学关系的一个重要角度。出于这样的考虑，近年来有的学者提出了针对某些藏缅语典型语法范畴或词类的专题构拟方法，以期对藏缅语的比较研究有所突破。不过由于藏缅语言数量甚多，分化太深，全面构拟原始共同语的任务还很艰巨。

阿泰语系历史比较研究始终没有像汉藏语系那样成为一个热点研究领域。各语族内部语言之间的结构亲疏程度相当密切，分化演变规律比较清楚，国内外突厥学、蒙古学等学术界对此都有所

论述。这个语系各个语族之间结构类型非常接近，有一大批语音和词义对应的关系词，它们是由于同源还是相互接触造成对应的关系目前尚无结论，这个问题至少用现有的历史比较法是不能全面解决的。和汉藏语系相比阿尔泰语系诸语族的语言史材料和古代文献较多，比较研究起点也较高，因此要拿出有说服力的研究结论，工作的复杂性是相当大的。

原始共同语的构拟是以建立语音对应规律为基础的。但是由于语言历史发展过程中种种复杂因素的影响，许多语言之间的语音对应规律不很完整，或者存在大量与规律不合的例外现象。为此，有些学者尝试通过内部构拟法和词汇扩散理论来处理这类现象，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少数民族语言比较研究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确定具有音义对应关系的词是同源还是借用的问题。各少数民族语言历史上都有过较多的外部接触，接触对语言结构的侵蚀是很自然的，甚至可以形成音类对应规律以及共同的区域性类型特征。如果把所有的对应规律都看作内部发生规律而不考虑外部接触的影响至少是不全面的。近来有的中青年学者开始考虑一些新的研究视角。语言的本质决定了借用发生在非基本词汇中的可能性要大于在基本词汇中，因此有人提出根据对应词在核心词与非核心词里的分布频率来区分同源词和借用词，即核心词汇对应词比例高的语言可能是同源的，而非核心词汇对应词比例高的语言可能是借用的。但是如何建立各种语言都普遍适用的区分核心词与非核心词的标准，根据严格的语音对应规律进行大范围的跨语言比较的推导工作尚未全面开展，因此这种思路和方法的有效性还需要进一步检验。总之，语言接触和借用对语言演变的强烈作用日益受到研究语言关系的学者的重视，如果能在已发现的语言对应规律的基础上切实区分同源机制和借用机制，将进一步深入认识语言的演变规律和相互关系，从方法论上促进传统历史比较法的改进和发展。

少数民族语言的系属分类是与语言历史比较研究相关的问题。由于观点和方法的不同，学术界对汉藏语系的语族和语支的分类存在较大分歧。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汉藏语系应该包括汉、藏缅、壮侗、苗瑶四个语族。这种分类的依据是四个语族之间可以找到一批音义对应的同源词，大多数语言的语音结构、词类、构词法、语法范畴和语法手段相当一致，语言发展过程也很相似。国外占优势的观点认为，只有汉语和藏缅语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苗瑶语族和南岛语系语言同源，同属于澳泰语系。其理论依据是壮侗苗瑶语言与汉语相对应的平行词实际是互相借用的结果，它们语言结构上的一致性是类型学现象，不能作为谱系分类的证据，但是能被证明与南岛语同源的词也不多。这两种观点针锋相对，分类结果相去甚远：如果认为壮侗苗瑶语族属于汉藏语系，它们就与汉语有十分密切的亲缘关系；如它们与汉语之间只是接触和借贷关系，那么就几乎没有亲缘关系。也有的学者认为，壮侗苗瑶语言和汉语的“同源词”比例大大高于和南岛语之间的比例，那么与其说它们是借贷关系，不如说是融合关系，即讲这些语言的古代群体开始使用的是南岛语，后因长期接触而放弃了原来的母语并转用了某一古代汉藏语方言，所以它们可以与汉语共有大量的同源词，同时又保留了少量南岛语底层的词汇。这一争论的症结，仍在于对有对应关系的词是同源还是借用的不同认识。上面提到的用对应词在核心词汇和非核心词汇中比例的高低来区分二者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其结论倾向于支持借用说。汉藏语系三个语族内语支的分类意见也在不断变化，总的来说是由粗到细，由浅入深，标志着对语言关系认识和分类的日趋精细和深入。我国几种孟－高棉语言，过去一般都划归南亚语系，近来有学者提出它们和壮侗语言有密切的关系。阿尔泰语系及其三个语族的分布至今仍是一种假说，它们是同源关系还是接触关系都还缺乏有力的证据。朝鲜语和京语一般认为是语系未定语言。从语言底层看，朝鲜语可以划在阿尔泰语系，京语可以划在南亚语系，因为它们都曾受到过强烈

的外部接触和影响而产生了许多异质的成分。语言系属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使研究者不同程度地认识到，从原始共同语到现代语言的分化固然是语言演变的基本机制，语言之间的接触和融合也是造成语言变异的重要因素。从语言历时接触和变异的角度研究语言关系（包括语言谱系关系）是全面认识和解决语言系属问题的一个有待突破的研究领域。

5．社会语言学研究

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社会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是 80 年代以后提出的。不过从 50 年代起，我国政府机构和科研机构就十分重视民族语文使用和发展以及制定和贯彻民族语文工作规划方面的调查研究。这些研究工作具有明显的政策性和为现实服务的目的性，属于宏观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并且在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社会语言学研究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的主要内容有：(1)1956 年由中央民委和中国科学院组织领导的全国性的少数民族语言普查工作，把调查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分布和使用情况作为一项主要任务，调查结果填补了基本国情这一领域的空白，为当时进行的民族识别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2) 50 年代为解决少数民族的文字问题，提出为没有文字和原有文字不完备的民族创制、改革、选择文字的任务，先后为 10 个少数民族创制了 14 种文字方案，帮助 3 个少数民族改进了 4 种文字方案。由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拟定和提出的《少数民族文字方案中设计字母的几项原则》中关于创制改革少数民族文字以拉丁字母为基础，民族文字方案尽可能与汉语拼音方案取得一致，为少数民族语言特有语音单位设计字母的办法的指导思想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在为文字创制选择基础方言和标准音点与根据需要为一个民族设计几种方言文字甚至不同的语言文字的处理上，学术界能从我国少数民族社会语言状况的实际出发，较合理地解决了不同情况不同类型民族的文字创制问题。(3) 在确定基础方

言和标准音点、推广标准语、建立和健全书面文字语言、制定和推行语音、词汇、语法规范和书面语的书写规范等语文规范化问题方面做了大量建设性的工作。这些与民族语文使用发展和语言工作规划有关的研究明显地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语文工作的开展，社会效益是显著的。当然，由于缺乏实践经验和受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也存在一定的简单化和脱离实际的倾向。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进入了新的繁荣时期，语言使用和语言规划问题重新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随着社会语言学在国内的兴起，加上对建国30多年来民族语言工作实践的认真总结，这一领域研究的学术性和规范性明显加强。在研究和制定语言规划的指导思想上，澄清和纠正了过去的一些左的看法和做法，确立了民族语文工作实事求是、分类指导的基本原则。学术界在讨论中逐渐形成了这样一些共同的认识：(1) 社会主义时期是民族语文繁荣发展的历史时期，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不可能很快出现民族融合和语言融合，因此要继续贯彻执行党的民族语文政策，促进少数民族语文的使用和发展。(2) 民族语文政策是我国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平等是民族平等的具体体现，民族和民族语言存在的长期性决定了坚持语言平等政策的必要性。(3) 正确认识民族语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地位和作用，既要在法律上保障各民族语言文字享有平等的地位和使用发展的自由，又要实事求是地认识和指导民族语文切实发挥其可以发挥的积极作用，处理好民族语文和汉语文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的关系问题。(4) 对我国民族语文使用和发展问题的调查研究，不仅可以指导民族语文工作的实践，也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语言学的重要基础，因此要重视和加强科学研究理论和方法论的建设。(5) 有必要及时地对我国少数民族语文使用和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做认真的对策研究，为制定和贯彻新时期党和政府的民族语文政策和规划提供科

学依据。

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学科研究发展战略的需要和进一步实施政府民族语文工作规划的需要，从宏观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开展针对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和语言规划的系统研究被提到重要议程。当时比较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需要全面调查和了解当前我国各民族语言文字的构成和使用状况，二是需要对50年代开始的新创和改进的少数民族文字试验推行工作进行总结。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国家民委联合组织开展了国家“七五”和“八五”期间民族学科重点研究课题《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和文字问题调查研究》和《我国新创和改进的少数民族文字试验推行工作经验总结和理论研究》，还与加拿大国际语言规划研究中心共同完成《世界各语言的构成》、《世界的书面语》这一国际系列研究中国部分的语言构成和语言使用的合作研究。

《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和文字问题调查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1995）是由4个子课题构成的第一套全面研究和反映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状况的社会语言学著作。其中《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一书从语言的社会使用功能角度，分别以语言和地区为单位描述了我国各少数民族的语言社区、语言环境、语言的接触和影响、各民族语言文字在不同社会领域的使用状况，反映了党的民族语文政策的贯彻情况，综合介绍了《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各种地方性法规条例关于少数民族语文使用发展的规定和措施以及民族地区语文工作取得的成就，还通过一组内部研究报告对当前民族语文使用发展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做了对策性的分析研究。这套著作搜集了丰富的语言文字使用方面的实地调查资料，对我国少数民族社会语言学的学术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民族地区的民族语文工作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世界各国语言的构成（中国部分）》、《世界的书面语·中国卷》（加拿大拉瓦尔大学出版社，1995）也是一部大型的描述我国各民族语言文字使用状况的社会语言学著作。其特点在于把我国的语

言(包括汉语和60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的)的民族分布、使用地区、使用人口、语言的使用、兼用和转用情况、双语社区、语言规范程度、语言的法律地位,以及语言文字在行政、立法、司法、意识形态和宗教、教育、出版、广播、影视、制造业和服务业等社会使用领域的使用类别和程度纳入一个国际统一的语言使用活力参项数据库。课题组在有关民族地区做了总体或分层抽样调查,获取了各参项要求的数据,调查范围涉及国内少数民族分布的20个省区和30个地州,调查人员深入到113个县旗大量有代表性的乡镇和村寨,在与民族语文使用、管理、教学有关的机构单位和学校进行现场采访、搜集资料,涉及语言使用者的抽样人数约10万人。同时还从各类年鉴、人口普查资料、政府机构的统计报表、大量的报刊文献中摘取与语言文字使用有关的数据资料,经过统计核实,得到了我国各民族语言文字构成和使用状况的定性定量分析描述结果。本书用汉、英、法3种文字对照出版,有助于国际社会对我国各民族语言使用状况及国家语言规划制定和贯彻情况的了解。由于本系列丛书拟将世界各国语言的使用功能放在一个统一的观测系统中,因此本书所收集的各语言社会功能参项的数据为分析和预测我国及世界各国语言使用活力的发展趋势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我国新创和改进的少数民族文字试验推行工作经验总结和理论研究》是从语言规划的角度对50年代创制和改进的16种少数民族文字的试验推行工作进行全面的调查总结。这个课题的提出和开展,一方面是为了落实和完成1991年全国民族语文工作会议和国务院文件提出的一项当前国家民族语文工作的重要部署,促进这些新创和改进的民族文字继续在民族地区两个文明的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同时也计划在调查总结新创和改进的民族文字试验推行效果和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40多年来少数民族文字创制、改革和推行的社会实践进行理论的总结和研究。课题的具体实施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国家民委和有关地方的民

族语文工作机构联合组成调查总结工作组，使用统一的调查提纲，在文字试行地区通过访问座谈、文献搜集、实地调查、现场测试、社会问卷等综合方法，调查了解各文种实际的试行效果和本民族群众对文字的评价态度。调查的内容包括这些文字在学校教育、社会扫盲、书刊报纸的出版发行、广播影视、行政司法、宗教活动和日常生活等领域的使用，以及文字的跨境使用、新老文字的关系等问题。每个文种都根据调查结果撰写出调查总结报告。目前多数文种的调查总结工作已经完成，有些文字试行地区政府已根据课题组的调查结果和总结意见，按照规定程序向国务院提出正式推行这些文字的申请报告。

社会语言学的微观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一个方面是关于语言社会变异的社会方言学研究。许多民族语言学家在实地调查语言时都注意到，同一地区同一种语言说话人使用的发音、用词、句式等形式并不完全一致，普遍存在因说话人年龄、性别、职业、教育程度、地区环境等社会属性不同而表现出的自由的或者规则的语言变异现象。在比较严谨的描写研究著作和论文中，作者往往要对这种例外的语言形式和用法提上几句，同时把这种“不规范”的变异特点排斥在常规的语言结构系统之外。在调查记录语言过程中，也是尽可能找“理想的”发音合作人搜集语料。近年来随着西方社会语言学的传入，语言的社会变异开始受到重视，出现了一些对此现象专题研究的论文。由于语言社会变异是共时的可以观察到的有规则的语言变化现象，可能对语言历史演变做出部分的解释，加上少数民族语言中所谓老派和新派语言形式的变异越来越突出和普遍，因此可以预计这方面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会越来越受到研究语言共时结构和语言变化学者的重视。另一方面是关于语言和文化关系的研究，有人曾提出建立文化语言学的设想。语言作为重要的文化代码无疑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这一领域的研究内容大致相当于西方人类语言学研究的范围。近年来这方面研究的论文数量相当多，涉及面也较宽，但是多停留在举例

和表面描述阶段，理论框架基本没有超过罗常培50年代初《语言与文化》一书的范式。通过语言分析，特别是用语义构成成分来分析某一特定文化制度(例如亲属制度)的研究有一些上乘之作。其实语言学从它产生之时就带有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是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后因结构主义过分强调语言形式的分析而逐渐忽略了语言内容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民族语言和文化关系的研究成为新的热点问题，可以说是语言学的返朴归真。从跨学科研究的发展趋势看，语言和民族文化关系的深入研究将会促进民族语言研究和民族学研究的日趋结合。

6．应用语言学研究

这里的应用语言学特指由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构成的双语教学问题研究和利用计算机及声学设备、以语言应用为目的的语言信息处理研究。

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教育兼有普通教育和特殊教育的性质，教学用语言是影响民族教育质量和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文革以前，有通用传统文字的民族主要用本民族语言教学，汉语文是作为一门语文课教学的。南方的少数民族多没有传统民族文字，因此一般都使用汉语文教材。80年代以后，我国社会语言状况出现了新的变化，教学用语的复杂性和重要性也日益受到重视。在这种形势下，学术界和教育界开始注意并加强民族语—汉语双语教学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实践。双语教学研究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实验性。教育界根据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特点，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双语教学模式，在教学实践中，逐渐完善教学法、教学体制和编写教材。对具体双语教学模式的总结和划分，有人根据双语教学地区、民族、语言环境的不同，分为延边式、内蒙式、西藏式、新疆式、西南式等几种类型；有人根据双语教学功能的不同，分为保存型、过渡型和权宜型等几种类型。通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民族教育界提出，双语教学既是一种教学目的，即培养民族语文和汉语文兼通的

现代化人才，少数民族学生不仅要学好本民族语文，同时也要学好汉语文，这是少数民族自身发展的愿望和需要；双语教学也是一种教学手段，尤其是在广大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在以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由于本民族语文是最好的启蒙教育工具，因此在低年级先用本民族语文教学对于开发学生智力、促进汉语文的学习有十分明显的教学效果。民族地区的双语教学是一种新生事物，目前师资队伍的培养、教材的编写、教学法的研制，以及双语教学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还有待进一步的规范和健全。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计算语言学研究起步较晚，目前仍处于初创阶段。研究领域及成果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计算机处理平台。我国蒙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彝文、傣文等较通用的传统民族文字大都不同程度地研制了字符处理系统，制定和颁布了国家技术标准。另外还开发了微机国际音标系统和少数民族非拉丁字母形式文字的多文种混合处理系统。

(2) 语料库研究。这项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计算机为工具进行语言结构的定性定量研究。由于计算机具有运行速度快、运算量大的特点，十分便于语言单位的分析处理，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传统的用手工排卡片的操作方式，部分地实现了归纳音位系统、建立语音对应规律、统计语言方言之间的相关关系及进行树形聚类分析等基础研究的自动化。目前已经完成的课题有我国藏缅语族和苗瑶语族数十个语言方言点语料的计量描写和比较研究。另一方面是对语言文字各种属性和规则的定量研究和算法

少数民族语言实验语音学研究建立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已显露出一定的起色。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1) 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特色语音声学分析，发表了一系列辅音、元音、声调声学分析、语音感知和噪音分析方面的论文和实验报告。

(2) 建立少数民族语言语音数据库，撰写录制了 30 多种民族语言的语音音档。

(3) 建立少数民族语言语音大型声学参数数据库。已开展的语言有藏语拉萨话、蒙古语、哈萨克语。

(4) 民族语言文—语合成系统。《藏语拉萨话文—语合成系统》是用比较尖端的共振峰参数合成方式建立的，获得了比较自然和实用的合成效果。

(5) 少数民族语言多媒体系统的开发。根据民族语言的语音特点，设计了和语音工作站及数字录音设备相连接的，能用于语音声学分析、建立语音参数数据库、进行语音合成和开发少数民族语言学习系统的工作平台。

在当前的信息化时代，计算机技术和信息处理人工智能化迅速发展，自然语言的交际功能和交际方式可能发生深刻的变革，国际和国内的语言环境也可能会有较大的变化。在这种形势下，我国少数民族语文和汉语文一样，存在着语言文字使用和处理现代化的问题，现在如果不及时重视和处理好这个问题，就会出现和加剧现代社会中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发展的新的不平衡问题。

7. 翻译工作和新词术语规范化

我国各少数民族语言的翻译工作具有悠久的历史，特别是有传统文字的民族语言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语言翻译体系，有一支优秀的专业翻译工作队伍，翻译出版了大量行政、科技、文化、教育、文学、历史文献方面的作品。

少数民族语言翻译的机构和组织主要有：中国民族语文翻译

中心、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民族语文翻译委员会以及新疆、内蒙、广西、云南等省区的民族语文翻译工作者协会。《民族译坛》和《语言与翻译》是刊载翻译理论与实践的主要刊物。

研究民族语言翻译工作的著作和论文的内容主要有翻译学基础知识、翻译史、翻译原则和技巧、新词术语处理、具体语言词语和句式的对译问题等方面。翻译的对象语言主要是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对译的方向通常是行政、法律、科技、教育方面的文献以汉语为源语，民族语为目的语；文学、历史、文艺方面的作品以民族语为源语，汉语为目的语。通过民族语言的翻译实践，不仅总结了翻译工作的理论和经验，同时也从一个侧面促进了对比语言学研究的发展。

新词术语规范化是与少数民族语言使用和发展有密切关系的问题，是民族语言规范化的一项重要内容。这项工作有明显的政府行为色彩。蒙古语、藏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朝鲜语、壮语、彝语、傣语、傈僳语、拉祜语、佤语、景颇语等民族语言地区政府主管部门通过名词术语规范审定委员会召开工作会议，制定颁布有关语种的规范原则和规范工作规定，开展名词术语的规范工作，并先后出版了这些语言规范后的新词术语词汇集。规范的词条包括政治、经济、科技、文教、人名、地名、汉语借词、外来词等。在规范化工作的研究和实施中，各种民族语言地区都总结出许多成功的和行之有效的方法和原则，较好地解决了各种民族语言自身发展和相互协调的关系问题。

8. 古文字古文献整理研究

少数民族古文字古文献整理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了较大的发展，成立了中国民族古籍整理规划出版领导小组和地方的配套机构，综合性的学术研究团体有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目前涉及的文种有 30 多个。

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对古文字文

献资料的整理和释读，其中在契丹文、八思巴字、回鹘式蒙古文、满文文献以及云南多文种刻石的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十分有益的基础研究工作，影响较大。二是在民族文字文献的基础上进行的古代语言、历史、文化的多角度研究，其中契丹小字读音的构拟、西夏文的翻译以及藏族历史文化的研究成就比较突出，有些已居于国际领先地位。近年来的研究开始向综合研究和理论探讨的方向发展，对各民族文字的比较研究和对民族古籍整理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的探讨初露端倪。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研究已成为中国文字学和文献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但是从总体研究水平看，我国民族古文字古文献研究乃至全面的少数民族语言史研究仍是一个薄弱环节。从研究对象看，许多有重要价值的古代文字(例如诸多古代西域文字)及文献的研究基本是空白，从而影响了一些北方少数民族语言历史语言学研究的进展。从研究方法看，国外传统的语文学、文献学和考据学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在这一领域已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即便在今天仍然很有效。但是现在能全面掌握这些方法驾驭丰富的古代文献研究的人才寥寥无几，成果也很少见。在现代语言学理论一统天下的形势下，这些经过数百年积淀的传统理论和研究工作受到不应有的忽视和割断，对此个别有识之士力图在传统研究和现代理论的结合上有所作为。但是由于对从事这方面研究人员的素质要求很高，目前还没有条件形成一支理想的研究队伍。

三、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发展前景

1949 年以后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事业在 40 多年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初步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学科体系。学科建设始终是以少数民族语言的基础理论研究和为民族地区的现实服务为其基本任务的，这一传统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仍会继续坚持和发扬下去。目前学术界在总结 40 年民族语言研究的成就和经验的同

时，也清醒地认识到学科本身仍存在许多长期未能克服的弱点，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由于研究理论缺乏深度，研究方法比较陈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在当前改革开放和社会政治经济体制转轨的新形势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如何适应新的社会环境，更好地满足少数民族地区两个文明建设的实际需要，真正实现学科研究的社会价值也引起了学术界深刻的反思。在第九个五年计划即将制定的时候，如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个阶段研究成就的基础上，制定今后的学科研究发展规划已被提到重要的议程上来。根据一些科研机构所做的学科调研论证以及有关单位已经或者计划开展的一些重点课题，我们可以对本学科下一阶段的基本任务和发展趋势做出宏观的展望。

现代语言学理论研究的基本范畴和体系决定了通过语言发生机制研究语言的谱系分类问题，通过语言功能机制研究语言的类型和共性问题和通过语言接触机制研究语言的地域特征问题仍将是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理论框架的三个主要层面。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的交叉研究，语言研究和信息科学以及其他人文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普及现代化的研究手段应成为本学科今后发展的新的生长点。

少数民族语言实地调查和描写研究历来是本学科的优势研究领域，今后几年内基本上可以完成 30 种以上新发现民族语言的调查工作，从而使我国境内语言构成的描写研究趋于完善。从现已出版发表的各种民族语言简志、语言概况介绍和大量语言描写研究论文反映的研究水平看，除少数外，一般还停留在描述音位系统、列举构词构形语素、划分词类和句子成分等直观的表层结构描写阶段，各种语言包含的深层结构的隐性特征和规则都缺乏深入研究，句法结构蕴含的语义关系和语用关系几乎没有涉及。因此尽管已经接触并做过初步调查的语言已超过百种，但几乎都还谈不上系统深入的描写，理论和方法的保守使描写研究明显地落后于当前国际国内语言学发展的水平。因此今后语言描写研究需要

集中力量在若干种代表性强、影响大的典型语种上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可望得到有较大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另外,已经或即将开展的蒙、藏、维、朝等民族语言的大型语料库研究,是通过真实文本语料分析归纳语言的各种结构属性和规则,其研究结果势必会突破以往根据自拟调查提纲搜集语料得到的研究结果,研究方法也会向前推进一步。

我国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和南亚语系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被有的学者预测为下一时期学科研究的主战场。这种预测是有一定根据的。因为在现行诸语言共时平面的结构描写研究大致完成以后,需要对这些语言的发生机制和演变规律做进一步的解释性研究,近年来讨论语言谱系问题的论著明显增多的确反映了这方面的研究正在成为热点问题。不过人们也普遍认识到,中国诸语系语族语言的发生发展过程与印欧语言很不相同,它们在古代和现代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其他语言外部接触的深刻影响,未必经历过从原始共同语简单分化为现代诸亲属语言的过程,因此现行语言之间的关系不能从传统历史比较的方法和模式得到全面解释。据现代语言学研究,语言的发生学关系、语言共性关系、语言接触关系,甚至偶合关系都可能使语言之间产生相关或相似的结构特征。如何有效地区分和证明不同关系机制在语言演变过程中发生什么样的作用,从而综合性地说明现代语言的发生学关系并构拟原始共同语应成为现代语言比较研究的基本范式。从这种意义上说,今后民族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可以说是学科发展一个更高的起点,当然也是需要用新的理论方法支撑的一个难点。

语言类型学研究以及通过语言类型进一步探讨语言共性问题是当前国际语言学界十分注重的一个研究领域。即便是从事语言结构描写研究的学者,许多人也并不满足描述个别语言的特性,而试图从语言最基本的交际功能来探讨语言表层结构所蕴含的深层共性机制。这一领域在我国民族语言研究中一直是被忽视的,在谈到语言类型分类问题时,多仍以孤立语、粘着语、屈折语等传统

范畴简单界定。现代语言类型与共性研究提出的类型的蕴含共性、类型的标记性和类型的连续等级等现象在我国诸民族语言中普遍存在，并且类型分布十分复杂，是开展这项研究很好的资源。可以预见，着眼于语言共性的类型专题研究或一般性的语言描写和比较研究将加强这一角度的研究力度，其研究成果可以丰富中国语言学和真正意义上的普通语言学的内容。

我国独特的社会人文环境表明古代民族群体历来是在频繁的分化与融合过程发生和发展的，从而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的社会文化格局。现代社会各民族人民长期共同生活在统一的国家里，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更为密切。由于社会群体的频繁接触反映在语言中的融合和混合现象十分普遍，因此研究语言接触和变异现象应该是我国民族语言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其研究成果无论对语言关系还是民族关系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近几年来研究语言接触的论文所占比例越来越大，说明了研究视野的拓宽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从研究语言接触的目的看，一方面是因语言历史比较研究的局限性而需要在语言观和方法论上另辟蹊径，一方面是因深入的结构描写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语言之间的相互接触和影响问题，另外也是因为可以通过语言接触现象来透视民族心理文化的互动作用和跨民族的交际行为。随着这一领域研究的进展，必然导致对语言接触造成的地区性语言联盟现象的研究。但是，近期内完成这样的重大课题还需要做大量的理论方法和资料方面的准备工作。

少数民族语言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近十年来发展较快，其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视，已经成为本学科主要研究领域之一。少数民族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走的是一条中国化的路子，注重从我国少数民族社会语言的实际情况出发，以贯彻和执行党的民族语文政策，开展政府语文工作规划为基本任务，侧重与语言规划和语言使用有关的各种社会语言问题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1984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各自治

区、自治州、自治县颁布的有关民族地区的“民族自治条例”都载有关于使用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条款和规定，进一步制定“国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法”的工作已经开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我国的社会语言状况和环境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因此从语文政策和语文工作管理角度进行宏观的理论和决策研究仍是我国少数民族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重要任务。社会语言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还处于探索阶段，可以说尚未建立能普遍适合各国社会语言问题的规范的理论和模式。在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外社会语言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目前急需结合我国少数民族的社会实际和语言实际，建立和完善一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语言学的范畴体系。今后几年内需要开展的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课题包括：我国少数民族语文立法和法制问题研究、我国民族语言使用活力的分析与预测、我国民族接触和语言接触状况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社会变异现象研究、民族语言社区和语言状况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的关系等基础理论研究以及一系列与民族语文使用管理有关的现实问题的对策性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社会语言学以其综合性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优势将会继续和民族地区的语文工作以及民族学、社会学、文化学研究密切联系，逐步成为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学科体系。

利用自然科学手段研究少数民族语言可以促进语言使用和科研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为信息处理和人工智能的开发提供必需的语言工程产品，是语言学研究方法现代化的发展趋势，也是研制为社会服务的语言应用和教学系统的重要手段。

实验语音学是传统语音学和物理学、心理学、生理学和信息科学交叉与结合的产物，它的出现加强了对语音现象的分析处理能力，少数民族语言中复杂多样的语音类型特征也为这一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我国民族语言的实验语音学研究目前是处于语音声学和生理分析的基础研究阶段，这一阶段需要开展的主要课题有“少数民族语言发声类型研究”和“少数民族语言特色语

音声学研究"以及相应的语音图谱的测绘工作。进入实用阶段研究的主题是研制开发语音识别与合成系统。目前可以以蒙古语、藏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重点语种为对象，研制有实用功能的文一语合成系统，建立这些不同类型语言的语音声学模型。过去语音的调查研究是我国民族语言研究中最充分的一个部门，其研究成果为开展以实验和实证方法为特点的现代语音学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计算机在语言研究中的应用无论是作为语言学的辅助研究手段，还是作为一门独立的计算语言学科在民族语言研究领域都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了加强过去研究中比较薄弱的语言结构的计量研究，处理民族语言口语调查和书面文献中大量的资料数据，今后在语言描写、语言比较、语言对比以及社会语言学诸方面的研究课题中，会越来越普遍地依靠计算机数据库和程序作为主要的研究工具，提高传统语言分析研究工作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程度。民族语言若干语种的大规模真实文本语料库已经开始建立，目前正在进行语言结构单位属性标注和语言结构规则算法的处理研究。根据这种语料库生成的语言词典库和知识库将为今后进一步开展少数民族语言领域内的机器学习、知识获取、机器翻译、文献摘要、文本处理等自然语言理解工作提供基本的工具平台。这项研究工作的各个阶段都有赖于有关语言基础研究成果的支撑，而计算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也会反过来促进传统语言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更新。

目前我国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工作可以说是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学科建设在研究方向、管理体制和人才培养诸方面都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如果本学科能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制定的内涵式发展思路的基础上继续提高专业研究水平，做好各方面的继承和创新工作，密切国内民族语、汉语和外国语研究三支队伍的合作，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事业一定会有新的进步，为中国语言学和民族学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应用语言学研究的现状和展望(上)[①]

汉语文教学及语言规划、术语学、语言的社会应用

仲哲明

应用语言学是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门年轻而有远大发展前途的应用学科。语言应用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可是真正形成一门独立的应用语言学科还是本世纪40年代以后的事,其标志是1964年第一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在法国的召开和国际应用语言学会的成立。

在相当一段时期里我国语言学界虽然在语言应用研究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是应用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在语言学领域里也未取得应有的地位。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叶圣陶、王力、吕叔湘等老一辈专家明确提出要重视语言的应用,"要搞好应用语言学的研究",并且列举出应用语言学应当研究的主要内容。1980年吕叔湘先生在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用了近四分之一的篇幅,专门论述了应用学科和纯粹学科、边缘学科与中心学科的关系,强调语言应用研究的重要。吕先生指出:"语言不存在于真空,语言是供人们使用的。研究人们怎样使用语言,这就是语言的动态研究"。这方面的研究近几十

---

① 为本文提供部分章节初稿的有:张锐(口语和口语教学研究),吕必松、孙德坤(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冯志伟(术语学研究),于根元(语言在社会其他领域的应用研究)。提供有关资料的有:陈章太、陈云英、费锦昌、佟乐泉、庄文中。佟乐泉、季恒铨参加了部分章节的讨论。成稿时对上述初稿作了不同程度的增删和调整,不妥之处,由笔者负责。写作过程中还得到北京、上海、广州部分同仁的帮助。胡明杨、陈建民审读过部分初稿,并提出修改意见。在此一并深致谢忱。

年来“发展越来越盛，名目越来越多”。社会语言学、语言教学、数理语言学三个方面“都可以算做广义的应用语言学，区别于只作静态分析的纯粹语言学。”吕先生批评说：“有些语言学家看不起这些研究工作，说这不是语言学。这不好。应当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事实上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常常是互相促进的，应用科学也常常能给纯粹科学提出新问题，开辟新园地。”在老一辈专家的倡导和帮助下，我国应用语言学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无论在学科建设，还是在应用研究方面都取得了许多令人振奋的成绩，直接或间接地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作出了贡献。从1978年开始，我国把应用语言学列入高校的学科目录，陆续招收和培养硕士生和博士生。

由于应用语言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发展快，议论多，人们对学科的性质、对象、范围、方法等问题有许多不同的理解和看法。早先欧美一些国家认为应用语言学就是指语言教学。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科技、文教的发展，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现代通讯技术、微电子技术的普及，语言的交际、传递功能空前扩大，语言应用和语言应用研究的范围也空前广泛。语言学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许多学科相互交叉、渗透，相互结合，产生了许多边缘学科，人们对应用语言学科内涵和外延的认识也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我国学者提出，应用语言学是“研究语言在各个领域中实际应用的学科”，它的任务是研究探索语言应用的一般原则、方法和规律，建立并完善学科的理论体系，用以指导语言应用实践，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至于应用语言学的研究范围，看法多有不同。实际上，应用语言学的研究范围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概念。它总是随着语言应用和语言应用研究范围的扩大而扩大，很难绝对划定。所以有些同志认为：“应用语言学不仅具有跨学科性、边缘性，而且具有开放性。”现在一般把应用语言学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应用语言学指语言教学(包括母语教学、对外汉语教学、外语教学、双语教学等)，有人称为教育语言学。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制定的专业目录和有关文件规定：应用语言学“研究语言学诸理论在外语教学上的

应用，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外语教学与外语学习的心理因素、社会因素；或从外语教学角度研究语言学对外语教学的实践意义”，这要算是对应用语言学最狭义的理解了。广义应用语言学，“除语言教学之外，还包括语言学与数学、物理学、生理学、电子学、信息论、控制论等等相结合而产生的许多应用学科。”也有人把应用语言学分为一般应用语言学（面向人的一些老问题）和机器应用语言学（面向机器的新问题）。

由于应用语言学是一门直接为社会发展需要服务的应用科学，同语言应用实际关系紧密，所以它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内容和重点都不尽相同。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本文和它的下篇只论及汉语文教学、语言规划、术语学、计算语言学和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等几个方面的研究现状。

汉语文教学研究

汉语文教学研究是应用语言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内容丰富，包括中小学语文教学、口语和口语教学、对外汉语教学等几个方面。分别叙述如下。

一、中小学语文教学研究

这是近年来进展较大，也是问题较多的领域。

1978 年 3 月，吕叔湘先生在《人民日报》上批评我国中小学语文教学少、慢、差、费，指出这是“不容忽视的一个严重问题”。他说：“十年的时间，2700 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是不是应该研究研究”。如何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用较少的时间取得较好的成绩？”这个尖锐而中肯的批评震动了整个语文学界，也在

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此后，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在吕老的号召下，进入了一个反思、改革、实验、探索的新阶段。

80年代以后，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扩大，带来了经济的繁荣、科技的进步、文教的发展，也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语文教学研究领域一方面是思想活跃、异彩纷呈，研究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一方面又存在许多的不足。现在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些分析。

1. 调查研究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语文教学战线逐步恢复了生机。但是实际情况究竟怎样，语文教学改革和研究的方向怎么确定，这些是语文教学研究工作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为此，许多同志深入第一线开展调查研究。在这期间目标明确、规模较大、组织严密的调查有两次。一次是1979年冬，人民教育出版社中语室到福建、四川两省进行"中学生语文状况调查"。他们除了听课、召开座谈会，还从两省选定六所学校18个班(初高中各9个班)进行作文、语文知识测验。获得了比较丰富的第一手材料。调查结果表明，粉粹"四人帮"之后，中学语文教学拨乱反正，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还有大约三分之二的学生语文水平过低，不能适应升学和就业的需要，语文知识测验的平均成绩只有30分。这给人们敲起了警钟。这次调查虽然地区不够广，类型不全，样本量偏少，但调查所得材料切实，条理清晰，仍有一定的代表性，对语文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另一次是国家教委委托华东师大组织实施的"1987年全国初中三年级语文教学抽样调查"。这次调查采用分级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样本学校572所(分布在15个省、市、自治区)、教师2893人、学生49260人。通过水平测试，问卷调查、典型调查、专题调查、开座谈会等方式，取得数据1000多万个。然后运用数理统计、教育测量的原理和计算机技术手段，对数据进行定量、

定性的分析研究，得出了比较可信的数据和结论。水平测试（包括阅读、写作、听力、说话和朗读）的试题题型新颖，覆盖面宽，既测定了知识掌握的程度，又测试了学生运用语文的能力（听、说、读、写）水平。试题的难度、区分度，测试的信度、效度达到了大规模标准化测试的要求。调查结果表明，初中语文教学是有成绩的，学生语文水平也有所提高，在字、词、句教学方面有较大进步，学生作文中错别字、病句大大低于1979年调查统计数。但是这种进步的实际意义是有限的。从总体上看，大多数被测学生的成绩都分布在及格线上下，处于中下水平。阅读、写作成绩在及格线以上的只占40.16%，就是说有近60%的学生不及格。阅读、写作、听力、说话与朗读四项测试，每项的总平均分均在及格线以下，而且学生的语文应用能力普遍较差。这次调查比较真实地、客观地反映了1987年全国初中三年级的学生语文水平状况、语文教学工作状况、语文教师队伍状况以及学校图书资料设备配备、使用状况，为教育改革和决策提供了比较可靠的依据，为语文教学科研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不足的是对问卷调查的分析较为笼统，对调查所得各类数据的进一步开发利用不够。

2．教改实验

随着改革意识的普及和深化，教育观念的转变和更新，国外新鲜理论的引进和借鉴，各种语文教学改革实验研究迅速展开，规模空前、内容广泛、形式多样。

（1）基础理论实验研究

大都是不同方面的学者从教育学或心理学角度对语文教学认知过程的某些环节、某些侧面进行的实验研究。据不完全统计，从1981年到1991年这类实验共有130多项。实验内容广泛，涉及幼儿、小学生识字写字的大脑生理机制和认知心理特征，词语、句子的理解和教学，语文记忆心理，语文思维心理，语文概念心理，以及语文教学一般方法等许多方面。

这类实验项目多属语文教学基础性理论研究，在语文教学认知过程的探索方面有所前进，为揭示我国语文教学与学习的规律积累了科学资料。但是这些实验比较零散，尚不能形成系统的认识，对语文教学实践的直接指导作用不大。

（2）教学结构改革实验研究

长期以来，语文课堂教学以教师为中心，以传授知识为中心。80年代以后，广大教师越来越认识到，这种教学结构、这种注入式满堂灌的方法是开发智力，培养能力的严重障碍。他们以课堂教学结构的改革为突破口，对语文教学进行全面的改革实验。十余年来，这种改革有似雨后春笋，遍及全国各地。在实验的基础上逐步总结出各自的教学模式，形成独特的教学风格。据统计，在全国语文教学界较有影响的新的教学结构模式不下20种。诸如上海育才中学的“读读、议议、练练、讲讲”八字模式。上海钱梦龙的“三主四式”模式。“三主”指“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以训练为主线”，“四式”指循序展开的四种课式：自读、教读、练习、复习。辽宁魏书生的“自学六步法”，其教学程序为“定向——自学——讨论——解答——自测——自结”，以自学为基本特征，有明确的教学目标和反馈系统。武汉黎世法的“六课型单元教学”模式，根据“教为主导，学为主体”的指导思想，以一个单元的教学为整体，将单元教学分做六个环节(即六种课型)：自学、启发、复习、作业、改错、小结。此外还有江苏李吉林的“情景教学”法，辽宁欧阳代娜的整体改革实验方案，浙江潘凤湘的六步骤教学法、北京宁鸿彬的“熟读、质疑、解疑、总结、运用”的模式，等等。上述教学模式大都在某些局部范围内得到推广应用，对推动语文教学改革，提高教学效率发挥了积极作用。

这些教学模式各具匠心，各有特色，应用范围也不尽相同。但是它们之间存在许多共性。正是这些共同点构成了这些模式的科学价值。第一，把探索语文教学的规律、提高教学效率作为实验的总目标，把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特别是培养自学能力作

为教学的核心任务。这是各种模式共同的出发点和归宿。第二，坚持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教与学有机统一的教学指导思想。赫尔巴特的"教师中心说"在我国的影响根深蒂固。从"教师中心说"到"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这是教学思想的一个质的转变。第三，各种模式都力求按照学生的认知特点来设计他们的教学程序，他们在把知识的学习与语文能力的培养训练紧密结合、特别是在培养自学能力，帮助学生学会学习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第四、多数教学模式采用单元教学的形式，并且注意从语文教学的整体出发组织教学内容，设计教学结构，体现了整体性与阶段性相结合的原则。

(3) 识字方法的实验研究

识字是小学语文教学的"入口"，又是阅读写作的前提与基础。因此，识字教学历来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重点，识字方法的研究一向受到人们的重视。解放以来，广大语文教师、语文教研工作者在总结我国传统语文教育经验的基础上创造了各色各样的识字方法。据统计，有正式名称，有一定实验基础的识字方法目前大约近20种，例如随文识字(又称分散识字)、集中识字、注音识字、部首识字、部件识字、字族文识字、分类识字、成群分级识字、字理识字、趣味识字、字谜识字、多媒体电脑辅助识字，等等。其中前三种方法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实验，规模、影响比较大。

随文识字，开头用一段时间学习拼音、看图识字，旋即转入随课文识字，边阅读边识字，做到"字不离词，词不离句"。两年时间可掌握2500个常用字。集中识字，在开始阶段先集中时间和精力识字。方法是按照汉字结构规律把常用字归类，以基本字带字，教一批字，读几篇文章，如此循环往复，两年中掌握2500个左右常用字。注音识字，全称是"注音识字，提前读写"，是80年代初开始的一项小学语文教学改革实验。儿童先学好拼音(用一个月左右)，利用拼音的多功能作用，从一年级起就进行听说读写全面训练，寓识字于读写之中，并且通过生动活泼的语言实践活动，促进儿童语

言、思维、智力诸方面的和谐发展。这个实验不只是单纯的识字方法实验，实际上也是涉及小学语文教学体系整体改革的实验。

在最近十余年里，这几种识字方法实验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它们一方面不断总结自己的经验，另一方面又开始注意排除门户之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因此实验逐步走向成熟：目标和指导思想更为明确，内容更为丰富，方案的理论化程度高了，方法更科学、更符合汉字的结构规律和儿童的认知规律，因而效果越来越显著，对整个小学语文教学改革和研究，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4）语文教材改革实验研究

1949 年以来，中小学语文教材一直采取全国统编的办法。对于教材的理论研究，只限于少数编写人员。统编教材一般都是承继传统，采取文选型的编排方法，课文的教学目的、要求不够明确，缺乏知识和能力训练的序列安排，教学中随意性、盲目性很大。80 年代初，国家教委提出教材多样化的思想。1986 正式公布“一纲多本”的方针，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试编实验教材，大大调动了广大教研人员和语文教师的积极性。近十年来各地纷纷组织力量研究、编制教材。现在已经正式出版的各种语文教材近 20 套。其中国家教委组编的 8 套，由地方、学校或个人编的 10 套。有 12 套已通过国家教委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的审查，正式向全国推荐试用。概括地讲，这些教材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从教材的总体结构看，各套教材都力求把语文知识、语文能力训练、智力开发、思想教育等内容尽量予以科学的安排，做到合理有序、螺旋上升。但是具体的结构序列又各有特色，多姿多彩。总体结构的设计不同程度地突破了传统教材的旧框架。

第二、各套教材都以单元作为落实教学目标、实施教育活动的基本教学结构单位。单元的组合形式打破了按文章体裁组元的单一模式。有的以表达方式组元，有的按题材组元，有的按思维训练点或能力训练点组元。还有的按生活内容分类组元，如人教社版初中教材试图建立以语文与生活的关系为中心的新的结构体系，

很有新意。多数教材是多种组元方式并存。组元方式的多元化有利于取得教学的整体综合效应。

第三、精选课文,面貌大有改观。各套教材都十分重视精选文质兼美、具有典范性、适合教学、丰富多样的课文。总的看,所选课文题材广泛,体裁多样,比较贴近生活,时代气息较浓。

第四、练习设计力求多样、新颖,具有启发性、巩固性和训练的有效性。许多教材设计了系列化练习。

教材体系研究和编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集中力量,反复实验、探索、修改,才能臻于完善。

3. 理论探索

总的说,目前语文教学理论的研究和探索,比较薄弱。不过跟原有基础比,应该说还是有较大进步,成绩明显。据不完全统计,近十年间出版语文教育学、语文教学论、语文心理学等专著近50部,发表理论研究论文、报告200多篇。这一时期理论研究的总的状况,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语文教学研究阵地不断扩大,研究队伍正在成长;语文教学界思想活跃,论者辈出,各有所见;研究内容广泛,探索多向,呈现出多视角、多侧面、多层次的特点;成果不少,但是水平一般,理论研究亟待深入。

八九十年代,语文教学理论研究涉及面很广,现仅就若干热点问题的研究状况概述如下:

(1) 关于语文学科的性质和任务

这是一个关乎语文学科体系和整个语文教学发展方向的关键性问题,也是几十年来从认识到实践总是左右摇摆不定的老问题。80年代以后,语文界结合新时期对语文教学的要求进行了再思考、再讨论。虽然不同的看法依然存在,但是共识多于分歧。对学科性质任务的认识,概括起来,大体有四种。一是工具论。认为语文是人们的交际工具,是"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因此,工具性是语文学科的本质属性。语文课的任务就是进行语言知识教学,

培养训练理解和运用语言的能力，即听、说、读、写能力。课文只是例子。二是人文论。认为语文这个工具与一般生产、生活工具不同。它是人们思想、情意、社会文化的负载工具，所以归根到底人文性才是本质属性。语文课的任务主要是通过语言的学习、感悟，培养情感，陶冶审美情操，弘扬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三是素质论。认为语言既是交际工具，又是思维工具，也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它与一般工具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语文课一方面要加强语言运用能力的训练，另一方面又要把语言能力的训练同对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内容的理解结合起来。他们主张“文中有道，道中有文，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文道统一论。在教学上提出一句名言：“带学生从文章里走个来回”，“首先把语言文字弄清楚，从而进入文章的思想内容，再从思想内容里走出来，进一步理解语言文字是怎样组织运用的”。所以他们认为语文学科不仅具有工具性，而且具有人文性、实践性、综合性。语文课的任务是培养、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主要培养运用语文工具的能力，同时也要培养思维能力、文学鉴赏能力，开发智力，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审美教育、语言文化知识教育。语文课的综合性特点决定了它任务的多重性。但是一门课要全面完成如此多重的任务是困难的。所以素质论者提出要区分主次，处理好特定任务或称中心任务（语文运用能力训练）与连带功能（其它各种因素的教育）的主宾关系，既不能唯主独尊，不及其余，又不能主宾不分，更不能喧宾夺主。必须紧紧抓住语文能力训练这个核心，在能力训练过程中，根据教材所提供的可能性，渗透各种教育因素。四是语感论。近年来，有人根据叶圣陶、吕叔湘先生关于培养训练语感的观点，提出“培养语感是语文教学的首要任务”。类似的说法还有：语文教学应“以语感为支点”，语文课要“以语感为基本内容”，“语感是言语能力的核心，是中小学语文教育的轴心”，等等。还有人提出“直觉思维能力（实际上也指语感）的培养，是形成高水平语文能力的核心所在，是语文教学训练是否抓住了本质的重要标志。”上述种种

说法虽然不完全相同，但是中心意思都是肯定语感教育在语文教学中的核心地位。不过，究竟什么是语感(内涵和外延)，语感有些什么特征，语感与语文能力、语文知识是什么关系，怎样培养语感，对这些问题目前人们还大都处于雾中看花阶段。人们开始重视语感问题，并就此展开研究、讨论，应该说是语文教学研究的一大进展。

四种看法，相对而言，第三种看法似乎比较全面辩证，因此已逐渐成为语文教学界多数人的共识，占据主导地位。素质论的许多思想观点已被 吸收进现行语文教学大纲，以教育法规的形式肯定了下来。至于语感问题的讨论，目前似乎尚处于零星的自发状态之中，但是完全有可能发展成为语文教学研究的下一个热点。语感问题的讨论不仅涉及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思维科学理论，而且还涉及语文教学规律、教学理论、原则和方法等一系列理论和实际问题。因此，重视并组织好这场讨论是有重要意义的。

在语文学科性质、任务的研究中还连带出一个课程设置问题。为了缓减语文学科的多重任务，有人提出必须改革语文学科的课程结构。具体意见是中学阶段在语文课之外增设文学、中国文化名著选读、现代文选读、文言文阅读等课程。这些课可分为必修与选修两类。这个问题看来短期内难于取得一致意见，需要同整个中学课程问题结合起来研究，统筹考虑。

(2) 关于语文教学内容的优化选择

一般说，学科的性质和任务决定课程的内容。但是实际情况复杂得多。语文课究竟应该包含哪些内容，如何优化选择，人们的意见不一。有人认为语文课要讲授系统的知识，他们提出：初一学文字、词法、句法、形式逻辑和修辞；初二顺序学习文体概论，议论文和抒情散文，文化史；初三下学期简介外国文学名著。这种意见，应者寥寥。最近有人从培养、提高正确运用语言的能力(口头和书面)这个目标出发，提出语文课教学内容应该包括：“① 普通话教学，②识字和正字教学，③语汇教学，④语法教学，⑤口语训

练，⑥写作训练，⑦逻辑思维训练。”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所规定的教学内容，共四项：

① 课文：基本课文总量不少于 180 篇。

② 能力训练：按读、写、听、说顺序安排，共规定 48 项训练内容，这是以往大纲所没有的。

③ 基础知识：包括汉语知识、文体知识、文字知识三类，只讲最基本的。

④ 课外活动：规定了课外活动的内容、形式和要求。把课外活动列入语文教学内容，这在我国语文教学大纲的历史上是第一次。这是“大语文教育”观念的反映，对更新语文教育思想、推动语文教改，全面培养语文素质，是有积极作用的。

上述教学内容的选择，大都还是凭经验和感觉，缺乏理论的分析和论证。这就可能使教学内容的范围、深度、难度等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和要求，容易坠入随意性、盲目性的陷井。这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3) 关于语文知识和语文能力训练的关系

这里包含两个问题：一是语文知识对能力的培养有用没有，二是语文能力训练需要什么样的语文知识。

语文知识在历史上曾经是被忽视的。后来又出现了语文知识讲得过多过深，加上教法不当，因而效果不佳的的情况。于是有些人在大失所望之余提出要“淡化”语法教学，有人甚至说要“扭断语法的脖子”，完全否定语文知识的作用，理由是能力培养靠实践经验就成，知识用处不大。这当然是一种误解。对于这种片面的认识，许多人写文章进行批评。他们指出靠实践经验培养能力，不是绝对不可以，只是速度慢、效率低。这跟现代化、信息化社会的要求，跟现代语文能力，即“处理生活和工作实际问题的敏捷准确的高效率的口头和书面语言能力”是极不相适应的。不向孩子们提供系统的知识，仍走摹仿、体会、摸索的老路，就不可能有语文教学的高效率、高质量。

但是几十年的事实说明现在的一套语文知识确实不大管用，至少是成效不大。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比较共同的看法是现在的语文知识过于追求体系的完整和严谨，内容过多过深，要求太高，教法也不得要领。于是提出语文知识要“精要、好懂、管用”，精简内容，降低要求，少用术语，突出用法。北京市语言学会也组织专门班子修改了“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提出了一个“中学语法教学实施意见”，实用性有所加强。这些都是局部改良措施，能否见效，有待实践证明。值得注意的是，张志公先生曾于 1985 和 1992 年两次提出，似乎没大引起注意的一种思路：创建跟语文能力训练密切配合的实际应用语言的知识系统。张先生说：“不能把语文课搞成一门纯粹的知识课”，而应该是“以知识为先导，以实践为主体，并以实践能力的养成为依归的课”。这种为先导的知识“不是纯粹的语言理论的知识系统”，而是“指实际应用语言的知识系统”。张先生认为，把那些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训练听、说、读、写能力直接挂起钩来是困难的。两端之间需要一个中介，这就是实用语言的知识系统。这种实用语言的知识系统跟语言理论的知识系统不同。“语言理论知识系统是从小到大的：语素——词——词组——句子——句组——篇章；而实际应用语言却恰恰相反，是从大到小再回到整体的”。“语文教学的知识系统既是实际应用语言的知识系统，就应当是从大到小再回到整体的这种系统”。张先生推想，一旦找到这个中介，听、说、读、写能力将会高速高效地提高，正如流体力学曾使航空科学飞跃发展一样。张先生这个设想是比较理想化的，富有创造性和吸引力。可是中介语言知识系统究竟是什么样的，它跟现在的语言基本理论、基础知识是什么关系，二者之间有何本质的区别，这个系统怎样建立，这些都有待研究和论证。

至于科学的语文能力体系的研究，目前还只是刚刚起步，有待深入。

(4) 关于传统语文教育的研究和民族化现代化语文教育体系

的构建

作为母语教育的汉语文教学是在汉民族语文教育这块沃壤上土生土长的。不管课程名称怎样更迭，教学目的、内容、方法如何嬗变，现代语文教育总是传统语文教育的继承和发展。重视传统、研究传统、正确对待传统，这对于当前语文教学的改革和建设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长期以来，我国传统语文教育研究领域一片空寂，几乎无人涉足。直到60年代以后，终于先后出版了我国仅有的两本传统语文教育研究专著：一本是《传统语文教育初探》(1962年)，一本是《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1992)年。两本书都出自张志公先生一人之手，写作动机也相同，都是出于对传统的历史责任感，出于在不同历史时期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语文教学路子的需要。作者运用历史的批判的方法，对传统语文教育的方方面面，一探再探，扒梳清理，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和过滤，归纳出传统语文教育的三大体系、三大经验、三大问题和四大积弊，为广大语文教师吸取传统的精华，剔除糟粕，推进教学改革开辟了道路。

研究传统的目的是古为今用。近十多年里，张先生致力于语文教学现代化研究。他大声疾呼：语文教学需要有突破性的改革。为此，他再一次系统深入地研究传统语文教育，把"回头看"与"向前看"这两方面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构建民族化与现代化相结合的语文教学新体系的理论设想。现代化，指语文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手段都要现代化、科学化。民族化，指继承、发扬传统语文教育的精华，突出汉语文的民族特点。二者有机结合，达到语文教学的高质量高效率和学以致用。这一理论构想，指明了当前语文教学改革和研究的目标和方向。

4. 问题与建议

十多年来，中小学语文教学研究确实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做出了不少成绩，但是，这些进步和成绩还是初步的。语文教学中许多

重大问题、语文教学的规律远没有搞清楚。语文教学的现实状况不容乐观。16年前吕叔湘先生所批评的语文教学少、慢、差、费的状况至今仍无根本性的改变。语文教学研究本身还存在许多问题。

(1) 语文教学研究缺乏现代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理论的指导，方法比较陈旧，研究水平不高。语言学界对中小学语文教学研究的重视、关心不够，投入力量很少。语用学、言语交际学、心理语言学等方面的某些研究成果尚未跟语文教学挂钩。近来虽然引进了国外的一些教学理论，引进了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但是还没有结合汉语文教学的特点和我国中小学生的实际加以消化吸收。

(2) 从研究内容的确定到方法的选择仍然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许多研究成果，教师们读了以后说：隔靴搔痒，不解决问题。

(3) 改革实验项目虽多，但是真正有组织、有计划的整体改革或其他重大项目不多。大多数是个人的具体方法的实验，缺乏明确的指导思想和目标，零星分散，低水平重复。少数比较成功的实验研究，也大多是停留在经验阶段，没能升华到理论高度。加上有些实验含有实验者特有的个体色彩，所以难以普遍推广。

总之，语文教学研究工作大大落后于语文教学实践，跟当前教学改革的客观需要不相适应。

语文学科是中小学的主课，是培养学生准确、敏捷、高效运用语言的能力，以适应社会生活和工作需要的基础课，也是学好其他学科的基础课。如此重要的一门课程，却始终是个"老大难"。几百万语文教师，一亿几千万学生，耗费十年时间，百分之三十的课时，含辛茹苦，付出极多，却收效甚微。这不只是经济上、时间上的极大浪费，而且将直接影响下几代人才的文化素养和全民族文化科学素质的提高。应该是下决心改变这种状态的时候了。为此，我们建议：

（1）国家教委教育科研规划部门应当高度重视语文教学科学研究，并从宏观上切实加强领导。在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教育科研规划部门下成立中小学语文学科科研规划领导小组，负责领导、组织全国语文教学科研工作。

（2）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订中长期语文教学科研规划，力争用 10 到 15 年时间，基本改变语文教学少、慢、差、费的状况，逐步建立起民族化、现代化的语文教学新体系。

（3）由领导小组出面组织、协调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语文教研部门等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教师，按照科研规划分工协作，联合攻关。"九五"期间可先进行三方面的研究：

一是语文教学基础性理论研究，包括语文知识系统、语文能力系统、不同年龄段学生在语文教学过程中的认知心理特征等内容。

二是采用科学的方法、现代化技术手段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次中小学语文教学状况的抽样调查。内容除中小学生语文水平和能力状况外，还应包括课堂教学实况、课外阅读情况，教师队伍状况，以及教材使用、图书资料、教学设备的配置和使用等方面的情况。样本的抽取力求全面，包括不同类型的地区、学校，不同年龄、性别等差别。

三是组织一个精干的课题组，对近几年来语文教学科研的主要成果进行调查、综合分析研究，指导帮助实验学校总结出几种比较成熟的改革方案，分别在局部或全国范围内加以推广。在此基础上，课题组再进一步研究、制订几种适合不同地区（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城市与农村）使用的语文教学总体改革方案，并进行实验。

二、口语和口语教学研究

口语是语言的源泉和基础，是语言中最活跃、最积极、最有生气的部分。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电子传声技术的进步、智能化计算机的应用，口语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

80年代以来，口语研究主要集中在口语结构功能、口语表达、口语教学三个方面，而且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从话语语言学、语用学等视角，揭示口语的功能与特点，如提出"言语的原则"——言语的质、言语的量、言语的关系、言语的方式等；"言语的特性"——社会性（群体性）与历史性（时代性），以及"言语的语境"和"言语的功能"等。

2. 从口语的交际过程考察口语表达的特点，有人提出，口语表达的基本特点是：(1) 以声传意，有传播简便的实用性；(2) 双向交流，有同一时境的直接性；(3) 通俗易懂，有约定俗成的生动性；(4) 句式简短，有随意补插的灵活性；(5) 即兴构思，有随机应变的及时性；(6) 态势配合，有动态直观的可视性。这些基本上已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

3. 汉语句式研究方面，有人试图从信息结构的角度来揭示汉语口语句式的构成规律，分析指出了强化焦点信息和弱化次要信息的两种典型表现。

4. 提出建立"口语修辞学"的初步设想，进一步扩大了口语研究的领域。有人提出，口语修辞学的内容应包括：口语同义形式的选择、口语修辞的语言因素、口语修辞的非语言因素、口语表达的修辞效果、口语修辞能力的培养与训练，等等。

5.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各行各业开始重视人际交往中的"话术"。有关说话的艺术、社会交际与口才、公关语言艺术、演讲术，论辩术、谈判术等内容的书刊大量涌现，促进了口语传播学研究的发展，同时也使语言学更加接近社会，为社会所了解和接受。

近年来汉语口语研究的态势呈现出一些变化。主要是：1. 由静态研究向动态研究转化。不少口语研究工作者走出书斋，借助录音机采集社会上不同性别、年龄、职业、不同文化程度的人的"原发性口语"，并且把这些语料放到动态环境中去分析、归纳，以求总结出真正的口头语言的规律。

2. 由对口语本体的描写研究转向对口语与书面语、口语与语境、口语与语感 、口语与交际、口语与文化等关系的研究。

3. 由纯理论研究向实验研究扩展。目前许多研究工作者更加重视对各行各业人员口语运用的研究，收集不同行业人员的常规用语、规范用语、文明用语、文明忌语，加以归纳整理，予以推广，促进了服务质量和经济效益的提高。

4. 由个体研究向群体攻关研究发展。

口语研究虽然取得一定的进展，但是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例如，汉语口语特有的语法现象和句式的研究近十年间进展不大，有待深入；汉语口语与文化的研究、汉语口语中民族文化的底蕴与特色的研究刚刚起步；从语用学角度探索汉语口语的话语推导、话语种类、话语特征、话语的礼貌原则和合作原则，以及会话的结构分析、语用失误等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普通话口语和方言口语相互渗透情况有待作全面调查；其他如从语体学、修辞学和信息论的角度研究口语的语用特色、语体分类等方面也很薄弱。

口语教学研究最近在师范院校取得比较显著的进展。师范院校的任务是培养中小学师资，语言教学的要求高，针对性强。为了适应贯彻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方针政策，大力推广普通话的需要，适应师范院校深化教育改革、加强职业技能训练、培养合格师资的需要，1993 年国家教委决定在师范院校开设《教师口语》训练课，1994 年又正式颁发《师范院校“教师口语”课程标准》，并组织编写了一套系列教材，从而大大地推动了师范院校口语教学的实施和研究。近年来，有关教师口语、中师口语训练等教材和专著有如雨后春笋。师范院校口语教学研究借鉴了国内外口语教学的经验和研究成果，加强了对教学过程的探索；把语用学、心理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等领域的新成果引进教材和教学，提高了师范院校口语教学的理论层次；在探索师范学生、中小学生和幼儿学习语言的规律、加强语文能力的培养和训练等方面都取得了初步的成绩。

师范院校的口语教学刚刚起步，口语教学在中小学尚不被重视。真正搞好口语教学，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有赖于丰富的实践和深入的研究。目前口语教学研究远远不能满足客观需要，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如中师学生认知心理特点与口语训练的途径和方法，小学口语教学的地位、教学重点和难点等问题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

三、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一门学科直到70年代末才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从那以后，对外汉语教学界对这一学科的性质、内涵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现在基本上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作为一门学科，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基础是语言学（包括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理论、心理学理论、教育学理论，从根本上说，它是一门新兴的边缘交叉学科。

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学习和教学。研究内容包括：1. 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学习和教学的全过程，即从零起点开始学习汉语到接近汉语本族人水平的过程；2. 贯穿于上述过程中的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和语言测试等全部教学活动。研究目的是揭示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学习和教学的内在规律，以便指导教学实践。具体地说，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主要目标是要解决“怎样教”这个核心问题。而要解决这个核心问题，首先必须明确“教什么”和弄清学生“如何学”这两个基本问题。这三者的关系如下图：



这些年来，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基本上是围绕这三个方面展开的。

1. 怎样教——教学理论研究

(1) 总体设计的地位、任务、原则已基本确定

长期以来，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缺乏总体设计的宏观指导，因此课程设置比较混乱，教材编写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从1982年开始，对外汉语教学界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讨论总体设计问题，讨论中逐步认识到在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和测试这四个语言教学环节中，总体设计是纲。它的任务是提出全面的教学方案，包括：根据教学对象的学习目的确定培养目标；根据培养目标确定教学内容；根据教学内容和学习者的背景确定教学法原则；根据以上因素确定教学途径。

总体设计应充分体现交际性原则、针对性原则、科学性原则和可行性原则。它一方面要有基础理论的研究成果作支撑，一方面要受到课堂教学的检验，因此，总体设计实际上是基础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之间的桥梁。它们之间的关系是：

基础理论 ⇔ 总体设计 ⇔ 教学活动

目前总体设计的指导地位已经确定，但是，由于基础理论研究还不够深入，在总体设计的实际操作中经验的成分仍然很大。

(2) 教学法路子初步形成

由于教学实际的需要，教学法的探讨在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中一直占据重要位置。80年代以前，对外汉语教学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以句型训练为主的直接法。80年代国外以培养学生交际能力为目标的功能教学法被引进对外汉语教学，因而出现了"结构——情景——功能"相结合的教学路子。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文化热"的兴起，又提出了"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教学法思想。这个思想得到一定程度的响应，被认为是今后教材编写和语言教学应遵循的原则。但是，除了现有的结构大纲外，我们还没有功能、文化大纲；而且由于结构、功能、文化三者之间呈多层次交叉关系，在语言教学的某一阶段应该教授哪些结构、哪些功

能、哪些文化，现在还没有一个科学的界定，因此，“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路子还只是一种假设，有待于理论上的论证和教学实践的检验。

（3）语言测试取得很大进展

语言测试是语言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不同目的，可分为学能测试、成绩测试和水平测试。学能测试主要考察被试学习外语的天资。成绩测试主要评定学习者的学习成绩，评估教学效果，因此测试的内容与手段是同特定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相联系的。水平测试主要是鉴定被试当前的第二语言水平。在这三种测试中，只有汉语水平考试(HSK)的研究与设计受到重视，并取得了显著成绩。1993 年汉语水平考试被正式定为国家级标准化考试。

HSK 目前只是初具规模，许多理论问题，诸如侧重语言知识还是侧重语言能力，语言能力包括哪些因素等等，还没有解决，题库也还需要进一步丰富。另外目前在国外兴起的计算机辅助自适应性考试(Adaptive Test)预示着水平考试的新方向，需要追踪调查研究。汉语学能测试目前还是一个空白，成绩测试也要给予一定的重视。

2. 教什么——汉语/交际文化研究

（1）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研究是为了解决语言教学中的实际问题，因此侧重于实用。在这个领域中语法研究一直是重点，取得不少成果。例如对现代汉语的基本语法现象有了初步的描写与分析；制定了语法等级大纲等。

在词汇研究方面，对外汉语教学界率先在全国第一次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词频统计，其成果为汉语词汇等级大纲和汉语水平考试词汇大纲的制订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也为国家有关部门制定政策性文件、编制教材，进行中文信息处理提供了依据和资料。

语音方面目前尚无比较系统的研究，需要迎头赶上，以便使语

音研究与教学更加精确化。

从总体上说，汉语研究还远远不能满足对外汉语教学的实际需要，主要表现在：话语层面的语用研究还很薄弱，这直接影响中、高级汉语教学中的语法教学。其次，不同场合、不同行业、不同专业中不同层次的词汇、语法、语用的调查与分析还很少有成果问世，而这些正是为不同学习目的的学习者确定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所必需的依据。这些方面的研究需要汉语研究工作者的通力合作。

(2) 90 年代以来，要求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注入文化因素的呼声很高。但是，文化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语言教学中究竟应注入哪些文化内容？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现在一种倾向性的看法认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指的是“交际文化”，即涉及语言交际的文化因素。不过时至今日，交际文化的内涵和外延还不明确，这是有待探讨的课题。

3．如何学——汉语习得研究

随着对对外汉语教学学科认识的深入，现在人们逐渐认识到，如果我们对“学生是如何学汉语的”这个问题没有比较透彻的了解，我们的汉语教学就很难有一个质的飞跃。因此，近年来汉语习得研究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汉语习得研究的目标是揭示外国人是怎样掌握汉语的奥秘，以便使我们的教学更加符合语言学习规律。这方面的研究现在还处在起步阶段，刚刚开始对外国学生的言语错误和中介语进行收集和分析。

汉语习得研究涉及语言学、心理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教育学等许多领域，可变因素很多，因此寻求有效的研究方法是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这一领域的研究深度将直接影响到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成熟程度。

4. 对今后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建议

对外汉语教学还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虽然学科框架已经初步形成，但是仍有许多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有待解决。在规划我国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建设的时候，一方面要认真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发展我们自己的理论，另一方面也要跟踪了解国外相关研究的进展情况，借鉴他们的理论和方法。西方发达国家语言教学研究的历史和规模远远超过我们，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理论成果。当前西方语言教学研究主要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方向是以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为主要内容的基础理论研究；一个方向是以界定语言能力为焦点的教学法理论研究。基础理论研究又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学习者的研究，主要研究学习者对所学语言的态度、学习动机、学习者的个性特点，以及学习者的学习策略等因素对第二语言学习的影响及其程度；一是对语言习得本身的研究，从语言学或心理学的角度研究人类大脑这个“黑箱”是怎样习得第二语言的。至于教学法理论研究方面，现在西方已不大热衷于创造什么具体的“法”，而是把研究重点转向能容纳各种教学法长处的第二语言教学的“组织原则”，这就是以培养语言能力为导向的语言教学体系(proficiency oriented language instruction)。这种以培养学习者的语言能力为目标的教学法思想对语言教学的各个环节正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借鉴国外的经验，考虑到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现状，我们认为在今后五年到十年里，首先应该加强以调查为主的基础理论研究，包括三方面内容。

(1) 对学习者的学习需求进行全面的综合调查，对汉语使用市场进行调查。

(2) 对汉语在不同职业、不同专业、不同场合的使用情况，从词汇、语法、语用等方面进行调查、统计与分析。

(3) 对汉语习得过程，包括课堂语言教学过程进行观察分析，

努力发掘汉语学习规律。上述第一、二两项调查研究是确定“语言能力”包括哪些因素、制订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所必不可少的。第三项研究是安排教学内容的顺序、选择何种教学方法和教学活动的重要依据。

上述各项研究都是较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周密计划。“九五”期间的重点应放在试验性研究上。通过试验性研究，培养课题带头人，培养研究队伍，探索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制订切实可行的研究计划，为下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研究作好理论的和实际操作的必要准备。

语言规划研究

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也叫作语言计划，这个术语是从国外引进的，80年代后才逐渐在我国用开。但是，语言规划的事情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只是我们不叫语言规划，而称文字改革或语文改革。

关于语言规划的定义，国外有许多说法，大多不能令人满意。我国学者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总结我国文字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就是《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所作的界说：语言规划是“国家或社会团体为了对语言进行管理而进行的各种工作的统称”，“所谓规划或管理，是个广义的概念，包括语言的选择和规范化，文字的创制和改革等方面的具体问题。”这是目前国内比较通俗而简明的解释。

我国语言规划的内容大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语言政策的研制和调整，包括语言的选择和语言地位的确定；二是各项语言应用规范、标准的研制；三是政策、规范、标准的推行、落实和监督检查。语言规划的目标是：1. 消除信息交流与人际、人机沟通中的语言障碍，充分发挥语言的社会功能，提高交际效率，使语言更好地为

经济社会发展服务;2. 促进语言自身的健康发展;3. 增强民族的团结,巩固国家的统一。

语言规划实质上是政府或社会权威机构按照约定俗成、因势利导原则,对语言进行的一种人工干预行为,也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面向未来的系统工程。它的决策和实施过程,涉及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社会心理等种种因素。成功的语言规划必须尊重并且符合语言发展的客观规律,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符合广大群众的意愿。语言规划必须具有坚实的语言学(包括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理论基础,同时需要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人类学、信息学、心理学、统计学、民族学以及计算机技术等方面的支持与指导。可见,语言规划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是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我国语言规划实际工作做得多,理论研究相对说比较薄弱。80 年代以来,语言规划研究工作基本上是围绕语言规划的内容展开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语言政策的研究

1. 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方针政策的研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一切工作都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改革开放政策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施,使整个社会生活,包括人们的语文生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文化教育的普及,科技的进步,特别是微电子技术,现代通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和普及,都要求语言文字保持自身的规范与稳定。在新形势下,50 年代制定的文字改革方针政策显然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时期的客观需要。文字改革工作正面临一个新的历史转折。要实现这个转折,就必须正确总结、评价以往的工作,深入研究新形势、新特点,转变观念,在此基础上相应地

调整工作方针、政策、任务。为此，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从1984年起组织人力深入全国各地进行调查、征询意见，召开全国文字改革工作座谈会和一系列中小型会议，研讨新时期的语言政策。经过近两年的研究讨论，1985年底正式提出关于我国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方针、政策和任务的研究报告，并得到了中央的批准。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政策、任务同原文字改革的方针、政策、任务相比较，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1) 体现了政策的连续性。30年来文字改革三项任务有的已经完成，有的尚待完成。需要继续进行的各项工作，如推广普通话、继续推动文字改革工作，进一步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等，基本上都作为新时期方针任务的重要内容予以保留。

(2) 反映了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新要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对语言文字工作的主要要求，简括地说，就是巩固成果，注重建设，促进规范与稳定，在规范和稳定中推进改革，求得发展。新方针政策从总体上突出了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要求，这是新时期语文建设的总目标、总任务。新方针政策把做好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大力推广、积极普及普通话列为新时期语文工作的首要任务；强调研究和整理现行汉字，制订各项有关标准；把原文字改革的方针——“汉字必须改革，汉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一内容列入科研范围，不作为当前语文工作的任务；把简化汉字包容在“研究和整理现行汉字”里作为一项具体内容，而不作一项任务单独提出。所有这些重要的政策调整都体现了规范与稳定的要求。至于在实现语文规范与稳定的过程中对语言文字不适应现代应用需求的某些方面要进行必要的改革与调整，以促进语言文字的健康发展，达到更高水平的规范与稳定，这是没有疑义的。至关紧要的是必须正确理解和处理规范、稳定与改革、发展的关系，必须根据当前语言文字应用的实际情况，根据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发展的需求和状况，根据语言使用者的意愿，审时度势，从宏观上把握住每一发展阶段工作的重点

和方向，改革的量和度。

(3) 显示了新时期语文工作内容的新发展。70 年代以后，中文信息处理提上议事日程。新政策把"研究汉语汉字信息处理问题"作为新时期语文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新时期语文工作的范围扩大了，不仅要研究解决人际交往中的问题，而且还要研究解决人与机器之间交际的问题。

(4) 强调了科学研究的重要。加强语言文字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是做好语文工作的基础。这是总结 30 年文改工作的经验教训而得出的结论。

2. 新时期推广普通话工作方针的研制

50 年代确定的"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的推普工作方针是积极的，正确的。但是，新时期新形势要求加快推广和普及普通话的步伐。1982 年我国宪法也已经明文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显然，这一方针的要求与提法已落后于形势。因此 90 年代初，国家语委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把推广普通话的方针调整为"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调整后的方针保持了和原方针的连续性，体现了新时期推普工作的更高要求，也恰当地表达了现阶段推普工作中普及和提高的关系。

二、关于现代汉字的研究

1. 汉字的定量研究与分析

80 年代以后，对现代汉字进行量化研究，运用计算机手段，对汉字诸因素进行量的测定和分析，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而且取得了不少成果，比较重要的项目有"现代汉语频率词典"、"现代汉语字频统计"、"现代汉语词频测定"、"新闻信息汉字流通频度统计"等。

字频、词频统计是研究语言结构和语言应用的基础。过去语言学研究中定性多,定量分析很少。上述研究都注意到量的测定,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其次这些字频、词频的统计,对语言教学,教材、读物、词书的编纂,对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制订都有直接的实用价值或参考价值。第三,这种统计语言学的研究对其他学科,如汉语信息处理、情报检索、机器翻译、人工智能等也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当然量的测定如何做到更精密、方法更科学、结论更可靠,都需要进一步探索。

2. 汉字结构及其构成成分的分析与统计

这是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与武汉大学合作进行的一个课题。方法是利用计算机对《辞海》所收的全部单字(16296 个),以及《辞海》未收而 GB2312—80《信息处理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收了的 43 个字(合计 16339 个)的结构及其构成成分进行分析统计。目的是求得现行汉字笔画、部件和结构方式等方面的数据,为汉字的整理、简化、有关汉字使用标准的制订提供科学依据。

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将在“应用语言学研究的现状和展望”(下)中详细介绍,这里从略。

三、普通话等级标准和水平测试的研究

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加快推广和普及普通话的步伐?如何贯彻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方针,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根据多年经验,推广和普及普通话,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人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对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学校、不同年龄的人应当从实际需要出发,区别对待,提出不同的要求。但是,“区别对待”、“不同的要求”如何落实?为了逐步解决这些问题,从 80 年代末起国家语委先后组织了《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普通话水

平测试大纲》课题组，研究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的标准、对象、内容、方法等问题。课题组在调查研究、测试的的基础上，于 1991 年，拟订了三级六等的等级标准，并规定了与等级标准相配套的量化评分办法。1992 年又研究编制了《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规定了测试的内容、方法。接着又提出近期进行测试的对象、要求，通过国家语委、国家教委、广电部联合发文作出了行政的规定。文件指出，掌握并使用一定水平的普通话是社会各行各业人员，特别是某些专业人员的必备素质。因此有必要在一定范围内对某些岗位的人员如播音员、节目主持人、演员、中小学教师等进行普通话水平测试，并力争逐步做到持证上岗。文件还规定了不同职业岗位的被测人员所应达到的普通话水平等级标准。

普通话水平测试是推广和普及普通话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普通话已有一定的基础后所必须适时推动的重大举措。它的实施必将使推广和普及普通话工作逐步走向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当然普通话水平测试是一件十分复杂的工作，掌握过严会损伤积极性，过宽则易流于形式。还有不少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四、语言文字立法研究

80 年代以来，随着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工作的加强，语言立法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对语言立法问题的认识很不一致。语言能不能立法？需不需要立法？立法的依据是什么？语言文字法调整的对象、范围是什么？包括哪些内容？它的效力范围多大？法律责任如何表述等等，这些问题的研究正在进行中。

五、现代语文改革史的研究

近十多年间在语文改革历史方面的研究和论著不多。除了散见的一些论文外,比较重要的专著有两部。一本是倪海曙先生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始末和编年纪事》(1987)。这是作者继《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推广普通话的历史发展》等书之后的又一本重要著述。该书分综述性的《始末》和编年性的《纪事》两部分,注重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对于了解、研究中国文字改革运动的历史有重要参考价值。另一本是高天如教授的《中国现代语言计划的理论和实践》(1993)。这是作者在教学和科研的长期积累的基础上写成的一本史论性专著。该书对现代史上语文改革运动的各个方面,从白话文运动和汉语文体的变革,拼音文字的倡导、创制和推行,国语运动和民族共同语的研究和推广,到汉字简化的宣传和研究整理等进行了全面的综合的研究,注重学术背景的阐发和文献资料的引用,力求以史料为依据,对语文改革的各种理论主张、学术争鸣和改革的实践活动给以客观的、历史的评析。这对总结、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推进当前语言规划,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这本书的出版也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近年来社会上有那么几个人公开撰文宣称,历史证明半个世纪以来的文字改革"已经彻底失败",企图完全否定中国文字改革的历史。对这种臆断谬说,这本书以其丰富的史料和客观的理论评析给予了公正的回答。

除了上述几方面的研究外,在语言文字应用规范的研究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先后制订一些规范和标准,例如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现代汉语常用字表和通用字表、扫盲字表、标点符号用法(修订)等。

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工作不仅具有很强的社会性、政策性,而且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必须重视语言规划理论的指导。我国语言规

划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理论的研究概括十分薄弱。今后语言文字工作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理论研究工作，尽快组织一支语言规划理论研究队伍，逐步建立我们自己的语言规划理论体系。

其次，几十年来我们研究制定了不少语言文字应用规范和标准，对促进语言文字的规范化起了积极作用。但是，有些规范、标准是几十年前公布的，客观情况已经发生变化；有些由于公布时间的跨度较大，几个标准之间存在某些相互交叉之处，不便应用；有的规定比较笼统，不便执行，因此，需要及时进行必要的调整、修订。另外，针对当前社会上语言文字应用混乱的状况，急需按照促进规范、保持稳定的原则，补充制订一些新的规范和标准，诸如现代汉语规范字表、现代汉语规范词表、普通话最低限度轻声儿化词表，等等。

第三、"九五"期间应把"全国语文生活现状调查"列为重点科研项目。对于全国语文生活的状况，我们从未进行过全面调查，情况若明若暗。建国近半个世纪，社会经历了多次重大变革，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以至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社会心理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革、变化给语言文字应用带来了哪些影响？语言文字本身又有了哪些新的发展和变化？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对语言文字的态度和使用语言的状况如何？这些都是我国国情的一部分。语文生活现状的调查，不仅是制订、实施国家语文政策、文化教育政策必不可少的基础，而且对我国语言规划理论研究也有重大意义，可以说是一项重要的基本建设。因此，建议国家语委牵头，组织全国力量，采取科学的程序和方法，运用现代化手段，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抽样调查。这个调查面广规模大，所需经费较多，希望能得到大力支持。

术语学研究

术语是人类知识在语言中的结晶。术语学是研究全民语言词汇中专业术语规律的一门应用语言学分支学科。术语学的研究不仅与语言学密切相关，而且与逻辑学、分类学、哲学的本体论、情报学，以及自然科学各个部门都有联系，边缘学科的色彩越来越明显。现在不仅语言学家，而且几乎所有学科的专家都十分关注并积极参与术语的研究工作。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术语学在人类现代知识总体结构中的重要位置。

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十分发达，在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史上曾占有光辉的地位。科技的发展产生了科技术语。近代西方科学技术传入我国以后，科技翻译一时兴盛，创造了许多新术语。这些促进了我国科技术语研究和审定工作的开展。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就建立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聘任150名科学家担任委员。1956年中科院设置名词室，负责统一和审定科技术语的工作。1985年4月正式成立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职责是确定工作方针，拟订全国自然科学术语统一的工作计划、实施方案，负责审定自然科学各学科名词术语的统一名称并公布实施。工作范围涉及广义的自然科学各学科领域，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球科学、生物科学、技术科学、农业科学、医学等。

为了推动我国的术语标准化工作，国家技术监督局建立了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CSBTS/TC62)，下设四个分委员会。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已经研究并完成了“确立术语的一般原则和方法”，“建立术语数据库的一般原则和方法”，“术语数据库开发规范”，“术语数据库开发文件编制指南”，“术语学词汇”，“术语数据库技术评价指南”等十项国家标准。

近年来，我国有关专业部门也逐渐建立了相应的专业术语标

准。例如，机械方面，已制订了金属切削机床术语、建筑机械术语、起重机械术语、矿山机械术语、渔业机械基本术语、空气分离设备术语的标准；船舶方面，制订了船舶通用术语、船舶设备术语、船舶工艺术语的标准，完成了“船舶工业术语标准体系”；铁路方面，制订了铁路机车术语、铁路车辆术语的标准，此外还制订了色漆和清漆术语、拖拉机术语、感官分析术语、地质仪器术语、无损检测术语、环境保护术语、邮政业务术语、汉语信息处理术语等标准。

为了促进术语的协调统一和发展，加强国际、国内术语工作的交流与合作，经国务院批准，我国于 1993 年成立了中国术语工作网。它的主要任务是：促进术语网成员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供术语信息资料，进行咨询服务，组织有关教学和培训活动，组织计算机辅助术语工作的研究与开发，组织有关书刊的编辑与出版，承担国际术语网的对口业务。中国术语网的成立，对于动员、团结更多的单位和专家开展术语研究和术语标准化工作，加强国内外术语工作的交流与合作，促进术语的统一，推动我国科学技术和经济贸易的发展，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80 年代以来，我国还开展了术语数据库的研制工作。这项研究先是从语言学界开始的。1985 年中国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派出一位计算机语言学专家前往德国夫琅禾费研究院合作研究术语数据库。这项研究涉及汉语的处理，建立了一个英汉对照的术语数据库，成果已被欧共体所采用。这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的使用汉语的术语数据库。此后，国内术语数据库的研究工作也逐渐开展起来。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建立专门的课题组，先后建立了应用语言学术语数据库和计算语言学术语数据库，开我国术语数据库研究之先河。接着，机械部机械科技信息研究院于 1989 年开始建立机电工程术语数据库；计划收 50 万条术语。第一期工程拟收 25 万条术语，分为 20 几个门类，100 多个专业，英法德日俄汉多语种对照。目前该课题的小型试验库已在微机上建成。此外，农业部中国农科院建立了农业叙词表中术语的数据库；中国标

准化与信息分类编码研究所拟与奥地利合作建立标准化术语数据库。

术语是语言词汇的一部分，从语言学角度对术语进行研究，是应用语言学责无旁贷的任务。我国学者在术语理论研究方面也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比如有人在术语数据库工作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潜在歧义论"(Potential Ambiguity Theory，简称 PA 理论)，指出中文术语的歧义格式中包含歧义性的一面，也包含非歧义性的一面，因而这样的歧义格式是潜在的，它只是具有歧义的可能性，不一定就是现实的歧义。这一理论观点已在国际会议上发表。它是对传统语言学中"type-token"观念的冲击。我国学者还提出了"术语形成的经济律"，证明在一个术语系统中，术语系统的经济指数与术语平均长度的乘积恰恰等于单词的术语构成频率之值，并提出了"FEL 公式"来描述这个定律。最近我国计算语言学研究工作者提出在术语研究中应提倡"结构功能观"，从结构和功能的角度来研究术语，并作了初步的探讨。

总的来说，我国术语学研究比较注重实用，但是在理论研究上注意不够。在术语学研究中提高语言学理论和计算机科学的修养，加强理论研究，是今后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应该在丰富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的概括与总结，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术语学理论，形成中国的术语学派。"九五"期间应当加强以下几方面的研究。

1. 进一步加强术语数据库的标准化。目前许多单位都在根据自己的需要建立各种术语数据库，没有或者很少考虑今后各个术语数据库之间的数据交换问题。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势必造成人力、资金的浪费。所以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应该通过标准化手段，加强术语数据库之间的协调和数据交换。

2. 加强海峡两岸科技名词术语的统一工作。海峡两岸的术语分歧，给科技、经贸、文化交流带来极大的不便。汪辜会谈已将两岸科技名词术语的统一排上日程。今后应进一步采取实际措

施，加强两岸术语研究人员和科学家之间的交流与协作，促进术语的统一。

3. 进一步加强对国际术语标准的研究和吸收。近年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制订了一系列关于术语学和术语工作的标准。其中许多标准，我国术语学界还不熟悉，比如关于“术语信息交换格式”（Terminology Interchange Format，简称 TIF），关于“通用标准置标语言”（Standard Generalized Make-up Language，简称 SGML 语言）等。我们应该设立专门的课题研究国际术语标准，只有加深了对国际标准的理解，才有可能采用先进的理论和方法来推进我国的术语学研究。

语言在社会其他领域的应用研究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语言应用范围越来越大，语言应用研究的领域也在不断延伸。80 年代以来，进展较快、成绩较为明显的领域主要有广告语言研究、法律语言研究、广播电视语言研究。这几方面的研究都处在起始阶段，加上资料不全，下面只能作概貌的介绍，难免挂一漏万。至于新闻语言研究等虽然重要，但是近年来进展不大，暂时从略。

一、广告语言研究

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广告事业很不发达，基本上无人研究广告语言。80 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广告业迅猛发展。在客观需求的推动下，从事广告和广告语言研究的人渐多，除了广告界外，语言学工作者的参加，使广告语言的研究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最近几年陆续出版了几本研究广告语言的著作。《广告语言艺术》是一本

比较全面的通俗性读物，书中所谈的某些内容，如语言在广告中的地位和作用，广告语言的运用等，都比较准确。其中“广告语言研究”部分对“广告语言与社会文化”、“广告语言中的新用法和新形式”都提出了很好的见解。此书实际上为广告语言研究准备了比较好的框架。《广告语言》是一本25万字的大书，对“广告语言战略”、“广告语言运用的心理战术”、“广告语言的创意与技巧”、“广告语言的艺术高度”、“广告语言的风格”等重要问题都有论述，反映出广告语言的研究正在逐步深入。《广告语言研究纲要》一文针对当前广告语言运用和研究的现状，提出了广告语言研究中的若干重要课题，比如广告语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近年来广告语言的发展和问题、广告语言的定位和创新、广告语言的规范，广告语言的思想性、广告语言里夸张与夸大的区别、广告语言的民族风格等等。

目前，广告语言的研究更趋活跃，研究论文的数量加速增长。思想愈加开阔，角度也越发新颖。如果说前一段研究还只局限于从语言结构本身、从语音、词汇、语法、文字、修辞等表达手段出发，探讨语言如何为广告宣传服务的话，那么，现在研究者已经开始注意从宏观语言学的角度把握广告语言的研究，开始注意联系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民俗学、交际学、传播学来思考、探索广告语言的创作规律。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但是，这还不够。正如有人指出的，广告语言研究的目的是直接为商品促销服务，为企业经营服务。因此，研究者要从纯语言学的圈子里跳出来，自觉地把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交际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理论同广告学、市场营销学、企业管理学等结合起来，深入到广告实践中去，才能弄清广告语言的性质、特点和广告语言应用的原则和规律，才能建立起一门能有效地为市场经济服务的应用学科——广告语言学。

二、法律语言研究

随着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加强，法律语言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与关注。司法界、语言学界都有人转向法律语言研究。近几年内各种刊物上研究法律语言的论文逐渐增多，还出版了一些专著。例如《法律文书的语言运用》、《法律语言》、《法律语言学》、《法律用词技巧》等。这些研究大都是运用现代汉语的基本理论（语词、句式等）来分析法律用语中成败得失的案例，总结、探索法律用语的特点、要求。研究范围逐步拓宽，从立法语言到审讯语言、司法文书语言等，有书面语，也有口语。近年来，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是法律语言的特征。说法不同，有的说“准确是法律语言的生命”，有的认为庄重性、严谨性、平易性是法律语言的三个特征，等等。实际上大同小异。针对一般人认为法律语言总是死板、枯燥、冷峻、严厉的看法，有人撰文提出法律语言的风格特征问题，认为法律语言中平实与生动、庄重沉稳与感情色彩、程式化与个性化、模糊与确切等等都是相对的，互相制约的。不宜片面地肯定一面而否定另一面，应当根据不同的文书体例恰当运用。此外，法律术语的命名和规范问题，已有文章提出讨论。至于法律语言是否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应用语言学科，也有不同的认识。总的说，法律语言的研究还处在打外围战的阶段，许多重要问题都有待深入研究。

三、广播电视语言研究

80年代以来，我国广播电视语言研究取得明显的进展。其中以张颂的《中国播音学》、《播音语言通论》为代表的播音学方面的著作，对播音语言的性质、特点，从文字稿转化为广播电视语言的规律和方法等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为播音学科奠定了理论

基础。在《播音语言通论》里，作者从宏观的角度，对播音语言的传统和创新，特别是主持人语言，提出了很多好见解，强调了语言学理论对播音语言的指导作用，有较浓的学术争论色彩。《播音风格探》对夏青等专家的播音创作道路和风格特点作了分析和总结，是播音语言风格研究的一本新著。《实用广播语体学》、《广播的语言艺术》，从广播学和语体学结合的角度对广播语体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其他如《广播电视语言》、《广播电视语言应用》，主要阐述了广播电视稿的编写原则、方法、要求等，对广播电视语言的规范有积极作用。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广播电视业的发展，广播电视语言也有很大的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语体，特别是节目主持人大量出现，他们的语言，迫切需要理论的指导。这些都是今后需要加强研究的内容。

对“九五”规划的建议

1. 国家在重点抓好自然科学(广义)研究的同时，要重视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重视语言学科的研究。

自然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含思维科学)构成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科学技术总体。为了发展经济，国家可以而且应当把重点放在自然科学上，但是，也决不可忽视人文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上不去，经济难以高速发展，落后就要挨打。而人文与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的落后、失误，却会直接影响国家的政策和发展方向，甚至关系国家的兴亡。这种作用难以量化，不易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一旦发觉，就常常是到了疾病的中晚期，难以收拾了，造成的损失绝非几亿、几十亿人民币所能度量的。希望从领导思想上重视发展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重视发展语言科学，重视发展应用科学。语言学是一门重要的科学。这不仅因为它为其他社会科学提供过

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和方法，对其他学科产生过重大影响，也不仅因为它是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的重要基础，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桥梁，而且因为语言是信息的主要载体，是人类所有信息中最重要的信息宝库。在未来信息社会里，语言不仅是人际交际的工具，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而且也是人机交际的工具。人工智能的研究有赖于语言学研究的成果，正如国外一些科学家所断言的，语言学发达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水平，首先是电子学和电子技术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

思想上的重视要落到实处。首先要制订一些倾斜政策，鼓励社会科学工作者勇于触动经济社会改革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勤于探索，取得成果。确有成绩的按情重奖。其次，要较大幅度增加社科科研经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科研经费似应保持 1:2 或 1:2.5 的比例。现在二者之间差别悬殊，不成比例。

2. 语言学科“九五”科研规划应从课题的立项到经费的分配向应用研究倾斜。重点放在应用学科中基础性研究的重大课题上。

3. 筹建现代语言学系。语言学科，特别是应用语言学科(广义)在下个世纪将有较大的发展，而且应用语言学各分支学科都是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它要求研究人员不仅要有扎实的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基础，而且要熟悉相关学科，例如数学、信息科学、数理逻辑等的基础理论，掌握计算机技术等等。现有的研究人员大都不适应这种需求。现有高校中文系的专业和课程设置也难以完成培养未来语言学研究人才的任务。因此建议在“九五”期间要认真考虑在全国选择 1—3 所有条件的大学尽快设置现代语言学系。专业方向、培养目标、课程结构、毕业生的去向等问题要组织专门的专家班子进行研究论证。

主要参考文献: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
《吕叔湘语文论集》,商务印书馆,1983。
王宗炎,《语言问题探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
桂诗春,应用语言学和认知科学,《语言文字应用》第3期,1993。
龚千炎、冯志伟,应用语言学研究刍议,《语文建设》第6期,1991。
张志公,对当前中学语文教改的意见,《语文学习》第1期,1994;
掌握语文教学的客观规律,《文汇报》1992年6月12日;
《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暨蒙学书目和书影》,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传统语文教育初探》,同上,1962;
《张志公语言和语文教育思想研讨会论文集》,语文出版社,1993。
胡明杨,语言观和语言教学,《语言文字应用》第4期,1994。
人民教育出版社编,《中学语文教学现状和设想》,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王光祖等,《全国初中语文教学调查与分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顾黄初,语文教学的多向探索,《扬州师院学报(社科版)》第3期,1992。
钟为永,语文教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河北师院学报(社科版)》第4期,1993。
汪潮,中国语文教学实验的回顾和展望,《教育研究与实验》第2期,1994。
盛冰、季银泉,我国当代语文教学模式,《教学与管理》第1、2、3、4、5期,1993。
余同生,建构有中国特色的语文教学模式,《语文学习》第8期,1992。

欧阳代娜，中学语文教学整体改革的构想和实践，《课程·教材·教法》第 2 期，1994。
吴春晔，曲折的历程，思想观念的转变，新教材体系的形成——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的回顾与展望之一、二、三，《甘肃教育》第 7、8、11、12 期，1993。
刘国正，深化改革，探索规律，《天津教育》第 1 期，1992。
于漪，语文教学应以语言和思维训练为核心，《课程·教材·教法》第 6 期，1994。
余应源，中小学语文教学轴心论，《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第 2 期，1994。
苗杰，训练语感：中学语文教学的首要任务，《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第 2 期，1992。
张厚感、赵大鹏，突出语文工具作用，加强语文能力训练《中学语文教学参考》第 5 期，1993。
何更生，中学语文课堂教学结构的改革，《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第 4 期，1991。
张孝纯，"大语文教育"的基本特征——我的"语文教育观"，《天津教育》第 6 期，1993。
甘其勋，九年义务教育初中语文教材述评(上、下)《语文教学通讯》第 7 期，1993。
张传宗，深化语文教改必须加强语言教学，《中学语文教学》第 1 期，1992。
熊兆武，语文学科直觉思维及能力培养，《盐城师专学报(哲社版)》第 4 期，1992。
顾振彪，对 21 世纪初叶中学语文课程教学内容的变革的展望，《教学与管理》第 4 期，1993。
陈建民，北京口语的语体比较，《修辞学习》第 4 期，1986；
汉语口语研究四十年，《中国语文通讯》(香港)第 7 期，1992。
李如龙，口语和口语的训练，《语言文字应用》第 1 期，1993。

李树荫,《实用口语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0。
李殿凤,《汉语口语教程》,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
张伯江、方梅,汉语口语的主位结构,《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1994。
[日]西槙光正编,《语境研究论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
夏中华,关于口语修辞学建构的设想,《锦州师院学报》第1期,1992。
吕必松,《对外汉语教学发展概要》,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
《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同上,1993。
第一、二、三、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1988,1991,1995。
对外汉语教学的定性、定位、定量问题座谈会纪要,《世界汉语教学》,1995年第1期。
程棠,关于当前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几个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1992。
高彦德、李国强、郭旭,《外国人学习与使用汉语情况调查研究报告》,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
刘英林(主编),《汉语水平考试研究》,现代出版社,1989;
(主编),《汉语水平考试研究(续集)》,现代出版社,1994。
盛炎,《语言教学原理》,重庆出版社,1990。
孙德坤,西方语言教学发展概要,《世界汉语教学》第3-4期,1994。
中介语理论与汉语习得研究,《语言文字应用》第4期,1993。
张旺熹,语言学习理论研究座谈会纪要,《语言文字应用》第4期,1992。
赵金铭,近十年对外汉语教学研究述评,《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1989。
柯平,语言规划,《语文建设》第7-10期,1991。

胡壮麟，语言规划，《语言文字应用》第2期，1993。
仲哲明，关于语言规划理论研究的思考，《语言文字应用》第1期，1994。
陈章太，语文生活调查刍议，同上，1994。
陈原(主编)，《现代汉语定量分析》，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
刘照雄(主编)，《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文件汇编(1986年1月)》，语文出版社，1987。
高天如，《中国现代语言计划的理论和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
《术语学、标准化与技术传播国际学术会论文集，TSTT'91》，科学出版社，1992。
《计算机辅助术语工作译文集》，语文出版社，1992。
曹志耘，《广告语言艺术》，湖南师大出版社，1992。
林乐腾(主编)，《广告语言》，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
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课题组，广告语言课题研究纲要，《语言文字应用》第1期，1995。
邵敬敏，论广告语创作的定位策略，《语言文字应用》第1期，1995。
宁致远、刘永章，《法律文书的语言运用》，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
邱实，《法律语言》，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
余致纯，《法律语言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周广然，《法律用词技巧》，检察出版社，1992。
宁致远，有关法律语言风格特点的几个问题，《语言文字应用》第2期，1995。
陈天恩，法律语言，准确为要，同上，1995。
陈炯，谈立法语言《语言文字应用》第3期，1995。
张维仑，法律术语命名(选用)的方法及意义，同上，1995。
张颂，《朗读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
张颂(主编)，《中国播音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0。

姚喜双,《播音风格探》,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
林兴仁,《实用广播语体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
林兴仁,《广播的语言艺术》,语文出版社,1994。
张颂,《广播语言通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4。
施旗,《广播电视语言》,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8。
牛印文等,《广播电视语言应用》,四川辞书出版社,1990。
Beeb, L.M.(ed) 1988, *Issu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Multiple Perspectives*. Newbury House Publishers
Ellis, Rod 1994, *Study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arsen-Freeman, D. 1991, *Second Lanuage Acquisition Research Staking out the territory*. TESOL Quarterly, Vol. 25,2.
Larsen-Freeman, D. & Long, M. 1991, *An Introduction to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esearch*. Longman.
Klein, W. 1986,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ichards, J.C. & Rodgers, T.S. 1993, *Approaches and Method in Language Teaching—A discription and analy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应用语言学研究的现状和展望(下)

中文信息处理

傅永和　刘连元　陈敏　王翠叶

一、中文输入技术

1. 汉字键盘输入技术

中文输入技术分汉字键盘输入技术、汉字的自动识别技术和汉语的语音识别技术三大类，它们在中文信息处理中的作用，各有侧重，功能互补。汉字键盘输入技术是10多年来中文输入技术的主流。汉字键盘输入方法通常指一个编码方案配有相应的软件系统实现在计算机上输入汉字，也就是说，一个完整的汉字键盘输入方法是由编码和软件两个层次组成的。

汉字键盘输入方法，按不同的标准分类，主要有四种不同的分类结果：按键盘类型分类，有通用键盘、专用键盘和无键盘三种输入方法；按信息特征分类，有音码、形码、音形码和形音码四种输入方法；按文稿类型分类，有看打、听打和想打三种方式；按用户类型分类，有普通用户和专职用户两种。

汉字键盘输入的理论和技术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发展。

1）从人工设计编码方案发展到计算机辅助设计编码方案。早期编码方案靠人工设计，做无数卡片，进行排列组合，人工统计汉字属性数据。后来，则利用汉字属性库，由计算机自动抽取信息特征进行编码，从而加快了编码方案的设计周期。

2）从单纯讲求从汉字形、音、义特征出发的编码方案素质发展到讲求编码方案——支撑软件素质。早期汉字键盘输入系统的软件层次是极简单的，本身处于被动状态，编码方案的优劣决定系

统的性能。如编码作者极力追求低重码率，甚至是无重码，结果导致规则增加，难学难记。后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汉字键盘输入系统不能仅依赖于编码本身，软件层次的作用更加重要。人们开始注意发挥软件的主动性、自学习性和智能性。如字词相关重码的自动选择、词语的自动切分和记忆等。智能化较强的软件可以减轻人脑负担而开发计算机的潜力。

3）从汉字编码发展到汉语词语编码。汉字键盘输入方法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字处理阶段、词处理阶段和句处理阶段。字处理阶段主要进行了汉字库、汉字交换码、汉字编码、汉字键盘设计等方面的研究；词处理阶段主要进行了词语编码、词频统计、自动分词、通用词库等方面的研究；句处理阶段正在进行词语搭配、语义、语用方面的规则及句型统计等方面的研究。有无词处理能力及词处理水平是衡量一个编码输入方法优劣的重要标志，具有句处理手段的输入方法将具有极强的智能性。

4）从只注重专业型输入方法发展到同时注重专业型和普及型两个方向的输入方法。早期只追求高速度的输入方法，后来开始注意追求速度与易学性统一的输入方法。

5）从只处理简化字发展到繁—简字的切换与兼容处理。最初编码方案只对6763个规范字编码处理，后来由于大量古籍的信息处理，开始对简繁两种字体编码，并由软件对其进行切换与兼容处理。

目前，据有关部门统计，国内外出现的汉字编码方案已有几百种，已实现的汉字键盘输入方法近百种，已推入市场的有几十种，推行较为成功的有十几种。国内若干输入方法领先于海外及港台地区；有的有极高的输入速度；有的有极低的重码率；有的编码规则简单明确，易学易记；有的兼具多方面优点，为许多用户所采用。总之，汉字键盘输入技术初步解决了汉字进入计算机的难题。

为了对汉字键盘输入方法进行优化，相应的评测工作和研究逐渐发展起来。国内较大规模的评测、评比活动进行过十多次，规

模最大的是1986年举行的首届全国汉字键盘输入方案评测。海峡两岸也就评测问题进行了交流和接触。有关专家对评测规则和实施办法进行了认真的研讨。国家有关部门曾制订了《汉字键盘输入方法评测规则试行草案》，其内容涉及静态测试、动态测试、定量测试、定性评价、综合评估及评测细则。1990年纳入国家“七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的“汉字键盘输入方法研究”，已有两项通过了技术鉴定，其研究内容和结果基本一致。所制订的评测规则和实施细则在国内、国际比赛中多次进行了验证。其评测研究的内容和结果有《汉字键盘输入方法评测规则》、《汉字键盘输入方法评测实施细则》、《汉字键盘输入方法评测用标准试题库》等。

汉字键盘输入技术今后的研究重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开展汉字键盘输入技术的规范化研究。目前，之所以出现几百种汉字编码方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规范，甚至是虽有标准和规范也未遵从。汉字键盘输入方法的设计者追求的指标通常有高速度、低重码率、高效率、易学易用等，但很少有人考虑规范性如何。汉字键盘输入技术的规范化应包括编码规范化和软件规范化两方面。汉字编码规范化是输入技术规范化的重要方面。目前有许多编码尤其是形码输入法存在着任意拆字的不规范做法，给用户应用、人员培训及中小学教学造成了困难，“可以说是电脑对汉语言文字的‘污染’，或者是一种汉语汉字信息处理的‘病毒’”[1]。因此，今后需尽快制订字音、字量、字序、部件、部首、笔顺、字结构等语言文字方面的规范。同时国家有关部门还需采取有效办法使汉字键盘输入方法的设计者严格遵从有关规范。软件的规范化长期以来是薄弱环节，至今还没有形成中文软件的技术标准。随着汉字键盘输入方法对软件作用要求的提高，应尽快研制软件技术标准和规范，从而提高软件质量，增加软件的可维护性，方便用户使用，实现同国际标准接轨。

2）研究汉字键盘输入系统的通用性。目前，众多的输入方法各自构成封闭式的专用系统，给用户造成了许多不便和系统资源

的浪费。编码层次暂时不易求得绝对的统一，这就需要“在软件层次上实现通用性”[2]。通用性的输入系统应能提供大多数汉字编码的生成接口、各种标准字符集的接口、专用词库和通用词库接口，并能适应多种机型和操作系统。

3）尽快实现汉字键盘输入方法的相对集中或统一。通过评测、行政手段和市场竞争等办法，把几百种汉字键盘输入方法统一到少数几种公认的符合规范和标准的优秀方法上来，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4）加强汉字键盘输入方法的智能化研究。智能化软件水平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句处理的水平。今后需完善字、词处理，研究句处理，重点研究词法、句法、语义和语用知识在汉字键盘输入方法中的应用。

5）要注意瞄准商品化输入软件的国际大市场。商品化输入软件不能只面向国内市场，还要面向国际市场。要申请国际专利，开发以外销出口为目的的特殊软件。

汉字键盘输入方法评测今后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研究重点：

1）汉字键盘输入方法的评测研究需进一步细化。目前虽然已有单位研制了汉字键盘输入方法的评测实施细则及评测软件，但还需进一步充实、完善，使其成为科学实用的评测标准。同时，还要尽快制订汉字键盘输入的语言文字规范评价原则，以利实现汉字输入的规范化，并促使汉字键盘输入方法相对统一。另外还需进行评测软件智能化的研究。

2）汉字键盘输入方法的评测模式应有新的变化。汉字键盘输入方法的评测工作，今后应由过去大规模评测的模式转变为集中评测、日常评测和检测并行的模式，即对于新的输入方法仍进行评测，而对于已投入市场的输入方法则进行达标式的评测。

2．汉字识别技术

汉字识别是汉字自动、高速输入的一种重要方法，属于模式识

别和人工智能范畴。汉字识别系统通常"由扫描、交互式版面分析的前处理、单字识别器和自动分词汉语词上下文匹配后处理构成"[3]。

汉字识别的类型主要分三大类:联机手写汉字识别、印刷体汉字识别和手写汉字识别。联机手写汉字识别是最简单的一种汉字识别类型,也是一种较为方便的汉字输入手段。印刷体汉字识别包括单体印刷体汉字识别和多体印刷体汉字识别两小类。手写汉字识别包括手写印刷体汉字识别、特定人手写汉字识别和人机交互式手写汉字识别三小类。上述三大类中除了第一类是联机识别外,其余两类都为脱机识别,这两类又被称为汉字 OCR(光电阅读)。联机识别的难度要大大低于脱机识别。联机识别软件因采集的是书写时的实时信号,既可利用文字图像各像素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信息,还可利用它们之间的时间关系信息,这使得它在非键盘汉字输入中成为一种最有前途的汉字输入方式。

汉字识别的方法,就是指特征抽取、分类判别的方法。特征抽取和分类判别决定了汉字识别系统的品质。同模式识别一样,汉字识别的方法主要是统计和结构两种基本方法。"统计法宜识别有噪声的文字,特征抽取容易且稳定,但不能很好地利用结构信息;而结构法可利用汉字字形的结构关系来识别,对文字变体、变形适应性好,但抗干扰能力低。"[4] 早期的汉字识别方法往往是应用单纯的统计法或单纯的结构法,后来逐渐把二者结合起来,即在结构法中应用了统计法的模式分布性质,在统计法中也使模式的表示体现模式的结构特征。如目前较实用的印刷体汉字识别系统采用的识别方法是把统计法和结构法有机结合,并突出汉字字形结构特点。手写印刷体汉字识别系统采用的是以汉字结构特征为主的统计识别方法。总之,目前汉字识别的基本方法是着重汉字字形结构特点,将统计法和结构法有机结合。预计这将是今后汉字识别方法的主要发展方向。

我国汉字识别技术自 70 年代末起步,目前正向实用化发展。

印刷体汉字识别是我国汉字识别研究的主流，1988年已有五六个系统基本达到实用化，并形成商品。它们的主要技术指标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识别字数可达3755—4000个，识别速度为20字/秒左右，对中等印刷质量文本识别率达到95%—99%，识别字号为3—6号，识别字体有宋、仿宋、楷、黑等，有一定版面分析和后处理能力，初步具备了适用的人机界面。其中，多体印刷体汉字识别系统具有较高的适应性和抗干扰能力，受到用户的普遍欢迎。

联机手写汉字识别1988年已有几个初步实用的装置。其指标为：识别字数可达6763—12000个；识别速度与人书写的速度基本相当；初次使用的识别率为80%左右，经常使用的可达95%。书写时要求笔形和笔画数比较正确，极常用的少数字可连笔书写，笔顺不严格要求，可以说还处于手写楷书汉字联机识别阶段。

手写汉字识别自1988年才开始认真研究，近两年进入了高潮，全国已有几个实验性系统进行了鉴定。特定人手写汉字识别已在小范围内试用，识别速度用386微机为1字/秒。接近实用的交互式自学习手写汉字识别系统，可识别3755个字，其前十位候选正确率为80%—95%。手写印刷体汉字识别离实用还有一定的距离，已从方法研究转向实用系统的研究。

为了了解我国的汉字识别水平，优化现有的汉字识别系统，国家有关部门曾举行过两次汉字识别的评测研讨会，初步确定了一些评测标准及相应的测试方法和工具。

从总体看，汉字识别技术今后的研究方向主要有三个：

1）人工神经网络技术用于汉字识别。人工神经网络技术具有高度的自组织、自适应和自学习能力。在我国手写汉字识别和印刷体汉字识别的研究中已得到了应用，今后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2）语言学知识用于汉字识别。识别实际文本时，文中大部分字及其相邻字要受到词、句法、语义的限制，因而是相关的。识别系统利用这些相关性的知识，可改善孤立字识别时的性能，这样，把单字识别技术同语言学知识结合起来，能提高识别系统的水平。

在已有的印刷体汉字识别系统中，后处理便利用了汉语的词进行自动纠错。今后将进一步利用词的上下文匹配和基本句法、语义的上下文匹配，来提高系统对实际文本的识别率。

3）多种识别方法集成。将多种识别方法集成在一起表决判别，可大大降低系统的误识率，提高总的识别率。

具体来说，汉字识别的不同类型各有其具体的研究重点。印刷体汉字识别方面，需要加强其实用化的深度和广度，使识别系统从能用走向好用。重点是提高系统效率和品质，增强系统适应性，并扩大识别输入的印刷文本范围。今后需要做的研究工作有：改进前处理，提高系统对每个汉字切分的正确率，尤其是提高系统对汉字、字符混合文本的字符切分正确率；改善人机综合环境；改进后处理自动纠错能力；增强系统抗干扰性能，实现对低质量印刷文本的识别。

联机手写汉字识别方面，今后的研究重点有：

1）研制低限制的联机手写汉字识别系统。低限制的联机手写汉字识别，又称联机自然手写汉字识别。最近，笔式计算机的兴起，使联机自然手写汉字识别掀起了新高潮。笔式计算机的技术关键是改变目前联机识别装置只能识别部分人认真书写的规整汉字的状况，进而能识别人们平时自然书写的汉字，如连笔书写的行书、行草。这种识别系统是今后的研究方向，一旦达到实用化，将有很大的市场潜力。

2）注意手写汉字的规范性。当前，有些联机手写汉字识别系统为了求得方便用户，无笔顺限制，允许笔画短缺，甚至人为规定一些简化规则，允许用户写不规范的简化字，“这不能不认为是进入了联机手写汉字识别的误区”[5]。为了维护祖国语言文字的纯洁性，联机手写汉字识别系统，应在汉字的笔顺和笔画方面有适当的限制。

3）研制价格便宜、性能稳定、书写方便的输入板和笔。输入板和笔是联机手写汉字识别装置重要的硬件设备，它们的优劣直

接影响整个识别系统的水平。

4) 加强识别软件的学习功能。识别软件的学习功能有利于计算机不断适应人的书写习惯，从而提高识别率。目前有的产品已有一定的学习功能，但随着计算机个人化，这种学习功能将显得更为重要。

手写汉字识别方面，需要改善已有的识别方法，研究新的识别方法，提高系统识别率，使其努力接近初步实用水平。特定人手写汉字识别与手写印刷体汉字识别相比，不但可以放松书写限制，还可在同样的技术条件下达到更高的识别率，因此，比手写印刷体汉字识别能更快地得到实用。今后需要加强系统自学习功能和学习方法的研究。特定人手写汉字识别系统要求边输入边学习，给用户造成了不便，需要从理论上进行研究，加以解决。手写印刷体汉字识别今后也需要加强系统自学习功能，使系统扩展成具有特定人手写汉字识别的特点。当手写印刷体汉字识别系统的识别率提高后，特定人手写汉字识别系统将失去其重要性。

随着各种汉字识别系统、软件和装置逐渐步入商品化，应尽快制订一套科学、实用、客观的评测标准，以利于产品鉴定、系统改进和市场导向。

3. 语音识别技术

语音识别是一种高科技的人工智能技术，它通过抽取语音特征参数来辨别语音。近年来，语音识别技术用于计算机中文输入，比键盘输入方便、迅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

语音识别有三种主要的识别方法，即模式匹配方法、隐马尔可夫模型方法和人工神经网络方法。三种方法各有利弊，把它们结合起来取长补短，将有利于语音识别技术指标的提高。

语音识别的类型，按不同的标准分类，有三种不同的分类结果：按使用人分类，有特定人语音识别和非特定人语音识别；按词汇量分类，有小词汇量语音识别、中词汇量语音识别和大词汇量语

音识别;按发音方式分类,有孤立词语音识别和连续语音识别。另外,还有使用环境优劣的区分,也就是指噪声轻重情况。目前噪声下的语音识别还只是在初步研究阶段。通常所说的语音识别都是有较好的使用环境。从技术上的难易程度说,上述每小类语音识别,后者都比前者难。如果将上述三小类排列组合起来,应该有12大类,即特定人小词汇量孤立词的识别、特定人中词汇量孤立词的识别、特定人大词汇量孤立词的识别、非特定人小词汇量孤立词的识别、非特定人中词汇量孤立词的识别、非特定人大词汇量孤立词的识别、特定人小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特定人中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特定人大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非特定人小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非特定人中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非特定人大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这12大类一类比一类难,尤其是后五类目前还很少有人研究,有待今后攻克。

我国语音识别技术经10多年的发展,目前已开始走向实用。以汉语全音节识别的成绩最为显著。特定人大词汇量孤立词语音识别系统,具有较高的识别正确率和响应速度,有的已初步商品化,识别率基本能达到80%以上,有的还可达到95%以上。基于神经网络方法进行的汉语声母、韵母、声调的识别,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有些单位四声识别已达到近100%的水平。利用声学信息进行的语音识别,有一些中、小词汇量的语音识别系统已投入实际应用,如口呼语音输入的自动查报电话号码系统、声控电话查号系统等。非特定人中、小词汇量孤立词语音识别已取得优异的成果,利用适合于汉语特点的概率统计模型对不同话者和语流速度的变异有相当强的适应性,目前正向大词汇量孤立词语音识别系统迈进。连续语音识别刚刚开始,特定人小词汇量的连呼识别,特别是连续数字串语音的识别在实验室里已做到实时识别,并有较高的识别率。连续语音识别的后处理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噪声下的语音识别已在做初步的方法研究。

关于语音识别的评测工作,国家有关部门曾举行过两次语音

识别评测研讨会，同汉字识别评测研讨会是一起举行的。初步确定了一些评测规则及评测方法。

语音识别今后需努力做到能用且好用，应开展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工作：

1）加强识别方法和处理手段的研究，"提高语音识别的鲁棒性"[6]。目前不少语音识别系统尤其是全音节语音识别系统的识别率已比较高，但其高指标是以一定的条件限制为代价的，如说话方式比较稳定、说话环境较安静等。要想实现低限制的自然语音识别，如噪声下的语音识别，必须改进已有的识别方法，探索新的方法和途径，解决语音特征参数抽取、时间对准、模式划分问题，进一步完善话者适应技术。

2）加强非特定人、大词汇量、连续汉语语音识别的研究。目前语音识别系统大多局限于特定的说话人、有限的词汇量或孤立词，非特定人、大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还面临许多困难，今后需重点研究，争取尽早达到实用水平。

3）开展建立语音库和语音特征库的研究。语音识别方法和处理手段的研究、识别系统的设计和训练等依赖于一个标准的语音库和语音特征库。

4）注意计算机听觉模型的研究。目前的语音识别主要是根据人的发声机理建立数学模型。其实，发声和听声是不同的。根据人的听觉感知生理模型和心理模型研究计算机的听觉模型，对语音识别向高级阶段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5）注意研究模糊数学理论在语音识别中的应用。模糊数学理论用于语音识别，可以探索克服语音多变性和语音数据不足给声学模型学习训练造成困难的新途径。

6）加强人工神经网络方法用于语音识别的研究。人工神经网络作为一种识别方法，已有人开始进行应用研究，但进展不太大，今后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如用人工神经网络方法识别大词汇量时的尺度问题和训练问题。

7）研究语言学知识在语音识别中的应用。目前语音识别的方法主要是利用语音信号中的声学信息和模式匹配。语音识别的终极目的是语音理解。语音识别和语音理解一样，不能仅依赖于声学信息，还需依赖于语言学的信息。如利用汉语的词法、句法、语义和语用知识来解决语音信号多变性的问题。语音识别要达到高级水平，必须利用语言学知识。

随着语音识别技术理论研究和应用开发的不断深入，研制语音识别评测标准也提到了日程上来。

二、字符集及编码

1．汉字编码字符集国家标准

我国于1980年发布了国家标准—GB2312—80《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为中文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84年有关部门又提出了繁体字与简化字对应编码的原则，并做出了制订五个辅助集的计划。目前，五个辅助集均已研制出来。基本集、第二、四辅助集是规范字集，第一、三、五辅助集是与基本集、二、四辅助集对应的繁体字集。上述六个集采用的都是双七位编码方式，其中，五个辅助集的标准文本中还建议了它们在双八位编码环境中的使用方式。现将六个汉字编码字符集标准简介如下：

1）基本集（国标编号GB2312—80）。本集收集了7445个图形字符。汉字分为两级：第一级按音序排列，有3755个汉字；第二级按部首排列，有3008个汉字。本集能基本满足汉字信息处理、汉字通信等系统间的信息交换的需要。

2）第一辅助集（国标编号GB12345—90）。本集是与基本集对应的繁体字集。收入图形字符7583个，同基本集的分级方式一样，一级汉字3755个，二级汉字3008个，但另有103个繁体字是简/繁一对多关系的字，选一个最常用或最通用的繁体字编码放在

与基本集中该字相对应的码位上，其余的编码放在别的区。

3）第二辅助集（国标编号 GB7589—87）。本集收入规范字 7237 个，不分级，按 201 部首序排列。本集是为字量超过基本集的应用而编制的，“所选的汉字之用途及使用率虽然低于基本集，但仍应具有一定的通用性和实用性”[7]。

4）第三辅助集。本集是与第二辅助集对应的繁体字集，两集的收字具有简/繁一一对应关系，收字量也是 7237 个。

5）第四辅助集（国标编号 GB7590—87）。本集收入 7039 个规范汉字，不分级，按 201 部首序排列。本集是为字量超过基本集和第二辅助集的应用而编制的。

6）第五辅助集。本集是与第四辅助集对应的繁体字集，两集的收字具有简/繁一一对应关系，收字量也是 7039 个。

目前，基本集已发布出版，第二、四辅助集及第一辅助集已正式发布，第三、五辅助集待发布。

GB2312—80《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虽已被广泛应用，但由于其中存在收字不够合理、字形不够规范等问题，今后需做些适当的修正和补充。例如《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中收了而基本集中未收的几百个字当补收到基本集里来。

2．少数民族文字编码字符集国家标准

我国除汉族外有 55 个少数民族，其中有 17 个少数民族具有本民族文字。应用最多的有七种，即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彝文和壮文。其中，蒙古文、朝鲜文、维吾尔文和彝文已有了编码字符集国家标准。现将四种少数民族文字编码字符集国家标准简介如下：

1）GB8045—87《信息处理交换用蒙古文七位编码和八位编码图形字符集》。本集是我国制订的第一个少数民族文字编码字符集标准。共收入 95 个图形字符，其中有 82 个蒙古字符、13 个符号。采用单七位或单八位编码，即单独使用时，用单七位编码，

与英文并用时，用单八位编码。实际使用时，为了与汉字兼容，基本不用单字节编码，而用与 GB2312—80 类似的结构，只是在同一区内保持与国标码的一致性。

2) GB12050—809《信息处理交换用维吾尔文编码图形字符集》。本集规定了两个七位编码字符集和一个八位编码字符集。两个七位编码字符集中，一个是基本集，收维吾尔文字母、数字及标点符号 70 个图形字符；另 ·个是辅助集，收维吾尔文字符 72 个。八位编码字符集中收 142 个图形字符。由于维吾尔文字母构词时位置不同会发生字形变化，"为了便于实现自动选形，在编码中采用了每个字母的各个字形（词头、词中、词尾、独立）'低五位同码'的方法"[8]。

3) GB12052—89《信息处理交换用朝鲜文编码字符集》。本集采用双七位编码方式。收入 5979 个图形字符，其中朝鲜文字 5297 个，非朝鲜文字 682 个。朝鲜文字分两级：第一级是符合现代朝鲜文音节结构的字 3424 个；第二级是不符合现代朝鲜文音节结构的字 1873 个。

4)《信息处理交换用彝文编码字符集》。本集已制订完毕，待审。采用双七位编码方式，与我国的其它双七位编码字符集的格局相同。收入图形字符 1853 个，其中彝文字符 1165 个，采用英文字母表的顺序，按音序排列，非彝文字符 688。

我国少数民族文字编码字符集今后的研究重点有三个方面：

1) 目前我国少数民族文字编码字符集未采用统一的编码体制，有单字节编码、双字节编码，有七位编码、八位编码，不利于实现各民族文字信息处理的兼容，今后应做适当修正和补充。

2) 有些少数民族文字的编码字符集国家标准的收字量满足不了实际需要，如彝文有许多彝文古籍需要进行信息处理，但彝文编码字符集国家标准没有收古彝文字符，今后应对其字符集加以扩充。

3) 未制订编码字符集国家标准的少数民族文字，应尽快研制

国家标准。

3. 国际标准 ISO 10646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于1984年开始着手研制《信息技术·通用多八位编码字符集(UCS)》国际标准,1993年5月该标准的第一部分即ISO/IEC 10646.1正式发布。

该标准规定了UCS的总体结构、编码表示形式、子集、实现等级和标识机制。下面分别加以简要介绍。

1) UCS的总体结构。标准中,"规定的代码是一个由32768个字符平面组成的单个字符集,这些平面可分为128个组,每个组由256个平面组成,而每个平面由256行组成,每行又包含256个字符位。一个字符编码在一个字符位上"[9]。基本多文种平面(BMP)是目前定义的唯一的一个平面。它是UCS代码空间中00组内的00平面,可独立使用。该平面有65469个代码位置,共四个区,A区用于拼音文字编码,I区用于中日韩统一的表意文字编码,0区留作未来标准化用,R区作为限制使用区(包括输出表示字形、专用字符及兼容字符等)。BMP平面之外的其它平面,是辅助平面和专用平面。辅助平面用于放置BMP不能容纳的字符,专用平面的字符可以由用户自定义,标准中未加规定。

2) UCS的编码表示形式。标准中提供了两种可替代使用的字符编码表示形式:一是四八位正则形式,允许以每个字符四八位编码方式使用UCS中的全部字符,字符编码由其组八位、平面八位、行八位及字位八位组成;二是双八位BMP形式,允许以每个字符双八位编码方式使用BMP中的字符,字符编码由其行八位和字位八位组成。其中,第二种编码表示形式比较实用,为工业界所看重。

3) UCS的子集。为了满足不同应用的需要,标准中引入了两种子集的概念:一是有限子集,由逐个列出UCS中的若干个字符构成;二是选择子集,由UCS中定义的图形字符汇集的清单组成。

"有限子集为现存系统向使用 UCS 平稳过渡提供了一条现实途径"[10],"选择子集为有选择地实现 UCS 中的各个汇集的组合提供了实现的灵活性"[11]。

4) UCS 的实现等级。标准中规定了三种实现等级供用户选用,它们是 1 级实现、2 级实现和 3 级实现。

5) UCS 的标识机制。标准中主要对带实现等级的 UCS 编码表示形式、控制功能、子集、从 UCS 返回 ISO 2022(GB2312—80)等内容规定了具体的标识。

从上述介绍可以看出,该国际标准的制订是多文种信息处理技术的突破性进展。与以往的 ISO 2022 标准和国标 GB2312—80 相比,新的国际标准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 世界各语言文种字符统一编码,采用等长架构,一字一码,不再存在中西文兼容的问题,为世界计算机软件的大统一奠定了基础。

2) 标准中已定义的 BMP 形式有 65469 个编码空间,足以收录世界众多的文字及符号,对字量庞大的东方各国尤为重要。

3) 世界各语言文字在标准中具有唯一编码,为国际间的信息交换和通信奠定了基础。

4) 标准中按文种编码而不按语言编码,避免了编码空间的重复占用。突出表现是中日韩汉字统一编码,BMP 中 I 区的表意文字采用中日韩汉字统一编码方式,以现有各标准字符集为源字符集,按统一的汉字认同规则进行认同与甄别,形成涵盖各源字符集的中日韩汉字统一字汇,共 20902 个字符。另外,我国几个少数民族文字字符与国际相应的文种字汇并收,也是国际标准按文种编码的一个表现。我国的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和柯尔克兹文的字汇与其它阿拉伯文字符一同收入阿拉伯文字汇,我国朝鲜文字符和韩国的朝文字符一同收入朝文字汇。我国的蒙文等暂未收入标准中,但已作为未来将要扩充的文种列入附录 N 中。"[12]

ISO 10646.1 发布后,国际标准化组织一直在为该字符集的

扩充做准备工作，预计 1997 年或 1998 年完成。目前已多次开会讨论各国提出的扩充方案，焦点问题有两个：字汇扩充和体系结构扩充。在字汇扩充方面，各国都看重了 BMP 这一重要平面，希望在其剩余的 21K 的编码空间里占据更多的码位。为此，国际标准化组织规定了严格的评估程序和批准原则。其规定对小字符集的扩充有利，而对我国提出的汉字、蒙文、藏文、彝文、维文、傣文等多文种字汇扩充方案则非常不利。我国有关部门正在组织有关专家对此进行研究推动工作。在系统结构扩充方面，美国已提出了称作 UTT16 的结构扩充方案。

ISO 10646.1 发布后，UCS 的实现在国际上也有了很大的进展。世界各公司竞相以此国际标准为基础，从字形、系统软件、文本处理、工具软件、应用系统环境及应用系统等方面，进行相应产品的研究和开发。面对这样的挑战和机遇，我国有关方面也开始积极行动。在标准制订方面，1994 年 1 月制订出了与 ISO 10646.1 对应的国家标准 GB 13000.1；在产品开发方面，有的公司在 UNIX 上实现了 UCS 的双八位基本多文种平面形式，为 UCS 应用软件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针对 ISO 10646.1 这个国际标准，我国今后的研究重点有两个方面：

1）在 ISO 10646.1 今后的扩充工作中，我国有关部门要积极组织有关专家为我国多文种字汇的扩充进行充分研究，争取在 BMP 平面上占据更多的码位。关于汉字，主要需扩充部件、部首及 20902 个字以外的较通用字。

2）由于 ISO 10646.1 中采用了中日韩汉字统一编码，我国需采取有效办法，防止国外汉字及繁体字、异体字对我国出版物、办公文书等的干扰。

4．汉字内部码

汉字内部码是指在设备或系统内部处理用的汉字代码，也叫

处理码。对于西文来说，处理码就是交换码；而对于汉字来说，处理码与交换码是不同的，汉字交换码是汉字内部码的基础，但不是内部码本身。

汉字内部码多年来一直缺乏统一的规范与标准，随着国外各种机型的引进，各个流派各自设计汉字内部码，致使国内外派生出十几种内码制式，造成计算机汉字内部码的混乱。ASCII 体系的汉字内部码的主要区别在于如何处理占用 C1 集，有的是占用 C1 区的模式、有的是未占用 C1 区的模式，每种模式又有不同的编码方案。EBCDIC 体系的汉字内部码一般有两大类：一类是采用 SO/SI 机制的编码方案，一类是采用空档码方案。各厂家在具体实现方面又有较大的差别。内部码的混乱潜伏在系统之间或机种之间的各个界面上。随着计算机应用从单机到网络、从单用户到多用户的发展以及各种信息系统的建立，汉字内部码的不统一，给用户带来了资源共享的困难。因此汉字内部码的标准化问题便提到了日程上来。1987 年 10 月成立了“中文内部码与数据类型标准化工作组(CICDT)”，这个工作组从 1987 年 12 月底开始对各公司汉字内部码的现状进行调查。经过近三年的调查研究，于 1990 年 5 月确定了 ASCII 代码体系和 EBCDIC 代码体系的汉字内部码推荐方案，并且初步规定了汉字内部码规范的编制原则。下面简要介绍其编制原则及推荐方案。

1）汉字内部码规范的编制原则

汉字内部码规范的编制原则主要有以下七条：

① 编码空间足够大，并且有扩充的可能性；

② 码长应固定，以便于处理；

③ 信息的冗余度要小；

④ 能唯一地标识汉字；

⑤ 尽量回避专用的控制字符；

⑥ 与交换码要有简单的对应关系，即可用简单的公式转换，编码是连续的、字序保持一致；

⑦ ASCII 与 EBCDIC 两大代码体系间要有对应关系。

2）ASCII 代码体系的汉字内部码推荐方案

此方案以内部码与交换码排序的兼容性为出发点，由两个内部码区组成，有 17672 个编码位置。此方案的优点是：能满足用户的需要；采用双字节的等长码，码长最短；与国内普遍使用的 CC-DOS 汉字内部码方案相兼容；与国标 GB2312—80 交换码有良好的对应关系，排序兼容性好，代码转换容易；回避了 C0 集和 C1 集控制字符。

3）EBCDIC 代码体系的汉字内部码推荐方案

此方案与 ASCII 代码体系的汉字内部码方案相对应，均由两个内部码区组成，同样有 17672 个字符编码位置。不同的是"此方案为 S0/S1 机制的编码方案，即在系统中，一个汉字信息必须以字符 S0(OE)作引导标志，以字符 S1(OF)作结束标志"[13]。此方案除了在字符位置、码长方面与 ASCII 代码体系的汉字内部码方案有相同的优点，还有另外三个方面的优点：一是第 I 内部码区与国标 GB2312—80 交换码有良好的对应关系，顺序一致，公式转换简单；二是与 DBCS HOST 码基本兼容(汉字空白字符除外)；三是编码连续。

在上述两种推荐方案产生的同年，美国的一些强有力的公司推出了一种称作 Unicode 的字符编码方案，意思是唯一的、通用的和统一的字符编码。1993 年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了《信息技术·通用多八位编码字符集(UCS)》国际标准——ISO 10646.1。Unicode 与 ISO 10646 都是多字节编码，它们在制订过程中从相互对立与竞争到逐步趋于统一。新代码体系实现后，就不再存在汉字内部码的问题了。

汉字内部码的规范化与标准化是汉字内部码今后的研究重点。从长远来说，应向国际标准靠拢。但由于我国目前所用机器仍基于单字节字符处理与存储机制，新旧代码体系的转换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因此，短期内，一方面要为新代码体系的实现做

准备工作，一方面需尽快推出汉字内部码的标准。CICDT 确定的两个推荐方案都有其缺点。ASCII 代码体系的汉字内部码方案的缺点是：汉字与汉字间、汉字与西文字符间易产生移位错误；汉字与西方字符间易产生二义性错误；在某些西文系统内，对高位加"1"码有可能产生处理错误。EBCDIC 代码体系的汉字内部码方案的缺点是"容易发生二义性错误；因需加上 S0 和 S1 标志，增加了处理的负担，且汉字字符的内部长度和外部显示不一致。如果要使这两个方案变成正式国家标准，必须加以改进，使其完善。否则就需另外制订标准。

三、中文输出技术

1. 汉字字形技术

近年来，字形技术在国际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形成字形信息产业。汉字由于字形复杂，字数繁多，在采用国际新技术时，存在着其特有的难点。"一般来说，汉字字形技术主要包括字形数据的产生和压缩以及字形的还原技术。计算机处理字形时，首先把字形（字稿）转化为计算机能识别的数据，这个过程称为数字化过程或字形描述"[14]。汉字库与西文字库有很大区别，西文 26 个字母的组合就能表示所有的单词，大小写字母加起来只有 52 个。汉字仅国家标准《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就有 6763 个汉字，每种字体就有 6763 个字形，每种字体又有 10 多种字号，如果把这些数据都存储到计算机中去，其存储量将是天文数字，因此必须对数据进行必要的压缩。常用的压缩方法有黑白段压缩法、部件压缩法和轮廓字形法。黑白段压缩法比较简单，还原速度快，字形不失真，但压缩比差，使用起来也不方便，一般在低级的办公系统中使用。部件压缩法压缩比大，缺点是字形质量不能保证。轮廓字形法是最新的一种压缩方法，这种方法压缩比大，且已成为一种趋势。被压缩的数据最终还将还原成点阵输出到计算机的外部

设备上,还原技术要求还原速度快,字形还原质量好,特别是在小字的还原技术上。

汉字字形库,依据其描述技术的不同,可分为点阵字库,矢量字库和曲线轮廓字库。点阵法是最早使用的一种描述字形的方法。它利用位于一定栅格内的点来表示字形,每个字形对应于一组特定的二进制点阵数据,通过这组点阵数据来存储、显示和打印汉字的字形。我国从80年代初开始研制点阵字库,1985年以来,已相继颁布了多种点阵字库的字模集和数据集国家标准,规格有15×16、24×24、32×32、36×36、48×48、128×128、256×256,字体有宋体、仿宋体、楷体和黑体。就一定大小的汉字字形来说,点阵字库在这一大小上同其它字形库相比,其质量一定是最优的。点阵字库的缺点是数据存储量大且字形不易放大和变化,字形放大后有明显的锯齿感或折线感。上述国家标准点阵对信息都没有进行压缩。对于高分辨率的输出设备,单纯的点阵字库将被淘汰,但对于低分辨的针打和屏幕显示,点阵字库仍有明显的优越性。

矢量法用直线描述字形轮廓。一般说来,矢量字库已能满足高质量输出的要求且具有存储量小的优点。到1993年,矢量字库已比较多地用于高档汉卡和激光打印机,并已有相应的国家标准。但当字形放大倍数很大时,矢量法所产生的字形仍会显出折线感。

曲线轮廓法是一种最新的字形描述技术。这种技术将字形看作是一种图形,采用特定的数学曲线描述字形。目前有代表性的曲线轮廓技术有两种:一种是美国 Adobe 公司的 PostScript 字形技术,另一种是 Apple 公司的 True Type 技术。

PostScript 是一种页面描述语言(PDL)。该语言具有很强的图形、图象功能,使用起来方便灵活且与设备无关,业已成为页面描述语言的国际标准,形成 SPDL (ISO/IEC 10180)。该语言中对字库的处理部分称为 Type 1,其格式被作为 SPDL 中的字库标准(ISO 9541)。Type 1 是用具有特殊标记的 PostScript 语言写出的字形程序,该字形程序是压缩的,比一般的 PostScript 程序占有更

小的空间，PostScript 解释器可对其进行高质量的还原。True Type 是 Apple 与 Microsoft 联合开发的 PDL 语言中的字形描述部分。它用一套专门的指令集来完成对字形的描述，其字形描述方便灵活，还原质量也较高。True Type 描述字形用的是二次 Bezier 曲线，而 PostScript 用的是三次 Bezier 曲线，一般认为三次曲线描述的字形质量更高，其复杂性也更高。

近年来，国外在西文字符描述中，采用了 HINT(提示信息)方法，即在曲线轮廓字形上附加字形调整信息，用以控制笔画宽度、距离，以使得折笔转接处、交笔相交处的笔画均匀、对称、清晰，从而大大提高字形的质量。现在，一套西文字形，放大到 20000×20000 点，缩小到 16×16 点仍能保证质量，缩小时的质量控制全靠 HINT 信息。

含 HINT 的曲线轮廓描述技术已成为国际潮流。曲线轮廓字库具有存储量小、对打印机分辨率的适应性强及字形质量高等优点。自 1991 年以来，国内先后有十多家厂商投资开发汉字曲线轮廓字库。

由于汉字本身的难点，采用曲线轮廓法进行描述，仍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如何实现汉字 PostScript 的高速解释问题。西文 PostScript 控制器(RIP)通常采用缓冲的方法，遇到一种新的字体、字号，就把该套字(约 100 多字符)的曲线轮廓描述转换成点阵，然后在缓冲中存起来，以后再出现该套字符时，不再作轮廓到点阵的转换，而直接从缓冲中读点阵，因而速度快得多。而中文控制器常常每遇到一个汉字就作一次轮廓到点阵的转换操作，因此要求这种转换的速度很高。另外，采用 HINT 方法描述汉字，将会大大增加存储量，等等。因此，汉字 HINT 技术，保证大字和小字字形质量的压缩方法，是难点也是今后的研究方向。此外，还需“对汉字的拓扑结构类型、汉字骨架系统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15]。

2. 语音合成技术

语音合成是用人工方法让计算机或其他专用设备输出人的语音的技术，具有美好的前景。汉语普通话的语音合成技术的研究，是从 80 年代初开始的，现已有一些产品问世。“语音合成系统一般可分为两类：有限词语的编辑合成系统和无限词语的规则合成系统。”[16]

有限词语的编辑合成系统以语句、短语、词或音节为合成单元，一般是针对持定的用途，将某一人（如播音员）发的数量有限的词语（单词、词组或句子）录音后进行数字化编码，再经适当的数据压缩，将其存储在存储器中，组成一个合成语音库。使用时，根据需要，从语音库中取出一个一个的单元数据，串连或编辑在一起，经解码还原成语音。这种合成方式的原理与录音机相似，但却没有一般录音技术中磁头、磁带的磨损等麻烦问题，以这种技术做成的装置，可靠性好、使用寿命长。典型的编辑合成系统是自动报站系统，另外还有自动拨号、报时和报警等系统。从技术角度上来说，编辑合成方式比较容易实现。一般使用现成的或专用的芯片就可以用较短的时间开发出实用的语音合成装置。目前，在普通话编辑合成系统中，使用较多的有 TM5200 语音合成片和 TI 语音板等。这类专用硬件及其开发系统原是为合成英语而设计的，但也有一定的通用性。目前还没有由我国自行设计、制造并成为商品的语音合成专用集成电路。编辑合成方式对语言学的依赖不大，在合成的语汇量较少时，合成音质较好。

规则合成系统的语音库中所存的是较小的语音单位（如音素、双音素、半音节或音节）的声学上的合成参数。每一语音单位的音色、音高、音强和音长由代码表示并利用规则对合成参数进行修改和调节，而后由语音合成器合成出连续的语句来。语音合成器在特定的合成参数控制下，能模拟人们产生语音的过程。规则合成系统的开发紧密地依赖于语音学的研究，其中涉及合成单元的选

取、合成音质的流畅性和自然度等方面。

用于计算机输出的语音合成系统称为文—语转换系统。这种系统将文字串形式输入的文本变成语音形式输出，是应用前景最广泛的语音合成系统。用编辑合成方式设计的普通话文—语转换系统，其合成语句既不连贯也不自然。以规则合成方式为基础的文—语转换系统较为完备，它有一个文本分析器及一整套复杂的语义、语法、词汇、音系和语音学规则。近年来国内已有几个文—语转换系统进入市场，但由于人的言语机制的复杂性，这些系统都带有较重的“机器味”。

当今，语音研究应针对汉语本身的特点，研究汉语语音学和音位系统学的知识，探索新的合成方案，开发专门用于汉语语音合成的专用集成电路并制订语音合成质量的评测标准。

四、中文信息处理基础研究及应用技术

1. 语料库

“语料库是存储于计算机中并可利用计算机进行分析的语言素材的总体。”[17]。过去，语言学家在做研究时，主要靠人工去查资料、做卡片，即使在一个很小很具体的问题上，要究尽有关的资料也是难以做到的，这就难免有所疏漏。而且，这样积累起来的卡片，查找起来也很困难，更不便于增删、修改和更新。有了语料库，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语言素材进行自动分类和编排，根据需要从中查找各类信息。因此，“本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和美国语言学界差不多同时萌发了建立语料库的设想”[18]，并崛起了一门新兴的学科——语料库语言学。1959 年，英国语言学家 Quirk 在杜伦大学任教时提出了建立现代英语用法调查(Survey of English Usage)语料库的设想，想建立一个为语法研究服务的容量为 100 万个单词的语料库，做为语法研究的可靠基础。在语料库的基础上，“Quirk 等四人在 1972 年发表了权威性的现代英语语法著作《当

代英语语法》,1985年又发表了更有权威性的《英语语法大全》"[19]。早期国外著名的语料库还有美国布朗大学建立的布朗语料库,其库容量也是100万个单词,存储了1961年美国各类书刊的连续语言样本500篇,每篇2000个词。70年代英国Lancaster大学、挪威Oslo大学和挪威社会科学计算中心联合建立了用于现代英国英语研究的LOB语料库。近年来,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都相继建立了各自的国家一级的大规模语料库,有的已投入使用,提供服务。

1990年8月在赫尔辛基举行的第13届国际计算语言学大会,将实现大规模真实文本的处理作为计算语言学今后一个时期里的战略目标明确地提出来,而且及时地指出:"为实现战略目标的转移,需要在理论、方法和工具等方面进行重大的革新"[20]。为使语料库得到充分利用基于语料库的分析方法(即经验主义)至少是对基于规则的分析方法(即理性主义)的一个重要补充。由于具备了"大规模"和"真实"这两个条件,语料库成为最理想的语言知识资源。为使语料库得到充分利用,还需对原始语料(或称生语料)进行从词法、句法到语义的多层次加工(或标注)。

近年来,国内的一些单位相继建立了一些通用的和专用的不同规模的现代汉语的语料库,并在语料的加工技术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例如清华大学设计的汉语词性自动标注系统,采用一元语法和二元语法相结合的统计模型和108个标记,对汉语真实文本进行标注的正确率达96.8%。但是,由于缺乏宏观管理和经费不足,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语料库的库容量小,用途单一,不能长期使用;缺乏统一的规范和标准,研制工作比较粗糙。因此,筹建国家级的大型现代汉语语料库已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目前,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正在建设这样一个大型的通用语料库。

通用大型的现代汉语语料库,可以服务于以下领域[21]:

1. 字、词频的统计

2．语词库建设

3．词典编纂

4．语言文字规范化研究

5．语法研究

6．其他一般性的语言文字研究

通用型的现代汉语语料库，应当能真实地反映现代汉语在文字、词汇、语法、语义等方面的全貌，所以对语料的选择有严格和科学的要求。为保证语料的通用性，应使所选语料有别于专业性，有别于地域性和纯口语性；另外还要考虑语料的时间跨度、文化层次和社会使用层面等因素；在必要的人工干预下，对样本的选取要尽量做到随机；分类要同时考虑门类和语体，等等。

语料库建设需朝着标准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国际上正在制订编码规范、存储格式的规范，以及在词类标记、句法树、复杂特征集等语言信息的标注方面采用统一的代码格式。现代汉语语料库的建设也必须向这些标准靠拢，以使语料达到互换和共享。如何利用语料库来获取语言知识和支持自然语言的分析，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的前沿课题。

2．汉字属性

汉字属性是指汉字所负荷的信息，即汉字在字音、字形、字频及编码等方面所具有的特征。汉字属性的研究和利用是汉字信息处理技术不断深入发展的结果。汉字属性最早曾被用于汉字键盘输入方法的研究上，如汉字编码方案的制订利用了汉字字音、字频、笔顺、笔画、部件和汉字结构等多种属性。后来，汉字属性又被用于汉字编码字符集、汉字自动识别等方面的研究上。当然，汉字属性大量的经常性的应用，主要是在经济信息管理、情报检索、印刷排版及办公自动化等各种领域。

汉字属性研究在80年代中期后成果显著，相继研制出了一些具有应用价值的汉字属性字典、汉字属性库和汉字属性系统。

建立汉字属性系统，可以使涉及利用汉字属性的计算机处理功能齐备、高效率和标准化。有的单位建立的汉字属性系统具有很强的通用性，可以移植到各种类型计算机系统上。也可以根据用户使用的需要，将部分功能模块移植。且经用户使用表明，其系统的处理效率在各种类型的计算机系统上都很高，处理结果也很准确。

汉字属性库，就是汉字属性电子字典，也就是电子形式的汉字属性字典；汉字属性字典可以说是汉字属性库的书面形式。目前，已有的汉字属性库和汉字属性字典的编辑中，依据的字符集，有的只限于《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有的则除了基本集还有辅一到辅五集。所编汉字的属性，一般有 20 余种。如字音、笔画数、部首、部首笔画数、部首序号、笔顺、异体字、繁体字、旧字形、字频、部件、国标编码、电报码等。有的汉字属性字典还列出了每种属性包括的不同类，使每个汉字的属性达 40 余种。属性编辑一般都依据了国家的有关规范和标准。

汉字属性今后的研究重点有三个方面：

1. 随着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的深入发展，汉字属性的应用范围将进一步扩展，汉字属性研究的内容要根据应用的需要不断扩展。

2. 汉字的有些属性，如字频、编码等方面的现有成果，今后要根据 ISO 10646 国际标准进行相应的调整扩充。

3. 汉字属性数据的维护工作需要重视，今后要随时发现错误，随时加以修改。

3. 现代汉语自动分词与分词规范

自动分词是中文信息处理领域中继汉字编码之后的又一个"瓶颈"问题。汉语书面语，不像西文那样是分词连写的，词与词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进入计算机后，仍然是等距排列的汉字字串序列。然而，在中文信息处理的许多重要领域中，例如在机器翻译、自然语言理解、文献检索、词频统计等语言工程中，都要求在词

这一平面上进行处理。因此，必须用计算机自动地将等距排列的汉字字串序列按词切分开来，打上切分标志，这就是自动分词。

自动分词系统所采用的方法，主要基于字符串机械性的匹配加上检错技术并辅以自动分词知识(知识库、专家系统等)。机械性的分词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22]：最大匹配法、逆向最大匹配法、逐词遍历匹配法、设立切分标志法、最佳匹配法、有穷多层列举法、基于词频统计的分词方法、联想——回溯法、双向扫描法、基于期望的分词方法。

以上所列的10种分词方法，只有前三种是基本的分词方法，其它几种都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机械分词方法。在实际应用中，一般都是几种方法配合使用[23]。

衡量分词方法优劣有两个重要的标准：一是分词速度，二是分词精度。影响分词速度的主要因素是词库的规模和结构以及匹配选词的实现技术。要想较大幅度提高现有分词系统的切分速度，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办到；而要提高分词系统的切分精度，哪怕提高几个千分点，也要付出较大的代价。切分精度通常是以错误切分率来衡量的，错误切分率是指错误切分的次数与被切分语料中所含汉字的总数之比。错误切分率愈小，表示切分精度越高。对于机械性分词方法而言，分词精度的高低，完全取决于该方法对多义切分字段的处理能力，切分错误只可能发生在多义切分字段上。多义切分字段为多义组合歧义字段和交集型歧义字段。所谓多义组合型歧义字段是指字段AB，其中不仅AB成词，而且A和B还分别独立成词。所谓交集型歧义字段是近字段AJB它既可分为AJ/B，又可切分为A/JB，其中J称为交集字串，交集型歧义切分字段占全部歧义切分字段的90%以上，因此，提高精度关键在于处理交集型字段。

自动分词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国内一些通过鉴定的自动分词系统都已达到实用化水平，切分精度都越过99%。现在各系统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不在技术上，而在词的本身，也就是说，究竟什么

是词。《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分词规范》已成为国家标准，该规范旨在为中文信息处理提供一个可供应用的分词原则。但该标准存在如下问题：某些规定在学术界有不同看法；可操作性比较差。因此，有必要对该标准进行修订和完善，另外，还需制订一个实例化的分词词表，以便操作。

4. 电子排版系统与文字处理机

1）电子排版系统

电子排版系统指的是以计算机为核心的自动化排版装置。电子排版系统的使用，使新闻、报纸、图书的出版进入自动化信息处理的时代。中文电子排版系统的发展，使得中文出版业从熔铅铸字、拣字排文的繁琐劳作中解脱出来，告别铅与火，步入光与电。

我国电子出版系统的研制，始于 20 年前。1974 年 8 月，国家计委批准了老一辈计算机专家提出的实施计算机汉字信息处理科研工程的立项(简称 748 工程)。748 分为精密照排、中文检索、中文计算机通信三部分，其中最成功的是精密照排系统(即后来的电子出版系统)。它引发了我国报业和印刷业的一场技术革命，造就了北大方正、华光等一批明星企业，从一个创新的构思发展成一个新兴的产业，年产值已达几十亿元，独占了国内市场并进入了国际市场。8 年前，国内还没有一份报纸是用电脑排的，全是铅排。而今天，北京和各大城市的绝大多数报纸均用"华光"或"方正"排版系统出报，有的报纸已用方正彩色出版系统印制彩报，海外的中文报业也几乎是我们的天下[24]。

我国电子出版系统的发展，跳过了第二代光机式和第三代阴极管式照排机，直接研制第四代激光照排机，大大缩短了我国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并且在许多领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例如："彩色图片与中文的合一"达到了世界第一的处理速度和高质量的色彩精度。在汉字字形信息的压缩与还原、页面描述语言及栅格图像处理器等方面也做出了艰苦的努力并取得巨大成就。从 90 年代

开始，我国的电子出版系统，面临着国外先进的字形描述技术及硬件进步的挑战，必须与国际先进技术接轨并在页面描述语言及字形技术方面向国际标准靠拢，才能保持我们的优势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2）文字处理机

文字处理机也就是电子打字机。它是现代计算机技术在办公室的一种应用，它能代替人工进行文字处理，是办公自动化的一种手段。国内市场上比较流行的文字处理机均能进行中外文兼容处理，如四通的 MS—2401、MS—2403 系列，文豪 mini5H 和科理 KL—8701。这些文字处理机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用户实现办公室中文信息处理的要求，并配有多种中文输入方式。字库一般均备有国际一、二级的全部汉字并且有多种字体、字号的汉字输出。

文字处理机还可和计算机进行通讯，可以进行图像处理、计时、电传等。最近新推出一种夏普 WL—3000C 中西文文字处理机，除支持各种输入法的键盘输入外，还配有识别率较高的手写输入、笔触键盘输入。

现阶段国内各种档次、类别的文字处理机已有相当的规模，在一段时间内已能满足用户需要。PC 机的低价格也冲击着文字处理机市场，在市场趋于饱和的情况下，怎样扩大需求，对于各大厂商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文字处理机还需在提高硬件配制，改善用户界面，完善系统功能方面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5. 字、词频统计

字、词频的统计，“是对现代汉语字、词的使用情况所做的大规模、较全面的调查研究，以得出字、词的使用概貌并区分出字、词的常用程度等级”[25]。字词频的统计结果对语言教学、研究及中文信息处理和自然语言应用系统的设计有直接的使用价值或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汉字编码输入方案、各种主题词表、通用词表及电子词典的编制，各种专家系统的构造以及人工智能研究中深度优先

和广度优先的搜索策略等都有利用汉语字、词频统计的成果的事例。

早期的字频统计主要是用手工方式进行的。现在的字频统计都依赖于计算机进行。字、词频统计结果的准确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所选择的语料是否科学，频率误差多半由于选材的不合理。我国在70年代组织的“748”工程，曾对2100余万汉字的语料，进行汉字的字频统计，得出了《现代汉字综合使用频度表》，国家标准《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的收字，就是以该表为基础的。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统计资料有一定的局限性，另外也由于技术和经验的不足，致使以这一统计材料为依据的《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集本集》中所收的一二级汉字中，有少数字的使用率极低，甚至是目前根本不使用的“死字”可有些实际使用频度不太低的字，却未能收进去。至今为止，国内利用计算机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字频统计，是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科学工程系与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当时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汉字处共同研制的。这项任务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标准局于1983年初下达的，于1985年完成，统计的成果提供了13种字频统计表并出版了《最常用的汉字是哪些——三千高频度汉字字表》。这次字频统计，由于利用了计算机，原始语料的分布比较合理，同时又对多音字的频度分别进行了统计，因而统计结果比较精确。除此之外，我国还在某些特定的领域内，利用计算机进行过字频统计研究，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山西大学曾对我国姓氏、人名用字进行过分析统计；北京语言学院对中小学语文课本进行了用字频度的统计，武汉大学曾对《骆驼祥子》等作品进行过字频统计。

对汉语进行词频统计，首先需要分词。为了使统计出来的词频具有较大的可靠性，词频统计对语言材料的选择也有严格的要求。

北京航空学院等单位于1982年开始利用计算机对1919年

——1982 年的汉语语言材料，分时期、分学科进行了词频统计，选材 3 亿汉字，抽样约 2500 万汉字，编码输入 2000 余万汉字，得出了各分期、分科频度表和总频度表。该项目于 1986 年 6 月通过了国家科委批准并委托国家标准局主持的国家级鉴定，是至今为止国内规模最大的一次词频统计。北京语言学院采用人机结合的办法，对近 200 万字的中小学教材进行词频统计，编制了《现代汉语频率词典》，收词 31159 条，这是中国正式出版的第一部汉语频率词典。

随着社会语言生活的变化，字、词使用频率也在发生变化，因此，需要补充新的语料进行字、词频的统计。

注释：

1. 曹右琦，中文信息处理研究的现状和前瞻，《语言文字应用》第 1 期，1995。
2. 李平、陈一凡，论汉字键秀输入的通用性、规范化与智能化，《计算机世界》，1994 年 11 月 9 日。
3. 张炘中，计算机汉字识别技术，《语文建设》第 10 期，1992。
4. 张炘中，我国汉字识别技术的历史、现状和展望，《中文信息学报》第 9 期，1994。
5. 顾小凤，联机手写汉字识别研究的现状及问题，《计算机世界》，1994 年 11 月 9 日。
6. 方棣棠、吴文虎，汉语语音识别的回顾、现状和展望，《中国中文信息学会成立十周年学术报告会论文集》，1991 年。
7. 《中文信息处理技术的现状与进展》，ACCC 1991 年 3 月，通用中文代码国际联合会。
8. 同[7]。
9. 黄伟敏，多文种信息处理技术的突破性进展——通用多八位编

码字符集(UCS)概述,《计算机世界》,1994 年 9 月 28 日。
10. 同[9]。
11. 同[9]。
12. 李韵琴,国际标准 ISO/IEC 10646 现状和发展趋势,《计算机世界》,1994 年 9 月 28 日。
13. 同[7]。
14. 闻中生,字形技术的现状和趋势,《电子出版》第 2 期,1995。
15. 刘连元,汉字字形描述描述,《语文建设》第 9 期,1994。
16. 杨顺安,语音合成与语音学研究,《语文建设》第 8 期,1992。
17. 冯志伟,《现代汉字与计算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18. 胡明扬,《现代汉语通用语料库的建库原则和设想》,《语言文字应用》第 3 期,1992。
19. 同[18]。
20. 黄昌宁、苑春法,计算语言学的战略目标——大规模真实文本的处理,《计算机世界》,1993 年 1 月 20 日。
21. 同[18]。
22. 揭春雨、刘源、梁南元,论汉语自动分词方法,《中文信息学报》第 1 期,1989。
23. 刘源,字词频统计与汉语分词规范,《语言建设》第 5 期,1992。
24. 孙定、高丽华等,748 工程专版,《计算机世界》,1994 年 8 月 17 日。
25. 常宝儒,关于《现代汉语频率词典》的编纂问题,《辞书研究》第 4 期,1986。

外语篇

我国外语界语言学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①

王福祥　刘润清

一、现代语言学的发展趋势

现代语言学可分为两大类：微观语言学和宏观语言学。微观语言学(microlinguistics)只研究语言本身的内部结构体系，不涉及语言以外的事实，普通语言学中的音位学、形态学、句法学、逻辑语义学以及历史语音学等都属于微观语言学。宏观语言学(macrolinguistics)除了分析语言自身的体系外，还联系语言以外的、与语言的使用密切相关的因素或学科来研究语言，如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数理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等都属于宏观语言学。过去把普通语言学称为理论语言学，其他新兴学科泛称为应用语言学。现在，应用语言学仅限于特指语言教学方面的语言学理论，其他分支成为独立的领域。为了便于区分，人们又开始把纯语言研究的领域称为狭义语言学，把与其他学科相联系的研究称为广义语言学或宏观语言学。

从研究对象来看，现代语言学有三个明显的发展趋势：第一，由微观研究转向宏观研究，即由研究语言本身的系统转向跨学科的研究，因而出现了许多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如近年来新兴起的话语语言学、文化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学、国情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第二，由结构研究转向对功能和应用的研究。例如，原来只是描写语音和音位，现在要把这种认识用于语音合成；原来描写构

① 此稿曾发表在《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年第3期。

词，现在要把构词法运用于机器翻译；原来只是描写句法规则，现在要探讨句法结构的不同功能；原来描写单个词的意义，现在要解释词在特定环境中的意义；原来描写语言结构的抽象系统，现在注意运用这个系统时的各种规则，如语用学。如果采用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区别，则从前注重研究“语言”，现在更注意“言语”。第三，由单一语言研究再次转向多语言的对比研究(但不同于历史语言学)，于是有了对比语言学的兴起。对比研究包括双语对比和多语对比，也包括同族语对比和非同族语的对比，既有语言自身系统的对比，如对比语音学、对比词汇学、对比语法学、对比修辞学，也包括语言与文化的对比，如刚刚兴起的跨文化交际学和国情语言学。

从研究方法上讲，现代语言学也有三大趋势：第一，先从演绎法转为归纳法，又从归纳法转向演绎—归纳法。传统语法基本属于演绎法。19 世纪以后，语言研究逐渐重视实证法，采取归纳法。美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把归纳法推向高峰，排斥演绎法；是乔姆斯基又给演绎法注入活力。目前，大部分研究者同意，两种方法各有所长，只有各司其职，相互补充，研究才会顺利进行。但在中国的外语界，实证性研究仍然太少。第二，从单层次、单角度、静态的研究转向多层次、多角度、动态的研究。例如，从原来对语音的静态描写，转向对韵律特征的研究和对语调的功能研究；从单纯的词义研究转向探讨词义的文化负载和文化差异；从词汇的形式研究转向大脑词库的研究；原来只认为研究语言可以揭示人类心理特征，现在又认识到研究心理同样可以揭示人类语言特征。总之，现在的角度宽了，焦点多了，涉及的学科大大增加了。第三，从手工操作转向高科技的运用。计算机的发展给语言学的许多研究领域带来巨大变化。声谱器把语言的共振峰记录得一清二楚；声音合成器可以让机器“说出话来”；自然语言分析器可以分析一个句子的主谓宾；光盘可以实现多媒体地处理语言信息；人机对话、机器翻译都在飞速发展着。

从研究目的来看，现代语言学也有三大特征。第一，目标不断从狭窄到宽广，从肤浅到深刻。索绪尔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语言学家仍然把研究重点放在音位学上，以句法研究为重点是到布龙菲尔德时期才开始的。到了乔姆斯基时期才把语言研究与人类本质挂上钩。可以说，现在的语言研究不再停留在以描写什么音、什么结构为目的，而是以努力探索人类本质、社会本质等宏伟目标为宗旨。第二，从描写转向解释。从19世纪开始，对语言的讨论逐步从规范性陈述转向描写性陈述；从20世纪60年代起，从描写性陈述又转向解释性陈述。明显的标志是乔姆斯基提出的“观察充分性”，“描写充分性”和“解释充分性”。乔姆斯基是试图从大脑的遗传基因来解释语言实质，而韩礼德则试图从语言的社会功能来解释语言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宏观语言学的各个领域都对语言的某一方面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当然，这种解释还远非令人满意，但是描写“语言是什么样子”之后，必然会接着发问“为什么语言是这个样子”。第三，从理论的探讨转向应用价值的分析。长期以来，语言学被某些人认为是“有钱人的游戏”(rich men's game)，除了让研究者获得一种智力上的满足，其他价值微乎其微。现在，语言学研究可以直接与产业、经济、国家政策联系起来。不用说外语教学和测试已在英国、美国成为一种大赚其钱的产业(他们称之为 industry)。计算机的发展本身就离不开语言学；人工智能的工程中更有语言学；对语音的研究已经发展到可以用来破案的程度；语用学的分析已经用到法庭审讯上去；对语言障碍的研究可用于医疗目的。

二、我国近十年来语言学取得的成就

似乎可以这样讲，1985年至1995年是语言学取得进展最大的十年。1978年至1985年，国门大开，一批批有志学子出出进进，带回了大量书籍和新鲜思想，述评和译著层出不穷，语言学界

思想空前活跃。但是，那十年中引进居多，创造甚少。1985年以来，情况开始转变，出现了有见解的评述文章和著作，如许国璋的《语言的定义、功能、起源》(1986)，陈平的《话语分析说略》(1987)，《描写与解释：论西方现代语言学研究的目的与方法》(1987)，黄晖的《近时西方语言哲学述评》(1989)，顾曰国的《什么是会话修辞学》(1989)和《奥斯丁的言语行为理论：诠释与批判》(1989)，邓炎昌和刘润清的《语言与文化》(1989)，伍铁平的《语言与思维关系新探》(1990)，廖秋忠的《篇章与语用和句法研究》(1991)，姚小平的《洪堡特的宗教思想：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1991)，沈家煊的《句法的象似性问题》(1993)和《"语法化"研究综观》(1994)。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开展的独立研究包括：许国璋的《许国璋论语言》(1991)，陈平的《现代语言学研究——理论、方法与事实》(1991)，刘润清等的《中国英语本科学生素质调查》(1991)，桂诗春的《中国学生英语学习心理》(1992)，廖秋忠的《廖秋忠文集》(1992)，喻云根的《英汉对比语言学》(1994)，胡壮麟的《语篇的衔接与连贯》(1994)等，都不再是纯介绍性的书，而是有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国内学人的研究成果的专著。这是可喜的一步。引进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引进的最终目的是利用本土的语言条件进行研究，提出合适的理论，解决本土上的语言问题，并对普通理论做出贡献。第二，知识从零散、肤浅开始转向系统和深刻。翻阅一下1980年以前的语言学文章便可知道，当时不仅引进居多，而且很不系统，零敲碎打。现在不同，有人可以就同一种语言现象连续发表文章进行探讨，不能不说是认识不断深入的表现。例如伍铁平对模糊语言学的研究，从1984年的《模糊语言初探》，到1986年的《论反义词词源和一词兼有相反二义》，共发表过25篇文章；王福祥从1989年到1994年五年之内撰写了五部有关话语语言学的专著，此外还编辑了两本话语语言学论文集。

知识系统化的另一个标志是专著的大量出版，例如，桂灿昆的《美国英语实用语音学》(1985)，桂诗春的《心理语言学》(1985)、

《标准化考试——理论、原则和方法》(1986)和《实验心理语言学纲要》(1991),秦秀白的《英语文体学入门》(1986),王佐良主编的《英语文体学引论》(1987),何自然的《语用学概论》(1988),涂纪亮的《英美语言哲学概论》(1988),侯维瑞的《英语语体》(1988),王逢鑫的《英语意念语法》(1989),赵世开的《美国语言学简史》(1989),程雨民的《英语语体学》(1989),伍谦光的《语义学导论》(1988,1991),徐烈炯的《生成语法理论》(1988)和《语义学》(1990),胡壮麟等的《系统功能语法概论》(1990),薄冰主编的《高级英语语法》(1990),刘耀武和徐昌华的《日语语法研究》(1990),刘润清的《语言测试和它的方法》(1991),徐强的《英语测试的理论与命题实践》(1992),何兆熊的《语用学概论》(1992),祝畹瑾的《社会语言学概论》(1992),许余龙的《对比语言学概论》(1992),周长忠的《西方现代语言哲学》(1992),卫志强的《当代跨学科语言学》(1992),王得杏的《社会语言学导论》(1992),方立的《美国理论语言学研究》(1993)、张会森的《现代俄语语法》(1995)等,都表明了国内研究力量的成长和成熟,表明语言学的各个领域的知识不断地系统化。

第三、中国学者的文章开始刊登于国外学术杂志。如1988年王福祥曾有四篇关于话语语言学的文章发表在前苏联及保加利亚的语言学杂志上;顾曰国在《语用学杂志》上发表的《现代汉语中的礼貌现象》(1990)和《取效行为的困境》(1993);祝畹瑾和陈建民在英国出版的《亚洲太平洋交际》杂志第二卷第一期上发表了《中国语言状况的一些经济因素》;程雨民、徐烈炯、刘涌泉、陈平、冯志伟、胡壮麟等都在英、美、德、法等国际杂志上发表过文章。由于近年来我国语言学的长足发展,国际上一些学术杂志开始编辑"中国专号"。如《国际语言社会学》第59期(1986)为《从中国和外国看中国的的语言建设》专辑,第81期(1990)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语言学》专辑,第97期(1993)为《来自中国的报导:少数民族语言展望》。波兰的米茨凯维奇大学语言所1991年出版了《寄自中国的语言学研究论文》,其中收录了许嘉璐的《近几年的训诂学研

究》和伍铁平的《模糊语言学和术语学》。莫斯科出版的《国外语言学新著述》丛书中的第22卷(1989)为《中国语言学》专辑，把王力、黎锦熙、吕叔湘、罗常培、张志公、周祖谟等的19篇文章首次译成俄语。《语用学杂志》将于1997年出版一期中国专刊，《亚洲太平洋交际》杂志正准备出版中国专辑《语境中的中国语篇》。此外，一些国际学术杂志开始聘请我国学者任地区编辑或审稿人，例如，清华的方琰被聘为荷兰《语言功能》杂志的咨询委员会成员；北大的胡壮麟被聘为"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委员会委员"；北外的顾曰国被三家国际杂志聘为咨询编审：《语用学杂志》、《语篇与社会》、《语篇》；王福祥任俄罗斯的《国外俄语教学》的编委。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图书经费和研究经费不足。研究机关和大专院校普遍感到进口图书经费不足，外刊外报的种类一砍再砍，购书限于一册两册，书到国内又不能及时与读者见面(编目力量薄弱)，所以我们的"信息公路"又窄又少又慢。由于科研经费不多，多数人争取不到国家和部委资助的科研项目，大都靠自力更生，难以开展大型、长期、多人参加的有份量的基础研究项目；零散的研究力量只能零敲碎打，缺乏统筹安排。此外，由于经费紧张，很难在中国组织国际语言学讨论会；中国学者出国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少得可怜，确实影响我们与国外的交流(就连在国内召开个学术研讨会都要三思其经费而后行)。

第二，外语界的语言学研究者靠外语"起家"，长于吸收国外新思想、新知识，短于汉语语言学的修养。因此，用王宗炎先生的话说，"搜集采购之功多，提炼转化之功少。比方有的搞理论的人只是读洋书，讲洋道理，没有回头看看本国情况，把从外国学来的那些东西加以试用、验证、修正、补充。讲语义学的只讲英语语义学，讲语用学的只讲英语语用学，仿佛把外国教授的讲座搬到中国来。

我们应当承认，这样做有其好处，因为引进了一些新学问、新知识，可是中国学者不研究中国问题、汉语问题，拿不出本土材料来，很难说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这种状况，尽管最近几年稍有改变，但毕竟还只是少数人在某些方面能结合中国语言材料做些文章。

第三，科研难，成果出版更难。国内语言学学术性杂志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份，与我们大国的身份不符；分学科的杂志几乎没有（如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语用学）。学术杂志不挣钱，难以维持。专著的命运更糟糕。学术性越强，印数越少，越是难以找到出版商。商业大潮对学术研究的冲击是无法估量的。

第四，对外宣传不够。我们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鲜为人知，原因就是没有自己办的外文杂志，也没有及时地把好的文章或专著译成外文或用外文介绍出去。我们打开国门了解世界，同时也要让世界了解我们。用科研成果去争取文化交流，也可以用科研成果去争取国外的资助。

四、对"九五"规划的建议和设想

"九五"和"十五"期间，中国将跨入21世纪。对于中国来说，这是关键的十年，各条战线、各个领域都要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国际上的挑战，语言学这领域也不例外。为了顺利完成这一任务，我们建议：

1. 如有可能，向语言理论研究投入更多资金，购置国外图书资料，资补重大科研项目，资补重要学术著作的出版，资补召开国际会议和参加国际会议。

2. 规定大专院校的中文系和外文系要把"语言学导论"作为学生的必修课。增加这两个系的语言学硕士点和语言学博士点。中文系研究生要学习国外语言学，外文系的研究生要学习汉语语言学和中国语言学史。

3. 设立几种专业化的语言学学术刊物和英文版的语言学刊

物，提供研究和讨论的园地；分类编辑有关成果的计算机检索软件和光盘，用最快的手段交流跨学科的信息。至少要创办一个英文版的《中国语言学摘要》。

4．利用国家资金建立起来的语料库、试题库或其他任何信息服务项目，要向全国研究者开放，一方面做到资源共享，一方面避免重复投资和重复劳动。

5．开展对研究方法的大讨论：强调两点，第一，在进行微观研究的同时，鼓励宏观的研究，即对语言实质、语言共性、大脑本质的研究，反对见树不见林；第二强调调查，运用实证性的研究，反对小证据大结论。

6．采取有效措施，使汉语语言学专家与外语语言学专家两股力量结合起来。两股力量各有优势，又各有缺欠。前者长于中国文化修养，短于外语的掌握；后者长于国外语言学，短于汉语知识。二者如能结合，既能继承我们文化遗产中的优秀成果，又能积极地学习外国先进语言学理论。

今后十年的语言学研究重点有三个：第一，侧重宏观语言学：语言与心理，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文化等之间的关系，鼓励跨学科的研究；第二，着眼于认知语言学，语言与大脑和神经的关系；第三，鼓励用科学主义方法和高科技手段进行研究。具体地讲：

1．认知语言学：研究语言与神经系统，语言与心理，语言与生物基础的关系。20年之后，认知语言学将是最热门的课题。

2．语音学和音位学中，重点放在语音合成、“机器说话”上；这是语音学与人工智能相结合的工程。

3．句法学研究，重点放在汉语语法与外语语法的比较上。微观研究的最终目的也是要有益于普遍理论的建立。

4．语用学，重点研究汉语的语用学。这种工作刚刚起步，应大力扶持，而且要从历史、方言、文化、哲学等不同角度去研究。在语用中研究语义，在语义和语用两方面，对人工智能工程做出贡献。

5. 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文化语言学将是近 10 年的热门课题。目前仍是罗列事实居多，成熟的理论和概括居少。既需要对汉语和汉文化的研究，又需要多语比较研究。

6. 话语语言学方兴未艾，但有待系统化。重点是汉语话语分析；不同语言的话语分析对比。最终指向话语结构和如何反映思维模式和思维表达方式的异同。

7. 应用语言学(语言教学研究)的研究重点：(1) 多媒体语言教学与多媒体语言测试；(2) 学习者的个人差异(决定语言学习的因素到底是什么)研究。

8. 每年翻译出版 10 部国外最有影响的专著和 60 篇最有份量的论文(编辑成两卷出版)。由一个专家小组指定书目和文章，指定水平高的译者，定时出版。赔钱也译，赔钱也出。

我国语音学与音系学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①]

史宝辉

一、语音学与音系学的走向

语音学是研究发音的学科。它包括三个主要领域（Ladefoged, 1971）：发音语音学探讨人类发音器官发出声波的方式，声学语音学研究声波的构成成分以及声波的规律，感知语音学研究语音如何被人接受。此外还有研究发音的神经系统和发音肌理的生理语音学和运用实验手段记录、分析和研究语音的实验语音学等。随着语音实验手段的普及，近年来实验语音学已不再被当做是一个专门的分支学科。

普通语音学指可以运用于任何语言的语音描述的规则和技术，它为我们提供的是一整套人类在语言交际过程中所可能产生的声音。普通语音学的理论可以用来对某一特定语言进行描述，形成该语言的语音学（如汉语语音学、英语语音学），但就其主旨而言，普通语音学是独立于任何一种具体语言的。

音系学是研究语音系统的学科。与语音学不同的是，音系学用来描述人们在交际过程中对于可能的发音的选择。因此，音系学首先是对于具体语言或是某一特定方言的语音系统的研究。普通音系学的理论是在对于具体语言发音规律研究的基础之上建立

① 本文写作过程中承蒙王嘉龄教授、林茂灿教授、刘润清教授、高一虹博士等先生指教，并承王嘉龄教授审阅，谨致谢忱。

起来的。广义的音系学还包括对于语音历史变化的研究，汉语称为音韵学。汉语音韵学是汉语历史音系学，是我国传统的语音研究方法。

语音学和音系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语音学和音系学经历了先合后分、分而后合的过程。研究语音的历史已有2000多年，汉语最早的韵书是三国时魏人李登所作的《声类》，表明我国对于语音的研究也有1000多年的历史。19世纪70年代Jan Baudouin de Courtenay和他的学生Micolaj Kruszewski提出音位学说以后，音位学曾一度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其意义是为语音的描述更为简捷、明确，现代音系学由此产生。本世纪中叶Roman Jakobson提出区别性特征理论，为音位的确定提供了新的依据。60年代美国生成音系学的提出使语音学和音系学彻底分道扬镳，形成两个各自独立的学科，出现了语音学和音系学平分天下的局面。生成音系学的代表著作是Chomsky & Halle (1968)，称为标准生成音系学。生成音系学在70年代后期经历了自然生成音系学、词汇音系学的挑战，到80年代初期发展到多音层、多平面、多层次的三维模型，以自主音段音系学、韵律音系学为代表，统称非线性音系学。90年代归结为Prince和Smolensky的“优选论”(王嘉龄，1995)。

然而，无论人们怎样强调二者之间的不可容性，在一些语音学的教材当中，不可避免地介绍了音系学的基本内容(如Ladefoged, 1982)，在音系学的教材中又常以语音学的基本内容为起点(如Schane, 1973和Sloat et al. 1978等)。Ladefoged一直是倡导语音学和音系学一体化的，他提出“语言学的语音学”这一概念(Ladefoged, 1971)，即是一个例证。Clark & Yallop (1990)本身就叫做《语音学与音系学概论》。在我国，语音学、音韵学、音系学一直没有明确的划分开，罗常培和王均(1957)后面有音位学理论介绍，后又增附“音位的区别特征”和“音系学”(1981)，王力(1956，1963)前面专门介绍语音学知识。不难看出，我国学者历来

重视语音和音系研究的整体性和内在联系。

90年代初 Ohala (1991) 明确提出语音学和音系学的分裂是有问题的，是建立在对语音学的错误理解上的。他呼吁语音学和音系学应重新携手，建立“总合音系学 (integrative phonology)”，共同解决当前语音科学面临的重大问题。由此可见，90年代的语音学和音系学将有可能进入重新融合的阶段。

二、我国语音学与音系学的研究现状

王理嘉(1993)认为1949年至今的我国现代语音学研究大体上可分为前15年和后15年，当中有一个停滞的10年动乱时期。按照这一划分，我们在50年代初期重点解决了建立汉语拼音系统的问题，同时开始介绍语音学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这对当时急于解决的汉语语音研究、汉语方言调查和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50年代后期为配合推广普通话，研究汉语普通话的文章较多。60年代起开始介绍现代语音学的实验仪器和实验技术，并取得了一定的语音实验研究成果。此时，有关汉语普通话音位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些。在此之前，人们对音位问题缺乏足够的了解和研究，特别是对于音位的抽象性、音段音位和超音段音位的关系还认识不足，以至于在50年代中期以后讨论确定普通话音位中如何处理声调的问题时，还有人认为不同声调的元音(韵母)应作为不同的元音音位看待。经过讨论，认识得到了统一。现在，已没有人会对此提出任何疑义了。

70年代末以来，中国语言学有了长足的发展，语音学和音系学的研究也是硕果累累。近年来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

1. 概论性著作和教材

1) 语音学

林焘和王理嘉(1992)是一部很好的语音学基础理论的换代教

材，它把传统语音学、汉语语音和实验语音学结合在一起，讲解了语音的形成、元音、辅音、音节和音节结构、声调、语流音变、轻重音和语调、音位和区别特征等语音学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本书的特点是：例证以北京话语音为主，以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语音做补充，体现了作者多年来对于北京话语音的研究。练习中有大量的口耳训练题目，强调语音学的基本能力训练。

吴宗济和林茂灿主编(1989)是一部比较全面的现代语音学著作。与林焘和王理嘉(1992)相比，本书更重语音实验技术。书中强调实验语音学是一门综合学科，在讨论了语音的物理、生理、心理基础之后，从生理、声学、感知三个维度分析了元音、辅音和声调这三个基本的语音现象，分析了普通话音节的一般结构和声学结构，介绍了轻重音实验和区别性特征。本书的两个附录分别介绍了常用语音实验仪器和计算机在语音学研究中的应用。这是一部重要的语音学理论著作。

这方面的教材还有结合民族语言为民族院校学生编写的罗安源和金雅声(1990)、为对外汉语教师编写的吴宗济主编(1991)和供一般读者学习普通话语音之用的徐世荣(1993)。此外还有曹剑芬(1990)、周同春(1990)、朱川(1986)等。

2) 音系学

王理嘉(1991)是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现代音系学基础知识的入门书，它从语音学的基本知识入手，讨论音位分析的方法和北京话音位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并对区别性特征理论和生成音系学的内容做了简要介绍。这本书的特点在于：结合传统语音学介绍声学语音学的基本知识，结合音位学说的起源和传播介绍不同的音位理论以及音位分析中的各种问题，结合普通话音位专题研究中的不同意见全面阐述普通话元辅音音位学说和调位系统。此外，介绍音系学理论的著作还有张彦昌等(1993)。

在汉语音韵学方面，王力(1963)1991 年由中华书局再版，收入“文史知识文库”，是汉语音韵学的普及性读物。作者在本书中

对他的前期观点有所补正，并提出了上古音29韵部、32声母之说。李新魁(1986)比较全面地概括了今音学、等韵、古音学的主要内容。唐作藩(1987,1991年重排繁体字版)详细讨论了《广韵》的性质、声母系统和韵母系统、四声的性质以及与现代汉语普通话声、韵、调的关系。沈祥源和杨子仪主编(1991)内容详尽、注重实用，对象是师范院校学生。该书除了介绍和讲解汉语音韵学基本知识外，为突出实用性，还介绍了文学的音韵美、方言调查与研究和音韵学名著及工具书的运用等内容。

2. 专题研究

1978年，北京大学重建语音实验室并恢复招收研究生。经过三四年的努力，第一批成果作为林焘和王理嘉等(1985)出版，主要是对北京话一些语音所做的实验研究。林焘教授1957—1989年间的12篇论文于1990年出版(林焘,1990)。南开大学石锋教授出版了两部论文集(石锋,1990;石锋和廖荣蓉,1994)。郭锦桴(1993)是一部专门研究汉语声调和语调的专著，最后三章论及外国人学习汉语声调语调中存在的问题和教授外国人汉语声调和语调的方法。

近年的专门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理论建设

在语音学理论方面，石锋(1991)提出了自己的语音观。他认为语音有三个层次：音位、音素和音子，其中音子是人们通过实验所认识的语音成分，是现代语音学的逻辑起点。论文说明了音子的提出、表现和分析方法，论述了音位、音素和音子之间的区别和联系。石锋(1992)论述了人的因素和仪器的作用、口耳之学和语音实验、语音学和音系学等三个语音研究中的重要关系，认为只有人和仪器相结合才能在语音研究方面做出成果。口耳之学是定性、语音实验是定量，缺一不可。他特别倾向Ohala (1991)的“总合”思想，提出把语音学和音系学结合起来，实际上就是重视语音

研究在语言研究中的作用。陶红印(1991)分析了辨认语调单位的问题,提出语调单位在性质上纯粹是超音质的,辨认语调单位需要考虑语调变化、音调及两个单位之间的停顿等因素,而不应以语句的句法类型与语义内容为出发点。但是拿语调单位作为一个基本单位来研究语言(口语)具有重要的意义。吴安其(1994)从语音的变异和语音的有序和无序两个方面讨论了语音系统的特点,提出"语音系统是由许多子系统构成的、有序的、关联的、具有动态性和一定演变方向的整体"。

在音系学理论方面。王洪君(1994)针对普通话音系的不同方案和理论依据,认为自主音系学的提出是进入了一个误区,指出生成音系学的已有成果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要在充分的理论探讨基础上对已有的模式进行修正、完善。

2)现代技术的应用

这类工作包括语音合成、语音识别、计算机语音处理和建立数据库等几个方面。在语音合成方面,杨顺安(1991,1992,1994)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他首先归纳出以非儿化韵转变为儿化韵的规律,进而将这些规律模型化,并使之成为计算机合成儿化音节的规则,合成出音质较好的儿化音节。他在此研究的基础上,进而从普通话语音的特点与合成单元的选取、音节的协同调音效应与合成语音的流畅性、普通话的韵律特征与合成语句的自然度、文本—语音转换系统与语言学研究等方面,讨论了普通话语音合成技术中的语音学和语言学问题,说明了这一领域中所取得的成果。在语音识别方面,吴文虎(1992)介绍了语音识别技术的方法以及汉语语音识别目前所达到的水平,并提出深化研究的方向和前景。在计算机语音处理方面,熊正辉(1992)介绍了利用已有的汉字操作系统处理国际音标并能补充造字的软件系统,很有实用价值。

利用计算机进行语音分析的另一件令人关注的工作是建立语音实验数据库。在语音实验研究中利用数据库,可以对语音系统作定量描写,也能在言语工程中提供必要的参考数据。鲍怀翘等

(1992),以藏语为对象,对语音特征的选取、排序检索、统计分析和会话功能的设置进行了探索,对建立汉语语音学参数数据库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

3) 轻声和儿化韵研究

现代汉语普通话特别是北京话的轻声和儿化是一个有特点且引人入胜的题目,成果较多。早在 80 年代初期,林焘(1982,1983)就对北京话轻声和儿化作了初步研究和实验。近年来,林茂灿和颜景助(1990)系统研究了普通话轻声字母韵母的声学表现,从元音简缩理论出发,认为普通话字组存在其特有的轻重音。王理嘉和王海丹(1991)就儿化韵的韵类、声学性质、音位分析、发展趋势以及普通话与北京话的关系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余志鸿(1991)讨论了北方话词尾"儿"的质变及其对汉语语音结构的影响。孙德金(1992)在老北京人中调查了 7 组儿化韵读音的分合,发现很多两读的情况与年龄有密切关系,随着年龄的减小,某些原来合并在一起的儿化韵越来越多地分开了。王旭东(1992)讨论了北京话语流中轻声去化现象有发音、分布以及相关的语音变化。贾采珠(1992)分析了北京话儿化韵因轻读音变而发生的合并现象。李思敬(1994)提出并论证了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儿系列字是复韵母[əl][al],普通话"儿化音"音变的奥秘在于词根语素韵母与"儿"音的[əl]韵母分别结成"拼合"与"化合"的关系,以及普通话的"儿化音"从其历史演变看是从简到繁,得出普通话"儿化音"([ɚ])形态音位的五个变体(/əl/,/al/,/əʴ/,/aʴ/,/uʴ/),简化了薛凤生(1986)提出的 7 个变体的模式。林焘和沈炯(1995)进一步针对北京话儿化韵中一些韵母存在的明显个人语音分歧,运用社会调查的方法取得语音样品,使用置信度工具来讨论语音分歧的问题,从中得出北京话儿化韵语音分歧的规律性。此外,林宝卿(1992)、鲁允中(1995)、史定国(1992)、孙修章(1992)、赵杰(1994)等也具有参考价值。

4）语调和声调的研究

关于早期汉语普通话声调的研究，见吴宗济(1993)。海外运用生成音系学进行汉语声调的研究见王嘉龄(1993)。沈炯(1992)阐述了一种汉语语调分析的框架，提供了一套应用于汉语语调分析的基础概念和基本方法。贺阳和劲松(1992)考察了功能语气不同的6种句子的句终语调在音高、音长和音强三方面的特征，瞿霭堂和劲松(1992)认为北京话的语调是单纯的音高韵律特征，劲松(1992)认为语气的表达手段是语调和重音两种韵律特征。此外，研究汉语方言声调变化的有石锋(1990)、石锋和廖荣蓉(1994)、陈忠敏(1991)等。探讨普通话声调协同发音的文章有林茂灿和颜景助(1992)和沈晓楠(1992)等。

5）节律研究

吴洁敏(1991a，1991b，1992等)对节律进行了系列研究。她提出语音节奏的三种模式：往复式、回环式、对立式，分析了汉语节奏的三大层次：音步节奏层、基本节奏层、节奏群层，提出汉语节奏的7种形式：音韵律、音顿律、长短律、平仄律、重轻律、快慢律和扬抑律。这一研究已引起语音学界的关注。史有为(1992)也论及汉语的音节结构及节奏、格律对文化形成的重要作用，同时提出拟议中的文化语音学应防止出现类似“文化语言学就是语言学的一切”这种观点。此外，研究汉语节律的文章还有文炼(1995)等。

6）语音学的应用

语音学的成果应用于语文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方面的研究近年来开始受到重视。林焘(1989a，1989b)讨论了语音学在汉语语文教学中的地位；石锋和廖荣蓉(1986)通过对比中美学生汉语塞音的时值，探讨美国学生学习汉语普通话塞音系统的特点与规律。此外还有张英宇(1992)、倪彦和王晓葵(1992)、孟悦和王艳宇(1992)等，分别从汉语和外语教学出发，讨论汉外语音对比问题。郭锦桴(1993)对留学生汉语声调和语调的偏误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和分析，提出了对外汉语声调教学的方法。

7) 我国传统音韵学的研究

我国传统的语音研究方法是音韵学。在音韵学理论方面，冯蒸(1989)从哲学、逻辑学和音韵学学科三个角度探讨了汉语音韵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为这一领域勾勒出一个宏观的轮廓。李新魁(1994)收入作者1963—1994年间发表的音韵学研究论文17篇。关于汉语音韵学研究的状况，李新魁(1993)、邵荣芬(1993)、唐作藩(1993)、杨耐思和张渭毅(1993)及张渭毅和唐作藩(1994)有详细的综述。

8) 国外音系学理论和方法的译介和研究

运用生成音系学理论研究汉语已有20多年的历史。国内多以译介为主，较早介绍这种理论的是徐烈炯(1979)、王嘉龄(1980)和刘润清(1980)。介绍音系学理论新发展的还有王嘉龄(1987，1989，1995)、徐烈炯(1989)、陆致极(1990)等。发表的研究文章有季国清(1983)、史宝辉(1989)等。《国外语言学》1992年第2期出"语音学与音系学专号"，登载Ohala (1991)、Beckman (1988)、Fant (1989)、Shen (1990) 四篇译文，王洪君(1992)和余英士(1992)专文介绍Morris Halle和J.J.Ohala两位音系学家。《国外语言学》1995年第1期"语音学与音系学专号"登载Clements & Hertz (1991)、Kohler (1994)、Lehiste (1994) 三篇译文，同时刊载王嘉龄(1995)、王志洁(1995)、张家禄(1995)、李永华(1995)等四篇专题介绍与研究文章。近10年来我国研究音系学的文章逐渐增加，特别是一些留学海外的学者，结合音系学理论研究汉语音系，写出了一批有质量的论文。这些文章论及汉语的音段、音节、重音等各个方面，但以汉语声调(特别是连读变调)研究为最多。关于这些研究的详细情况，见王嘉龄(1993)和陈丽萍、姜晖(1994)。

9) 英语语音的研究

本时期研究英语语音的著作主要有桂灿昆(1985)、何善芬(1985)、周考成(1984)、邹世诚(1986)、许天福等(1985)、葆青

(1988)等。这些书基本上都是大专院校英语专业教材，适用于不同的年级，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英语学习者学习好英语语音，因而常于一般的语音描写，较少理论阐述。其中桂灿昆(1985)是一部理论性较强的著作，该书突出对于美国英语语音的研究，介绍了发音语音学、声学语音学、感知语音学、音位原理、音变、重音、节奏、音渡、语调等语音学的基本概念和知识，论述了美国普通音(GA)的特点，并对美音和英音、汉语和英语两个语音系统进行了对比。周考成(1984)虽出版时间早些，仍不失为一部好书。与桂灿昆(1985)不同的是，该书重英音(RP)。作者将语音学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与英语语音训练较好地结合起来，既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又有大量的口耳训练。其特点是除一般语音教材所包括的内容外，对于语音的功能变体和语音的社会基础等也有一定的论述。其他几部教材更适用于低年级学生进行全面的英语语音训练。

三、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发展趋势

1. 重视语音学与音系学的理论建设

我国语音学研究的进展是在充分借鉴了国外语音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起到了很好的社会效应。传统音韵学的研究仍方兴未艾，但音系学介绍到我国较晚，与语音学和音韵学相比，我国在对于西方音系学的了解和运用音系学方法进行汉语音律研究，特别是对汉语音系的理论解释方面是薄弱的。一方面有人把它与我国传统音韵学对立起来，认为西方音系学理论不一定适用于汉语的音律，另一方面音系学理论性强、方法较为复杂，至今国内掌握这门理论的人廖廖无几，研究成果多限于留学海外的学子(王嘉龄，1993)，一时间出现了唯音系学先天不足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出现，不利于我国多年来一直探讨和争论的节律、语调和声调的进一步研究和讨论，加之我国已有学者大力倡导语音学与音系学的融合(如石锋，1992)，在

还没有许多音系学成果出现的情况下，这种融合恐怕很难出现一个很好的局面。正如王洪君(1994)所指出的，如果汉语音系的某些研究成果能够“在理论上得到充分阐述，将是汉语学者对普通音系学的贡献”。正由于我国学者已经认识到了以上两点，音系学的研究，特别是对汉语音系的理论阐释，将是今后这个领域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之一。

2．加强语音学的实用性研究

我国的语音学研究较早地吸收了国外语音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在历史上，它起到了很好的社会作用：它曾为建国初期推广普通话、建立汉语拼音系统、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立下过汗马功劳。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及时介绍并研究语音合成的技术和方法，针对汉语的语音特点探讨汉语普通话语音合成的方法和可行性，将对人工合成汉语普通话的工作做出新的贡献。我国的机器翻译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刘涌泉，1989)，但就目前来讲，基础语言研究工作(如对语音、语法、语义的研究)能否再进一步，直接影响着机器翻译工作的进展。在国外，近年来语音学与实验技术的结合被称作“言语科学(speech science)”，如英国 Essex 大学的 Phonetics 硕士专业就于 1987 年改名为 Speech Science。瑞典的方特教授和高奋博士曾于 1985 年来华作系列学术报告，主题就是“言语科学与言语技术”，只可惜，漫长的出版周期致使这些报告的中译本到 1994 年才与我国读者见面(方特和高奋，1994)。欧洲国家在 80 年代中期就把机器翻译作为一件大事来抓，投重资资助这方面的研究(如当时著名 Eurotra 项目)，而我国在这项工作上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要想使语音学的研究具有实用性，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就要注意基础理论研究与现代技术的接轨。因此，我国今后的语音学研究在这个方面应给予足够的重视。事实上，在这个方面我国的学者已经走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3. 语音学与音系学研究并重

进入 90 年代以来,西方和我国学者都论述了语音学与音系学融合的问题,那么,这是否就是这两门学科的最终命运呢?融合是必要的,但这要看从哪个层次上来说。固然,Ohala (1991) 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这就是二者的分离,其根源是它们的物理学属性和语言学属性所决定的,结果是使它们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宽。然而,音系学的独立,使它失去了一个有力的武器、一门有用的技术。但"总合音系学"是否就能解决全部问题呢?似乎也不尽然。它该只是一种指导思想,即我们没有必要非把它们分开不可,在研究中应该互相吸收有益的成分,提高我们研究的效率。这种融合的思想完全适合我们中华民族的一贯传统,因此,只要音系理论一旦在我国得到足够的重视,融合是不难做到的。

4. 外语界的研究有待深入

如前所述,近年来,研究英语语音的著作出版了一些,但都局限于一般的语音描写,少于理论阐述(其他外语语音的研究更是如此)。国外在这方面发展变化很快,但国内资料较少。在这方面,《国外语言学》杂志及时地组织介绍音系学的最新进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中国科学院声学所和天津师范大学的同志尽了很大努力。但是,由外语界教师编写、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语言学系列教材虽受到广泛赞誉,毕竟至今还没有编入一部《语音学与音系学》,对希望系统地学习和了解并有志于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一学科领域的外语界同仁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了。

主要参考文献：

葆青，《实用英语语音》，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鲍怀翘等，藏语拉萨话语音声学参数数据库，《民族语文》第5期，1992。
曹剑芬，《现代语音基础知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陈丽萍、姜晖，近年来美国大学汉语音系学博士论文简介，《国外语言学》第1-2期，1994。
陈忠敏，声调在汉语南方方言侗台语里的共同表现形式，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编《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的现代思考》，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
Fant G. 1989，言语研究展望，张家禄译，《国外语言学》第2期，1992。
方特、高奋，言语科学与言语技术，商务印书馆，1994。
冯蒸，汉语音韵研究方法论，《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1989。
桂灿昆，《美国英语实用语音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
郭锦桴，《汉语声调语调阐要与探索》，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
何善芬，《实用英语语音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胡明扬等，《北京话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
贾采珠，北京话的轻声儿化韵，《中国语文》第1期，1992。
贺阳、劲松，北京话语调的实验探索，胡明扬等(1992)，296—329页，1992。
季国清，汉语韵律结构的非线性分析，《求是学刊》第1期，1983。
劲松，北京话的语气和语调，《中国语文》第2期，1992。
李思敬，《汉语"儿"[ɚ]音史研究》(增订版)，商务印书馆，1994。
李新魁，《汉语音韵学》，北京出版社，1986；
四十年来的汉语音韵研究，刘坚、侯精一主编，1993；
《李新魁语言学论集》，中华书局，1994。

李永华，麻省理工学院与生成音系学的发展，《国外语言学》第1期，1995。
林宝卿，普通话的儿化，《语言文字应用》第4期，1992。
林茂灿、颜景助，普通话轻声与轻重音，《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1990；
普通话四音节词和短语中声调协同发音模式，《声学学报》17卷6期，1992。
林焘，北京话儿化韵个人读音差异问题，《语文研究》第2期，1982；
1983，探讨北京话轻音性质的初步实验，《语言学论丛》第10辑，1990；
1989a，汉语韵律特征和语音教学，世界华文教学研讨会论文（新加坡），1990；
1989b，语音在语文教学中的地位，香港语文学会第五届国际研讨会论文，1990；
《语音探索集稿》，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
林焘、沈炯，北京话儿化韵的语音分歧，《中国语文》第3期，1995。
林焘、王理嘉，《语音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林焘、王理嘉等，《北京语音实验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刘坚、侯精一主编，《中国语文研究四十年纪念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
刘润清，英语重音规则生成音位学，《现代英语研究》第2辑，1981。
刘涌泉，《应用语言学论文选》，商务印书馆，1989。
鲁允中，《普通话的轻声和儿化》，商务印书馆，1995。
陆致极，词汇音位学和英语构词，《现代语言学与应用》第2期，1990。
罗安源、金雅声，《简明实用语音学》，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
罗常培、王均，《普通语音学纲要》，科学出版社，1957；
《普通语音学纲要》，商务印书馆，1981。
孟悦、王艳宇，普通话发音水平与英语发音水平的关系：一份调查

报告,《外语教学与研究》第1期,1992。
倪彦、王晓葵,英语国家学生学习汉语语音难点分析,《汉语学习》第2期,1992。
瞿霭堂、劲松,北京话的字调和语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5期,余志鸿主编1992。
邵荣芬,欣欣向荣的汉语音韵学,刘坚、侯精一主编,1993。
沈炯,汉语语调模型刍议,《语文研究》第4期,1992。
沈祥源、杨子仪主编,《实用汉语音韵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
沈晓楠,汉语普通话声调的协同发音,林茂灿译,《国外语言学》第2期,1992。
石锋,《语音学探微》,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试论语音的层次,《中国语言学报》第4期,1991;
语音研究中的三个关系,"中国语文研究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北京)"论文,刘坚、侯精一主编,1993。
石锋、廖荣蓉,中美学生汉语塞音时值对比分析,《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1986;
《语音丛稿》,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
史宝辉,关于英语句子重音的理论探讨,《北京林业大学社会科学论文集》,1989。
史定国,普通话中必读的轻声词,《语文建设》第4期,1992。
史有为,汉语文化语音学虚实谈,《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1992。
孙德金,北京话部分儿化韵读音调查,《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1992。
孙修章,必读儿化词研究报告(节录),《语文建设》第8期,1992。
唐作藩,《音韵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1991;
四十年音韵研究的回顾,刘坚、侯精一主编,1993。
陶红印,语调单位作为言谈的基本单位,《语言研究》,1991年增刊。
王洪君,Morris Halle与生成音系学,《国外语言学》第2期,1992;

什么是音系的基本单位，余志鸿主编，1994。
王嘉龄，生成语音学简介，《山东外语教学》第1期，1980；
词汇音系学，《国外语言学》第2期，1987；
自主音段理论的由来与发展，《现代语言学与应用》第1期，1989；
汉语声调的生成音系学研究，刘坚、侯精一主编，1993；
优选论，《国外语言学》第1期，1995。
王力，《汉语音韵学》，中华书局，1956；
《汉语音韵》，中华书局，1963，1991。
王理嘉，《音系学基础》，语文出版社，1991；
四十年来汉语语音研究综述，刘坚、侯精一主编，1993。
王理嘉、王海丹，儿化韵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与李思敬先生商榷，《中国语文》第2期，1991。
王旭东，北京话的轻声去化及其影响，《中国语文》第2期，1992。
王志洁，独值特征架，《国外语言学》第1期，1995。
文炼，汉语语句的节律问题，《中国语文》第1期，1994。
吴安其，语音系统的特点，余志鸿主编，1994。
吴洁敏，1991a，什么是语言的节律，《语文建设》第5期，1991；
1991b，汉语节奏中的套叠现象，《杭州大学学报》第3期，1991；
汉语节奏的周期及层次，《中国语文》第2期，1992。
吴文虎，汉语语音识别的现状与展望，《语文建设》第6期，1992。
吴宗济主编，《现代汉语语音概要》，华语教学出版社，1992。
吴宗济，普通话声调实验研究四十年，刘坚、侯精一主编，1993。
吴宗济、林茂灿主编，《实验语音学概要》，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熊正辉，YFX计算机音标处理系统简介，《方言》第3期，1992。
徐烈炯，两种新的音位学理论，《语言学动态》第4期，1979；
生成音系学：问题与发展，《外语教学与研究》第3期，1989。

徐世荣,《普通话语音常识》,语文出版社,1993。
许天福、虞小梅,孙万彪,《现代英语语音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薛凤生,《北京音系解析》,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
杨耐思、张渭毅,1992年的汉语音韵学研究,《语文建设》第11期,1993。
杨顺安,普通话儿化音节合成的初步研究,《中国语文》第2期,1991;
语音合成与语音学研究,《语文建设》第8期,1992;
《面向声学语音学的普通话语音合成技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
余英士,J.J.Ohala—"总合音系学"的倡议者,《国外语言学》第2期,1992。
余志鸿,儿化和语言结构的变化,《江苏社会科学》第2期,1991。
余志鸿主编,《现代语言学:理论建设的新思考》,语文出版社,1994。
张家騄,韵律特征研究新进展,《国外语言学》第1期,1995。
张渭毅、唐作藩,1993年的汉语音韵研究,《语文建设》第11期,1994。
张彦昌、戴淑艳、李真,《音位学导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
张英宇,汉外语音对比与汉语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1992。
赵杰,《北京话满语底层和"轻音""儿化"探源》,北京大学:博士论文,1994。
周考成,《英语语音学引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4。
周同春,《汉语语音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朱川,《实验语音学基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邹世诚,《实用英语语音》,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
Beckman, Mary E. 1988. Phonetic theory. In Newmeyer, F.J.

(ed). *Linguistics: The Cambridge Survey*, Vol. 1, pp. 216–3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omsky, Noam & Morris Halle. 1968. *The Sound Pattern of English*. Cambridge, MA: MIT.

Clark, John & Colin Yallop. 1990. *An Introduction to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Oxford: Blackwell.

Clements, George N. & Susan R. Hertz. 1991. Nonlinear phonology and acoustic interpretation. In *Proceedings of the 12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honetic Sciences*.

Kohler, Klaus J. 1994. Complementary phonology: a theoretical frame for labelling an acoustic database of dialogues. I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poken Language Processing* '94.

Ladefoged, Peter. 1971. *Preliminaries to Linguistic Phone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defoged, Peter. 1982. *A Course in Phonetics*. 2nd ed.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Lehiste, Ilse. 1994. Poetic metre, prominence, and the perception of prosody: a case of intersection of art and science of spoken language. I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poken Language Processing* '94.

Ohala, John J. 1991. The integration of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In *Proceedings of the 12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honetic Sciences*.

Schane, Sanford A. 1973. *Generative Phonolog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Shen, Xiaonan Susan, 1990. Tonal coarticulation in Mandarin. In *Journal of Phonetics*, Vol. 18, pp.281–95.

Sloat, Clarence, Sharon Henderson Taylor & James E. Hoard.

1978. *Introduction to Phonology*.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外语语法研究:回顾和展望

张会森

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从自己的见地扼要回顾我国外语语法研究的现状和对今后语法研究的展望。由于篇幅、任务所限,回顾部分基本局限在1990年到现在的5年,展望则力图着眼于2000年之前的5年。前后跨度为10年。此外,笔者本人主要是研究俄语的,因此涉及俄语语法研究的地方会较多,而对于其他语种说的则会不够充分;所举事实,难免挂一漏万。

一、外语语法研究概况

语法是语言构造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语言用词造句规则的汇集。语法在外语教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外语的语法研究一直持续不衰。1990年以来,我国外语界在语法研究领域继往开来,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

首先,在传统的描写—规范语法方面,这5年来出版了多部比较有份量的系统、综合型的、密切结合外语教学,同时适应较高层次的社会需要的语法书,例如英语方面:薄冰主编:《高级英语语法》(上,下册,北京出版社,1990)、陆锦林:《高级现代英语语法》(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1990);日语方面:朱万清:《新日本语语法》(上,下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2)、刘耀武、徐昌华:《日语语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俄语方面:张会森:《现代俄语语法》(上,下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等。语言的语法在不断地发展、演变(尽管是渐进的,缓慢的),当代语法学也不断地有新

的成果、新的理论出现。上面所提及的成果中，大都能做到在书的目的、性质允许的范围内吸收、反映语法学的新成果，反映、描写当代语言中新的语法现象，有不同程度的“推陈出新”。

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些专题性语法著作，如薄冰的《英语名词的数》(北京出版社，1990)、《英语时态详解》(商务印书馆，1992)、张家骅的《俄语动词体用法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等。外语刊物上不断有研究某一语法现象的论文，但篇幅所限，难免不够全面、细致、深入。因此就一些主要的、复杂的语法范畴、语法现象，写出专门著作，进行有理论、有充分事实的研究，是很必要的。这是语法研究发展的一种具体表现。我们期待着有更多质量高的专题研究成果出现。

这一时间，我国外语语法研究中的一大成果是前苏联科学院1980年《俄语语法》(《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中译本的出版。这部卷帙浩翰、博大精深的语法学巨著的翻译本身就是一种研究成果。中译本是由上外胡孟浩教授主持，组织国内20余位教授、专家通力完成的，1991年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154万字)。这部两卷本著作比较集中地反映苏俄语法学最新成果，其原文版在80年代中期即传入我国，出版了影印版，对我国俄语界产生很大影响，推动了我国俄语语法的研究。1986年在哈尔滨黑龙江大学曾举行过有160余人参加的针对该书的专题研讨会。为了便于我国俄语界的使用，使之进入俄语高层次的教学(例如研究生、教师)，三位长期从事有关领域研究和教学的专家(信德麟、张会森、华劭)编写出了这部语法巨著的简编本：《俄语语法》(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0年出版，后多次重印，已达23000册)。

应该指出，介绍、引进国外的语法新理论、新方法、新成果对于发展我国的语法学，是十分必要的。90年代以前，我国就介绍、引进了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理论、格语法理论、句子模式理论、功能语法理论、实义切分及话语语法理论等，活跃和促进了我国的语法研究。1990年前后，除了外语刊物上不断有评介文章发表外，这

方面还出版了几部评价专著，如：徐烈炯：《生成语法理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胡壮麟：《系统功能语法》（北京大学出版社。同时还出版了系统功能语法研讨会的论文集，1990）、刘耀武：《日语语法研究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等。进入 90 年代，“认知语法”（Cognitive Grammar）作为一种新兴语法理论和模式在国际上引起重视。由美国学者兰凯卡（Langacker R. W）倡导的“认知语法”针对生成语法理论提出了：语言的语法不是一个自足的形式系统，对语言的语法的描写必须参照人的一般认知规律，对句法的描写与分析不能脱离语义、不能脱离认知逻辑。兰凯卡于 1987、1991 出版了他的《认知语法基础》一、二卷。象这样有影响的语法著作似应组织译介。翻译这类反映世界语言学新潮、又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出版上有些困难，曲高和寡，印数不多，出版社从经济效益考虑不愿接受，译者因而却步。如果国家社科基金能够资助，那就会给这项工作注入活力。

二、对语法交际功能的研究

语法学，语法研究，作为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必然体现着一定时期语言研究的大趋势。当代语言学发展的大趋势是：从侧重对语言的形式结构和形式关系的研究转向侧重研究语言的交际运用（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ие）。如果说，以前语言学研究的主要是“语言是怎样的构造？”那么现在则侧重于研究“语言是如何运作的？”美国拉波夫说得好：“语言学的对象毕竟是社会集团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因此，语言研究必须从对语言的单纯形式和结构的研究中解放出来。语法学的主要注意力逐渐转向研究语法单位（语法形式、语法结构）的语义、功能和言语交际中的运用规律。交际语法、功能语法、语义语法、甚至“言语语法”、“语用语法”的理论相继出台。

这里着重谈谈功能语法（也叫语义（意念）语法）的研究。功能

语法已成为与传统语法、生成语法并存竞争的一种极富生命力的语法模式。功能语法有不同的流派和类型。比较典型的，和外语教学、人的思想的积极表达最为密切的是“由语义到其表达手段”的描写类型。这种功能语法就实质而言是一种“编码”语法，它以语义功能范畴（而不是形式范畴）作为分类单位，在统一的语义范畴内描写其语法上不同平面的表达手段。这种语法近年来又称为“表义语法”（иде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在前苏联、俄罗斯、东欧、西欧各国，现在甚受重视，成为研究的一大“热门”。它特别适用于外语教学和外语交际实践。匈牙利学者德热（Дэже Л.）的看法很有代表性：“外语教学与实践告诉我们：为了实现交际任务，除了以形式为出发点的语法（即传统类型语法——森注），还需要以内容（语义）为出发点的语法，这样的语法能满足交际的迫切需要。”

还是在 1980 年我们就发表了《功能语法若干问题》一文（《外语教学与研究》1980，No2），倡导进行功能语法的研究。后来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到 1990 年我们撰写了《俄语功能语法》，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于 1992 年出版。该书立即引起俄语界很大反响，《中国俄语教学》、《外语学刊》、《外语教学》先后有三篇书评发表，认为该书的出版“标着中国俄语语法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对中国俄语教学将产生重大影响”。这一时期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吴贻翼的《现代俄语功能语法概要》。功能语法已开始进入我国俄语教学。1994 年 8 月，作为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学术活动的一项内容，在牡丹江镜泊湖召开了首届俄语功能研究讨会。会上专门讨论了功能语法问题。功能语法是一门新兴的语法门类，理论和实践上都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深入研究。就我们已出版的著作而言，很多语义范畴（功能项目）尚未涉及，已涉及的项目中有些也有待拓宽和深入。我们期待着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

三、对句子语义的研究

1990年以来，我国在同义句，同义结构及其转换和运用的研究方面也有了可喜的成果。这方面有两部专著值得提及：倪波、顾柏林：《俄语语句的同义转换（方法和手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王铭玉：《现代俄语同义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同义句的研究标志着句法学的新的深入和发展。同义句的研究既涉及到句子结构，更直接涉及句子语义，它又与逻辑、修辞、语用诸学科密切相关，问题复杂，很多基本问题尚无定论。上述二书从理论和实践上作了有益的尝试。句法同义现象特别是同义句问题是一个新兴研究领域，传统句法、结构句法对这种问题很少涉及。我在为王铭玉的专著所写的“序”中指出：“同义句既有语言平面，也有言语平面。铭玉的这项研究成果主要是在语言平面上作了文章。……但同义句的言语平面也同样是重要的，同义句与语言的使用——与言语密切相关。同义句在言语中的选择与使用，同义句的相异之处，不同同义句的修辞—语用问题，同义句与外语教学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

对句子语义的重视是当代句法学发展的显著特征。在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上，现阶段的语言学天平明显地倾向于内容。这种倾向体现在功能语法、语义、句法、语句的逻辑分析、语用分析中，以及新出现的“认知语法”理论中。

传统句法中的一些有争论的问题，如句子模式问题、所谓的“单部句”类型问题、句子成分分析与分类问题、并列与主从复合句的划分与类型问题等等，如果充分考虑语义因素（包括认知规律、思维逻辑），而不是囿于形式特征，必然会有新的、更为合理的解决。

当代语言学中句子语义研究方兴未艾。国内有些介绍性文字，但尚缺乏深入的研究。国内尚没有出现象俄国阿鲁久诺娃

(Арутюнова Н. Д.)的《句子和其意思》(《Предложение и его смысл》)、马杜切娃(Падучева Е. В.)的《论句法语义》(《О семантике синтаксиса》)、《语句和它与现实的对应关系》(《Высказываине и его соотнесённость с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ю》)这类不只是有理论探讨、而且深入到语言运用实际中、有丰富的语言材料的分析著作。我们应该努力。

四、话语语法

传统的语法学向来以书面语为研究描写对象。近十余年来，语言学界注意了日常口语的研究，其中包括口语语法问题。这是语言学的一大进步和发展。口语语言交际中所使用的语法和写作文章的语法有很明显的差异，不掌握口语的特殊语法形式和句子结构，很难以顺利地进行交际(表达和理解)。口语语法对于外语教学与运用实践具有重要意义。著名学者 Halliday 很早就呼吁："我们需要新的描写，如口语语法和语篇研究。"从 80 年代我国开始重视口语研究，近五六年我国俄语界出版了三本俄语口语语法书：孙夏南：《俄语口语语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徐翁宇：《俄语口语研究》(上海译林出版社。1993)、张会森《俄语口语与常用口语句式》(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3)。

从语言学角度对语篇(话语)进行研究我国在 80 年代已经开始。北外王福祥教授最先写出有关专著《话语语言学》并主编了《话语语言学论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语篇研究是当代语言学的热点之一。语篇不再只是语法研究的辅助材料(语言学一直以句子为最大单位)，而同时是语法学的对象。但自王著之后国内尚无语篇语法(包括话语语法)的专著。我们希望在 2000 年之前我国能够有较高水平的英、俄、日等语言的语篇(话语)语法。

五、虚词语法

传统语法学，特别是在实词屈折丰富的语言中，对于“虚”词（“小品词”、辅助词、结构词），很少注意，往往只限于分类，对各类词做笼统的功能描述。这是因为以往的语法描写侧重于实词——“(大)品词”的缘故。近些年来，由于语言学侧重于言语交际、侧重于语义表达和语用，虚词问题便受到重视。各种虚词的表义功能、语篇功能、修辞—语用功能是极其复杂、丰富的，需要细致、全面的描写分析。据笔者今年参加两次国际学术会议得知，在俄罗斯，如莫斯科科技大学、远东大学、俄语研究所等处，都已把俄语虚词——非实词的深入研究纳入研究日程。“虚”词——非实词一直是外语运用和领会、外语教学中的难点，我们应该把虚词的语义、功能研究搞起来。英语的介词研究已有些成果，其他语种则鲜有研究。就俄语而言，很多语气词、前置词、连接词意义、用法复杂多样，甚至一个词的意义和用法都可以是研究课题。从总体上说，虚词的研究一般还是限于词组、句子的范围内，而随着话语分析、语篇语言学的兴起，各种虚词——非实词的语篇功能急待研究，但这方面的工作还没有真正开始。我以为，很有必要搞出《虚词语法》(Грамматика служебных слов)或者是《虚词词典》(словарь служебных слов)这类成果。

六、对比语法研究

1990年以来，我国的汉—外或外—汉语言对比研究跨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很说明问题的事实是：1990年以来出版了《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杨自俭等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对比语言学论文集》(王福祥选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2)；1991年4月杭州分别召开了两个对比研讨会：全国首届“中外语

言文化比较研讨会”和全国首届“俄汉语言对比研讨会”。同年7月日汉语对比研讨会又在威海市召开。这一时期在对比语法学方面出现了一些成果。笔者认为,如何把双语对比研究,特别是语法对比研究推向更广、更深的研究,引出全面、系统、深入的成果来,应该是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近10年来,我国学者在语法对比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总的来看对比语法成果还相对薄弱。数量不多,履盖面很小(只是某些问题的对比),尽管有的研究成果相当出色,总体上质量尚待提高。汉—外或外—汉语言对比研究是我国语言学易于登上世界舞台的一个科学领域,这方面有我们的长处,有我们的优势。据我们所知,至少俄—汉或汉—俄对比语法,在国际语言学界还是一片空白。时代呼唤着我们拿出几部有份量的、比较系统、全面、深入、细致的对比语法著作来,比如俄汉(汉俄)对比语法,英汉(汉英)对比语法,等等。

应该指出的是:对比语法学发展到今天,已经不限于两种语言的语法系统、语法范畴的形式系统的对比。根据语言学发展的趋势,应侧重功能、用法上的对比。理想的对比应是把形式、意义、功能和用法结合起来,有时甚至加进功能修辞和语用的对比。芬兰学者 K. Sajavarra 中肯地指出:“仅仅抽象地单纯地比较两种语言的语法系统,显然是不够的,特别是对于应用目的而言,尽管传统的对比分析对于从语言学角度来理解两种语言是必要的,而且这种分析会产生某种理论上的结论。”俄罗斯学者 В. Гак(加克)认为:“功能对比揭示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言语组织的规律和运用上的特点,这看来是语言对比研究的最终目的。”

语法对比研究不仅有语言学上的理论意义,而且大大有利于我国各种外语以及对外汉语的教学与研究,有利于汉外机器翻译的发展。

完成我们上面提出的大部头对比语法研究,个别人力量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某一个单位的力量也是不够的。可以组织国内有关的学者(包括有一定外语知识的汉语专家)共同努力。1991年

笔者在主持杭州俄汉语言对比研讨会时，曾根据与会同仁的愿望试图组织力量撰写《俄汉语对比语法》，但当时因经费、出版方面的原因而未果。希望这一计划能得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的支持。

前面已指出：当代语言学研究的大趋势侧重的是“社会语境中实际的语言用法，而不是抽象的或理想的语言系统”（Van Dijk, Kintsch)，但这不排斥理论研究。语言研究不应空洞地“坐而论道”，要注意解决实践提出的问题，要有理论有事实，注意理论结合实际。另一方面，我们应强调在语言（语法）具体研究中提高理论思维，吸收、运用新观念、新方法，不能满足于事实的简单分析和罗列，防止追求“票房价值”。

主要参考文献：

1. 正文中已指明者不再列举。
2. 关于当前语言学及语法学研究的侧重点，参阅：
   (1) Лингвистика на исходе XX века: Итог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Тезись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Москва, 1995
   (2) *Linguistics by the End of the XXth Century: Achievements and Perspectiv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bstracts). Moscow, 1995.
3. 关于功能语法问题我们在《俄语功能语法》一书“导言”中给了综述；国外文献可参阅：《Теория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1-4, 1987-1992.
4. 关于对比研究，参阅论文集：
   (1) 《Новое в зарубеж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е》 выпуск XXV (Контрастивн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 Москва, 1989.
   (2) 《语言对比研究》（国外论著译文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

我国语义学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王逢鑫

语义学是一门跨学科研究的学问,主要涉及哲学与语言学两大领域。现代语义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以哲学和逻辑学的框架与概念为基础。目前,国际学术界对哲学与语言学这两个领域的语义研究交汇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本文仅涉及我国学术界对国外语言学领域中的语义研究的一些现状与展望。

一、语义学的介绍与传播

70年代末,我国对国外语言学开始全面、系统的研究,经历了引进、吸收、借鉴到应用的过程。对现代语义学的研究,跟语言学其它分支相比较。仍处于艰苦的探索阶段。语义学研究的步子慢了一些,这是因为:第一,专门从事语义学研究的人员比较缺乏,其中不少人原来是学外语的。第二,这门学科涉及哲学、逻辑学和数学的理论,显得十分深奥,令人生畏。第三,引进的国外资料相对匮乏,新资料更是凤毛麟角。介绍的很少,而且片面,评论的则更少。教学与研究所使用的关于语义学理论的书籍大多数出版于70年代,不能正确反映国外语义学研究的现状。第四,国内现有的语义学研究,比较多地利用成分分析的方法,而几乎很少涉及当前西方语义学家普遍进行的逻辑式研究。

80年代初,我国一些高等院校的与语言学有关的系科(主要是英语系)开始设立语义学课程,基本上是研究生课程。参考书目有Leech, Lyons 和 Palmer 等人在70年代出版的语义学专著。

1987 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李耀华等人翻译的 Leech 的《语义学》，介绍了 Leech 的语义学理论。

1988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胡壮麟等人的《语言学教程》。这是一本阐述语言学基本原理的教科书。其中有专门章节介绍语义学的理论。

1988 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伍谦光的《语义学导论》。这是《语言学系列教材》中的一本专著。该书在 1991 年出版修订本。这本书系统地阐述了语义学的研究对象与范畴。作者指出：语义学分为四种，包括语言学的语义学、逻辑学的语义学、哲学的语义学和普通语义学。此书主要探讨语言学的语义学。作者还分别讨论了语义学与哲学、心理学、逻辑学及语用学的关系。语义学是语言学中比较年轻的学科，很难找到一个大家公认的研究模式，作者简要介绍了近几十年来美国语言学界比较有影响的语义学研究模式。包括：普通语义学、沃尔夫语义学、语义分类学、逻辑—数理语义学、解释语义学、生成语义学、格语法和齐夫语法。此外，还比较了传统的“符号学三角形”语义学理论与当代的几种语义学理论。当代重要的语义学理论有：并置理论、结构语义学、语义成分分析和语义场理论。由于本书是语言学的语义学，作者花了较大篇幅介绍语义特征、词义与 Leech 阐述的七种词义类型、词义关系(同义、反义和歧义)、及词汇信息类型。本书除了论述语义学的基本理论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理论联系教学实际，分析了语义学对英语教学的指导意义，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1988 年，学林出版社出版了毛茂臣的《语义学：跨学科的学问》，这是《人文丛书》中的一本用通俗方法介绍语义学理论的专著。该书论述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哲学、心理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等学科对语义研究的贡献；第二，现代语义学在词义、句义、语篇意义、及非语言交流手段表达的意义等方面的突破；第三，语义学与文学、翻译、新闻、及词典学的关系。这是一本深入浅出介绍语义学的书。

1990年,语文出版社出版了徐烈炯的《语义学》。此书作者曾于1988年在复旦大学给研究生以此书内容讲授语义学。作者看到国内学术界介绍国外语义学研究状况时,对成分分析谈得较多,而对逻辑式很少论及。这种欠平衡的介绍,给国内读者造成一种错觉,以为国外语义学研究的主要趋势是成分分析。作者认为国外语义学研究的主流是逻辑式。为澄清国内读者的误解,作者从哲学和逻辑学更广泛的角度阐明语义学理论。此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介绍欧美哲学家、逻辑学家和语言学家提出的七种语义理论。包括:指称论、意念论、行为—环境论、验证论、真值条件论、用法论和境况论。上述理论研究表现出语义学在哲学和语言学两大领域交汇的趋势。此书下篇则集中探讨语言学领域内语义研究的一些重要课题。涉及词的意义、词组和句子的意义、语义与语法、先设、题元、照应及量词等内容。

1993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寅的《简明语义学词典》,收录两千余词条,系统介绍了语义学的术语。

二、我国语义学研究的现状

语义学,顾名思义是研究语言意义的学问。由于语言与逻辑思维、心理活动、文化交流及社会活动紧密相关,对语言意义的研究不限于语言学领域,而涉及哲学、逻辑学及心理学等多学科。我国外语界对语义学的研究刚刚起步,仍局限于语言领域,与哲学界的语义研究联系不多。

语义、顾名思义是指整个语言的意义。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其研究范围除了词以外,向下包括词素和义素,向上包括词组、句子,段落、篇章等语言单位和言语单位的意义。我国外语界对语义学的研究,深受 Lyons 和 Leech 等人的影响,集中在同义(synonymy)、反义(antonymy)和歧义(ambiguity)等意义关系(sense relation)方面。

对同义的研究，传统的做法局限于同义词（synonym）研究。对同义词的定义不很科学，认为同义词是音异形异而义同的词。英语具有一词多义（polysemy）的特点，很难找到每个义项都相同或相似的同义词。意义有不同的理解和分类。Leech 提出 7 种类型的意义。主要有概念意义（conceptual meaning）和内涵意义（connotative meaning）之分。人们常说的同义，指的是概念意义的相同或相似。现在外语界的共识是：同义不再笼统地指两个词的意思相同。而是指两个词的概念意义相同。允许在内涵、用法和习惯搭配等方面存在差异。

对同义的研究。传统的做法还局限于词汇层面，具体地说是用替换（substitution）的方法，即在不改变句法结构的情况下，用一个词或词组替代另 ·个词或词组。这种方法多用于词汇教学、词典编纂和标准化考试的词汇多项选择。现在对同义的研究已扩大到对同义句（paraphrase）的研究。即两个句子的意思相同或相似。这从词汇层面上升到句子层面。具体地说是用意译或同义转译（paraphrasing）的方法。除了通过词汇变化（lexical change）以外，还可以通过句法变化（syntactical change）及逻辑变化（logical change）来进行意译或同义转译。这种方法对英语教学、会话、写作和翻译都有极大的指导意义。伍谦光在《语义学导论》阐述了利用同义关系和同义转译指导英语教学的问题。

与对同义现象的研究相比较。外语界对反义现象的研究稍微弱了一些。表现之一是同义词词典容易找到，而反义词词典则是凤毛麟角。这是因为同义现象比较普遍。完全雷同是同义，而大同小异也包含同义。但是反义现象相对少些。问题还出在“反义”的定义上。传统语义学认为反义指两个词的意思相反。这种提法局限于相反性、十分笼统。现代语义学对反义进行了更加科学的分析，认为反义除了具有相反性的特点以外，还有不相容性、相互依赖性及分级性等特点。反义不仅包括绝对反义，或称成对反义；还包括相对反义，或称分级反义。反义现象远比同义现象复杂，给

学习研究造成一定困难。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反义现象进行了一些研究。伍铁平用模糊语言学理论做了一些富有价值的论述。廖绿胜等认为反义关系的语言功能包括解释词汇、区别同义词和扩大词汇量。利用反义关系有利于外语教学和词典编纂。

大体来说，同义指形式不同而意义相同；反义指形式不同而意义也不同。歧义却是指形式相同而意义不同。同义与反义涉及语义的分级性(gradability)。即语义在数量、程度和频度方面存在差异。相同是相对的，而相异是绝对的。歧义则涉及语义的模糊性(fuzziness)。即语义在内涵和外延方面可能界限不清。精确是相对的，模糊是绝对的。语义的分级性和模糊性是所有自然语言的基本属性。英语由于具有同形异义、一词多义和句法松散等特点，造成大量的歧义现象。人们日常生活会话中充满歧义，但是在一定语境中并不会造成误解。秦洪林等在《英语歧义研究》中对歧义的成因、分类和修辞作用做了全面细致的分析。我们应辩证地看待歧义现象。歧义确实能造成误解。我们要力求精确，避免模糊。但是，歧义有时在一定语境里也会造成幽默的效果。妙用歧义会起到积极的修辞作用。郎天万在《语境分析是辨识歧义的重要工具》中，对 Lyons 否定语境分析是辨识歧义的重要工具的观点提出异议。他认为言语交际是在特定语境中展开的。而特定语境常常提供许多附加的信息和修正的信息。即语境对词项和语法的语义选择范围具有缩小限定的作用。这样会帮助排除干扰解，避免歧义。

西方语文学家曾研究归纳了词义研究的几种类型，指出词义扩大、缩小和转移等规律。这种研究构成了词汇学(lexicology)。词汇学研究涉及三个方面：第一，词的性质与自然规律(包括词的形式、意义、发展变化和应用)；第二，词与词之间的关系(即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系)；第三，各种语言词汇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80年代，我国外语界对英语词汇学进行了系统的介绍与研究，出现了汪榕培、李冬的《实用英语词汇学》、陆国强的《现代英语词汇学》等

专著。但是,词汇学所涉及的范围是对个别语义现象的观察和分类,不是系统的语义研究。徐烈炯指出:“在语言演变过程中,有些词的涵义扩大了,有些词的涵义缩小了。这些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规律,不能用来说明过去词义为什么演变,也不能预测未来词义怎样演变。”廖秋忠在《[词义学]简介》中,将 lexical semantics(词汇语义学)缩略为“词义学”。词义学不同于词汇学,顾名思义是研究词汇语义的学问。

结构主义曾给语义学研究以巨大影响,使其由历时性研究转向共时性研究,由一个词的语义变化研究转向词与词的语义关系研究。但是结构语义学仅以词和词以下的词素和语素为研究单位,而忽视词以上的词组和句子意义的研究。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把语义、句法和音系并列为语言的三大系统。词义学成为语义学的一个分支,即所谓的词汇语义学。此后,语言学家对语义结构和句法结构的关系展开了激烈争论。有的主张语义结构应以句法结构为基础,有的则主张句法结构应以语义结构为基础,还有的认为语义结构和句法结构为界限难以划清。我国学者也对语义和句法的关系进行了一些探讨。王逢鑫的《英语意念语法》从语义学角度出发,结合句法学,对英语语法进行了更为概括的阐述和解释。钱军系统地阅读了布拉格学派的著述,对语义和句法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在《布拉格学派的句法语义学》中,讨论了 Danes 的两篇代表作,试图说明布拉格学派句法语义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研究内容,展示布拉格学派句法语义学的应用价值。

语义与认知密切相关。借助认知心理学的基本理论,林纪诚在《论能动认知语义》中阐述了能动认知语义的含义,即受认知者主观能动性制约的意义。他提出语法手段、主题变换、词汇选择和修辞手段等四种体现能动认知意义的方法。他还指出过去的语义学及外语教学对同义现象的研究,往往偏重于社会意义和情感意义方面的差异,而忽视了能动认知意义这一特殊语义范畴。

邱述德在《语义范畴的转化》中,认为“典型范畴理论指出了语

义成分分析模式忽视词义的经验基础、将语义结构极端理想化等弱点，揭示了与语言符号有关的认知心理过程。但是，这一理论实际上将语义结构与概念结构完全等同，又从另一个极端否定了语言范畴的理性方面。"语义结构分析理论与典型范畴模式在理性抽象与感性知识、词与概念、静态描写与动态描写三个方面存在对立和分歧。语义范畴是对众多差别各异的典型的概括和界定。当典型属性的量变达到一定程度而促成语义范畴转化时，词义便产生质的变化，形成多义现象。当词义或结构形式兼跨两个或两个以上语义范畴时，属性和范畴都处于从量变到质变的进行过程，从而会产生歧义。语义范畴转化有下列 10 种类型：一般—特殊、具体—抽象、动态—静态、生命—无生命、时间—空间、原因—结果、直接表达—间接表达、主观—客观、褒义—贬义、及互补—相对等。

梁锦祥在《论模式意义》中，指出主张语义成分分析说的一些人采用两项对立的二分法来寻找语义成分，企图以这种机械的方式来确定包含在词义中的各种成分，其结果并不理想。但是对模式意义如何确定的问题也未能找到明确的答案。他提出要在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运用比较与分析、综合与概括、类比与想象、抽象与理想化等基本方法，进行观察、归纳、形成关于某个词语的模式意义的假设、在实践中予以修改和确证，并进而确定该词语的模式意义。他以英语介词 at 为例，提出了确定模式意义的两个参数：固定性和显著性。

三、模糊语言学与语义研究

伍铁平教授在我国开创了模糊语言学研究。对我国语义学研究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65 年，美国的 Zadeh 发表《模糊集》的论文，接着又发表了数十篇关于模糊理论的文章。从此模糊理论得到发展与推广。模糊理论是从数学、哲学、逻辑学和语言学中产生的一门边缘学科。Zadeh 说模糊类是"其界限不是泾渭分明地

确定好了的类别”,“模糊类是指该类中的成员向非成员的过渡,是逐渐的,而非一刀切的”。伍铁平在1979年第4期《外国语》发表《模糊语言初探》,又在1980年第5期发表《模糊语言再探》,以后又发表数十篇关于模糊语言学研究的论文,并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模糊语言学》专著。这是《现代语言学丛书》中的一本。他将模糊语言理论引进我国语言学界,把它运用到汉语、外语和普通语言学理论研究中去。自此,我国语言学界对模糊语言学的研究迅速展开,取得一些成绩,也引起不少辩论。陈新仁在《模糊语义研究的现状与未来》中论述了石安石与符达维关于模糊语义的辩论,认为他们二人都没有从语义本身——模糊语义研究的前提——来讨论模糊问题。关于模糊语义的产生与实质,他认为边界不明是语义模糊的实质;模糊语义是客体经过语言符号化的产物;语义模糊寓含于语言的概括性之中;语义的描写性是造成语义模糊的重要原因。关于模糊语义研究的未来,已有的著述大都局限于概念意义模糊性的研究,他探讨了伴随意义、文体意义、感情意义、搭配意义和联想意义的模糊性的研究。

俞如珍在《简论词的模糊性、概括性和特指性》中,对英国Kempson的词的四种类型模糊性提出异议。Kempson认为词的模糊性表现为指称模糊(referential vagueness),词义不确定(indeterminacy of meaning),词项意义缺乏确指(lack of specification),和词项确指意义的析取(disjunction)。俞如珍认为指称模糊指实词界限模糊,词项确指意义的析取指虚词界限模糊,都属于模糊语言学研究范围。而词义不确定涉及词的语法意义的概括性问题;词项意义缺乏特指涉及词的词汇意义的概括性和特指性问题。模糊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词的模糊性,即词所表达的概念的外延没有明确的界限,不能一刀切。而词的概括性和特指性不属于模糊语言学研究的范围。

李维光在《论英语语言矛盾》中,揭示了英语这个自然语言中主谓相悖、相生相克和语义对立等矛盾现象。这主要是由于语言

的模糊性所致。

文旭在《从语义场理论看语言的模糊性》中，通过语义场的分类及不同语言之间语义场的对比，探讨了语言的模糊性。他分析了六种主要的语义场，包括分类义场、顺序义场、换位义场、互补义场、两极义场和语义同义场。而语义同义场又可细分为文体不同、感情意义不同和搭配意义不同的语义场。他还指出通过对比不同语言中相应的语义场，揭示它们的异同，可以进一步了解语言的模糊性。

贺善镛在《试论模糊理论和外语教学》中，尝试将模糊理论运用于外语教学。文章简要分析了语言三大要素（词汇、语法和语音）的模糊性，及语言模糊性的作用。在外语教学中运用模糊理论很有必要。作者认为，事实上外国教学法里存在大量的模糊现象。名目繁多的外语教学法和会使用一种语言的能力都是模糊现象。

四、语义学的应用与未来

目前，我国语义学主要应用于外语教学、词典编纂和机器翻译等方面。

外语学界利用了同义、反义和歧义等意义关系的理论指导外语教学，特别是词汇教学，取得了一些成绩。又利用了语义学理论指导通用词典、同义词词典和反义词词典的编纂，也取得了不少进展。

语义学对机器翻译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俞士汶指出用计算机处理自然语言是非常困难的。困难的根源在于自然语言本身的特性，其中歧义性是它最显著的特点之一。而开发机器翻译系统，不仅要研究一种语言内部的歧义，并且要研究两种语言之间的歧义。当前大多数的机器翻译是立足于语法，向语义的层次发展。

语义学理论的研究在我国方兴未艾，除了对模糊语义研究比较深入以外，整体来说还比较落后。需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能得

到进一步的发展。语义学的应用研究更需加强，特别是在指导机器翻译方面，具有广阔的前景。

主要参考文献：

陈新仁，模糊语义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外语学刊》第1期，1993。
贺善镛，试论模糊理论和外语教学，《外语学刊》第1期，1993。
胡壮麟、刘润清、李延福，《语言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姬少军，谈谈对上下义关系的理解，《现代外语》第1期，1992。
郎天万，语境分析是辨识歧义的重要工具，《外国语》第1期，1995。
李维光，论英语语言矛盾，《现代外语》第4期，1992。
（英）利齐著，李瑞华等译，《语义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
梁锦祥，论模式意义，《外国语》第5期，1994。
廖绿胜、黄远振，论反义关系在英语中的地位，《外语学刊》第4期，1992。
廖秋忠，《词义学》简介，《国外语言学》第2期，1988。
林纪诚，论能动认知语义，《外国语》第1期，1989。
陆国强，《现代英语词汇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3。
毛茂臣，《语义学：跨学科的学问》，学林出版社，1988。
沐莘，试谈英汉同义词比较，《外国语》第2期，1989。
钱军，布拉格学派的句法语义学，《外语学刊》第2期，1994。
秦洪林、贾德霖，《英语歧义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
邱述德，语义范畴的转化，《外国语》第5期，1993。
苏新春，《汉语词义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2。
汪榕培、李冬，《实用英语词汇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
王逢鑫，《英语意念语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论语义的分级性，《北京大学学报，英语语言文学专刊》，1993。
文旭，从语义场理论看语言的模糊性，《外语学刊》第1期，1995。

伍谦光,《语义学导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1991。
伍铁平,模糊语言初谈,《外国语》第4期,1979;
模糊语言再谈,《外国语》第5期,1980;
《模糊语言学》,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1990;
论反义词同源和一词兼有相反二义,《外语教学与研究》第2期,1986;
再论词义向其反面转化和一个词兼有相反的两个意义,《外国语》第3-4期,1991。
徐烈炯,《语义学》,语文出版社,1990。
俞如珍,简论词的模糊性、概括性和特指性,《外国语》第2期,1993。
俞士汶、朱学锋,《计算语言学》,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系、北京大学计算语言学研究所教学参考资料,1993。
王寅,《简明语义学词典》,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

我国语用学研究

沈家煊

语用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得到国际学界的承认可以说有三个标志。一是 1977 年《语用学杂志》(*Journal of Pragmatics*)创刊,二是 1983 年第一本语用学教科书(S.C. Levinson: *Pragmatics*)问世,三是 1986 年"国际语用学会"正式成立。可见世界语用学的兴起和发展也是不太久的事。《剑桥语言学综览》第一卷有 Horn (1988)的《语用学理论》一文,对世界(主要是西方)语用学研究的历史、现状和展望作了一个综述,这个综述远不是全面的,但确实涉及了语用学家最感兴趣或语用学中最基本的一些问题。国内的语用学发展情况已有钱冠连(1990)和何自然(1994)两篇综述可以参考。

一、语用学在我国的引进

跟形式主义语法理论(以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为代表)相比,语用学在我国的引进是较快的,前者的引进由于十年动乱的阻隔而迟缓了多年。从 1980 年起《国外语言学》杂志就开始介绍国外的语用学,如胡壮麟(1980)的《语用学》,程雨民(1983)的《格赖斯的"会话含义"与有关的讨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现代外语》等外语院校的学报也相继刊登了一系列翻译、综述、评介语用学的文章,数量很大,无法一一列举。这类文章中最集中的是格赖斯的"合作原则"和会话含义,奥斯汀和舍尔的"言语行为"理论(许国璋先生(1979)生前亲自摘译了奥斯汀的《论言有所

为》),另对指示(deixis)、预设和会话结构等问题也都有涉及。随着国外语用学研究的进展,新的理论和新的观点也都能及时在国内得到介绍,例如把会话含义的推导跟认知结合起来的"相关论"(沈家煊,1988)、把说话过程看作选择顺应语言的"语言顺应论"(钱冠连,1991)、以及最近新出现的"新格斯会话含义理论"(徐盛桓,1993—1995)以及以"语义元素"为依据的"跨文化语用学"(范文芳,1995)。

何自然编写的《语用学概论》作为国内语言学系列教材之一,1987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内容几乎囊括了Levinson《语用学》一书的各个部分,也增加了一些其他内容和汉语例子。1989年由广州外国语学院发起召开全国第一届语用学研讨会,现已召开四届。该学院还与国际语用学会建立联系,在国内设立了语用学研究资料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也组织召开过两次语用学专题研讨会,最近又由华南师范大学发起在广州召开了一次"新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研讨会",这些活动都对推进我国的语用学研究和国内外学术交流起到积极的作用。

从事语用学引进工作的几乎都是外语系特别是英语系学人,他们对国外语言学的动态最为敏感。语用学又跟外语教学有比较直接的关系,因此引进工作无论在速度和数量上都要优于西方其他语言理论的引进。

二、我国的语用学研究

在引进国外语用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国开展的语用学研究大致可分三个方面:(1) 面向外语教学的语用学研究,(2) 面向汉语语法和语用法开展的研究,(3) 语用学理论的研究。这样的划分是权宜的,前两方面的研究有一些也带有理论探讨的性质,而理论研究往往也离不开前两方面的研究。

1. 面向外语教学的语用学研究

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最多，发表的论文也最多。首先引起研究者兴趣的是用外语交际过程中出现的语用失误，例如何自然(1984)、何自然与阎庄(1986)、黄次栋(1984)的文章都注重外语语用法的特点，指出汉外语用法的差异，对提高学生外语的语用能力有很实在的价值。与外语教学相关的是翻译的语用对比研究，许多文章探讨翻译中的"语用等值"问题(如何自然[1988]、张亚非[1987])，在译文中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引进外语语用成分的问题(如黄家修、谢宝瑜[1990]、黄金棋[1988])。

无论是外语教学还是翻译，语用方面的研究都跟中外文化差异的研究密切相关，两者往往很难分清。例如邓炎昌、刘润清(1991)谈的是英汉语言文化对比，其中有许多涉及英汉语用特点的对比。高一虹(1991)、何自然(1993)、王得杏(1990)也都把语用研究置于文化差异研究的大背景之下。

这一类研究的特点是注重中外不同文化和语言之间的差异，对人类语言在语用上的一些共同规律不太注意，当然也有例外，如何自然(1991)谈的"移情"问题就是语用中的普遍现象。

这里要顺便提及的是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中也开始注意语用研究，在《语言教学与研究》等杂志中出现一些讨论语用学和汉语教学的文章，如常敬宇(1986)、鲁健骥(1992)等，另外西槙光正(1992)编的文集也有不少是结合汉语教学对"语境"进行研究的成果。

2. 面向汉语语法的语用法的研究。

从《马氏文通》开始，近几百年来我国的汉语学界就不断借鉴和运用西方语法理论中的某些成分来研究汉语语法，如叶斯帕森的"三品说"、结构主义语法的"分布论"都曾被系统地用于汉语语法的描写。国外语用学的兴起和发展也影响到我国对汉语的研

究，特别是汉语语法的研究。范开泰1985年在《中国语文》首先发表《语用分析说略》一文，举例说明了语用分析对汉语语法研究的意义，“语用”作为跟句法和语义相关联的一部分开始纳入汉语语法的研究范围。关于语法三个组成部分（语用、句法、语义）相互关系的讨论在汉语界开展得很热烈，参看施关淦（1991）和范晓、胡裕树（1992）。社科院语言所从1989年起设立“汉语运用的语用原则”课题组，运用国外语用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汉语语法和语用法，部分成果见《语用研究论集》（1994，北京语言学出版社）。一个主要的研究方向是用语用原则来解释汉语语法中过去难以解释的现象，如沈家煊（1987，1989，1992）。有一个观点就是语法（句法）是语用法约定俗成或“凝固化”的结果，因此对语用法如何“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的过程也开始有所研究（如沈家煊，1993）。对汉语语法中常见的省略和隐含现象也有人从语用的新角度加以考察（见程雨民，1989，范开泰，1990，施关淦，1994，徐赳赳，1993），对汉语歧义句的研究也开始把语用因素造成的歧义跟句法、语义层面上的歧义区分开来（王建华，1987），对句子“话题”（topic）和“评述”（comment）的划分也有人通过汉语会话结构中“邻接对”（adjacency pair）和语气词的分析提出新的看法（沈家煊，1989），对汉语中的“语用否定”也有较全面的描写和讨论（沈家煊，1993，徐盛桓，1994）。

这方面的研究特点除了以汉语为主要研究对象外就是把语用学限制在一个规定的范围内，即研究语用法和语法（句法）的关系。在Levinson的*Pragmatics*一书（1983）讨论的语用学诸多定义中，这是最狭窄的定义（第9页）。这样严格地限制语用学的研究范围可以把语用学跟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和一般的功能主义语言学区分开来，从而保持住（按另一种观点也许是不利于）语用学作为语言学一个独立分支的地位。结合汉语语法开展的语用研究一方面拓宽了汉语语法研究的范围，从对汉语语法事实的描写提高到对语法事实的解释，“语法化”的研究又把语法的共时研究和历

时研究结合起来，对汉语语法研究的深入有很积极的意义；另一方面又可以从汉语的角度对主要建立在西方语言基础上的语用学理论加以验证、修正和补充。总的来说，这方面的研究开展得还很不够，亟需加强。

3．语用学理论的研究。

把这一类单独列出来并不是说前两类研究没有理论性或没有理论价值，只是这一类研究更加注重一般语用规律的探讨。这一类研究在国内也比较薄弱，基本上是对西方现有的语用学理论加以评论、修正和补充，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格赖斯的合作原则和下属的各条会话准则提出不同的看法（如钱冠连，1986，1989），“新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出现后也有人（徐盛桓，1993，1994 等）对这种语用推导机制加以修正和补充，进而提出自己的会话含义理论框架。二是对“礼貌原则”的探讨，顾曰国（1990）结合汉语对 Brown & Levinson（1987）提出的礼貌原则和“面子”概念作出重要修正，很有影响。三是有关“言语行为”理论的讨论，顾曰国（1993，1994）二文提出言语行为不是说话人单方面的行为而是与听话人有关的双方共同的行为，把言语作为置于社会活动的大范围里加以考察，很有新意。另外，对国外讨论颇多的语用学与语义学、句法学的分界问题也有人作过评述（沈家煊 1990）。对这个涉及语用学独立地位的重要问题外语界似乎不感兴趣，倒是汉语界有很热烈的讨论。（见施关淦，1991，范晓、胡裕树，1992，廖秋忠，1994，杨成凯，1994）。关于“预设义”（presupposition）的性质问题国外有大量的论争文章，牵涉到重要的理论问题，国内几乎没有什么深入的讨论。

三、今后的语用学研究

语用学的兴起和发展得益于哲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文化人类学以及人工智能学的发展，同时又反过来对这些相关学科的发展有重要意义。语用学大大加深了我们对语言本质、语言结构和语言运用的了解。今后的语用学将在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方面更加深入。宏观方面，总的趋向是把言语活动放在人类文化、社会活动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不同文化的语用对比研究仍将是一个热点。从 Sperber & Wilson 的"相关论"(1986)开始，语用学家开始从认知心理的角度来考察语用推理过程，从这一角度来建立各种推理机制的模式也是一个发展趋势。当然推理过程不仅涉及认知心理，也跟社会因素有关，"新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讨论的"常规关系"就包括由社会约定俗成的常规关系。研究人的推理能力和推理过程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因为涉及到各种各样的知识和心态，如果不分阶段进行，就很难有所进展。先走第一步，把按"常规关系"进行的推理过程搞清楚，确是明智之举。微观方面，将继续探讨语用法跟句法的关系，特点是探讨"语法化"的规律，在这种探讨中，语言的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会进一步结合起来。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两方面都很重要，不可偏废，应该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发展我国的语用学包括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继续引进国外的理论和方法。这项工作主要要加强系统性，避免片面性和零敲碎打。有一些介绍国外语用学的文章对理论产生的背景、发展的脉胳交待不清，也有的没有吃透人家的理论，想当然把自己的意思加进去，就更应该避免。另一方面更为重要，就是要开展脚踏实地的研究，要避免空论和泛论。要真正使我国的语用研究深入下去，除了上面提到的要把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结合起来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要把外语研究和汉语研究结合起来，外语

界和汉语界要携起手来。吕叔湘先生一直为我国外语界和汉语界不相往来,"两张皮"的现象深为忧虑,许国璋先生生前也指出:"语言学界的学术活动,大体分两类:中文系学人以音韵、训诂、方言、汉语语法的研究为主;外文系学人以介绍、解释国外诸语言学派的论点为主。两者未见汇合。"(《许国璋论语言》自序)从我国近代语言学的发展来看,有成就的老一辈语言学家,如赵元任先生、王力先生、吕叔湘先生等无一不是自觉地借鉴和运用国外先进的理论和方法来对自己的母语汉语作踏踏实实的深入研究,从而也从汉语的角度对一般语言理论作出了贡献。国外有影响的语言理论也大多是提出者在研究自己有切身感受的母语的基础上形成的。我国的语用学研究也只有使外语界和汉语界的研究"汇合"起来才能有所进步,外文系学人才会超越以介绍和解释为主的阶段。近年来已有不少外语界学人认识到研究汉语的重要性,有的干脆把研究对象从以外语为主转向以汉语为主,这是很可喜的。在国家的科研对策上,应该鼓励外文系从事语言学专业的人(包括研究生)在研究一般语言理论时以汉语为研究对象。目前有些外语院校的研究生论文只能以外语为主不能以汉语为主,这是一种很失策的做法。当然,中文系从事语用学研究的人应该学好外语,更多地了解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不要关起门来自己搞一套,造成重复低效劳动。

最后,语用学的应用不应局限于语言教学和翻译,在人工智能、计算机语言处理方面语用学也可大有作为,这就需要在语用学的形式化手段上加强研究,这也是发展形式语用学的必要条件。目前国内从事语用研究的人大多缺乏数理逻辑、计算机语言等方面的训练,要弥补这一不足,除了鼓励理工科的学生转向语用学和语言学的研究外,外文系和中文系毕业的研究人员也应加强数学、逻辑、计算机等方面的学识和修养。

主要参考文献:

程雨民,格赖斯的"会话含义"与有关的讨论,《国外语言学》第1期,1983;
词汇意义、逻辑推理和语用学,《现代外语》第2期,1990。
常敬宇,语境和对外汉语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1986。
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
范开泰,语用分析说略,《中国语文》第6期,1985;
省略、隐含、暗示,《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1990。
范晓、胡裕树,有关语法研究三个平面的几个问题,《中国语文》第4期,1992。
高一虹,我国英语教师的文化依附矛盾,《北京大学学报》(英语语文学专刊)第1期,1991。
何自然,语用学的研究及其在外语教学上的意义,《现代外语》第1-4期,1984;
汉英翻译中语用对比研究,《现代外语》第3期,1988;
《语用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
言语交际中的语用移情,《外语教学与研究》第4期,1991;
跨文化交际中的语言离格现象刍议,《外语教学与研究》第2期,1993;
我国近年来的语用学研究,《现代外语》第4期,1994。
何自然、阎庄,中国学生在英语交际中的语用失误,《外语教学与研究》第3期,1986。
胡壮麟,语用学,《国外语言学》第3期,1980。
黄次栋,语用学和语用错误,《外国语》第1期,1984。
黄家修、谢宝瑜,翻译的原则与词语的引进——从语言学的角度谈翻译中的表现法选择,《现代外语》,第2期,1990。
黄金棋,应该肯定"西译汉化"现象的积极面,《中国翻译》第1期,

1988。
廖秋忠，篇章与语用和句法研究，《语用研究论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
刘润清，关于 Leech 的礼貌原则，《外语教学与研究》第 2 期，1987。
鲁健骥，状态补语的语境背景及其他，《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1 期，1992。
钱冠连，语言冗余信息的容忍度，《现代外语》第 3 期，1986；
不合作现象，《现代外语》第 1 期，1989；
语用学在中国：起步与展望，《现代外语》第 2 期，1990；
语用学：语言适应理论——Verschueren 语用学新论述评，《外语教学与研究》第 1 期，1991。
沈家煊，"差不多"和"差点儿"，《中国语文》第 6 期，1987；
讯递和认知的相关性，《外语教学与研究》第 3 期，1988；
"判断语词"的语义强度，《中国语文》第 1 期，1989；
语用学和语义学的分界，《外语教学与研究》第 2 期，1990；
不加说明的话题——从"对答"看"话题——说明"，《中国语文》第 5 期，1989；
正负颠倒和语用等级，第七届现代汉语语法讨论会论文，载《语法研究与探索》七，商务印书馆，1992；
"语用否定"考察，《中国语文》第 5 期，1993。
施关淦，关于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中国语文》第 6 期，1991；
关于"省略"和"隐含"，《中国语文》第 2 期，1994。
王得杏，跨文化交际的语用问题，《外语教学与研究》第 4 期，1990。
王建华，语境歧义分析，《中国语文》第 1 期，1987。
西槙光正编，《语境研究论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
许国璋译，论言有所为，《语言学译丛》第 1 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许国璋，《许国璋论语言》（自序），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
徐赳赳，多动词小句中的零形式，《中国语文》第 5 期，1993。

徐盛桓，会话含义理论的新发展，《现代外语》第 2 期，1993；
论常规关系，《外国语》第 6 期，1993。
新 Grice 会话含义理论和含义否定，《外语教学与研究》第 4 期，1994。
论荷恩的等级关系，《外国语》第 1 期，1995。
杨成凯，语用学理论基础研究，《语用研究论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
张亚非，试论双语翻译的语用等值，《现代外语》，1987。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汉语运用的语用原则"课题组，《语用研究论集》，北京语学院出版社，1994。
顾曰国，1990，Politeness phenomena in modern Chinese, *Journal of Pragmatics* 14, 237-257.
顾曰国，1993，The impasse of perlocution,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 405-432.
顾曰国，1994，Pragmatics and rhetoric: A collaborative approach to conversation, In H. Parret ed. *Pretending to Communicate*,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94, 173-195.
沈家煊，1993，A metalinguistic adverb *hao*（好）in Mandarin Chinese, In J. C. P. Liang & R. P. E. Sybesma eds. *From Classical Fú to "Three inches high"*, Studies on Chinese in honor of Erik Zürcher, Leuven: Garant, 141-152.
Horn, 1988, L. R., Pragmatic theory. In F. J. Newmeyer ed. *Linguistics: The Cambridge Survey*, Vol.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13-145, .

我国文体学研究现状

胡壮麟

文体学在国内外早先是从修辞学衍生的一个分支。我国汉语界至今仍保持这一传统,成立中国修辞学会,但无文体学会。较长时间内又被认为是文学批评的领域。随着现代语言理论的发展,人们加深了对文体实质的认识,并试图将有关理论应用于文体分析,从而使这门学科相应地获得飞速的发展,获得了"新文体学"、"科学文体学"和"语言文体学"等名称。这一情况在我国外语界也是如此,只是在时间上比国外差一拍而已。自解放后至文革结束的28年间,在《西方语文》、《外语教学与翻译》和《外语教学与研究》三种杂志上总共发表了14篇有关文体学的论文,也就是说,每两年才摊上1篇,主要撰稿者为王佐良(4篇)、许国璋、徐燕谋、杨仁敬等。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整个80年代,情况大为改观,如改革开放后至1988年的12年中,有《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教学研究》、《现代外语》、《山东外语教学》、《外语教学》、《外语学刊》等56种杂志和学报发表了文体学研究文章近300篇(高等学校外语学刊研究会1992),平均每年24篇。同一时期出版的供英语专业使用的教材和专著有:

王佐良	1980	《英语文体学论文集》
秦秀白	1986	《英语文体学入门》
王佐良、丁往道主编	1987	《英语文体学引论》
程雨民等主编	1988	《英语语体学和文体学论文选》

侯维瑞	1988	《英语语体》
程雨民	1989	《英语语体学》
钱　瑗	1991	《实用文体学教程》
王守元	1990	《英语文体学教程》
徐有志	1992	《现代英语文体学》

从上列著作不难看出，领导这支文体学研究大军的仍然是不久前不幸病故的王佐良先生，他在 1980 年首先奉献了《英语文体学论文集》一书，正如他在自序中写道："文体学方兴未艾，我愿在这个领域继续研究下去。"在王公的倡导下，原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一批资深教授如丁往道、胡文仲等编写了《英语文体学引论》，并经国家教委外语教材编审委员会批准邀请李赋宁等教授于 1984 年在北京外语学院召开了该书的审稿会。与会专家在会上还建议了两件大事，一是决定于 1985 年在武汉华中师范学院召开"高等院校英语专业'英语文体学'教学大纲"会议并进行学术讨论，一是授权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英语专业的教授程雨民、钱佼汝、虞苏美等负责编撰国外论文汇编。前者的会议论文已分两批发表于《外语教学与研究》1985 年第 2 期、第 3 期上，后者由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出版。从此以后，国内一些学校，纷纷开设了文体学课程，如北京大学设置了为本科生讲授"英语语体学"和"文学文体学"、为研究生讲授"理论文体学"的系列课程，至今已有十年的历史。

下面谈谈在 80 年代中至 90 年代初的十年间，人们在文体学这门学科所关心的问题和所从事的活动，其中也反映了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在今后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1. 什么是文体学?

从文体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人们常认为文体学和修辞学、诗学难以分辨，其原因前者在于当代文体学代表了从亚里士多德修辞

学衍生的一个分支，即文体风格传统(顾曰国，1990)，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后者则由于迄今为止对文体学的研究相对集中于对诗歌的研究，因而成为诗学的一部分。事实上，在语言中反映出来的文体风格特征的范围远远超过传统的修辞格，与其说两者相等，不如采用 Leech 的说法，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Leech, 1969)。这同样适用于文体学和诗学的关系，从研究对象着眼于文体风格来说，(文学)文体学应当包括诗歌，这不同于诗学只研究有关诗歌创作的一切内容。

当代文体学的发展得益于现代语言学，但接着又出现新文体学如何与话语分析和语篇语言学的区别问题。从《语言学与语言行为摘要》在目录中把三者并列来看，编者一方面认为这三者有其共性，一方面多少有些区别，虽然这三者都要采用语言学的方法。文体学似强调探索一个语篇的文体风格特征及其效果，话语分析偏重于研究在一个语篇中信息的表达和理解，特别是隐含的信息，而语篇语言学则着眼于有关信息如何通过语言得到体现。

2. 什么是文体?

秦秀白(1988)、顾曰国(1991)、刘世生(1992)、顾玉兰(1993)都认为要弄清文体学的确切含义，归根结蒂是弄清 style 这个词的意义。恰恰就是这 style 有多种意义，像条活泥鳅，一手休想抓住。秦秀白曾归纳了多种定义，如“表达方式说”、“外衣说”、“行为方式说”、“选择说”、“社会情景制约说”等。刘世生则罗列了 20 个定义，并一一注明出处，这里举一些秦文中未谈到的，如 Gorgias 的“风格即修辞”说、Aristotle 的“风格即形式”说、Cicero 的“风格即雄辩术”说、Swift 关于“在恰当的地方使用恰当的词”的论述、Buffon 的“文如其人”、Murry 的“个人表达上的特点”、Stendhal 的“赋予既定思想并适合产生出它应有效果的全部形式”的观点、Enkvist 的“以最有效的方式讲恰当的事情”的观点、Jakobson 和 Levi-Strauss 的“结构对等”说、布拉格学派的“风格即功能”说、

Mukarovsky 的“风格即突出”说、Spitzer 的“常规变异”说、Ohmann 的“语言结构转换”说、Halliday 的“风格即意义潜势”说，等等。针对上述情况，刘指出两个原因，一是界定者所依据的语言学理论不同，一是界定者本人认识上的不同。

尽管像瞎子摸象一样，每个人从自己的经验感受来谈论 style，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力求在认识上更前进一步，至少有些持理较勉强的观点应当首先排除。如对“风格即雄辩术”这一观点，我们不妨发问“不会雄辩者讲话是否就没有风格呢?”有些人讲话罗嗦，事倍功半，是否就不算他的风格呢?

3．文体学的任务

刘世生(1994)曾谈到 Lang(1987)和 Toolan(1990)对文体学的研究提出三个任务，即 1)为外语教学服务；2)为语言学理论提供一个应用的基地；3)为文学研究提供一种方法。

第一条就内容说不会有多少异义，但对其服务内容似可更具体化。首先，早在 1984 年《英语文体学引论》审稿会上，王佐良先生就指出英语专业学生对四年一贯制的精读课不感兴趣，文体学有可能替代高年级的精读课。其次，当代文体学的对象既包括传统的文学作品，也包括体现为各种语体的非文学作品，文体学有助于通过对有关课程的阅读材料的语言特征分析，帮助学生提高语言消化能力和鉴赏能力。第三，文体学的知识能激发学生写作能力，考虑如何用语言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第二条的提法有些被动，给人的印象似乎文体学只是语言学理论的实验基地。的确，语言学家都力图将自己的语言学理论用来解决文体学的各种问题，但文体学家不太会同意把自己的领域降为语言学的一个“实验基地”。

第三条回到文体学传统的活动范围，即把“文体”理解为“文学体裁”。要说明的是，搞文学研究的人一般不反对文体学，他们反对的是“提供一种方法”这样的提法。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他

们反对的这"一种方法"实际上是指"语言学的方法"。这样就出现了强调主体认识的传统的文体学家和强调客观分析的新文体学家的争论。在英语界相应地表现为60年代Vendler与Fowler的争论(Fowler 1966),前者不欢迎语言学插足于文体学。争论双方唇枪舌战,以致有些感情用事。Vendler的观点最后由Fish在1973年集大成。这场争论直到1980年代中后期才在我国一些文章中反映出来。所不同者,倾向于Vendler和Fish的是钱佼如的两篇文章(1985,1992),持反对意见者为郭鸿的文章(1988);另一方面申丹与Fish的辩论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Shen, 1988)。不同意见的争论可以活跃学术气氛,但也说明这些问题尚未取得共识,应进一步研究。有一点无用置疑,那就是语言学方法的的确确被广泛应用于文体分析,尽管它还不完善,尽管它不能全部回答Vendler和Fish提出的许多问题,它的价值、它对文体学发展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何况科学的历史本来就是从不完善走向完善,从无数次失败走向成功的探索过程。

但我认为所有这三条都不是文体学的主要任务。文体学根本的任务应当是揭示文体的实质(也就是第二节中所讨论的"什么是文体")、寻找进行文体分析的有效方法、各种文体特征(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科技文章、新闻报道等)的表现形式和交际效果、对具体语篇的分析,等等。我们在这方面的了解还很不够。其次,有人比较客观地把文体学看作是联结文学批评和语言的桥梁(Widdowson 1975)。根据这些情况,我比较赞同顾曰国(1990)的界定:Stylistics是语言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分析文体、风格的产物。这里的Stylistics具体地指明为New Stylistics似乎更妥当些,因为在两者未结合前,文体学已经存在。

4. 体裁的研究

谈到体裁,一般人都会很快联想到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文学体裁。这是文体学研究的一项内容。在我国,侯维瑞(1988)曾

区分三种类型，即 1)科技文体，最能代表语言的表事功能；2)中间性文体，是人际功能的代表，如新闻体与广告文体；3)文学性文体，是寄情功能的代表。在我国被专门研究过的体裁有戏剧(杨雪燕，1991)和外交语言(郭鸿，1992)，。杨介绍了在戏剧文体分析中可借用四种话语分析理论作为文体分析的基础，如奥斯丁和舍尔的言语行为理论；里奇的会话目标和修辞原则理论；萨克斯等人的会话结构理论；辛克莱等人的级阶体系理论。郭鸿对外交语言作全面分析，指出外交语言一般是事先有准备的口语或事先写好临时宣读的口语。如何对小说作文体分析是个难题，慈继伟(1985)试图从区分现代派小说和现实主义小说着手以找到突破口，他认为对现代派小说作文体分析难度要小一些。

自 80 年代以来我国文体学工作者所研究的语体已向多样化发展，如文革前仅限于散文、新闻和口语少数几种，从 80 年代至今已扩展至外贸、科技、学术、广播、公文、方言、法律、医学、广告、军事等体裁。但与国外同行相比，许多体裁如学生作文、航海、旅游、女性语言、桥牌等尚未涉及。最大的差距则表现在我国发表的文章引用的语料以第二手为多，缺少在语言实际使用过程中的第一手语料，特别缺少对口语体的分析。最后，语料的量不够大，常以少量材料定性。

5. 研究分析的不同方法

就文体分析方法而言，传统方法是对语言的词汇句法和修辞手段的某一方面作深入地全面地介绍，如孙生茂(1994)认为圆周句的文体效果是 1)可变化结构，以帮助表情寄意；2)可制造悬念，以加强戏剧性；3)可诉诸情理，以增强说服力；4)可添加细节，以扩大信息量。我在分析狄伦·托玛斯的一首诗中虽采用了头韵、正韵、辅韵、行中停顿、跨行等常规方法，但提出了全应效果的概念，说明诗人的意图有时反映于语言的语义、词汇、句法、音系各个层次，互相呼应(胡壮麟，1985)。

国外文体学研究并未放弃传统方法，如至今仍有人把句子长度作为文体研究的一个参数(LLBA:9401112;9405636)。有的从理论上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以常见的词语句法的重复为例，Schnebly(1993)认为重复这个手段在微观(角色之间)层次可产生意义和促进交往，但也可表示角色之间的失谐；在宏观(语篇和读者/听众之间)层次由于将读者/听众卷入由模式产生的音乐般的节奏中去，产生了和谐，但重复过多，成了噪声，也会失谐。Law(1989)指出重复不仅是词语和短语的重复，它反映了主题，动作和感情状态的重复。Hoffman(1992)把希腊语，拉丁语，莎士比亚，艾略特等人作品作为语料，研究了韵文中的行中停顿(caesura)，认为这是一种保持平衡的沉默。

一些新的文体分析方法在国内已被介绍或应用。如申丹对间接引语的历史发展作了论述后，讨论了如何正确理解自由间接引语可使作者保持缄默，使空间时间和心理时间交叉和表现意识流(申丹 1991a, b；王黎云、张文浩 1989)，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由间接引语可有效地表达和加强讥讽的效果；增强同情感；增强语义密度。美国功能主义对语言可证性的研究已引入国内，并用于对辩论文体的分析(胡壮麟，1994)。

自韩礼德(1985)提出“语法隐喻”(grammatical metaphor)的概念后，国内已开始介绍(朱永生，1994)，但尚未在文体学中广泛运用。国外已用“句法隐喻”(syntactic metaphor)、“意译”(paraphrase)等术语来研究分析 Joseph Conrad, James Joyce 等作家的小说(Ostrowski 1993;9303919)。Montz (1988)对话语中的某些定冠词的现象使用了“框架回指”(frame anaphora)的概念，即这些定冠词的所指语义是受共知的语义框架制约的。

6. 对个人风格的研究

对具体作家的文体风格的研究，以国外居多，且多半是博士论文选题的主要内容，如 Wildermuth (1991)认为 Samuel Johnson 的

散文体既有抽象的哲学词语，又有意象和话语中常见的表达形式。Fatany (1991)探讨浪漫主义时期探索诗体与 Yeats 诗歌语言的语法复杂性的关系，认为 Yeats1937 年的自述(“我需要一种多情的句法来描写多情的主题。”)确有道理，从而表明主题与文体的精密关系。Mther (1989)研究艾略特诗作的文体风格，认为他在文体风格上是革命的，但他的政治观点是保守的，这正好反映诗人在思想上的两种力量的冲突。此外，对 James Joyce, Saint Teresa of Avila, Byron, Thomas Carlyle, Robert Browning, Martin Luther 等作品都有专人研究。其中 Leroux (1990)指出 Martin Luther 的风格不是出于装饰，不是出于美学，而是功能性的，为了论辩的需要。

相形之下，我国的文体学研究还未能对一个作家作系统的全面的研究。揆其原因，一方面是我们每年能攻读博士学位的人数有限，另一方面可供研究的书籍和设备不足。

7. 文体学的发展方向

当 20 世纪即将走向尽头的时候，文体学究竟今后将如何发展呢？刘世生(1994)曾根据 Carter 等人的观点，归纳了四个发展方向，即 1)形式文体学，其理论基础为形式与内容的二元对立模式；2)功能文体学，以功能主义语言观为理论基础；3)语篇文体学，即以语篇分析为基础；4)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其理论根据是 Foucoult 的观点，即人们的知识与信仰具有社会符号学的特点，这又可分为两个流派：1)语文学方法；2)Fowler 的政治文化文体学。对每一项的具体内容似有深入讨论的余地，如第一类形式文体学失之过宽，作者说：“形式文体学家认为内容或认知意义是首要的”，这与我们一般认为形式主义重形式、轻内容的理解不一样，又如作者把 Riffaterre 的“超级读者”论列为此类的原因不很清楚。第二类无大问题，但功能文体学家从理论上必然是第三类的语篇文体学家。第三类则具有浓厚的采用语用学方法的色彩。第四类

似乎从宏观上讨论较多，对具体语言分析不很重视。总的来说，这是对不同文体学流派的分类。

从文体学当前的研究动向和对一些问题的争论来看，我认为下列几个方面将受到重视：

1）文体学的研究对象

尽管文学批评家反对语言学"侵入"传统的文学文体学、诗学的领地，这个现实已不可能扭转，不可能走回头路。今后的文体学的研究必然包括文学文体学，语体学和理论文体学三大块。这就是说，当代文体学应当包括文学文体学，但文学文体学再也不是文体学的同义词。这样，有关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仍是一个研究的课题（申丹，1994）；对非文学体裁的研究，如新闻、广告、科技、贸易、法律，以至学生写作等将占更大比重。在文学文体方面，除 Leo Spitzer 和 Eric Auerbach 外，象"实用批评"、"新批评"和"新文体学"过去都把原则与方法建筑在诗歌上，把小说置于文体学之外（慈继伟，1985），故今后将更多地探索分析小说文体的有效方法。

2）文体学的解释力

当语言学最初涉足文体学时，新文体学家满足于对文体的客观描写，无意参与对作品的鉴赏和评论，认为这是文学批评家的任务。他们现在认识到，用任何方法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都不可能是中性的或客观的（Burton, 1982）。这也涉及新文体学能否站稳脚跟的问题。由于文学批评学家对新文体学发起一次又一次的反扑，新文体学家已无退路，它必须解决语言学方法与文学欣赏的相互关系，正如 Birch (1989)指出语言文体学的不足是描写太多，解释太少，为此，文体学应考虑文本的互相交叉现象，进行语言、语篇和文学的接面研究。

3）文体学与符号学

为提高文体学的解释力，语言文体学要结合语言外部研究，即研究有关语篇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情况。这就进入比语言学更高层次的符号学。当前符号学的热点是运用巴赫金的理论来研究

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Garza (1992)在讨论小说体的特征时采用了巴赫金的定义：现代小说是各种语言互相斗争的阵地。这些语言有时联合，有时冲突。Slavinsky (1993)在研究 Clarice Lispector 的小说时，分析了作家的杂语体式的词语，各个情节、人物、和主题构成的多声部性，以及作者与其它思想家的互文性。Lin (1992)认为 Ulysses 是官场中狂欢节的范例。虽然巴赫金在讨论对语体时未处理妇女的声音，乔伊斯在这部小说中的一章中把最后一个词留给莫莉，构成了尤里西斯的"他者"。Grider (1990)指出很少人谈论巴赫金的怪诞式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怪诞。其实，这个理论对描写传统力量和叛逆力量的冲突很有用。福克纳的小说《八月之光》是怪诞式的现实主义的典范，而哈代的《黛丝》是浪漫式的怪诞的体现。Grider 还认为巴赫金时空概念的理论在本质上更是多声步的。Evenson (1993)则对巴赫金的狂欢节理论和对语体提出批评，认为巴赫金的方法有偏见，给这些理论赋予使人获得解放的价值是先入之见。

我国对巴赫金理论虽已多次报道，但在文体学中尚未系统应用。其次，巴赫金理论也好，符号学理论也好，不能代替已有的文体分析方法。

4)文体测量学

如上所述，现有的文体分析方法适合于诗歌或语篇片断。对篇幅较大的小说，剧本，或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困难较大。这就要求文体分析方法的科学化，现代化，具体说，计算机化。作为文体学的分支，这就是文体测量学(Franking 1988)，它通过对某时期或某作家的作品惯用的表达特征作客观的定量统计，来判断语篇的统一性，作者的身分和产生的年代。国内已用来研究分析《红楼梦》等名著，但外语界还很少使用。

5)跨学科交流

文体学发展的历史是跨学科交流和融合的历史。早期文体学的建立本身就是修辞学和文学的结合。在 60 年代后又引入了语

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从而形成了新文体学。今天,社会文体学是文体学与社会语言学的结合(LLBA 9401111),叙述拓朴学是文体学和拓朴学的结合(LLBA 9405628),语篇文体学则是文体学和话语分析或篇章语言学的结合(刘世生,1994)。这些例证都最好地说明了文体学今后的发展仍离不开跨学科的交流。

6)为教学服务

文体学为外语教学服务具有巨大的潜力。多年来外语教学界对传统的精读课教学争论不休。文体学一方面深入浅出将语言学和文学的知识传输给学生,另一方面通过对不同长度的语篇段落进行分析,帮助学生将主观感受客观化,激发学习兴趣,从而提高对外语的鉴赏和应用能力,在高年级可代替四年一贯制的精读课。

主要参考文献:

程雨民,《英语语体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

程雨民等主编,《英语语体学和文体学论文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

慈继伟,小说对文学文体学的挑战,《外语教学与研究》第 2 期,1985。

高等学校外语学刊研究会,《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顾曰国,西方古典修辞学和西方新修辞学,《外语教学与研究》第 2 期,1990。

顾玉兰,谈 style 和 stylistics 概念的内涵及汉译问题,《外语研究》第 1 期,1993。

郭鸿,评英语文体学的范围、性质与方法,《外语研究》第 1 期,1988;

英语作为外交语言的文体特征,《外语研究》第 4 期,1992;第 1 期,1993。

胡壮麟，语音模式的全应效果，《外语教学与研究》第 2 期，1985；
语言的可证性，《外语教学与研究》第 1 期，1994。
侯维瑞，文体研究和翻译，《外语教学与研究》第 3 期，1988；
《英语语体》，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
刘世生，文体学的理论、实践与探索，《北京大学学报：英语语言文学专刊》第 2 期，1992；
系统功能理论对现代文体学的影响，《外国语》第 1 期，1994；
钱佼如，英语文体学的范围、性质与方法，《外语教学与研究》第 2 期，1985；
"Stylistics and the Teaching of Literature to EFL Learners in China"，《外国语》第 1 期，1992。
钱瑗，《实用文体学教程》(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秦秀白，《英语文体学入门》，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
文体学理论述评，《外语教学与研究》第 3 期，1988。
申丹，简评《英语文体学引论》，《外语教学与研究》第 2 期，1988；
小说中人物话语的不同表达方式，《外语教学与研究》第 1 期，1991；
对自由间接引语功能的重新评价，《外国语》第 2 期，1991。
施旭，文体的语言学研究——评介 N.E.Enkvist 的《从语言学研究文体》，《外语教学与研究》第 3 期，1988。
孙生茂，英语'圆周句'的运用及其效果，《外语研究》第 2 期，1994。
王黎云，张文浩，自由间接引语在小说中的运用，《外语教学与研究》第 3 期，1989。
王守元，《英语文体学教程》，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
王佐良，《英语文体学论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0。
王佐良，丁往道主编，《英语文体学引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7。
徐有志，《现代英语文体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
杨雪燕，话语分析与戏剧语言文体学，《外国语》第 2 期，1991。

朱永生，英语中的语法比喻现象，《外国语》第 1 期，1994。

Birch, David. 1989.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ritical Practice: Ways of Analyzing Text*. London: Routledge.

Burton, Deidre 1982. "Thought Glass Darkly: Through Dark Glasses", in Carter 1982.

Carter, Ronald (ed.) 1982.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n Introductory Reader in Stylistic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Fatany, Afnan Hussein. 1991. *A Passionate Syntax for Passionate Subject-Matter': The Interdependence of Style and Quest in the Later Yeats*. PhD Dissertation.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Fowler, Roger (ed.) 1966. *Essays on Style and Languag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Garza, Gloria Esther. 1992. *Reporting Influence in the 20th Century Latin America Novel, the Intertext of Journalism and Fiction*. Ph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Grider, Barbara Sue. 1990. *Crucifications: The Crossroads of Carnival and Lent in William Faulkner's 'Light in August' and Thomas Hardy's 'Judy the Obscure'"*. Ph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Halliday, M. A. K. 1985.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Edward Arnold*.

Hoffman, M. M. 1992. *Stabilizing Silence: The Caesura in Verse*. PhD Dissert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Barbara Lamberts. 1989. *Repeating is in Every One: A Discourse and Literary Analysis of Repetition in Gertrude Stein's "Three Lives'*. PhD Dissertation.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Leech, G. N. 1969. *A Linguistic Guide to English Poetry*. Longman.

Leroux, Neil Richard. 1990. *Style In Rhetorical Criticism. The Case of Martin Luther's Vernacular Sermons*.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Lin, Yu-chen. 1992. *The Poetics of Alterity in James Joyce's 'Ulysses'*.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Behaviour Abstract*.

Mther, Elizabeth. 1989. *Polemics and "Vers Libre": T. S. Eliot's Radical Stylistics*.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Ostrowski, Constance J. 1993. *The Syntactic Metaphor in Prose Fiction*. PhD Dissertation. 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Schnebly, Cynthia Woodard. 1993. *Repetition in Beckett, Pinter, and Alebe*. PhD Disser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Abstracts: Humanities.

Shen, Dan. 1988. "Stylistics, objectivity, and convention." *Poetics*. Vol.17, No. 3 221-238.

Slavinsky, Barbara Anne. 1993. *Clarice Lispector's Fiction, A Dialogic Study toward an Aesthetic and Ethical Exegesis*. Stanford University.

Widdowson, H. G. 1975. *Stylistics and the Teaching of Literature*. Longman.

Wildermuth, Mark Edwin. *Energy and Elegance: The Style and Context of Samuel Johnson's Moral Prose*. Ph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Yontz, Ruth Ann. 1988. *Frame Anaphora. The Definite Article in Discourse*. PhD Dissertati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我国实验心理语言学的进展

[illegible]

一、认知作为研究中心

心理语言学是借助于语言学和心理学的理论和成果研究儿童习得语言的过程和语言使用(言语的感知、理解与产生)的过程的一门交叉学科。心理语言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确定语言能力的发展过程和运用语言能力的心理过程(沈家煊,1988)。随着心理语言学朝着理论与应用两个维度的纵深发展,一方面大多数学者开始把人类的智能研究放在首要位置,所以时至今日偏重对认知心理的讨论和研究就不足为奇了;其中主要包括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和认知心理语言学。另一方面,这一领域又形成了侧重点不同,但实际上又相互重叠的学科分支,例如,人类学心理语言学、社会心理语言学、发展心理语言学、实验心理语言学等等。

认知心理学作为对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反动,主要研究人类的智能系统及其性质这一基本问题,通过可以测量的观察到的行为,从假设内部结构和过程来透彻地解释人类知识的心理表征及其规律性。由此,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活动是带有一定创造性的智能活动,语言智能建立在人类关于语言和世界的规则知识基础上(史忠植,1988)。如果说心理表征是连接语言与现实世界之间关系的界面,语言是心理表征的重要符号系统,那么认知心理语言学正是以实验科学的手段来研究这个符号系统的整个认知运作过程,亦即表征语言智能的过程。

心理语言学的分类虽然繁多,但在理论上心理语言学与认知

心理学的合流是当前国内外基础研究的主要特征；心理语言学与认知科学的方法论(特别是人工智能、计算机模拟的研究手段和'在线'的实验方法)相结合是当前国内外应用研究的显著趋势。由此可见，认知、心理、语言三者之间存在着先天的内在联系。这种事实足以说明：理论心理语言学本质上应该属于认知心理语言学；而应用心理语言学本质上应该属于实验心理语言学。更严格地讲，实验心理语言学是与研究语言习得的发展心理语言学相对的；因为它集中从实验科学和认知科学的角度，深入研究语言学习和使用的心理机制与心理过程(G. D. Prideaux, 1984；桂诗春, 1991)。这门新兴学科在我国虽然逐步地发展起来了；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国内其它相关学科的科研水平高低，以及财力和物力等方面的支持都会制约和影响这种新学科的继续发展。事实上，可以这样认为，我国实验心理语言学的现状反映了多种边缘学科(例如，认知科学、心理实验测量学、语言学等)在心理语言学总体框架下不同程度的渗透和拓广。

国内一些专家针对上述情况提出了这样的看法：我国的心理语言学研究无论在规模和深度以及理论基础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小的距离。就实验心理语言学而言，"我们所开展的各项研究有的属基础研究，有的属应用研究，但大都和认知有关，只不过认知的范围很广，我们只能限于中国人学习英语的认知心理过程；我们所采用的研究手段也是认知科学中常用的手段"(桂诗春,1992a)。笔者认为，我们若是从理论与实践、引用与应用的高度，综述一下近十年来国内在这个领域发展的成绩和问题，这无疑会有利于我们的研究事业进一步发展，最终使这一领域在较短的时期内达到国际水平。当然，本文只是就当前发展状况以及我们开展这项科研所应采取的策略发表一点浅薄之见。

二、当前的状况和水平

最近十年，确实是我国的心理语言学不断深入发展的时期。特别是自从我国第一部《心理语言学》(桂诗春，1985)专著问世以来，这门新兴的学科在国内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介绍国外心理语言学理论的引进阶段；运用主要理论框架解释汉语和外语教学实践的研讨阶段；以及在认知理论与实验方法的指导下建立初步的理论模型阶段。目前的状况是：这三个阶段所研究的方向和内容不是彼此的替代更新，而是同步发展、相互依存。当然，每个阶段的研究都有各自的历史作用和发展特色。例如，实验心理语言学的起步与发展过程只体现在第二和第三阶段之中。

1．介绍与引进国外理论阶段

这一阶段中，N. Chomsky, D. I. Slobin, H. Clark & E. Clark, D. J. Foss & D. T. Hakes 的心理语言学论述介绍的最多(刘润清，1982；沈家煊，1988)。此外，有关专著的特点一是取材广泛，把各派议论都摘要介绍，便于初学者认真学习；二是客观地概括和评论各家学说，提出有关的问题，便于研究者深入讨论(桂诗春，1985；鲁忠义，1989)。这一阶段的重要贡献是初步讨论了心理语言学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问题，如：教学方法的心理语言学基础、语言错误分析等；并明确提出了心理语言学的四个显著特性：多学科性、过程性、认知性和实验性。

2．结合国内实际研讨阶段

研讨阶段有两个方面值得人们重视：结合国情说和突出认知说。朱曼殊教授(1990)强调要结合国内实际运用心理学理论与实验手段，论证语言使用(特别是汉语阅读理解)的心理处理与加工过程。彭聃龄教授(1991)则认为，语言的心理学研究不仅对探讨

语言现象的本质和规律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揭示人类认知系统的本质和规律，也有重要的意义。桂诗春教授(1991)也坚持认为，心理语言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其重要的标志是它与认知科学的合流(M. Tanenhaus, 1988)，例如，我们可以从认知方面对语言理解进行理论探讨(A. Garnham, 1985)。应当指出的是，《实验心理语言学纲要》是一部承上起下的著作；它从实验科学和认知科学的高度，讨论这样一个主题：语言使用的过程就是信息处理的过程；这个过程 的本质是认知的。如果可计算性原则被视为是探索语言认知心理过程的一个基本原则，那么，心理语言学作为实验性的科学，它的理论来自观察和收集到的数据，以及使用现代统计手段来作出分析和推论(桂诗春，1991)。

3. 形成初步模式阶段

国内现有的实验心理语言学模式可以分为两类性质不同的理论：第一类模式是对语言学习规律的假设，用以描述外语学习的心理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诸因素(如：态度、动机、性格、智力、年龄、外语学能、学习策略等)所起的交互作用；其研究的重点放在描写学习者的个体差异问题上。刘润清等(1993)的《中国英语本科学生素质调查报告》和王初明(1990)的中国学生的外语学习模式及其验证就是例子。第二类模式指对语言使用规律(包括外语教学过程)的假设，主要是解释语言的感知、理解与产生等认知过程，并且还有必要确定词语感知、单句处理、语篇理解、话语产生等方面的特性；其研究的重点放在解释群体行为的异同性问题上。例如，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计划重点研究课题《中国学生英语学习心理》一书中，主要讨论的是这种以认知为基础的外语教学过程模式(桂诗春，1992a)。总体上讲，以上这两类模式都贯穿着心理语言学的“认知制约”(cognitive constraints)新概念：不管是语言的习得、学习，还是使用都要受到心理表征(如：知觉、表象、记忆、理解、意识、思维、决策、问题求解)的制约，可以说成是认知的制约(桂诗

春,1992b)。

从研究对象来讲,国内实验心理语言学模式有三个主要层次:心理词汇模式(mental lexicon models)、单句分析模式(sentence parsing models)和话语或语篇理解模式(discourse or text processing models)。心理词汇模式讨论人们是怎样在听辨的基础上把意义和知识保存在长时记忆里,以及这些意义和知识是如何提取的。一般地讲,词和意义的关系有不同的解释:一种是直接提取模式,认为词和意义一起保存的;另一种是检索模式,认为两者分开保存。有的实验表明,我国大学生的汉英两种语言只有一个统一的心理词汇,激活括散可以在两种语言中交叉进行。但受试对两种语言的掌握程度不同,直接影响其反应时间(桂诗春,1992a)。

单句处理模式主要探讨句子(命题)内词语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话语或语篇理解模式是结合语境,重点研究句子(命题)之间的意义建立过程。从原则上说,句子中所有的词语在确定句法关系之前都已经辨认;同理,句法分析应先于句子或语篇的解释。为了验证句子层次上意义建立过程的心理现实性,国内的实验报告一般讨论下面几个单句处理分析模式,如:短时回述模式(李崴,1992)、主题/述题结构模式(陈建平,1992)、心理知识模式(沈三山,1992)等等。我们最近的资料表明,国外的实验心理语言学报告中正在讨论"空范畴"模式(G. Bever, 1988)、句法歧义的语境模式(Clifton, 1986)。汉语的空范畴研究虽然受到了一定的重视(赵世开,1986;黄衍,1992),但国内还没有发表过从心理实验的角度论及英汉语的空范畴和句法歧义的语境分析报告。为什么对这样的句子处理研究受到了冷落,很可能是与乔姆斯基及其"管约理论"在我国的地位有关。该理论在国外的发展很快,但我们国内的资料有限。我们没有从汉语的角度检验乔氏"空范畴"的心理现实性;除了由于英汉语言的差异以外,还由于这个范畴原本就不好懂,不易将其引入汉语的实验心理研究之中。关于话语或语篇理解的模式,我们将在下一节专门评述。

上述事实可以表明，实验心理语言学自80年代中期以来的确得到了发展。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这一学科所涉及的理论不够深刻，而且理论对外语教学等方面的应用程度与控制操作水平至今还是有限的。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在不少的文集中发现，基本的实验报告和结论也不尽相同(桂诗春，1992a)；此外，所建立的模式越来越繁琐，限制条件也不明确(T. Trabasso, 1993; J.P. Magliano, 1993)。面对这一研究的目前状况，我们认为，过于悲观或过分急于求成都是不可取的态度。最好的做法应该是确切肯定成绩，明确存在的问题，努力寻求可能解决问题的方法。

三、成绩和问题

我国实验心理语言学发展至今，虽尚未成熟，但确实取得了应该加以肯定的成绩。可以说，与语言感知和语言产生相比，语言理解的研究比较深入；这对探索人类的智能起一定的推动作用。换言之，如果我们对语言理解机制有一定的了解，这将会大大促进我们理解推理、记忆、联想和学习等方面的智能过程。

心理语言学关于语篇理解的理论或模式必须描述篇章各个部分的信息是如何组合成一个整体的认知过程。研究者要探讨读者是如何利用已有知识经验，把语篇中内隐和外显的意义整合起来，达到对篇章内容理解的全部心理活动过程(Ehrlich, 1991)。然而，就已取得的研究成果来看，对字、词和单句理解的讨论较多，而对语篇理解(特别是汉英对比)的研究较少。其原因主要在于：理解一篇短文所需要的"认知制约"是多方面的；而且"认知环境"(cognitive environments)也在语篇理解过程中起作用。读者的感知能力、推理能力、信息的提取能力都会有差别，因而在理解过程中所建立的心理表征也不尽相同(Carston, 1988)。理论上，尽管字、词、单句理解与语篇理解的研究应当相互联系、相互补充，但实际上，目前的研究仍然是各自为营，侧重于不同的问题来讨论。国内

的英语(或汉语)语篇理解模式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概括:

1. 基础研究

国外语篇理解的基础研究是围绕语篇连贯性或整合性的心理现实性问题展开的;其中分为心理表征、认知过程与语境功能这三个方面的论述(Ehrlich, 1991)。国内从前两个方面(如:命题表征、因果关系链、故事语法、心理模式等)讨论的人较多(桂诗春, 1992a),但比较零散不够系统;而从世界知识、社会与文化的语境功能方面讨论的人很少(索玉柱, 1996;王初明, 1990)。这种偏向可能有两种解释:一是因为人们可能有这样的表面误解:语境功能与心理语言学是大相径庭的;二是说明语境功能与心理语言学的交叉研究难度较大,但并非不可以视为是一个新的努力方向。我们下面要举的例子:"中国学生在英汉语篇理解中的推理特征"(索玉柱, 1995),就是讨论'语境功能'的例证。

众所周知,推理在语篇理解中发挥特殊的作用,其功能主要是使篇章的命题有效地进行连贯与整合,并且恢复其言外含义(implicature)。按照"相关原则",人类的认知活动总是力图花最少的力气去获得最大的认知效果,因此人们在交际中,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最'相关'的信息上,即把新信息和旧信息组合起来,作为推理的前提条件,去获得更多新信息(Sperber & Wilson, 1986)。作者从以上"认知制约"的概念出发,限定了这样的工作定义:受试在辨别语篇中的命题时,依靠的语境线索越多,该命题就越不是显性的。那么,受试处理的语篇显性程度越高,推理的速度就越快,而推理的数量则越少;反之亦然。关于命题逻辑推理的实验数据表明:受试的英汉语篇理解的推理模式有这样的共性:只有在语境必需时或相关时,才会产生推理。例如:(1)在识别测验中,局部(local)推理句总比总体(global)推理句反应快;释义句(paraphrase)总比推理句反应快。这表明推理的经济性;(2)如果将显性语篇的推理与隐性语篇的推理相比,前者的反应时总要快于后者;而且显性

与隐性语篇的释义句却没有显著意义上的反应时差异；这说明推理的有效性；(3)显性与隐性语篇的反事实句(counterfact)不但没有显著意义上的反应时差异，而且它们总比推理句和释义句的反应时要长；这就证明推理有可判断性(justified nature)。

2. 应用研究

在我国应用研究更加着重于考察中国成人学习外语(特别是英语)的具体过程，以便为我国外语教学改革提供更多的实验数据。首先是对学习策略的个别差异研究得到了重视(刘润清，1993)。这包括外语交际能力与交际策略的关系、听力策略案例分析等方面。其次，是对阅读能力与过程的群体行为讨论。我们下面所举的例证属于后一种讨论："影响中国学生英语阅读理解的主要因素是什么"(李绍山，1992)。

不少的资料表明：对语篇理解有影响的因素大致可以分成文本因素、读者因素与环境因素。文本因素指与阅读材料有关的因素，如：词长、句长、词频、复句多少、命题多少等。读者因素指读者的动机、兴趣、对有关背景知识的掌握等。环境因素指阅读的社会与物理环境。作者的实验结果表明，命题作为一个基本的意义单位是影响阅读理解的主要因素。它的性质是：一个句子的命题数越多，它给认知处理过程带来的负担就越重。换言之，命题数越多，它需要的处理时间就越长。因而，命题之所以具有敏感的预测能力，正因为是受试的英语学能水平不高，语言障碍使他们难以有效地利用阅读中的背景知识。如果阅读材料的难度超过他们的英语学能，那么他们对语言信息的依赖就会更加明显。可见，受试的语言知识与背景知识之间存在有这样的关系：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必须具备一定程度的外语能力，才能激活有关背景知识的"图式"。显然，作者对于命题的分析不仅与图式理论相一致，而且也与心理语言学的"认知环境"概念相吻合。

3. 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我国实验心理语言学有其研究特色：除了选定一些有意义的课题外，研究者还有意识地实验各种研究方法。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摸索在我国建立研究语言学习和语言使用的认知心理过程模型。下列两种研究手段最有利于对认知过程的研究，值得进一步开拓：

1）潜伏性数据，即反应时间的收集

由于计算机的应用，我们的许多实验都可以利用计算机来显示刺激和控制其显示时间，而且还能记录反应时间，并且把它们作为因变量来观察(桂诗春，1992a)。例如，索玉柱(1994)所分析的实验潜伏性数据，具体表现了受试在不同条件下语篇理解的推理认知过程；比如：英汉语言的差别、篇章文本显性与隐性的差别与不同类型推理的差别都可以得到讨论。这种研究手段的特点是：实现了对阅读过程的同步测量；对受试的正常阅读过程不干扰，有利于提高实验研究的生态学效度；可以较准确地记录受试在阅读各种内容和层次时，认知加工处理的变化过程，从而会增强实验研究的科学性。

2)认知科学中的计算机模拟技术

计算机模拟技术是指根据某种理论和假设，把人类的认知过程变为计算机程序，然后在在受试身上做实验。在某种意义上说，李绍山(1992)的实验研究也算是一种计算机模拟，因为它使用了多元回归的统计方法分离出一些主要的阅读因素，然后又根据这些因素反过来预测受试的阅读时间，如果预测是成功的，就说明几个阅读因素(如：命题、实词词频、难度、熟悉度)正是关键因素。

上面对实验心理语言学的成绩所作的概括，当然并非全面，也未能逐一作出深刻分析。我们盼望国内专家和学者能对以上方面作进一步地广泛深入的研究。那么，致使实验心理语言学至今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原因何在呢？笔者认为，有三个 M (materi-

als, methods, models)值得让人考虑：

① 实验材料的取样标准有缺陷。实验材料只局限于某些题材和文体(如：短小的叙述文体故事)。语篇的句子数目还太少。

② 实验方法的实施条件差。用计算机实施的'在线'实验和正常的自然感知、自然阅读情景还有一段距离；另外，受试人数少，而且大多数实验的受试只限于一个语言水平的学生。这些方面都会影响实验的可靠性。

③ 理论模式的预测性不足。国内论述的各类模式过分的单一化；不是多维度、多层次的验证，大多数实验都停留在就事论事上；因而，如果换一个角度讲，就会出现许多例外的情况。特别是对语义模式的研究，就更显得预测性不足。这可能是和认知科学所指的"语义障碍"有关。解决语义问题不是靠现在的实验技术与手段的延伸，而是要依靠未来"全新的技术"(王惠临，1994)。

四、如何继续推进我国的认知心理语言学研究

我们有理由相信，认知实验心理语言学的研究将会在我国得到充分地发展：一是作为先行学科的语言学与认知心理学有先天的内在关系；语言学的各个层次都需要用认知心理学的实验方法加以检验；二是对中国成人学习英语过程展开心理语言学的研究确实有着更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社会意义，它对外语教学与研究的纵深发展会有极为特殊的启示和影响；三是计算机技术作为认知心理学发展所依赖的技术条件在我国迅速地发展。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这就是语言信息处理技术所涉及的语言问题极具有民族性(王惠临，1994)。与其它西方语言相比，汉语信息处理的认知心理过程到底有什么特点；这种研究只能靠我们民族自己来完成。每个语言学者除了借鉴发达国家现有的理论和研究手段以外，还要力图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否则一旦发达国家在自己民族语言的信息处理上获得突破，我们将很难在短期内缩短差距。

更何况从计算机模拟认知程序的角度来看，汉语要比西方语言难得多。

那么，如何使我国认知实验心理语言学得以更有效的发展呢？我们认为，在吸取与借鉴国外这一领域的理论时，应该对下列论题继续开展讨论：

(1) 语言信息处理是在认知的制约下进行的；要在认知科学的指导下对中国学生学习外语心理过程进行充分解释。(2) 认知是语言学习和使用的共同基础；要研究外语和汉语的共同性，这将是我们提高语言教学的重要依据。(3) 语言信息处理中意义和形式、规则和策略、语言信息和非语言信息的对立统一关系，都值得我们在研究认知过程的基础上加以充分地认识。

假若从实施策略方面认识问题，我们不妨建议，鉴于国内现有的发展水平的各自为营的局面，当务之急是应当运用网点与网络相结合的原则，有计划地建立专家指导下的实验心理语言学理论研讨系统；这样，一方面可以在短期内探讨一些理论或实用问题；另一方面还可以长期加强与国内理论语言学、认知心理学、计算语言学等保持同步的横向联系。为此，就很有必要在高等学府为语言专业的研究生设立实验心理语言学课程，以便更多地培养出一些既懂语言学又懂心理学的“两栖”人才。

主要参考文献：

赵世开，语言结构中的虚范畴，《中国语文》第1期，1986。

沈家煊，心理语言学述评，《外语教学与研究》第2期，1988。

史忠植，《知识工程》，清华大学出版社，1988。

鲁忠义，阅读理解的过程和影响理解的因素，《外语教学与研究》第4期，1989年。

朱曼殊，《心理语言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王初明,《应用心理语言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
彭聃龄,《语言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桂诗春,《心理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
《实验心理语言学纲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
1992a,《中国学生英语学习心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1992b,认知与外语学习,《外语教学与研究》第4期,1992年。
李绍山,影响中国学生英语阅读理解的主要因素,《中国学生英语学习心理》,1992。
李崴,句子短时回述的汉英比较,《中国学生英语学习心理》,1992。
陈建平,中国学生学习英语时句子的主题突出现象与母语转移,《中国学生英语学习心理》,1992。
沈三山,语义知识在句子处理中的作用,《中国学生英语学习心理》,1992。
黄衍,汉语的空范畴,《中国语文》第5期,1992。
刘润清,心理语言学诸派及其观点简介,《国外语言学》第1期,1982。
《中国英语本科学生素质调查报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3。
王惠临,机器翻译进展,《中国计算机报》,1994年3月29日第七版。
索玉柱,中国大学生在英汉语篇理解中的推理特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外国语言文学专刊,1995。
索玉柱,连接推理与世界知识,《外国语》第2期,1996。
Bever, Thomas G. 1988. Empty Categories Access their Antecedents during Comprehension. In *Linguistic Inquiry*, Volume 19, No. 1, Winter 1988:35-43.
Carston, R. 1988. Language and Cognition. In F. J. Newmeyer (ed): *Linguistics: The Cambridge Survey*. Cambridge, New York: CUP.

Clifton, C. and L. Frazier. 1986. The Use of Syntatic Information in Filling Gaps. In *Journal of Psycholinguistic Research*.

Ehrlich, Marie-France. 1991. Aspects of Textual Continuity: Psycholinguistic Approaches. In G. Denhiere(ed.) *Text and Text Processing*, North-Holland: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B. V. pp269-85.

Garnham, A. 1985. *Psycholinguistics: Central Topics*. London: Methuen.

Magliano, Joseph P. 1993. A Three-pronged Method for Studying Inference Generation in Literary Text. In *Poetics* (in press).

Prideaux, G.D. 1984, *Psycholingusitics: the Experimental Study of Language*. Croom Helm, Australia Pty Ltd.

Sperber, Dan, and Deirdre Wilson. 1986.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UK: Basil Blackwell.

Tanenhaus, M. 1988. Psycholinguistics: An Overview. In F. J. Newmeyer (ed): *Linguistics: The Cambridge Survey*. Cambridge, New York: CUP.

Trabasso, Tom. 1993. Inference during Reading: Converging Evidence from Discourse Analysis, Talking-Aloud Protocols, and Recognition Priming. In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32, 279-300.

我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现状及问题①

高一虹

社会语言学兴起于本世纪60年代的美国。在我国，虽然50年代罗常培就在《语言与文化》一书中将语言与社会文化因素联系起来考察，但社会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真正起步是在80年代。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我国社会语言学已经初步发展至一定规模。作为一名青年外语教师，笔者在本文中仅能就本人了解的情况做一概述，谈几点个人看法。

一、研究状况

80年代至今我国社会语言学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概论性著作和教材的出版

陈原于1979和1980年分别出版了《语言与社会生活》的香港和大陆版，这部具有漫谈风格的作品一般被认为是国内第一部社会语言学专著。1982年他又出版了更具理论系统性的《社会语言学》。陈著的材料生动丰富，其中许多积累于十年文革时期，渗透着作者对当时语言现象与社会政治关系的批判性思考。近年来他的成果还包括《社会语言学专题四讲》(1988)，《社会语言学论丛》

① 作者感谢陈建民、赵丽月、周庆生、刘润清、史宝辉先生及北大英语系语言学沙龙诸同仁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给予的帮助与启发

(1991)和《语言和人——应用社会语言学若干探索》(1993)。陈建民的《语言文化社会新探》(1989) 是另一部影响较大的专著。作者本人将其归为"文化语言学"范畴,并直接溯源于罗常培的影响(见陈著前言),但他立足于汉语口语的调查,将汉语与社会文化环境联系起来考察的做法较多地反映了社会语言学的特征。

其它概论性著作和高校教材还包括陈松岑(1985)、申小龙(1991)、孙维张(1991)、王得杏(1992)、祝畹瑾(1992)、戴庆厦(1993)等人的作品。其中陈著是出版较早的教材,较及时地满足了新学科的教学需求。孙著和戴著立足于本专业的教学,在材料上各以汉语和民族语言见长;王著重在用较浅显的英文介绍基本概念和理论,适用于国内英语专业本科学生。祝畹瑾较系统全面且及时地反映了西方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对方法的介绍尤为详细。申著的独特之处是作者在结语中对社会语言学的两点尖锐批判:重材料描写而轻理论概括、忽视语言的人文性或曰人的主体意识。

2. 国外社会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翻译介绍

许国璋早在 70 年代末就开始向国内引进社会语言学,他的几篇有关论文收在《许国璋论语言》(1991)中。他对社会语言学的热情介绍和扶持还见于为祝畹瑾《社会语言学译文集》(1985)和湖南教育出版社《语言学系列教材》所作的序中。当社会上普遍还对社会语言学调查存有"这也算是学问?"的疑问时,许国璋立场鲜明地回答:"是的,这是学问。"祝畹瑾所编《社会语言学译文集》(1985)集中了拉波夫、特鲁杰、费希曼、伯恩斯坦等重要学者的重要作品,自出版后被广为引用。其它译著还包括卫志强(1987)所译什维策尔、卢德平(1989)和丁信善等(1990)所译赫德森、刘明霞等(1989)所译佐伊基、谭志明和肖孝全(1990)、周绍珩等(1992)所译特鲁杰的几种。《国外语言学》自 1980 年至 1993 年刊载了 30 余篇有关方面译介(见总目录,1994)。在百废待兴的起步阶段,在我国语言

学者能接触的文献范围和外语水平有限的情况下，这些译介对学科建设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3．专题研究

各个分支领域的专题研究成果集中地反映于近几年出版的有关专著、学术会议论文集，以及《语文建设》、《语言文字应用》、《民族语文》、《宏观语言学》(*Journal of Macrolinguistics*)、香港《语文建设通讯》)等刊物。学术会议中最主要的是国家语委语用学所举办的三届全国社会语言学研讨会和深圳教育学院深港语言研究所举办的三届双语双方言研讨会。此外，国际粤方言研讨会、全国语言与文化研讨会、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规划、语言政策和语言规范化学术讨论会、对外汉语教学和外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讨论会等国际、全国和地区性会议上也有一些有关论文。表一是三届全国社会语言学研讨会论文集所收入的论文分类：

	论文总数	宏观理论探讨	具体问题研究
第一次会议	58	5(8.62%)	53(91.38%)
第二次会议	41	7(17.07%)	34(82.93%)
第三次会议	45	5(11.11%)	40(88.89%)
总　　计	144	17(11.81%)	127(88.19%)

表一、三届全国社会语言学研讨会论文分类

下面分几个方面介绍包括上述论文在内的专题研究成果。

1）语言变异

方言的研究取得了较可观的成绩。方言学家游汝杰与历史地理学家周振鹤合作，提出了新的方言分区方法。西方传统的方言分区是以同言线为标准的，在同言线很分散，无法组成密集的同言线束的情况下，方言区的划分就很困难。周、游二人根据中国人文

地理的特点，创立了一种以旧府为基本单位的历史地理分析法。该法比同言线法更加适用于历史上政区稳定的地区。他们的专著《方言与中国文化》(1986)也被认为是文化语言学的代表作之一。在方言领域还出现了一批关于地区方言及文化的专著和文章，比较突出的是北京话的研究(如张清常，1990；胡明扬，1992)和粤方言的研究(参见詹伯慧主编，1990、1993；郑定欧主编，1993；澳门中国语文学会学报《语丛　第三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专辑》，1992)。最近，上海方言及沪语文化似又成为第三大研究热点，为此《人民日报》还开辟了讨论专版(如申小龙，1995)。

对语言性别差异的研究涉及语音、词汇选择、构词形式等方面，其中最突出的是赵丽明等(1990)对“女书”材料的采集和分析。“女书”是湖南省江永县潇水流域汉族农家妇女使用的女性专用文字，借源但有别于被当地妇女称为“男字”的汉字方块字，与其相连的是一整套女书文化。目前女书几乎没有在世的使用者，因而《中国女书集成》(赵丽明，1991)收录和翻译的 430 篇女书原件极为珍贵。史金波、白滨和赵丽明主编的《奇特的女书》(1995)收集了 1991 年全国女书学术考察研讨会论文，反映出目前的女书研究状况。赵丽明所著《女书与女书文化》(1995)也已出版。女书的分析和解释近年来还吸引了欧洲、日本、加拿大、美国等多国学者的兴趣。

在语域研究方面，各种行业语言引起关注。以“言语交际和交际语言”为主题的第二届社会语言学研讨会集中了一批有关论文，涉及军旅语言、审讯语言、医生语言、广告语言、图书馆工作人员语言等。近几年还出现了许多广告语言的书籍，其中一些较多地采用了社会语言学视角，如曹志耘的《广告语言艺术》(1992)。

2）言语交际

刘焕辉分别于 1986 和 1992 年出版了《言语交际学》和《交际语言学》，试图建立“言语交际学”和“交际语言学”两门独立的学科。刘氏的研究以言语交际活动、交际活动中的语言为对象，着眼

于语言的社会本质，因而与社会语言的有关分支领域有许多相同之处，根据刘本人的定义来看（刘焕辉、陈建民，1993:21），言语交际学和交际语言学似可为社会语言学所涵盖；根据他的研究实践来看，它们在研究角度和方法上似与修辞学的联系更为密切。也有人将他的研究归入文化语言学的范畴（如申小龙，1988，潘文国，1993）。钱冠连的《美学语言学》（1993）亦有较浓的修辞学色彩，但其“语言变体的审美选择”等内容以及注重活语料的研究方法却有社会语言学特色。

称呼和称谓的研究引起了广泛兴趣。虽然赵元任早在50年代就对汉语的称谓系统进行过详尽的描述，但没有涉及解放后的变化。陈建民（1989）、姚亚平（1990）、苏新春（1994）的著作都有章节讨论此问题。其中苏新春的试图将具体详细的语料分析与深入的文化阐释结合起来。祝畹瑾（1993）对汉语称呼的研究、周庆生（1994a）对傣语亲属称谓变体的研究也都试图超越简单的分类举例，概括出较为系统的模式。適永顺（1985）提出区分“称呼”和“称谓”，徐志诚（1991）提出区分“面称”和“叙称”。关于《红楼梦》中称呼系统的分析（姚亚平，1993；徐静茜，1993）、关于“您”的产生和发展的历时考察（谢俊英，1993）等具有我国研究者的特色。见于国际刊物的有关论文已有多篇，如 Scotton, C. M. & Zhu Wanjin, 1983; Fang, J. & Heng, J. H., 1983; Zhou, 1993。

礼貌研究也引起较多关注。汉语敬词、谦词、禁忌语、委婉语、吉祥语等几乎是百谈不厌的题目，但此类研究还有待深入，超越简单分类举例的阶段。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根据汉语和汉文化的特点，对利奇等西方学者的礼貌理论提出了补充修正（刘润清，1987；顾曰国，1992）和批判（毕继万，1993），有一定深度。社会心理学者也从其专业角度对汉语的“面子”和“脸”等问题做了调查和理论分析（如佐斌，1993），映证和深化了语言学者的探索。

关于会话结构、会话策略和风格的研究在外语界较为兴盛。上海外国语学院刘虹（1991）的博士论文《会话结构研究》对汉语会

话结构和交际规则提出了一些独创性见解，对国外有关理论和方法做了修正和补充。已召开三届的全国话语分析研讨会上有部分论文涉及汉语市场会话、课堂会话、论辩结构等。这些分析参照了多种国外的分析框架，如韩礼德功能语法、荷兰功能语法、英国伯明翰学派等，在理论和方法上都呈多元状态。有些成果已开始应用于社会实践，例如高一虹(1995)关于电话心理咨询会话结构的研究已初步应用于心理咨询员的培训。

3）语言接触

有关双语双方言状况、语言关系方面的研究，民族语言学者和汉语方言学者作出了较多贡献。戴庆厦主编的《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关系概论》(1992)、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双语研究论集》(1990)、延边大学编委会编的《双语双文化》论丛、陈恩泉主编的《双语双方言》一至三集(1989、1992、1994)等集中反映了这一领域的成果。语码转换、语言态度方面的一些研究也见于这几个论文集。语言接触和融合方面的专著还有赵杰的《现代满语与汉语》(1993)等。

在语言变化的研究方面，近几年出版了多部汉语新词语词典，(如熊忠武，1989；郭熙，1993；李行健，1993；李达仁等，1993；北京市语言学会，1993；朱广祈，1994)，及时记录了改革开放以来汉语在词汇层面的变化。特别值得提到的是，由社科院语用所于根元主持，从1991年开始出版以《现代汉语新词词典》(收录了1978至1990年新词新用法)为基础的编年本。另外，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姚德怀等从90年代开始着手汉语词库的建设，并出版了专刊《词库建设通讯》(至1994年12月已出5期)，进行"汉语外来概念词词库"、"香港粤语词库"等专项收集与研究。这些项目的实施标志着汉语词汇变化的研究正在走向规范化和系统化。

4）语言与文化

"语言与文化"是社会语言学的传统研究内容之一，其典型课题包括"沃尔夫假设"、颜色词、原型、亲属系统、分类等。从几次全

国社会语言学研讨会的情况来看，我国语言与文化的研究与此有所交叉，但范围更广。

首先是影响很大、争论也很多的“中国文化语言学”研究。这一领域已有大量作品出现（见宋永培、端木黎明，1993：附录），有关综述和评论也很多（如戴昭铭，1993；伍铁平等，1992；潘文国，1993；），此不赘述。关于文化语言学与狭义社会语言学的关系，我们将在稍后讨论。总起来看，前者具较强的人文科学色彩，有较多的历史现象分析和文本阐释；后者有浓重的社会科学色彩，注重实地调查研究。用“重解释”与“重描写”来分别概括它们也未尝不可。此外，二者的研究前提或曰“世界观”也似不同：前者的世界是“黑白”的，用范畴性（categorical）的视角分析问题（如“中、西”差异）；后者的世界是“灰色”的、“现实”的，用原型性（prototypical）的视角分析问题。

在语言、文化、思维关系的理论探讨方面，近年来萨皮尔、沃尔夫、洪堡特等人的思想在我国引起前所未有的兴趣，如姚小平在《外语教学与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过多篇有关洪堡特的文章并出版了专著《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1995）。关于语言相对论的肯定性评价（如戴昭铭，1994）似多于否定性评价（如伍铁平，1990），文化语言学研究者对“沃尔夫假设”尤有热情。

建立“民俗语言学”的倡议是曲彦斌于1984年提出的，1989年他的《民俗语言学》出版，1991年成立了中国民俗语言学会。数年来他发表了许多专著、译著、辞典和论文，引起瞩目。根据他的观点，民俗语言学直接脱胎于民俗学，以民俗语言和民俗语言现象为研究对象，是一门独立的人文学科。曲氏的民俗语言学包括社会语言学的一些传统课题，如禁忌语、委婉语等，但范围似更广。

语言学习和交往中的文化因素是语言教学界的研究热点（参见陈建民、谭志明，1993：附录）。主要作品有胡文仲编《跨文化交际与英语学习》（1988）和《文化与交际》（1994）、邓炎昌、刘润清著《语文与文化》（1989）、顾亦瑾、吴国华著《语言与文化：俄语语言国

情学概论》(1991)、王宗炎主编,正在陆续出版的《外国语与外国文化》丛书等。此类研究重在对比两种语言及其使用规则的不同,并将此差异与各自的文化联系起来。研究所涉及的语言层面以语义和语用居多,与教学实践关系密切,但也有一些概念性总结,如"知识文化"与"交际文化"(张占一,1984),"交际能力"与"交往能力"(王振亚,1991),"生产性外语学习"(高一虹,1992)等。此类成果也常被包括在"跨文化交际学"、"语言国情学"等范畴中。

语言与经济的关系是一个新课题。祝畹瑾、陈建民(1991)发表于国际刊物的论文《中国语言状况的一些经济因素》通过具体材料对此问题作了很富启发意义的探讨。语言与文化其他方面的关系,如语言与体态语、语言与服饰、语言与音乐、语言与戏剧等,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兴趣。

5) 语文规划

我国的语文规划历史悠久,至少可以上溯到秦始皇的"书同文"政策。1949 年以来,政府有关部门在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汉字简化和少数民族语文的规划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参见祝畹瑾,1992,1994)。进入 80 年代以来,由于港澳回归日期的追近、大陆和台湾交往的日益密切、大陆的经济开放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语文规划成为越来越迫切的任务,而社会语言学此时的兴起为语文规划提供了新的认识视角。例如,人们对普通话的认识从一个简单同一的标准系统过渡到一个有层次、分等级的复杂系统(陈章太,1990);对推广普通话的认识从单方面强调"推普"到明确提出双语双方言是"时代的趋势"(王均,1994),普通话和方言将长期共存分用(于根元,1990)。港澳语文规范化问题是当前的一个讨论热点,双语双方言会议的三个论文集、《语文建设》、《中国语文》(如 1992 年第 1、2 期)、香港的《普通话》、《语文建设通讯》等刊有许多大陆和港澳语文工作者的有关看法。有关语文规划的主要文献还包括《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文件汇编》(1987)、戴庆厦主编《语言关系与语言工

作》(1990)、周有光《新语文的建设》(1992),以及《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和发展问题》(1993)、美国社会语言学家费希曼主编《国际语言社会学学报》的三期中国社会语言学论文专刊。

在汉语文字的规划问题上,多年来就存在着两派意见的对立。一种意见是,中国文字需走拉丁化的道路才能适应现代化的需要。另一种意见是,拉丁化乃至汉字的简化有损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近年来国家语委已经明确了我国的文字政策:汉字不会废除;拼音将作为注音和学习普通话的工具,长时期与汉字同时存在。1992年12月14日,江泽民总书记做了汉字简化方向不能改变的讲话。然而有关争论仍在学术界继续。袁晓园及其主编的《汉字文化》主要作者大力主张汉字优越,这一论点受到一些激烈批评(如王开扬,1992a;1992b)。美国夏威夷大学李英哲则建议,为了适应现代化的需要,中国应当象日本和朝鲜那样,吸取拉丁字母的长处,实行汉字和拼音文字共用的双文制度(《双语双方言》三)。对于汉字简化,有肯定论(如陈章太,1992;王宁,1991a、1991b、1992)和否定论(如田惠刚,1993)之分。袁晓园1989年在《汉字文化》上提出"识繁写简"之说,主张"把繁体正字作为印刷体,把简化字作为手写体"。该论点受到一些批评(如戴昭铭,1992;史有为,1992),但讨论仍在继续。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之外,社会语言学在我国的起步还有其它一些标志:举行了一系列国际、全国、地区性的研讨会,从而促进了学术进行和不同领域学者的交流;有了一些从事社会语言学工作的研究机构以及由这些机构承担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成立了一批国家和地区从事语言规划和规范化的机构;开展社会语言学教学,培养了一批社会语言学研究生、博士生(参见周庆生,1994b),为学科今后的发展准备了后续力量。

综上所述,我国的社会语言学在短短的十几年中有了迅速的起步,并已有相当规模。尽管由于诸多历史和环境条件的限制,社会语言学在我国还不具有与形式主义语言学"平起平坐"的地位,

但作为具有迥异于唯理主义语言观的独立学科，它毕竟已经有了自己的起步，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承认。该学科的现状似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应用性。受到政府支持多、成果集中、系统性强的分支领域及专题，与国家的政策制定一般有着密切联系。至今全国还没有一个专门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所，但在社科院设有与“语言所”相对的“语用所”（“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的简称，成立于 1984 年），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和解决语文规划方面的问题。许多省、直辖市、自治区、自治州都设有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从事语文规划工作。同样，全国目前尚无专门的社会语言学刊物，但有语用所主办的、以语文规划为主要内容的《语文建设》（1986 年以前刊名为《文字改革》）。一些在国外较为发达的研究领域，如语言变异，相比之下则较为落后。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重视学术研究的社会应用价值是顺理成章的，虽然这对学科本身发展的平衡和系统性有所影响。

第二，本土性。与西方相似，我国的社会语言学是作为形式主义语言学的对立面出现的，它的兴起与形式主义语言学在汉语、汉语方言以及民族语言研究中的发展困境有密切联系。然而我国的社会语言学又有其本土特点，不象心理语言学等学科那样是较纯粹的“舶来品”。从内容来看，许多分支领域和专题表现了中国社会文化的独特之处，如上述语言与文化研究、文字研究等。从方法来看，文本研究，特别是文学文本、历史文本的分析和阐释占了相当比重。从研究者的情况来看，许多人从事有关研究并非出于对学科理论的兴趣和了解，而是出于对具体现象的兴趣。这种“本土性”与心理学等学科中的“本土化”完全不同。“本土化”是照搬国外模式至极后的革命，而社会语言学的“本土性”则更多的是“土生土长”。

第三，时代性。中国的改革开放给社会语言学创造了独特的生长和发育环境。就其社会学意义而言，80 至 90 年代的社会语

言学真实地反映了改革开放形势下我国丰富多彩的社会情境。在一般情况下，社会沿革是缓慢的，因而一些西方社会语言学家认为语言的变化是无法记录的，人们只能从不同代人的身上看到语言变化的结果。然而我国社会演变形式之快则使语言工作者能够在十年、五年、甚至三、两年内记录到同一社群内语言的变化。从课题内容来看，在社会语言学刚刚兴起之时，陈原等的著作清晰地记录了刚刚过去的文革时代的社会现象，而目前的"推普"工作与双语双方言的关系、汉字的"识繁写简"、新词、借词的大量产生等等，突出反映了20世纪末中国的社会环境特点。

第四，广泛性。可以包容在"社会语言学"这个名称之中的研究（例如为历届社会语言学研讨会提交的论文）范围很广，几乎涉及语言的各个层面（语音、词汇、句法、语篇、语体、语域、文字）、社会的各个层次（性别、职业、年龄、阶层、社群、教育程度）、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家庭、教学、命名、翻译、销售、服饰、体态、饮食、广告、法律、军事、医疗、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部门（文学、艺术、音乐、戏剧、民俗、宗教、历史、地理、心理、哲学）、语言研究者的各个领域（汉语理论、汉语方言、民族语言、外语、对外汉语），覆盖一切可能的将语言与社会文化背景联系起来的研究，真可谓是"多角度"、"全方位"。这种广泛性造成一种声势，使社会语言学受到注意，形式主义语言学受到挑战。另一方面，它也显示出缺乏系统性和深刻性的弱点。

二、存在的问题

1. 学科的界定

作为形式主义语言学对立面出现的社会语言学，一般界定为研究语言与社会之关系的学问。根据广义解释，从不同社会科学的角度考察语言和文字都可归入这一范围。根据狭义解释，其研究对象是语言变异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变异是语言运用

上的变化和差异，通过各种语言变体表现出来；社会环境包括大环境和小环境：前者指语言使用者的社会、民族、文化等背景，后者指说话人进行言语交际时的情境（祝畹瑾，1992:7）。早期西方的研究主要是根据阶级、性别、种族、年龄等社会范畴研究语言变异。后来甘柏兹、坦嫩等人认为社会语言学还需研究谈话各方相互协商内容的交往过程，因而有了"交往社会语言学"。可见学科界域并非清晰而固定。社会语言学与语用学、话语分析等学科也有所交叉。不过，对于一些"典型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内容和方法，例如拉波夫的语言变异研究模式，人们还是有所共识。

前述研究可归入广义社会语言学范围。在我国社会语言学兴起之时，还出现了其它一些与形式主义相对的、将语言与社会文化背景联系起来的新学科概念，如上述游汝杰、陈建民、申小龙等倡导的"中国文化语言学"、刘焕辉的"言语交际学"和"交际语言学"、曲彦斌的"民俗语言学"，此外还有赵丽明提出的"文字语言学"（1990）、胡文仲引进的"跨文化交际学"（1990）、王德春等引进的"语言国情学"（或"国俗语义学"），等等。本文涉及这些成果，一是因为它们与社会语言学的边界目前难以划清；二是因为在历届社会语言学研讨会上，这些学科的研究都占了相当比例，而它们与社会语言学的关系也总是成为一个争论主题。

以"文化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的关系为例。文化语言学内部的几个流派各有说法。"社会交际派"代表陈建民在第三届社会语言学研讨会上提出，社会和文化的概念是相互交叉的。性别、年龄、阶层等属社会范畴，价值观念属文化范畴。有些因素既属社会范畴又属文化范畴。由于概念之交叉，又由于作为边缘学科的社会语言学边缘地带模糊不清，社会语言学内部可派生出一些交叉学科。偏重从文化背景出发，解释当前或历史上一些语言现象的是文化语言学；偏重于人际交往中对语用条件加以说明的是言语交际学，等等（见苏金智，1992）。这意味着社会语言学涵盖文化语言学。"双向派"代表游汝杰在此会议上也认为将文化语言学视为

社会语言学的分支学科并无不可，务实的研究更为重要（同上）。但在1993年出版的《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1993:12—13)中，游氏明确提出社会语言学与文化语言学的三大差异：第一，前者的研究重点是语言使用的规则，后者的重点是从文化背景出发，解释某一语言或方言的自身特点及使用特点；第二，前者只研究当代语言现象，后者也研究历史上的语言现象；第三，前者与其他人文科学无甚关系，而后者则试图与其他人文学科结合起来。"认同派"代表申小龙曾多次强调，文化语言学不是语言学分支学科，也不是边缘学科，文化语言学就是语言学，它是本体学科（申小龙：1991:266—268，苏金智，1992）。这意味着文化语言学可以涵盖社会语言学。申氏此见与西方激进的社会语言学者曾提出的观点颇为相似："社会语言学"概念中的"社会"前缀多余，因为去掉社会因素的语言学不是完整的语言学（见 Hudson，1980:19）。然而近来申氏又提出"社会语言学是一个引进的学科，应照人家的样子去做（当然可以有修正，这与自说自话是两码事）。而文化语言学是土生土长的新学，我们自己会去建设。""谁也不要涵盖谁"（给本文作者的信，1993）。民族语言学界的文化语言学倡导者张公瑾(1993)认为，文化语言学是一个广泛的综合学科，它虽然具有某些边缘特点，但是它以语言为基点，是一个语言学科。相比之下，以拉波夫为代表的社会语言学有明显的边缘学科特征，而且范围较小。还有人认为，"文化语言学"与其说是一门新"学科"，不如说是一种影响着语言学各分支领域的"思潮"（姚亚平，第三届文化语言学研讨会）。文化语言学之外的学者在"分"与"合"的问题上也意见不一，还有一部分人主张少谈些"玄学"，多拿出些"干货"。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关于学科界限的的争论还会继续下去，它将促进认识的深化和学术的繁荣。作为形式主义语言学对立面的语言与社会文化研究将逐渐壮大并提高其地位；统括在语言社会文化研究范畴之内的各学科概念将在明确自身性质的过程中，逐渐、自然地实现合并与分化。这些学科自身的系统化、规范化，

也将有助于其地位的提高。在此过程中，"原型"（prototype）或"范式"（paradigm）的确立似很重要。赫德森曾经指出，在解决社会语言学概念零散、模糊的问题时，宜使用建立"原型"的方法（1980：231—234）。人们虽很难对"语言"和"方言"之间的界限作出明确的概念解释，但不难确定典型的"语言"和"方言"。这一思路也可借用于学科界定。学科的"边缘"不清属自然，然而"中心"则须明确。我们现在的问题主要是中心不清楚。当前更有效的工作也许不是硬性划分学科疆界，而是更加明确社会语言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研究到底有哪些研究内容、理论和方法上"原型"或"范式"。例如，拉波夫对城市方言的研究已经确立为"拉波夫范式（或模式）"（the Labovian paradigm），与其相补充的是米尔罗伊的"社会网络"范式。其他社会语言学范式还包括伯恩斯坦的"复杂—局限语码"研究、甘伯兹等的"民族会话方式学"研究等。我国现在的范式性研究还不是很多。在范式明确之后，学科自身的发展和学科之间的比较便较为容易；在核心明确的情况下，边缘地带有"共用电子"式的交叉也不足为怪。笔者个人以为社会语言学与文化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学会趋向于"分"，而"言语交际学"、"交际语言学"会包容在社会语言学范围之中。

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我国至今还没有一个专门刊载狭义社会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刊物。《语文建设》可说是最"社会语言学"的，但其内容主要是语文规划，文章篇幅也有限。它虽能提供较多学术动态的信息，但难以承载较有分量的调查报告或理论探索。其它刊物或是综合性的，兼顾各宏观语言学分支领域（如《语言文字应用》），或者受到语种局限（如《民族语文》）。

2. 学习与创新

与学科的界定问题相关的是学习与创新的关系。目前我国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兼具学习和创新意识。前面译介成果便体现了学习意识，有些"舶来品"在中国的环境中得到应用和检验，如沙平

(1991)对“配对变语”实验方法的尝试。同时，有相当一批学者在自觉地寻找新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带有民族文化特性的问题。上述“语言与文化”研究所呈现的多样性以及许多新学科概念的提出便充分显示了这种创新意识。

不过，我们的学习和创新都很不够，总的情况象是外语界介绍较多而创新不足，汉语界学者创新意识可敬而成果有待鉴定。从目前的发展阶段来看，对现有成果的批判性学习是更突出的问题。这既体现在对国外的成果引进、吸收和检验不够，也体现在对国内传统和当代成果缺乏挖掘和关注，因而时常出现“各吹各的号”和“新瓶装旧酒”的情况，大批智慧力量不是用于“接力赛”，而是消耗在同一“起跑线”上。例如，第二次社会语言学会议关于言语交际的行为和原则的文章中，有 7 篇涉及交际中的合作和礼貌问题。这 7 篇文章中，参考了陈望道先生《修辞学发凡》和西方有关语用学理论的各有两篇，其中有一篇以陈望道关于说话写作要同“题旨情境”相适切的观点为总体框架，对“适切”性的内容和方法作出种种分类；另一篇明确地借用了西方格赖斯合作准则为理论框架，分析汉语会话中的“数量准则”。其余几篇也涉及“适切”(“得体”)、“简洁”(“简括”)等原则，术语和分类不一但又没有实质性区别。有篇关于“礼貌原则”的文章，从中文参考书目上看可能借鉴了利奇的“礼貌原则”，但文中既没有明确的概念出处，也看不出哪项是作者的独特贡献。还有一篇文章提出，研究言语行为时“不适合套用西方的言语行为理论和方法(如 J.L. Austin 的“言语行为三分说”)，而是要根据交际汉语的特点，把研究重点放在带共同性的言语行为基本方式上以勾勒其动态系统的结构模式，但也不忌讳在阐述过程中采用同 Austin、J. Searle、H. P. Grice 等人的观点部分契合的某些个提法。”此言费解。如果研究的是带共同性的问题，如果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深化认识，怎么会有“忌讳”问题？上述西方理论是否的确不适合汉语？如果真的不适合，原因何在？这些问题都需要讨论。笔者个人以为，先入为主的“不适合”与盲目照

搬一样无益学科发展。批判性的学习是创新的基础，更高的创新有赖于与现有成就更深层次的对话。在这方面，也许还需要更多的跨学科合作。

3. 材料、方法、理论

社会语言学的任务是探求语言现象与社会的关联，在描写的基础上加以解释。在讨论"描写"与"解释"的功能时，总要涉及到材料、方法和理论之间的关系。在此问题上大致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观点认为，社会语言学的问题是缺少理论概括。它从形式主义语言学的局限中走出来，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满足于"蝴蝶标本"式的材料采集。这种采集大多浅尝辄止，既不在标本本身描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考究，也不在标本与标本之间进行联系比较，从而做更高层次的概括。它描写有余而概括不足，强于实证而穷于立说，求其然而不求其所以然。由于社会群体语用变异的无限性，蝴蝶标本的收集便在时间和空间上无限延伸，而这种延伸并不能自然而然地生产出理论系统。没有理论，就没有材料（申小龙，1991：结语）。

第二种观点较为普遍，认为我国社会语言学研究最缺乏的是材料的积累，是扎扎实实的田野调查。社会语言学首先是一门描写的学科，一门吃苦的学科，而不是安乐椅上坐而论道的学科。那些急于立论、急于成派的心理实际上反映了一种草率轻浮的学风。如果大家都关在书斋里"内省"或在文本之间抄抄写写、搬搬运运，那还有什么社会语言学？对于材料收集者来说，"标本"就是标本，但是对以后的分类学家来说，标本是建立理论的基础。没有材料，就没有理论。

第三种观点是，我国社会语言学目前的首要问题是研究方法。正如毛泽东所说，要过河，首先要解决桥和船的问题。有了方法，就好比过河有了桥和船（祝畹瑾，1992：第二章）。没有方法，对于材料的描写往往是片面、主观的，分析往往是不科学、不系统的，因

而也无法概括出具有说服力的理论概念和模式。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方法的建设在现阶段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方法直接影响到材料描写的科学性和理论解释的有效性。社会语言学的“方法”有“材料采集”和“材料分析”的类型之分以及“路子”(approach)和“技巧”(technique)的层次之分。“路子”可为定量或定性,技巧有“问卷”、“访谈”、“快速隐匿观察”、“配对变语”、“语义鉴别”等具体操作方法和程序。无论从哪方面看,我们对方法的掌握都很不够。表一显示了三届全国社会语言学研讨会论文的语料采集和分析方法:

	总数	调　　查	文本分析	一般举例
第一次会议	39	26(66.67%)	5(12.82%)	8(20.51%)
第二次会议	34	12(35.2%)	11(32.35%)	10(29.41%)
第三次会议	27	3(11.11)	6(22.22%)	18(66.67%)
总　　计	100	41(41%)	22(22%)	28(28%)

表二、三届社会语言学研讨会专题研究论文的语料来源和处理方法

表二排除了宏观理论探讨的文章和“文化语言学”专题研究论文,因而是较“纯”意义上社会语言学专题研究的文章。凡是文中有通过调查得来的活语料的,无论比例多少都归在“调查”类;以文本(主要是文学作品,也包括辞典、报纸)为主要材料进行立论的归在“文本分析”类;没有系统语料来源的归在“一般举例”类。在最后一类中,作者多就一个专题对语言现象进行分类性描述或分析,论据的随意性较强,包括作者经验中的零散语言现象(如某方言中的某些词汇)、名人或凡人轶事,以及作者根据语感编织的句子。可以看出,活语料虽比例最大(41%),但相对于研究内容,文本分析和一般性举例文章相当高。第二次会议有关“言语交际和职业

语言”这一微观领域的9篇论文中,4篇用了真实的活语料,3篇用了文本语料,2篇是概述性的。

在调查类当中,定量研究高于定性研究,但“定量”技巧的级别和“定性”的深度都有限。下表显示了调查类研究的方法:

	总　数	定　　量	定　　性
第一次会议	26	16(61.54%)	10(38.46%)
第二次会议	12	7(58.33%)	5(41.67%)
第三次会议	3	3(100%)	0(0%)
总　　计	41	26(63.41%)	15(36.59%)

表三、三届全国社会语言学研讨会专题调查类论文的研究方法

定量分析占调查类总体的60%以上,但它们几乎都没有超出百分比这一对材料本身进行描述的“描写性统计”方法。使用“推理性统计”方法(根据材料本身的数字分析,对更大范围的群体作出推理、预测)的论文仅有一篇。定性调查中较常见的是对调查对象就某个语言现象(如某类词或发音)进行询问,深入的调查或案例研究还不多见。

上述现象的原因除了“吃苦精神不够”、“经费短缺”等非学术因素之外,还有方法的欠缺。在西方,方法论的讨论已经相当深入,例如米尔罗伊(1987)的新著《自然语言的观察与分析》就对众多社会语言学分析技巧作了批判性的分析评价。在我国,数学、统计学、计算机等知识和技能的缺少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社会语言学者进行定量研究能力,使我们很难超越材料本身而进行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的抽象和概括。同样,除一部分民族语言和方言学者外,大部分人缺少人类学等学科定性方法的训练,因而相当一部分“定性”研究仍很表面化。如果说西方的社会语言学同时注重材

料的采集和分析，那么我们似乎偏采集而少分析；如果说西方的研究较多地注意“描写性”与“推理性”分析的区别，那么我们的分析可说尚未进入“推理”阶段，仍在“印象”和“描写”之间徘徊。作了这番方法的考察之后，对于目前理论建设中多宏观学科设想，少微观领域新概念、新模式的现象，我们便不难理解了。

有人认为，我国语言学最大的敌人是与“人文主义”相对的“科学主义”。下个世纪，我国语言学将实现从“描写型”到“人文型”的转变。精确化的技术性分析会使人们忽略语言中的人文性。此见虽具洞察力，但不一定适用于当前我国的社会语言学。对此特定学科的特定发展阶段来说，主要问题是“科学不足”而非“科学主义有余”。历史有着自己的发展规律，从“前科学”、“科学”、“科学主义”再到“人文主义”的发展过程或许有某种必然性。西方也在对“科学主义”进行批判性反思，这种反思较为深刻，因为它是建立在对于批判对象的充分了解之上的“局内人”的反思。如果在尚未充分掌握这些描写工具时就站在“局外人”的立场笼而统之地进行批判，那就会将孩子连洗澡水一起泼掉。对于“客观”的描写方法，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地学。只有“进得去”，才能“出得来”，而只有进去后出来的“人文主义”才可能是深刻的。当然，在有人已经“出来”之后，我们的“进去”应更加清醒。再者，学科与学科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有相互渗透和影响的作用。无论是科学的还是人文的方法，都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认为所有学科、所有民族都循着完全相同的轨道“单线进化”的观点是简单肤浅的；认为“中国的人文主义”与“西方的科学主义”各行其道的“双线平行进化”观点同样是简单肤浅的。从长远的、整体的角度看，我们无疑应以研究问题为中心，然而在现阶段，只有将方法的建设提高到本体论的高度，才能使我国社会语言学有理论解释上的新突破和材料描写上更有效的积累。

三、结束语

要使我国社会语言学研究更上一层楼，本人有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加强国外社会语言学的介绍工作。有组织、有计划、有选择地翻译一批重要成果；加强与国外的资料和学术活动交流，促进我们对国际发展动向的了解。

第二，加强研究方法的建设。开设研究方法和技能课程，组织有关培训。统计、计算机、研究设计、调查方法等应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生的必修课程。在缺少有关语言学教员的情况下，可安排学生通过其他渠道（如综合大学的其他社会科学系、所）学习有关技能。

第三，提倡和鼓励深入的专题研究。好的专题研究应有这样一些特点：有分析地借鉴或了解现有的本专题成果或相关专题研究成果；有扎实系统的材料收集和分析；在分析的基础上对语言现象作出解释或提出理论设想。

第四、加强跨学科交流与合作，包括语言学内部各分支领域人员的交流合作，以及语言学与相关学科之间的交流合作。

第五，从语言学的基础教育开始，重视人才的多语言、多文化修养。大学外语专业的学生应设汉语与中国文化必修课（北京外国语大学语言所最近在研究生培养中增设了这项内容，值得借鉴）。汉语专业学生的外语成绩不应低于其他非外语文科专业学生的平均水平。

第五，设立专门的社会语言学学术刊物，提供研究和讨论的园地，特别是刊登好的"范式性"研究；分类编辑有关成果的计算机检索软件和光盘，为学科向纵深发展创造条件。

20 世纪 80 年代，社会语言学在中国起步并有了迅速的发展，这一新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还有待于更多的跨学科合作、更系统的方法建设、更有效的借鉴和更实在的创新。这一切都要依靠广大学者的努力，特别是跨世纪的中青年一代的努力。

主要参考文献：

《澳门中国语文学会学报》，语丛 第三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专辑，1992。

北京市语言学会编，《新词语词典》，人民邮电出版社，1993。

毕继万，西方 CP 和 PP 与中国汉人的礼貌原则，第三届全国语用学研讨会论文，1993。

陈恩泉主编，《双语双方言》(一)，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

《双语双方言》(二)，彩虹出版社，1992；

《双语双方言》(三)，汉学出版社，1994。

陈建民，《语言文化社会新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

陈建民、谭志明主编，《语言与文化多学科研究》(第三届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

陈松岑，《社会语言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陈原，《语言与社会生活》，三联书店，1980；

《社会语言学》，学林出版社，1982；

《社会语言学专题四讲》，语文出版社，1988；

《社会语言学论丛》，湖南出版社，1991；

《语言和人——应用社会语言学若干探索》，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陈章太，关于普通话与方言的几个问题，《语文建设》第 4 期，1990；

论汉字简化，《语言文字应用》第 2 期，1992。

曹志耘，《广告语言艺术》，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戴庆厦主编，《语言关系与语言工作》，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

《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关系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

《社会语言学教程》，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

戴昭铭,繁体风、“识繁写简”和语文立法问题,《语言文字应用》第1期,1992;
宋永培、端木黎明,序,1993;
语言与世界观,第三届文化语言学研讨会论文,1994。
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高一虹,生产性双语现象考察,《外语教学与研究》第1期,1994;
“咨询员中心”与“来话者中心”:两种电话心理咨询模式及其语篇特点,《语言文学应用》第3期,1995。
顾亦瑾、吴国华,《语言与文化:俄语语言国情学概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
顾曰国,礼貌、语用与文化,《外语教学与研究》第4期,1992。
郭熙主编,《汉语新语语汇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
赫德森,《社会语言学》,卢德平译,华夏出版社,1989;丁信善等译,中国科学出版社,1990。
胡明扬等,《北京话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
胡文仲主编,《跨文化交际与英语学习》,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跨文化交际学选读》(英文版),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
《文化与交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李达仁、李振杰、刘士勤主编,《汉语新词语词典》,商务印务馆,1993。
李英哲,双语双方言教育、双文制度及教育现代化,陈恩泉主编,1994。
李行健主编,《新词新语词典》,语文出版社,1989。
刘焕辉、陈建民主编,《言语交际与交际语言》(第二届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江西高校出版社,1993年。
刘焕辉,《言语交际学》,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
《交际语言学》,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
刘虹,《现代汉语会话结构》,博士论文详细摘要,上海外语学院,

1990。
刘润清，关于 Leech 的礼貌原则，《外语教学与研究》第 2 期，1987。
潘文国，80 年代我国语文与文化的研究，陈建民、谭志明主编，1993。
钱冠连，《美学语言学》，海天出版社，1993。
曲彦斌，《中国民俗语言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
申小龙，中国文化语言学论纲，《北方论丛》第 5 期，1988；
《社区文化与语言变异——社会语言学纵横谈》，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听话听音察世态——沪上流行语汇与海派文化的发展，《人民日报》1 月 20 日，1995。
什维策尔，《现代社会语言学》，1977，卫志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史金波、白滨、赵丽明主编，《奇特的女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
史有为，汉字辩证四题，《语文建设》第 8 期，1992。
宋永培、端木黎明，《中国文化语言学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苏金智，多学科合作的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第三届社会语言学讨论会综述，《语言文字应用》第 3 期，1992。
苏培成，1992 至 1993 年的现代汉字研究，《语文建设》第 5 期，1994。
苏新春，《文化的结晶——词义》，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
田惠刚，汉字简化质疑，《语文建设通讯》第 6 期，1993。
特鲁杰，《社会语言学：语言与社会导论》，谭志明、肖孝全译，1983，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周绍珩译，商务印书馆，1992。
逄永顺，称呼语及其使用，转引自祝畹瑾，1993。
王得杏，《社会语言学导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
王均，祝贺第三届双语双方言研讨会隆重举行，陈恩泉主编，1994。

王开扬，汉字优越诸说献疑，《语文建设》第 2 期，1992a；
论研究汉字的立场、方法和学风，《语文建设》第 8 期，1992b。
王宁，汉字的优化与简化，《中国社会科学》第 1 期，1991a；
论汉字简化的必然趋势及其优化原则，《语文建设》第 2 期，1991b；
再论汉字简化的优化原则，《语文建设》第 2 期，1992。
王振亚，交往能力与外语教学，胡文仲主编，1994。
伍铁平，《语言与思维关系新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伍铁平、范俊军，评申小龙部分著作中的若干问题，《北方论丛》第 2 期，1992。
谢俊英，试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考察汉语人称代词“您”的产生和发展，刘焕辉、陈建民主编，1993。
熊忠武主编，《流行语词典》，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
徐志诚，汉语亲属称谓的面称与叙称，《语言·社会·文化》，1991。
徐静茜，从《红楼梦》的对称看当时的社会文化，陈建民、谭志明主编，1993。
许国璋，《许国璋论语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
延边大学编委会编，《双语双文化论丛》(一)，延边大学出版社，1990。
姚小平，《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姚亚平，《文化的撞击——语言交往》，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
《红楼梦》称呼的特色及其原因，刘焕辉、陈建民主编，1993。
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于根元，普通话与方言问题学术讨论会上的总结发言，《语文建设》第 4 期，1990。
于根元主编，《汉语新词语(1991)》，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
詹伯慧主编，《第二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0；

《语言与方言论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张公瑾,文化语言学的性质和任务,陈建民、谭志明主编,1993。
张清常,《胡同及其他——社会语言学的探索》,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
赵杰,《现代满语与汉语》,辽宁民族出版社,1993。
赵丽明、宫哲兵,《女书——一个惊人的发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赵丽明,《中国女书集成》,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
《女书与女书文化》,新华出版社,1995。
周庆生,傣语亲属称谓变体,《民族语文》第4期,1994a;
当代社会语言学鸟瞰——中国、西方、亚洲和原苏联,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第六届年会论文,1994b。
周有光,《新语文的建设》,语文出版社,1993;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和发展问题》,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
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郑定欧主编,《广州话研究与教学》,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
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编,《中国少数民族双语研究论集》,民族出版社,1990。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社会语言学研究室编,《语言、社会、文化——首届社会语言学学术讨论会文集》,语文出版社,1991。
祝畹瑾编,《社会语言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著,《社会语言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称呼研究小议,刘焕辉、陈建民主编,1993。
朱广祈,《当代港台用语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
佐斌,面子与脸——一项关于中国人典型心理的初步分析,《社会心理研究》第1期,1993
佐伊基,《社会语言学演讲录》,刘明霞等译,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89。

Fang, H. & Heng, J.H. 1983, Social Changes and Changing Address Norms in China. In *Language in Society*, 12:495--507.

Hudson, R.A. 1980, *Sociolinguistics*. Cambridge: CUP.

Milroy, L. 1987, *Observing & Analyzing Natural Language-A Critical Account of Sociolinguistic Metho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Scotton, C.M. & Zhu Wanjin, 1983, Tongzhi in China: Language Change and Its Conversational Consequences. In *Language in Society*, 12:477—494.

Zhou Qingsheng, 1993,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in Tai Kinship Terminology. In *The South East Asian Review*. Nos. 1 & 2.

Zhu Wanjin & Chen Jianmin, 1991, Some Economic Aspects of the Language Situation in China. In *Journal of Asian Pacific Communication*, 2 (1):91—101。

我国宏观语言学部分学科的发展概况

王福祥

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语言学随着社会交际的需要而不断发展。当今世界，人们交往日益频繁，语言学研究也从微观语言学的狭小圈子里走出来，把研究视野扩展到与社会、文化、经济相关的各个领域，从而出现了许多新的语言学科。下面就笔者所接触的六个学科做一简要的概述。

一、话语语言学

话语语言学的兴起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话语语言学的理论基础是本世纪初奠定的。在这方面，布拉格功能学派的语言学家们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1926 年 10 月捷克语言学家 V. Mathesius 创立了"布拉格语言小组"，后来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功能语言学派，成为世界上三大结构主义学派之一。除了捷克和斯洛戈克语言学家外，参加这个组织的还有一些其他国家的斯拉夫语言学家。布拉格学派学术思想的先驱是 F. de Saussure，同时也深受俄国莫斯科学派、彼得堡学派和喀桑学派的影响。1929 年，在布拉格召开的第一次斯拉夫语言学家代表大会上，该学派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学术思想纲领。他们认为语言的基本功能是用作交际的工具；语言本身是一个功能体系，是一个表达手段的体系；语言是在一定的社会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研究语言一定要同人们交际的具体语言环境

联系起来，同社会文化联系起来。他们不仅重视分析语言的结构形式，也极重视研究语言结构形式所表现的内容。在普通语音学、音位学、语法学、功能修辞学等研究领域里，他们提出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见解，如音素的区别性特征的理论、句子的实际切分理论、语言规范的理论等。在话语语言学方面，布拉格学派的贡献主要有两点：

（一）语言分析不应局限于研究句子结构。他们提出要研究连贯言语(связная речь）的结构，并提出话语学说。所谓"话语"(высказывание)是指一个人在具体的时间、空间环境里，为了达到某一具体的目的讲出的话，是语义完整、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言语单位。F.Daneš 认为，"一篇话语可以看成是一条(最小的)表述链(也就是说，是一条符合特定上下文和特定情景的句子链)。"(论话语结构的语言学分析，《国外语言学》，1986.1)

（二）Vilém Mathesius 创立的句子实际切分理论。他提出："有必要把句子的实际切分同句子的形式切分区别开来。如果形式切分是从语法要素的角度研究句子成分的话，那么句子的实际切分就是研究句子以何种方式与上下文的具体情境发生联系，而句子也正是在这种具体上下文的基础上形成的。"(关于句子的所谓实际切分，《话语语言学论文集》，1989 年)俄国语言学家 B.B. Виноградов 高度评价了实际切分理论。他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已经有人尝试摆脱赤裸裸的形式—逻辑的窠臼来研究这类语言现象了。譬如捷克语言学家 V. Mathesius 曾经主张把句子的一般形式—语法分析即结构分析和实际切分(АЧ)区别开来。实际切分是揭示该句子在相应上下文或语境中的直接、具体的意思。"同时，他还指出实际切分理论对于研究修辞学、对于深刻理解俄语各种表情手段(其中包括词序)是会有很大帮助的。(见苏联科学院《俄语语法》，第二卷，上册，序言，1954 年)

V.Mathesius 创立的句子实际切分理论具有极大的应用价值和重大的理论意义，使句法研究摆脱传统语法学观念的束缚，发展

为现代理论语言学中的一门新学科，为句法研究开拓出一个新领域——实际切分句法学。此外。应用句子实际切分法分析词序变化、研究句子组成成分的交际功能及句子的各种交际结构、分析句子与上下文及语境的关系，必然会推动对连贯性话语的研究。实际切分法在探索连贯性话语构成的内部规律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现在语言学家们关于词序的变化是受上下文和语境制约而不是"自由"的观点、关于句子有受上文制约与不受上文制约的结构的认识、关于句子交际结构类型的分析、关于连贯性话语"T—R"链线性扩展规律的发现，都与实际切分理论有密切关系。

早在30年代，英国著名语言学家J.R.Firth就提出要在语境中研究言语的意义，研究形式与意义的关系。他认为，一个句子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中才有意义。J.R.Firth及其追随者们都十分重视研究语句之间、句子与上下文之间、言语与语境之间的关系问题。特别是伦敦学派的代表人物语言学家M.A.K.Halliday提出的话语接应理论对研究句际关系和句际连接手段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在他与R.Hasan合著的《英语中的话语接应》(《Cohesion in English》, London: Longman, 1976)一书中，他们提出五种英语句际接应关系：1)所指(reference)；2)替代(substitution)；3)省略(ellipsis)；4)连接(conjunction)；5)词汇接应(lexical cohesion)。这本著作影响很大，不仅揭示了英语语句之间的内在联系，对话语语言学的发展也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欧洲，话语语言学恰恰是发端于研究句际关系及句际衔接手段，如词语重复、代词照应、同义词对应、情态词语关联等。同时也十分重视研究语句与语境及上下文之间的关系。

俄语话语语言学开创于1948年。在这一年，著名语法学家Н.С.Поспелов教授发表了两篇后来被视为俄语话语语言学奠基作的文章：一篇是《复杂句法整体及其主要结构特征》(《Доклады и сообщения Институт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АНСССР》, 1948, вып. 2)，另一篇是《现代俄语中的复杂句法整体问题》(《Ученые

записки МГУ», 1948, вып. 137)。在这两篇文章中，他提出并全面阐述了关于“复杂句法整体”的学说。他认为，客观事物、现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句子与句子之间也同样有着紧密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因此“对语言学家来说，可能也应该把语法句子理解为在连贯独白言语的组成之中，与其周围的上下文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之中”，必须把句子看作是整体的一部分，研究句子、分析句子不能脱离开它的上下文。他提出：通常不是句子而是由一组句子构成的复杂句法整体，才是连贯性、独白性言语的实际句法单位。只有这种复杂的句法整体，才能表达一个复杂完整的思想，并在上下文中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是单个句子所没有的。俄语话语语言学从创立时起，就形成一个特殊的学派，它主要研究大于句子的言语单位——复杂的句法整体（后被称作“超句统一体”）。

同年，И. А. Фигуровский 发表了《从单句句法到话语句法》（《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школе》，1948，№3）一文，主要研究句际之间语义上的联系及句际联系的语法表现手段。这篇文章对推动俄语话语语言学的发展起过很大的作用。1961 年他的专著《全文句法与学生笔头作业》（Учпедгиз, М.，1961）问世。这本书主要内容就是分析句际关系与句际连接手段，并把理论与实际应用结合起来。不过，他把独立句子之间的关系同复合句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完全等同起来，并依照并列复句和主从复句的分类原则来确定句际关系的类型。他还分析了词语重复、代词、动词形式等句际衔接手段的作用及使用特点。从 И. А. Фигуровский 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俄语话语语言学开创的初期还未能摆脱传统语法学的影响。在这一时期，语言学家们研究的主要内容基本上都是有关话语语法方面的问题：句子的实际切分、词序问题、句际关系的类型、句际连接手段的发展与描写、超句统一体的结构特征等。

从本世纪 50 年代到 60 年代上半期，话语语言学的发展比较缓慢，还没有引起各国语言学家的足够重视。因为当时，欧美各国

的结构主义理论正方兴末艾，接着美国语言学家 N.Chomsky 的生成转换语法理论又风靡世界，成为语言学家们最热门的话题，纷纷研究各自语言的生成转换问题，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问题。而这一时期，研究话语语言学的学者们还处于孤军作战的状态：语法学家不了解心理学家研究的成果，俄国学者不了解欧美语言学家的研究情况。

从 60 年代下半期开始，特别是到了 70 年代，话语语言学才逐渐形成起来并有了较快的发展。在这方面，德国语言学家们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话语语言学”(Textlinguistik)就是德国语言学家 H·Weinrich 提出来的。1973 年出版了两本主要的著作：一本是 W.U.Dressler 写的《话语语言学导论》(Tübingen, 1973)，另一本是 S.J.Schmidt 写的《话语理论》(München, 1973)。1974 年又有两本专著问世：一本是 R. Harweg 撰写的《话语语言学》(Stuttgart, 1974)，另一本是 H. Weinrich 倡仪编写的《话语语言学大学讲义》(F.a.M., 1974)。德国语言学家们对话语语言学极为重视，认为：它是最有成效的语言研究的前沿，它为语言学开扩了研究的视野，它打开了一个新的领域。他们把话语语言学看成是一门研究正确交际的科学。罗曼语学者 H. Weinrich 甚至认为“语言学只可能是话语语言学”。

在这一时期，俄语话语语言学有了更大的发展。据 С.И.Гиндин 的统计从 1948 年到 1975 年发表和出版的有关话语研究方面的文章和论著有 700 篇(本)之多。(见《Советск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 текста (Некоторые проблемы и результаты 1948—1975)》，《Известия АН СССР. Се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языка》，т. 36, № 4, 1977) 话语语言学成为许多学术讨论会的重要议题。1968 年在德国的康斯坦茨曾举行过一次话语语言学专题讨论会。此后，在俄国召开了多次学术讨论会研讨话语语言学问题。在 1970 年召开的全俄第七次大学校际日耳曼—罗曼语语言学报告会上，专门研讨了大于句子的言语单位问题，分题讨论会的名称就

是："句子与更高层次的单位"。1974 年在莫斯科外语师范学院召开了话语语言学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了两本大会的论文集。这次学术讨论会标志着俄语话语语言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会议充分肯定了话语语言学的独立学科地位。话语语言学也是 1975 年全俄第五次心理语言学及交际理论讨论会的一个专题，而 1977 年 1 月召开的大学校际学术讨论会的中心议题是话语与话语分析。为了推动俄语话语语言学的发展，1978 年出版了《国外语言学新动向》第八辑，译介了欧美各国的话语语言学家的论著，内容包括话语语言学概述、话语理论、话语分析等。T. M. Николаева 为此书的出版写了长达 40 多页的前言《话语语言学现状与展望》全面阐述了话语语言学的发展历史情况、研究的内容及性质以及一些有争论的理论问题。在此之前，德国出版了《苏联俄语话语语言学》(Sowjetrussiche Textlinguistik. T. 1—2. Frankfurt. 1976)，共两册，译介了俄语话语语言学方面的论文 26 篇。

80 年代前，俄语话语语言学的研究工作主要分为三个方面：1)研究词序问题，主要论著有：1969 年 Л.М.Лосева 写的《词序是结构独白话语的手段》(Порядок слов как средство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текстов монологической речи. Одесса)，И.Ковтунова 的《现代俄语(词序与句子的实际切分法)》(Современный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Порядок слов и актуальное членени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М., 1976)，还有 1976 年 О. Крылова 与 С. Хавронина 合著的《俄语词序》(Порядок слов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М., 1976)；2)研究超句统一体问题，在这方面最有影响的著作是 1967 年 Т.И.Сельман 的《句法修辞问题》(Проблемы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ой стилистики (на материале немецкой прозы)).Л., 1967)及 1973 年 Г.Я.Солганик 的《句法修辞·复杂句法整体》(《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ая стилистика (Сложное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ое целое)》.М., 1973)；3)研究句际关系和句际连接手段问题，如 Л.М.Лосева 1967 年发表的论文《句际联系研究·段落与复杂句法整体》(《К изучению межфразовой связи (абзац

и сложное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ое целое》,《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школе》, № 1, 1967) 以及 Б.М.Гаспаров 的论文《现代俄语中句子间形式联系的结构》(Структура формальной связи предложений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УЗ Тарту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вып. 347, 1975), 后者按句子成分之间的关系划分句际联系的类型, 这与 И.А.Фигуровский 的观点不同。1980 年 Л.М.Лосева 的专著《话语是怎样构成的》(Как стуроится текст. М., 1980)出版了,这本书全面论述了句际联系及其表达手段,并对复杂句法整体的基本功能类型进行了分析。

80 年代,俄语话语语言学的发展出现了两个明显的趋势:1)话语语言学向分科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独立学科,这说明人们对话语语言学的研究更深、更细,对话语语学研究的内容理解得更全面、更系统。在语法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有 О.И.Москальская 的《话语语法》(Грамматика текста. М., 1981);在修辞学方面有 В.В.Одинцов 撰写的《话语修辞》(Стилистика текста. М., 1980);在语义学方面有两本比较有影响的著作:一本是 1980 年 Г.В.Колшанский 写的《上下文语义》(Контекстная семантика. М., 1980) 和 А.И.Новиков 1983 年出版的《话语语义及其形式化》(Семантика текста и ее формализация. М., 1983); 在话语理论方面有 И.Р.Гальперин 1981 年撰写的《话语是语言学研究的对象》(Текст как объект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 1981) 和 Н.А.Слюсарева 等人写的《话语的一般与个别两个方面的语言学理论》(Аспекты общей и част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 текста. М., 1982)等。2)话语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教学。师范院校的外语系已把话语语言学作为专题讲座纳入教学计划,在新出版的一些语法书里都增加了有关句际联系及手段、超句统一体的概念及结构特征等方面的内容。

80 年代,话语语言学在中国也有了很快的发展,而且从一开始就十发重视把研究工作同外语教学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独具

特色的研究倾向。北京外国语大学从 1980 年开始给学生开设话语语言学讲座，已坚持了十多年。十年来，中国语言学家们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内容主要涉及四个方面：1)句子的实际切分与词序问题；2)超句统一体问题；3)语篇分析问题；4)话语修辞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的语言，有英语、俄语、德语、西班牙语和汉语。在此阶段还出版了一些专著，如本文作者写的《俄语话语结构分析》(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1 年)、《俄语实际切分句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年)、用俄文写的《话语语言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8 年)、《汉语话语语言学初探》(商务印书馆，1989 年)。此外，还有黄国文撰写的《语篇分析概要》(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 年)等。

1989 年王福祥与白春仁合编的《话语语言学论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年)，基本反映了中国语言学家们在话语语言学领域里的部分研究成果和研究方向。1992 年还出版了一本由张寿康和王福祥主编的《日本文章学论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2 年)。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的研究生们把 14 位日本语言学家的 20 篇论文译成了中文，内容包括文章学概论、文章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文章结构问题、段落问题、句子间的衔接与连接词问题等。这本论文集的出版对于我们了解日本语言学家们的学术思想和开展对文章学和话语语言学的研究，都有极大的借鉴意义。1994 年王福祥又出版了《话语语言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这是一本用话语语言学理论分析现代汉语语言材料的著作。此书已被译成日文，不久将在日本出版。

二、语篇分析

长期以来，语言学家们大都重视研究书面语，而忽视研究口语；重视探索书面语的规则与规律，而轻视对日常交际言语运用规则与规律的寻求；重视阅读与写作能力的培养，而忽略口语表达能

力的提高；热衷于研究那些并非人人都关心的语言现象，而每人每天讲的大量生动活泼的话语却极少有人问津。

最早提出语篇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的是美国语言学家 Z. Harris。1952 年他发表了《语篇分析》（Discourse Analysis. - "Language", vol. 28, n. 1, 1952）一文，试图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来分析连贯的口语和书面语，提出要在句子以外继续进行描写分析，把语言研究同文化联系起来。但 50 年代语篇分析并没有发展起来。

60 年代，推动语篇分析的是一些社会学家，如 H. Sacks, E. A. Schegloff, G. Jefferson 等。他们用语篇分析来揭示人们在社会交际中的作用，社会环境对语言运用的影响，探索人们在交际中所遵循的原则。在这同一时期，俄国语言学家，如 Шведова, О. А. Лаптева 等也对口语语言现象进行研究，但主要侧重研究口语句型和各种口语语体的特点。

70 年代以后，从事语篇分析的著名学者有 T.A. van Dijk, G.N. Leech, H.P. Grice, P. Brown, S. Levinson 等。T.A. van Dijk 是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他运用语义学、语用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理论研究话语，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论著，如《话语语法的若干问题》(Some Aspects of Text Grammar, 1972)，《宏观结构》(Macrostructures, 1980)、《语篇语用研究》（Studies in the Pragmatics of Discourse, 1981）等。G. N. Leech 是兰开斯特大学教授，1983 年发表了《语用学原则》（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London），阐述了礼貌对言语交际的重要作用。他提出来的"礼貌原则"(Politeness Principle）和 H. P. Grice 提出来的"配合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是交际中应当遵循的两项重要原则。剑桥大学教授 P. Brown 和 S.C. Levinson 合著的《语言运用中的普遍现象：礼貌现象》（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e: Politeness Phenomena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也对礼貌现象和面子问题进行了研究和分析。他们通过调查英语、墨西哥一种土著语和印度南方一种土著语中的礼貌现象，发现在三种不同文化中，语言里使用的

礼貌现象却十分相近,因此认为这是一种普遍现象。(见刘润清,关于 Leech 的"礼貌原则",《外语教学与研究》,1987.2)

语篇分析,以合乎语法、意思连贯的语篇(discourse)为研究对象,主张突破孤立的句子界限,在更大的范围内对言语进行研究和分析;强调录制大量的谈话录音,以研究发话人与受话人之间的制约关系、言语与语境的关系,探索人际交往所应遵循的准则与规范。

最能体现语篇分析应用价值的,主要有两个方面:谈话分析和完整语篇分析。前者是分析口语谈话,后者是分析口述语篇。

(一)谈话分析

谈话分析(conversational analysis)是 H. Sacks, E. A. Schegloff, G. Jefferson 等社会学家们提出来的,希冀通过对大量现实的录音材料分析,探索支配社会交际的原则和规律,开创了对日常交际言语的理解及规律性的认识。

H. Sacks 认为,一次谈话至少要包括双方一轮发言交替。意义相关的一轮发言交替是对话的基本结构单位。语篇分析主要是研究相邻语对(adjacency pair)的结构特征、意思联系,发话人的交替,话题转换及语言表现手段及交际前提和条件(是否有共同的背景知识、是否遵守意义连贯性原则,是否有主题等)方面的问题。但缺乏对完整的谈话的分析。

语篇分析提出的面子问题、配合原则、礼貌原则都是人际交往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并制约着人际交往的言行。

"面子问题"是 E. Goffman 提出来的。他认为"面子"是人类行为准则之一,渗透于人际行为之中,人的行为都要受到面子的约束。要想自己不丢面子,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伤害他人的面子。所以人们在谈话中往往贬低自己,抬高对方。(Interactional Ritual: Essays on Face-to-Face Behaviour. New York: Doubleday and Company, 1967) P. Brown 和 S. Levinson 把面子分为两种:一种是积极的(positive face),就是希望自己的性格、职业、爱好、穿着

等受到别人的赞扬;另一种是消极的(negative face),就是希望自己的人身、财产、行动等不受他人的侵犯。(见刘润清,关于 Leech 的“礼貌原则”,《外语教学与研究》,198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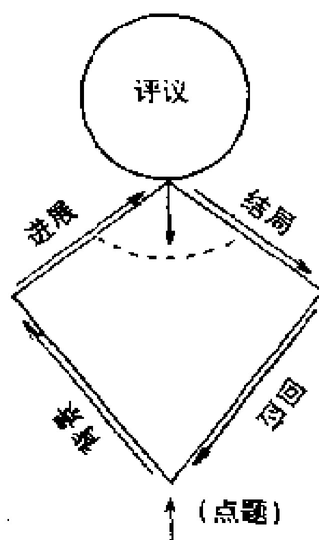
“配合原则”是 H.P.Grice 提出来的。配合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是指一个人的发言要符合谈话的目的或发展方向,在交际中起制约人们理解谈话对方和该怎么回应的作用。配合原则包括四条次则:1)质量次则(the Quality Maxim)——所说的话要真实,要有证据。2)数量次则(the Quantity Maxim)——所提供的信息量要符合谈话的要求,不多不少。3)相关次则(the Relevance Maxim)——所说的话要与前面的话相关。4)方式次则(the Manner Maxim)——说话要简洁、清楚、有条有理、不含糊其词。(见刘润清,关于 Leech 的“礼貌原则”)

“礼貌原则”在 P.Brown 和 S.Levinson 的《语言运用中的普遍现象:礼貌现象》一文中已有专门论述。他们把礼貌行为分为两种:一种是积极的(positive politeness),即满足对方面子上的积极方面的要求(如表扬对方的职业、地位、成就、相貌、孩子等);一种是消极的(negative politeness),即满足对方面子上的消极方面的要求(如尽量不去侵犯对方的人身、财产、自由等)。G.Leech 对礼貌原则提出了六条次则:1)策略次则——尽力减少他人付出的代价;尽力扩大对他人的益处。2)慷慨次则——尽力减少对自己的益处;尽力扩大自己付出的代价。3)赞扬次则——尽力缩小对他人的批评;尽力夸大对他人的表扬。4)谦虚次则——尽力缩小对自己的表扬;尽力夸张对自己的批评。5)赞同次则——尽力缩小与他人的不同意见;尽力夸张与他人的相同意见。6)同情次则——尽力缩小对他人的厌恶;尽力扩大对他人的同情。G.Leech 认为礼貌原则与配合原则是平行的,同等重要的。刘润清认为礼貌原则比配合原则有更大的约束力量,他提出四点理由:第一,讲礼貌是相互配合的前提,若双方粗野无礼,就没有合作可言;第二,如果为了遵循配合原则而必须违背礼貌原则,一般要表示歉意。

但是，如果出于客气而违反配合原则，却不能有任何暗示，如拒绝朋友的邀请时，可以用“无害谎言”。第三，我们经常遵循礼貌原则，但从来不能公开声明；我们常常违反配合原则，但经常声称自己如何遵循它。第四，除了特殊情况（如开玩笑或教训孩子）外，人们常常告诉对方不要遵循礼貌原则，而常常告诉对方一定要遵循配合原则，如讲“别客气，有什么意见提吧”之类的话。最后，他还指出礼貌行为与一个民族的文化和习惯有密切关系：同一个行为在某些国家里很有礼貌，而在另一个国家里就不一定很礼貌。（刘润清，英语语篇分析，《话语语言学论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年）

（二）完整语篇分析

语篇分析不仅分析对话，也对口头叙述的完整语篇进行结构分析。最有影响的学者当推 W. Labov。他把语篇分析扩展到完整的口头叙事。他以口头叙述的故事为分析对象，并提出一个完整故事的自然叙述（natural narrative）通常包括六个环节：点题（abstract）、背景（orientation）、进展（complicating action）、评议（evaluation）、结果或结局（result or resolution）和回应（coda）。这六个环节可用下图表示：



口头叙述开始是点题，接着交待故事的背景：时间、地点、环境、人物等；进展是叙述的核心内容，讲述事情的发生、发展过程；然后是结局，讲述人物的最后命运、事情的最终结果、目的实现或行动失败；评议是在进展和结局两个环节中进行的，评论人物或事件以提高听众的兴趣，增强故事的吸引力；最后是回应，叙述者用一两句话回应主题，使听者对叙述有一个完整的了解。（详细的介绍见：①刘保山，几种“语篇分析”理论介绍，《外语教学与研究》，1983.2；②黄国文著《语篇分析概要》，1988 年）

三、文章学

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西方研究语言，无论是传统语法学还是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都是到句子为止，而东方研究语言从未局限在句子范围之内。如果说话语语言学是以连贯性话语为研究对象，那么文章学恰是一门研究宏观话语（macrotext）的科学。文章学作为研究文章内部规律和读写文章规律的科学是以书面语的全文，即文章为研究对象。文章学在亚洲有着悠久的历史，遗憾的是不为西方所知，而欧美语言学家们只是近年才提出研究全文的问题。为此，简要介绍一下中国的文章学发展情况。

中国是文章大国，也是文章古国。春秋战国时代，文章勃兴。在《尚书》、《论语》、《墨子》中就有许多关于文章写作方面的论述。魏晋时期，系统论述写作的论著主要有曹丕的《典论·论文》和陆机的《文赋》。《典论》是曹丕（187—226）所著，大部已亡佚，今仅存《自序》、《论文》、《论方术》等篇。其中《论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篇文论著作。这篇论文不仅论述了文章的风格、文体等问题，还提出了文章的社会作用，指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赋》是西晋陆机（261—303）所撰，是我国第一篇系统论述文章写作方面（如定旨、构思、择体等问题）的著作，他把文体分为十类，并详

细论述了文章形式和创作技巧问题。

我国最早的文章学巨著当推齐、梁时代刘勰(467? —521)创作的《文心雕龙》。《文心雕龙》(公元501年前后成书)全书共50篇,分上下两编,系统论述文章写作的原则、文体、文章写作的规律与写作技巧等问题,集我国写作理论之大成。《文心雕龙》研究的是广义的文章,不限于文学作品。在《章句第三十四》中,刘勰把言语单位分为字、句、章、篇:“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同时,他还指明了这四者之间的密切关系:“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他一方面认为写作文章没有固定的章法可循,另一方面又强调创作韵文或散文还是有共同的规律可守:“夫裁文匠笔,篇有大小;离章合句,调有缓急;随变适会,莫见定准。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章总一义,须意穷而成体。”同时,又指出:“若辞失其朋,则羁旅而无友;事乖其次,则飘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斯固情趣之指归,文笔之同致也。”(周振甫《文心雕龙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

最早提出“文章学”的是北宋时代的理学家程颐(1033—1107)。他在《近思录》卷二中写道:“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存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近思录》为南宋朱熹,吕祖谦合撰,共14卷,录北宋周敦颐、程颢、程颐等人的言论600余条。宋代还出现了不少论述文章写作的专著,如陈骙的《文则》、李涂的《文章精义》、吕祖谦编的《古文关键》等。《文则》是一本文章学理论著作,也是我国早期的修辞论著之一。该书主要内容涉及文章章法、技法和修辞。书中归纳出三种文章结构方式:总一分式,分一总式和总一分一总式,归纳出十种比喻修辞:直喻、隐喻、类喻、诘喻、对喻、博喻、简喻、详喻、引喻、虚喻。此外,还谈了文章风格问题。

元、明、清时期,文章学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并逐渐形成一门学科进入学堂。主要著述有:元陈绎曾的《文说》,主要讲文章作法:

养气、抱题、明体、分间、立意、用事、造语、下字；明归有光的《文章指南》，也是研究文章作法的，共提出66则，如引事论事则、前后照应则、总提分应则、结束括应则等；明高琦的《文章一贯》，这是一本辑录前人论述文章写作的章法与表达法，包括立意、气象、篇法、起端、叙事、议论、引用等内容；清邵作舟的《论文八则》，主要谈文章作法，包括立意、辨体、布局、修辞等。据张寿康发现的材料，1907年国粹学堂曾立有"文章学"一科，内容包括四部分：文章源流考、文章派别考、文章各体、著书法。这是在学科中立"文章学"之始。(张寿康《文章学导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85年)

中国现代文章学是20世纪初发展起来的。20年代，刘咸炘在《文学述林·文学正名》中把言语单位分为五种："外形(以一篇为单位)纵剖则为五段：一曰字，二曰集字成句(字群在内)，三曰集句成节(句群在内，俗所谓一笔)，四曰集节成章(亦曰段)，五曰集章成篇。专讲一字者谓之文字学，即旧所谓小学；专讲字群、句群者谓之文法，旧校勘家所谓词例也；其讲篇章者则为文章学。"从20年代到40年代之间出版了相当数量的文章学论著，如1920年出版的戴谓清等著的《白话文做法》，谈到了白话文的变迁、种类、构造；1922年陈望道的《作文法讲义》，提出了记载文、记叙文、解释文、论辩文、诱导文五种文体；1924年黎锦熙的《国语文法》，其中第19章谈了语体和段落篇章；1925年龚自知的《文章学初编》和叶绍钧的《作文论》；1926年夏丏尊、刘熏宇合编的《文章作法》。1933年出版了夏丏尊、叶圣陶合著的《文心》；1934年曹冕著《修辞学》，其主要内容还是讲文章的结构、分类及四种文体：描写文、叙述文、说解文和论辩文。1939年汪馥泉撰写的《文章概论》，实为一部名符其实的文章学专著，全书共分五章：文章的要素、文章的性质、文章的构成、文章的体制、文章的材料。1942年蒋祖怡著《文章学纂要》，1943年出版了刘敔瑞的《文章学十讲初稿》。这一时期的文章学论著多为总结前人的写作经验和指导文章写作，文章学与修辞学在内容上互有渗透。

50年代，文章学没有获得明显的发展，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只有少量指导文章写作的书出版。如1951年吕叔湘、周振甫合著的《习作评改》，朱德熙撰写的《作文指导》；1957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作文讲话》，195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章讲话》等。

从60年代起，文章学才再次被提了出来。1961年张志公提出把“探讨运用语言的技巧和效果”的学科叫做词章学。他认为词章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应包括两部分：“一般的语言运用的方法和技巧问题”；“特定的作品形式和作家运用语言的特点。”前者属修辞学研究的内容，后者属风格学研究的范围。（词章学？修辞学？，风格学？，《中国语文》，1961.8）翌年，张志公在《谈词章之学》（《新闻业务》，1962.2）一文中再次强调：“凡是写作（作诗和作文）中的语言运用问题，无论是关乎语法修辞的，关乎语言声律的，还是关乎体裁风格的，都属于辞章之学。”他认为，古人说的“辞章”或者“词章”就是文章，“辞章之学，就是文章之学”。1981年3月，他在北京大学讲授辞章学，内容包括辞章的历史、辞章学的民族特征、章法论、句法论、比兴论、文体论、风格论等。

1962年4月19日《文汇报》发表了林枧敌的《文章学初探》一文。这是一篇极有参考价值的文章，简明扼要地概述了现代文章学的地位、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他认为文章学是语言学中新开辟的一个领域，应列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主要“研究语言的表达方式”。他把文章学研究内容划分为两大部分：理论部分和实际部分。理论部分包括文章学史和文章原理。根据语言表达方式，他把文章原理综合为三条规律：1）衔接律（如实接与虚接、近接与远接、明接与暗接、顺接与逆接等）；2）侧重律（为了使某段或某句重点突出而采用侧重的方法，如侧重段）；3）变化律（段的变化，如倒叙、插叙和追叙；句的变化，如顺装与倒装、主动与被动、肯定与否定、长句与短句、散句与整句；全文的变化，如夹叙夹议、议论和抒情相结合等）。实际部分包括措辞、章法和文体三个方面。

黎锦熙和刘世儒合编的《汉语语法教材》(1962.7)第三篇中提出了句群问题，认为句群是“复合句与段落之间的语言单位”。1979年，吕叔湘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指出：“一般讲语法，到句子为止，句子是最大的语法单位，因此句子只有结构分析，没有功能分类。其实这也是一种老框框。若干句子组成一个段落，句子与句子之间不仅有意义上的联系，也常常有形式上的联系，比如“这”、“那”等指代词，“首先”、“其次”、“总之”等关联词语，这些都应该算是语法手段。”这些问题的提出，为句法研究冲开传统束傅，进入探索连贯性话语打下了基础。1980年《中学语文教学》杂志组织了关于句群问题的讨论。1981年7月在哈尔滨市召开全国语法和语法教学讨论会，通过了《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修订说明和修订要点，决定增补句群的内容。自此，句群的概念正式进入中学教学语法。此后，有许多关于句群的论著出版，如郝长留的《语段知识》(北京出版社，1983年)，吴为章和田小琳合著的《句群》(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曹政的《句群初探》(浙江教育出版社，1984年)，沈开木的《句段分析》(语文出版社，1987年)等。句群研究从一开始就直接面向中学语法教学，这充分说明中国在研究连贯性话语方面强调应用的特点。

80年代是我国文章学蓬勃发展的时期。这门学科最积极的倡导者是张寿康先生。1980年8月，他在《语文战线》上发表了《文章学古今谈》一文，提出要建立一门文章学，“科学地研究文章和写文章的规律”。同年10月在武汉中国语言学会成立会上他又提交了一篇论文《试论文章学研究》，引起了与会者的重视。他在这篇论文中详述了中国文章学的历史，指出文章学是一门科学，应开展文章学的研究工作，既可以研究现代文章学，也可以研究古代、近代文章学；既可以研究文章的共同法则，也可以研究有别于现代的古代和近代的文章法则。他主张把语言研究扩展到章(即超句统一体)和篇，建立科学的文章学，为语文教学科学化提供知识的基础。他认为文章是有规律可循的，并提出了“三律说”：语言

合体律、观点材料统一律和层次律。1985年他又提出了《文章构件论》(《逻辑语言写作论丛》,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把文章构件分为两大类:实体构件,包括总分构件、联合构件、层进构件、偏正构件、实虚构件;联系构件,有联引、呼应、过渡、插入。他的这些学术思想对文章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80年代中国文章学的发展有四个明显的特点:1)古代文章学研究与现代文章学研究工作并驾齐驱,积极构建现代文章学体系,1983年出版了张寿康主编的《文章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以狭义的文章为研究对象,以文章的源流、分类、要素、写作、章法与技法、阅读与鉴赏、文风、风格等方面为体系;1985年蔺羡壁、徐江、李振起等编著《文章学》(南开大学出版社),全书12章,以文资、文意、文情、文序、文境、文色、文声、文势、文术、文品、文体、文病为体系;1985年张寿康专著《文章学导论》(湖北教育出版社)问世;1986年出版了孙移山主编的《文章学》(档案出版社)。于此同时,积极开展了对古代文论的研究工作,1983年出版了王凯符等编著的《古代文章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现代文章学向多学科发展。倡议并有详细内容阐述的新学科及子学科有:文章心理学、文章逻辑学、文章语言学、文章信息学、文章美学;文章写作学、文章阅读学、文章病理学;而文章写作学又衍化出:写作心理学、写作信息学、写作社会学、写作美学等。(详见曾祥芹,1984年文章学研究述评,《语文导报》,1985.5;1985年文章学研究述评,《语文导报》,1985.5;1985年文章学研究的新进展,《文章学通讯》第3期;曾祥芹、洪珉,当代崛起的文章学建筑群(上),《殷都学刊》,1987.4;(下),《殷都学刊》,1988.1)3)理论研究与应用结合。研究文章学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提高写作能力。从这一宗旨出发,中国文章学始终坚持理论与应用结合的原则。应当说,文章学应用方面的著述比理论方面的著作出版的更多,如1984年杨振道、韩玉奎编著的《文章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刘锡庆编著的《基础写作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裴显生主编

的《公文写作概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朱伯石主编的《现代写作学》(人民日报出版社)等。4)理论研究工作与教学结合。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要从小学抓起,而要提高阅读与写作能力的培养需要有高水平的教师。中国不仅重视文章学的研究工作,同时也十分重视文章学的宣传、教育工作。据曾祥芹文章介绍,目前已有十余所高校开设了文章学课程,其中不少是师范院校。此外,还召开了多次全国性的文章学讨论会,举办全国性文章学讲习班,至少有六种杂志开辟了文章学园地,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发表了500多篇文章学方面的论文。这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现象。

文章学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承认和支持。尽管如此,无论是话语语言学、语篇分析,还是文章学都还处在形成阶段。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还没有一致的看法,还有许多问题,如文章学的性质、地位等有待深入研究,还有许多领域,如语义、语用、心理等有待探索。

四、跨文化交际学

跨文化交际学(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又称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它同人类学、社会学、社会语言学、翻译学、传播学,特别是外语教学都有密切的关系。跨文化交际学也是语用学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跨文化交际既指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之间的交际,也指不同民族同一语言之间的交际。也有人认为跨文化交际是泛指一切在语言与文化背景有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我们从对比语言学角度出发,认为跨文化交际学主要还是研究不同民族在跨文化语言交际和非语言交际方面的问题,分析社会习俗、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对交际的影响及可能造成的障碍,研究交际原则与方式及通过外语教学传授异文化知识的途径与方法。

跨文化交际学于本世纪60年代中期兴起于美国。

最初对文化与语言关系进行系统研究的是美国的人类学家们。他们致力研究美洲印第安人的社会与语言，采用实地调查的方法搜集材料，分析不同的文化模式。

人类学家 B. Malinowski 于 1914 年到西太平洋 Trobriand 群岛调查当地的语言与文化。他认为，语言是文化整体的一部分，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工具的体系，而是一套发音的风俗及精神文化的一部分。（见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译），7 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1 年版。）他还提出要根据一定的文化来分析词的功能。

美国的人类学家 F. Boas 是研究美洲印第安人的社会和语言的。他撰写的《种族、语言与文化》主要是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他本人就懂得印第安语的 17 种方言。F. Boas 同他的两个学生 A. L. Kroeber、E. Sapir 及后者的学生 B. L. Whorf 共同创立了人类语言学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Edward Sapir 在他撰写的《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一书中明确提出："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能脱离社会继承下来的各种做法和信念，这些做法和信念的总体决定了我们生活的性质。"他把文化定义为"一个社会做的和所想的是什么"，而语言则是"人具体地怎样思想"。（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21）

E. Sapir 的学生 Whorf 在研究了印第安人的语言与文化后，认为说话人的语言通过语言系统中可能存在的语法范畴和语义类别，决定说话人的世界观，而语言系统是说话人同他的本族文化一起传承下来的，语言即文化。这就是所谓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把语言同文化混为一谈是不正确的，语言是交际的工具，它只能是文化的载体。

早在 40 年代，美国教学法家 C. C. Fries 就曾指出在外语教学中要对文化因素给予足够的重视，他甚至认为，如果不了解文化背

景，连一句简单的话"John is having breakfast" 也不能真正理解。他在《作为外语的英语教与学》一书中指出："为了实际交际，完全掌握一门语言，并做到真正理解，需要对各种句子的使用场合的许多特点作系统的观察和记录。这种系统的观察和记录必须细致入微和富有同情心，其目的既不是为了以自己的做法为依据来衡量对方，也不是为了发现奇特的风俗，而是为了尽可能充分地理解、感受和体验。"(Fries Charles C. 1945. Teaching and Learn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胡文仲:92.1.）

学习外语同学习文化相结合的思想，到 50 年代更加深入人心。在美国以《通过学习外语了解文化》、《语言学习中的文化问题》、《外语、外部世界：处于文化中的语言》、《通过了解文化学习语言》、《讲授文化——为外语教学工作者提出的策略》等为题举办过讨论会，并创造了应用于课堂教学的多种文化教学法。（林毅、张才兰，语言·国情·外语教学，《语言研究集刊》第一辑，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 年）

1957 年 R.Lado 出版了著名的《跨文化的语言学》一书。他是最先提出"跨文化"研究的人。他在该书中专门有一章谈文化对比问题。他认为，形式（form）、意义（meaning）和分布（distribution）（后者指词语可能出现的环境及在实际语境中的使用）构成文化对比分析的三个层次，文化对比可以通过形式、意义和分布三者的关系进行：(1)同一形式，不同意义；(2)同一意义，不同形式；(3)同一形式、同一意义，不同分布"。（Robert Lado, 1957, 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s: Applied Linguistics for Language Teacher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他还指出："学习外语的人有这样一种倾向，即容易把自己的母语和本民族文化形式、意义及分布转移到外语和外族文化中去。" Lado 是美国对比语言学的创始人，也是句型操练的倡导者。不过，他编写的课本绝大部分是语言形式的练习，并没有多少对比文化的内容。（见戚雨村：语言

对比与文化对比,《外国语》,1992.5)E.Hall 被认为是跨文化交际学的奠基人。

1959 年出版了 E.T.Hall 撰写的专著《无声的语言》,打下了跨文化交际学的基础。这本书主要还是探讨非语言交际问题,也分析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问题。他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文化决定"论的思想,是值得商榷的。他认为:"文化是人类生活的环境。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不受着文化的影响,并随着文化的变化而变化,或者说,文化决定人的存在,包括自我表达的方式以及感情流露的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解决问题的方式等等。……正是这些在一般情况下十分明显,习以为常,然而很少加以研究的文化方面,以最深刻和最微妙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行为。"(E.T.Hall, 1959, The Silent Language, Greenwish Conn)(见戚雨村,语言、文化、对比,《外语研究》,1992.2)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是"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文化决定人的存在,包括自我表达的方式及感情流露的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解决问题的方式等"。文化是属于上层建筑,它可以对人的思维方式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不能决定人的思维方式。人的思维方式最终取决于经济基础。

60 年代是跨文化交际学形成时期。在一些大学里开始设置跨文化交际学课程。除了人类学家外,社会学家、语言学家也都对语言与文化关系作深入研究。先后出版一些著作:1962 年出版了 R. T. Oliver 的《文化与交际》(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Springfield, 1962), 1966 年出版了 Smith 等著的《交际与文化》(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Readings in the Codes of Human Interactio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67 年又出版了 I. Parry 的《交际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Huma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1967)

1965 年 N.Chomsky 在他的《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一书中提出区分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他指出:"语言学理论首先注意的是

一个说完全相同语言的语言集团中理想的说话人—听话人，这类说话人—听话人精通他们自己的语言，并且在实际运用他们的语言时不受像记忆限制、精神涣散、注意力和兴趣的转移，以及种种错误（偶然性的或固有的）这样一些在语法上毫不相干的条件的影响"。（乔姆斯基：《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黄长著、林书武、沈家煊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年版第 1 页。）N.Chomsky 所说的语言能力是指说话人—听话人具有的关于自己语言的知识，而语言运用是指在具体环境中对语言的实际使用。他声称转换生成语法就是研究语言能力的。但他所追求的理想的"说话人—听话人"客观上是不存在的。

针对"语言能力"说，D.Hymes 提出了"交际能力"这一概念。他认为交际能力应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1)能分辨合乎语法的语言形式；(2)能分辨实际可接受的语言形式；(3)能分辨得体的语言形式；(4)能分辨一种语言形式的常见程度。交际能力既包括对语言形式的掌握，也包括对与语言使用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因素的了解。（参见海姆斯：《论交际能力》，吴兆颐译，载祝畹瑾编《社会语言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年）

D.Hymes 认为，仅仅学习某种语言是不够的，还必须学习怎样使用那种语言，即必须掌握交际的能力，懂得什么情况下使用何种语言形式和语体。他把他的研究称作"言语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speaking），并把言语活动分解为八种成分，用 speaking 一词的八个字母表示：

(1)S 代表 setting and scene（背景和场合）；

(2)P 代表 participants（参加者）；

(3)E 代表 ends(目的)；

(4)A 代表 act sequence（行为程序）；

(5)K 代表 key（风格）；

(6)I 代表 instrumentalites（媒介手段）；

(7)N 代表 norms(各种规范)；

(8)G 代表 genres(体裁)。

这八种成分的相互作用,就产生了语言交际能力。他指出:在儿童习得语法体系的社会母体里,他还习得其运用体系,关于人称、地点、目的和其他交际方式等——一切交际活动的成分连同关于它的看法和信念。这一些还在会话、演说和标准常规等中发展了语言的序列运用模式。儿童的社会语言能力 (sociolinguistic competence 或广义地说,交际语言能力)就存在于这种习得中。他还主编出版了《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语言:语言学与人类学读本》。

70 年代是跨文化交际学成熟时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跨文化交际成为世界性研究课题。1970 年国际传播学会承认跨文化交际学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并成立了跨文化交际学分会。1972 年在东京召开了第一届跨文化交际学会议,参加会议的有 2000 多人。1974 年在美国马里兰州成立了国际跨文化教育、训练与研究学会并召开了首届会议。

(二)跨文化交际学成为大学里一门重要课程。目前美国已有 200 多所大学开设了跨文化交际学课程。此外,还编写了一些读本,如 P. Bock 的《文化休克:现代文化人类学读本》(1970)、Larry Samovar 和 Richard Porter 合编的《跨文化交际学读本》(1972)、David Hoopes 的三册《跨文化交际学选读》(1972、1973、1974)。

(三)先后出版了一些跨文化交际学方面的理论著述,如 John Condon 同 Fathi Yousef 合著的《跨文化交际学概论》(1975), E. T. Hall 撰写的《超越文化》(1977 年), M. K. Asante、E. Newmark 和 C. A. Blake 合编的《跨文化交际学手册》等。

(四)跨文化交际学的发展推动了外语教学的改革。随着交际法的普及和对语言与文化的深入研究,外语教学专家们认识到:外语教学的最主要任务是培养跨文化交际的人材,只教会学生外语是不够的,还必须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因为在同外国人交往时,除了要正确运用外语外,还必须遵循一定的交际准则、懂得

交际礼貌，而交往上的失礼和失误必然要造成交际上的障碍与误解。语音、语法上有错误，外国人可以理解，而对文化上的错误则难以容忍。因此，在教学中增设所学语言国家概况、社会、历史等课程，在教学内容上增添了对所学语言国家文化、历史、社会习俗等方面的讲解，以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现在美国外语教学协会(American Council o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在其编写的外语教学大纲中把社会文化能力列入交际能力中，这样交际能力就由原来的听、说、读、写四种语言运用能力增加到五种。(详见胡文仲、文化教学与文化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1992.1；戚雨村、语言、文化、对比，《外语研究》，1992.2)

进入80年代以后，跨文化交际学有了更大的发展，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兴趣和重视。除了人类学家外，社会语言学家、社会心理学家、传播学家、语言学家、教学法专家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开展了对语言与文化关系方面问题的探讨。跨文化交际学不仅对外语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翻译学的发展也起了推动作用。

80年代出版的重要著述有：Geert Hofstede 的《文化的后果》(Culture's Consequences: Internati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 1980)、Richard Brislin 的《跨文化交往》(1981)、W. Gudykunst 的《跨文化交际学理论》(1983)、N. Wolfson 的《语言与交际中的说话规则》(Rules of Speaking in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Longman, 1983)、J. Condon 的《关于日本人》(1984)、Michael Harris Bond 主编的《中国人的心理》(The Psychology of the Chinese People, 1986)、Adrian Furnham 和 Stephen Bochner 合著的《文化休克》(1986)、E. D. Jr. Hirsch 的《文化识字》(Cultural Literacy. Boston, 1987)、M. Byram 的《外语教育中的文化学习》(1989)、M. Byram 和 V. Esarte-Sarries 的《外语教学中的文化学习研究》等。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外语教育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在外语教学中，重视文化因素开始较早，但跨文化交际

学的传播则始于80年代中期。在这方面，胡文仲教授起了重要作用。他在研究与传播跨文化交际学方面都卓有成绩。1985年他写了《跨文化交际与外语教学》(《外语教学与研究》第3期)一文，1986年他又发表了《文化差异种种》(《教学研究》，1986.3)及《英语教学中为什么要涉及文化》(《外国语》第4期)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际与外语教学》(《外语教学与研究》，1985.4)。1988年又编写了《跨文化交际与英语学习》(上海译文出版社)，为国内第一本用英语撰写的论文集，1990年他选编的国外著名学者撰写的论文集《跨文化交际学选读》(湖南教育出版社)问世，1992年撰写了《文化教学与文化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1992.1)、《试论跨文化交际研究》(《外语教学》，1992.2)、《文化差异与外语教学》(《外语教学与研究》，1992.4)，1993年又发表了《试论外语教学中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1995.1)。在这些文章中，他全面地介绍了跨文化交际学的历史发展、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内容、外语教学与跨文化交际学的关系以及如何开展跨文化研究等问题。

1989年邓炎昌教授同刘润清教授合写的《语言与文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一书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这本书在推动我国的语言与文化研究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跨文化交际学在我国得到迅速的发展，不仅是因为受到英语教育界的重视，也同其他外语界学者们的积极倡导分不开。近十几年来，在我国各种学术刊物上许多学者发表了倡导开展语言与文化研究方面的文章及研究的成果，约有100多篇，还有许多论著。

五、文化语言学

文化语言学是1985年新兴起的一门边缘学科，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有关这门学科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仍众说纷纭，甚至有关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方法、内容、性质，也有待进一步统一认识。

中国很早就有结合文化研究语言的传统。这个传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通过文学、训诂研究中国社会，从西汉的《尔雅》和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为开端；通过方言调查揭示地区间的文化差异，以西汉杨雄的《方言》为始。这一传统从汉代一直延续到现在。

本世纪30年代，民族学家罗香林、张东荪、徐松石等研究少数民族的语言与文化关系并进行实地调查，徐松石还写出了《傣族、壮族、粤族考》及《粤江流域人民史》。1947年致知书店出版潘懋鼎写的《中国语源及其文化》。他在这本论文集中通过语源考证，研究"中华文化之发轫"、"中外文化之汇流"。他认为，"凭科学方法整理语源，使之表现其文化之背景，诚研究人类思想作用与乎文化活动之出生、成长、发展、变迁之全程之最简捷而有味之方法也。"这是研究词语文化的一本专著。（参看刑福义教授主编的《文化语言学》序及总论部分）

1950年罗常培先生的专著《语言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问世，奠定了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基础，开辟了一条通过分析词语的涵义研究语言和文化关系的新路。这本书的内容包括六个方面：第一，从词语的语源和演变推溯过去文化的遗迹；第二，从造词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第三，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第四，从地名看民族迁徙的踪迹；第五，从姓氏和别号看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第六，从亲属称谓看婚姻制度。

随着宏观语言学的不断发展，随着语言国情教学法和交际性原则在外语教学中广泛应用，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研究语言

与文化关系方面的课题受到语言学界、教学法界越来越多的人士的重视，出版了许多著述，发表了许多文章。1985 年以前这一段时间研究的课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语言与文化——文章有：刘跃武《语言与文化及其他》（载《外语论丛》黑龙江大学，1980 年）、严棉《汉语与文化、同音词、吉利语与禁忌语之研究》（载《北京师院学报》，1982.2）、伍铁平《语言与文化》（载《语文战线》，1983.5）。

在这一时期，有关交际文化方面的著述比较多，也比较集中。文章有：陈章太《反对语言污染，加强语言美教育》（载《中国语文通讯》，1981.1）、张寿康《浅谈礼貌语言兼及您们的用法》（载《语文研究》，1981.2）、刘贯文《略论"语言美"与"心灵美"的关系》（载《语言研究》，1982.2）、伍铁平《礼貌语言中的词汇》（载《语文研究》，1982.2）及《礼貌语言中的语法》（载《语文研究》，1983.1）、任念麒《避讳小议》（载《修辞学习》，1982.3）等。著作有：张应德等《语言美杂谈》（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 年）、刘世俊《语言美讲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 年）、严戎庚等《漫谈语言美》（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 年）。

二、语言与社会——主要著作有；陈原《语文与社会生活》（三联书店，1980 年）及《社会语言学》（学林出版社，1983 年）。文章有：吕叔湘《语言作为一种社会》（载《读书》，1980.4）、徐俐丽《浅析语言的社会功能与培养规范的语言行为》）载《青海师院学报》，1982 年）、伍铁平《语言的社会分化》（载《百科知识》，1984.4）及《语言是社会的一面镜子》（载《现代外语》，1984.2）等。这些著述充分说明社会语言学的发展在我国具有深厚的科研基础。

在这一阶段，研究词语文化方面的成果亦很丰硕，如：王还《建国以来汉语词汇的变化及其原因》（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82.5）、王士元《语言变化的词汇透视》（载《语言研究》，1982.2）、曹广安《词义的社会性与时代性》（载《语文园地》，1983.1）、徐俐丽《试论社会变异与词汇变异》（载《青海师院学报》，1984.1）、陈原

《关于新词的产生及其社会意义》(载《语言研究》,1984.2)、曹静《关于词义的社会性》(载《逻辑与语言学习》,1984.3)等。

在这一时期还有不少研究人名、地名、称谓的文章,如:陈建民《地名小义》(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4)、祁庆富《古代农村公社与地名》(载《地名知识》,1980.2)、李如龙《地名词的特点和规范》(载《中国语文》,1980.3)、黄家教《广东地名词的规范问题》(载《学术研究》,1980.4)、楚庄《姓、名、字、号》(载《天津师院学报》,1980.6)、刘丹青《亲属关系名词的综合研究》(载《语言研究》,1983.4)、陈松岑:《北京城区两代人对上一辈非亲属使用亲属称谓的变化》(载《语文研究》,1984.2)等。

三、语言与民族——这是文化语言学与民族学共同研究的课题。这里着重介绍与语言学相关的内容。文章有:傅懋勣《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家庭和亲属称谓》(载《民族研究》,1980.3),郑贻青《黎族的亲属称谓和人名》(载《民族语文》,1980.3),闻宥《族名小考》(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3)、何星亮《从哈、柯、汉亲属称谓看最古老的亲属制》(载《民族研究》,1983.1),龚佩华《浅谈族称》(载《民族学研究》,1982.3)、徐仁瑶《族名漫谈》(载《民族团结》,1983.3)、刘庆华《满族姓氏述略》(载《民族研究》,1983.1)、俎浚《回族人姓名》(载《民族文化》,1984.4)、赵洪宝《西双版纳傣语地名初探》(载《地名知识》,1984.4)等。

四、方言与文化——这是文化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研究这方面问题的文章有:李行健《河北方言词语对民俗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的意义》(载《唐山教育学院唐山师专学报》,1981.1)、李如龙、陈章太《碗窑闽南方言岛二百年间的变化》(载《中国语文》,1982.5)、伍铁平《论语言融合和社团方言》(载《外国语》,1983.6)、游汝杰、周振鹤《方言与文化史研究》(载《中国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等。

总之,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为文化语言学的兴起与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另外,上述这些研究工作也是我国研究语言与文

化关系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建立文化语言学是1985年提出来的。在这一年游汝杰、周振鹤写了《方言与中国文化》一文(载《复旦学报》,1985.3),文中谈到:“我国境内的语言,据一般的估计有六七十种之多,几乎每一种语言内部都有方言的差异。如果将如此丰富的语言材料和历史悠久、多姿多彩的中国文化结合起来研究,是不是可以称之为文化语言学?它跟德国的人种语言学、美国的人类语言学及拉波夫近年所倡导的社会语言学有所区别,应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边缘学科,应该把中国语言学和文化史研究结合起来,探索语言与文化史的内在联系。”同年秋,陈建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用系还开设了“文化语言学课”。

可以说从1985年起,在我国对语言与文化的研究形成了一个热潮。人们从语言的、文化的、社会的、民族的、民俗的、历史的、现代的,各种不同的角度展开了对语言与文化的研究,不仅研究中国的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也研究外国的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出版了不少专著,召开了多次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同时,就文化语言学的性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也展开了讨论。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跨学科研究的课题越来越广,拓宽了语言与文化研究的视野。文章有:杨希枚《当代语言哲学与人类文化史的研究》(《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6)、吴琦幸《试论文化人类学与训诂学》(《学习与探索》,1986.3)、李如龙《略论语言人类学的一些课题》(《人类学研究》试刊号1986年)、曲彦斌《民俗语言学》(《百科知识》,1986.5)、王运新《语言民族语学例证——哈萨克人东、西、南、北方位概念的形成与发展》(《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3)、熊文华《非语言交际理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指导作用》(《语言教学与研究》,1986.1)、林鹏《人、社会与语言交际》(《汉语学习》,1987.6)、李先焜《中国一个具有丰富的符号学传统的国家》(《江汉论坛》,1990.1)等。

（二）民族语言与文化研究不断发展，为文化语言学的发展、特别是对比文化语言学的发展，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文章有：周政华《瑶族称谓漫谈》（《历史知识》，1985.2）、仲素纯《达斡尔语的亲属称谓》（《语言研究》，1985.5）、斯高琴娃《关于我国民族称谓的探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2）；芈一之《青海姓名探源及若干规律》（《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5.1）、范玉梅《裕固人的姓名》（《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5.1）、朱文旭《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姓氏词的词源结构与等级分化》（《民族语文》，1987.1）、郑宝倩《华夏民族的姓氏与华夏民族的历史发展》（《语言研究》，1987.2）及《论华夏人名的民族特点》（《语文研究》，1987.4 期）；朱琚元《彝语支地名与中国民族地名学》（《彝族文化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李国文《从象形文字看古代纳西族时空观念的形成》（《东巴文化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李炳洋《从苗语词汇看苗族古代文化》（《贵州民族研究》，1987.3）。

（三）文化语言学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不仅发表了大量文章，还出版了不少专著。文章有：黄长著《语言、文化、社会之断想》（《中国语文教学》，1985.4）、余志鸿《汉语的文化历史背景》（《语文导报》，1987.7）、申小龙《语言研究的文化学方法》（《语文导报》，1986.9-10）、《20 世纪中国语言学的历史转折——中国文化语言学论略》（《语文导报》，1987.7）、《论汉语的文化特征与文化语言学方法》（《汉语学习》，1988.1-2）、游汝杰《语言与文化学》（《语文导报》，1987.5-6）、陈建民《文化语言学说略》（《语文导报》，1987.6）、《语言与文化漫话》（《宏观语言学》，1992 年）、邵敬敏《说中国文化语言学的三大流派》（《汉语学习》，1992.2）、《关于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反思》（《语言文字应用》，1992.2）、李先焜《文化语言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语言文字应用》，1992.2）、陈月明《“语言与文化”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汉语学习》，1993.2）等。

1986 年游汝杰、周振鹤在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一书的影响下写出《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年陈建民出

版了《语言文化社会新探》(上海教育出版社)。申小龙有两本专著问世:《中国句型文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和《中国文化语言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1988年12月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语言与文化"学术讨论会,会上提出协作编写一本《文化语言学》,一批中青年学者用了一年时间完成了这部著作,由邢福义教授主编,于1990年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从研究的具体课题来看,既有深度又有广度。文章有:曹树人《北京口语中的委婉词语和委婉表达方式》(《汉语学习》,1985.2)、傅惟慈《浅谈禁忌词语与委婉词语》(《语言教学与研究》,1986.2)、王建华《人名与社会生活》(《语文导报》,1987.9)、周振鹤等《人口变迁和语言演化的关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6.4)、刘云泉《色彩、色彩词与社会文化心理》(《语文导报》,1987.6-7期)、胡明扬《问候语的文化心理背景》(《世界汉语教学》,1987.2)、文秋芳《从社会语言看汉语称呼语的使用规则》(《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7.4)、徐静茜《汉语的"意合"特点与汉人的思维习惯》(《语文导报》,1987.6)、申小龙《从汉民族的时空观看汉语施事句的铺排律》(《语文导报》,1987.9-10)、顾嘉祖《试论语言的吸收、同化功能与民族文化心理》(《外语研究》,1987.3)、邵敬敏《论汉语语法发展的历史趋势》(《语言学通讯》,1989.1-2)、吕叔湘《南北朝人名与佛教》(《中国语文》,1988.8)等。此外,史有为出版了《异文化的使者——外来词》(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王建华写了一本《文化的镜象——人名》(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等。

六、对比语言学

对比语言学是一门新兴的语言学科。虽然在本世纪初就有许多国外学者从事语言对比研究,但对比语言学的形成与发展还是近30年的事。在我国,特别是近十多年来,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随着外语教学和翻译事业的迅速发展,对比语言学也正以前所

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从50年代初起至今,刊登在我国各种杂志和文集中的文章600余篇,其中95%以上的文章都是1980年以后发表的;出版专著13本,其中10本是1979年以后问世的。

1955年在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曾召开过一次以语言对比研究为主要内容的俄语教学研讨会。此后,对比研究再没有更大发展。1991年对我国对比语言学发展的历史来说,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几乎同时召开了两个学术研究会。一个是4月17日在杭州汉语文化学院召开的中外语言文化比较研讨会,会上决定成立中外语言文化的比较学会,会后还出版了《中外语言文化的比较研究》杂志。另一个是4月20日在杭州大学举行的全国俄汉语言对比研讨会。这两次学术研讨会,说明在我国语言对比研究不再局限于语音、语法方面的对比,对比研究已跨出了语言体系之外,积极开展语言文化对比。

1990—1992年出版了三本论文集。第一本是杨自俭和李瑞华合编的《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收入42篇论文,分为五个部分:1)理论与方法,2)语义,3)词、语,4)句子,5)修辞、语用及其他。第二本是杭州大学外语系外汉语言对比研究课题组编译的《语言对比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收入19篇论文,其中15篇文章是翻译过来的,文章作者为各国从事对比研究的著名学者,文章内容涉及对比语言学发展的历史概况、语言对比的理论与方法、已取得的成果及存在的问题。还有4篇是杭大外语系课题组的同志们撰写的有关中国汉德、汉日、汉俄、汉英和英法语言对比研究的综述。第三本是王福祥主编的《对比语言学论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2年),共收入37篇论文,是1983年至1991年期间发表的语言对比研究成果。文章内容有:语言对比的理论与方法、语音语调对比、构词对比、词汇语义对比、语法对比、修辞对比、篇章对比、文化对比、对比与翻译、对比与教学。我国对比语言学近年的发展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一)随着我国同国际交往的日益发展，学习外语的热潮有增无减，外语教学和翻译自然受到特别的重视。为了教学与翻译的需要，开展对比研究，就成了极有意义的课题。对比的语言除汉英、汉俄语外，增加了汉日、汉德、汉法等语言的对比，形成了多语言的对比。

(二)70 年代以前，对比研究多局限在微观研究上，理论研究多于应用研究，而且微观研究也仅限于语音体系和语法体系，很少涉及语义、修辞、篇章、文化等方面的对比。现在对比语言学发展已逐渐由微观研究转向宏观研究。

英汉对比分析评述[①]

高 远

本文根据近五年来(1990—1994)国内九所高等院校公开出版的刊物上发表的英汉对比语言学和语言教学的论文写成[①]。

在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和禁锢之后，语言对比分析在我国开始蓬勃发展起来。自1977年至1989年的13年中间，发表在国内出版的各种刊物上国人写的英汉对比研究的文章达159篇。其中上述九所院校的刊物上发表66篇，平均每年发表五篇。

自1990年至1994年的五年中，这九种刊物共发表英汉对比分析的文章77篇，平均每年发表16篇，数量上有了比较明显的增加。但是如果落实到刊物上，平均每个刊物每年才发表1.7篇，数目又显得太少。似乎可以这样说：英汉对比研究近几年来已取得相当的进展，但仍然比较单薄。

和过去相比，英汉对比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从下面的数字比较中可以看出。

数字的对比显示，概论、综述性的文章增多了。这可能是由于我们对国外对比语言学的进展有了更多的了解和国内学术活动及论著增多的原因。但是，另一组数字的差别更重要，更能显示英汉对比分析在我国的发展变化。这就是语法体系本身的微观的静态的研究文章明显减少，而语言的宏观的解释性的研究文章增多了不少。近30年来，语言的社会功能研究和以Greenberg及Chomsky为代表的语言普遍性研究风靡世界，我国的英汉对比研究也

① 本文的写作曾得到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的赞助，在此谨致谢意。

在紧跟这个大的趋势。

论 文 类 别	1977—1989	1990—1994
概论、综述	7 篇	18 篇
语音	3	7
词汇、语义	9	8
语法(传统方法)	39	18
(系统功能)	1	5
(转换生成)	0	3
修辞	3	1
思维方式与语言表现	1	8
语篇分析	1	2
跨文化交际与语用	1	6
语言普遍性	1	1

本文将搜集到的80篇论文分成理论和方法、语音、语法、词汇和语义、修辞、文化、思维方式和母语迁移、跨文化交际和语用等七个方面进行介绍和评述。

一、理论和方法

对比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主要涉及语言的可比性、比较的内容和怎样比较,这和对比语言学的分类、目的和任务密切联系。从英汉对比研究在我国的现状看,理论内容和方法的问题都还需要深入探讨。

刘宓庆认为,进行英汉语言的对比研究,最基本的是抓住英汉

两种语言的异质，这种异质表现在语音、文字、词语、句法、语段各个层面上，重点是发现两种语言的特点。他认为，应把对比研究向纵深推进，在表层结构、表现法系统和思维形态三个层次上进行。这就需要把握住语言的人文性，并把静态研究和动态研究结合起来。

关于对比的内容，许余龙表述了类似的观点，英汉对比研究既不同于语言的普遍性研究，旨在寻求共性，也不同于语言的类型学研究，旨在寻示特性，而是描述英汉两种语言的异同，特别是不同之处，并将这类研究应用于其他有关领域。也就是说，应该引进系统全面的理论研究，并利用理论研究的成果开展应用研究。

我们认为，关于对比的内容，有必要区分微观和宏观、理论和应用。如果对比是微观的，重点在于语言系统本身的对比。如果对比是宏观的，重点应该是在语篇水平上比较英汉两种语言在某种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使用。理论对比研究和应用对比研究的内容也有其不同之处。根据国内外语言学界，特别是外语教学界的看法，应用对比研究的重点需要放在英汉语的相同而又不完全相同之处，因为这些细微的差别正是学习者的困难所在。

理论框架的选择是英汉对比研究的另一个基本问题。徐烈炯认为我国的对比研究应该向纵深发展，但是对比分析的一个关键问题没有解决。这就是，对比分析应该发展自己的理论，还是借用一般语言学的理论，这个问题不解决，对比分析就很难深入发展。

朱永生从功能学派的角度阐述了英汉对比分析的原则和方法。他也认为英汉对比分析有许多关键问题亟待解决，如对比的理论模型、语言层面、步骤等。他主张从语言系统入手，然后落实到句法和词汇上。他强调了句法研究的重要性，因为句法分析是语篇分析的基础。

英汉对比分析的另一困难是汉语的研究。许国璋先生指出，“从汉语例子着手不多，以解释汉语为目标的更少”，“不首先通晓汉语语言学更是不够”。刘福长认为，在当前条件下，汉语的研究

是英汉对比研究的基础和条件。我国的汉语研究仍囿于规定性的圈内，这就影响了汉语语言学的发展。朱永生强调句法研究的重要性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是汉语语法研究的薄弱环节。

学习中的迁移是传统的对比分析依赖的一个心理学核心概念。对比分析曾因心理学界、语言学界和语言教学界对它的心理学基础的严厉批判而被冷落30年之久。现在西方不少从事教学研究的人认识到，当初的批判否定一切，搞得太过火。许余龙、戴炜栋、束定芳的文章回顾了对比分析50年来的发展变化，指出，从80年代开始，人们又重新评价行为主义心理学中的合理因素，全面认识语言学习过程。他们认为，迁移这一心理学概念仍然有效，不能只靠一种心理学理论解释外语学习的全过程。

俞约法、方梦之也都肯定了对比分析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对外语教学具有指导意义。他们和许多学者都认为，从迫切性和可行性上看，对比分析的应用研究应该是今后的重点。但是许国璋先生主张，对比语言学的目标不是应用于语言教学。它的目标"只是详尽而系统的对比……对比研究者不应该也不必对外语教学作出过早过多的承诺"。

许国璋先生提出上述看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认为我国的英汉对比研究中对两种语言的静态描写和语用描写远非全面和系统，"用几条零星的翻译偶得或教学札记是不够的"，"重视实用，只有牺牲全面性和系统性，这一牺牲也自然损害了准确性"。

我们认为，这里有个描述、理论和应用三者的关系及处理问题。英汉对比分析的理论研究的正确性的前提是对这两种语言的全面系统的描述。乔姆斯基说过，描述的充分性是理论的充分性的前提。许国璋先生的意见针砭时弊，寓意是深刻的。

但是对比分析确实有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方面，也有人称之为理论对比分析和应用对比分析。应用研究是否一定要以理论研究的成果为基础，这在国际对比语言学界中并无定论。一种意见认为，应用对比研究不能独立于理论对比研究，否则应用对比

研究容易失去客观标准而成为教师的个人经验总结。另一种意见认为，理论对比研究和应用对比研究的目的、性质和方法不同。应用对比分析的理论可以来自理论对比分析，也可以来自一般语言学。理论对比分析和应用对比分析可以并行不悖，就好象欧洲的对比分析和美国的对比分析两大源流一样，前言重在理论，后者从开始就重在应用，两条路都走得通。我国是个学习英语的大国，英语教学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如外语学习过程的性质、母语的作用、语法意识、跨文化语用能力、教学方法等都需要英汉对比的帮助，不能等到一切都做彻底了再来解决。

二、语　音

有关英汉语音对比的论文有七篇，除了一篇是纯粹语音本身的对比外，其他都是讨论学习英语时汉语语音的干扰，范围涉及音段单位和超音段单位。

习晓明比较了作为声调语言的英语和作为字调语言的汉语的重音性质、功能、规则等方面的相似和区别。

王桂珍采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对中国学生和英国学生发音的声学特征进行调查。如同赵元任先生所说，汉语的字调和句子的语调是叠加的，字调制约了语调的变化。因此中国学生的英语语调一般比较平和单一。作者还调查了中英两国学生的语流情况，发现我国学生的平均停顿次数和比率远高出英国学生。这证实了音节计时为母语的学生在学习重音计时的英语时，母语的迁移将妨碍他们习得英语的节奏。

李小金和龚卡佳也都指出，我国语音教学强调正音，忽视语调。而我国学生的更大困难在于掌握英语语词(重音、节奏、音渡、和旋律)。

乐眉云和凌德祥进行了一件费时、费力，但很有意义的工作。他们从我国的汉语八大方言区中取样，调查中学生的英语发音，调

查结果表明存在明显的母语方言发音干扰，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普遍性发音错误。

William Moulton 把学习外语时的发音错误分成音位错误、发音错误、音位变体错误和分布错误，其中后果最严重的是音位错误。肖德法对我国学生调查的结果表明，用汉语辅音音位代替英语音音位的现象十分普遍。他总结出六种替代模式和四条替代规律，从而提高了理论解释的充分性。但是作者建议分两步纠正学生的错误发音，先纠正影响交际的发音偏误，再纠正不影响交际的发音偏误。我们担心，这一要求如用于英语专业的学生，将导致降低标准，因为学生的发音错误一旦固定下来，纠正就很难了。

外语学习中的母语语音迁移是大家都承认的。现在需要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详细占有材料，全面了解哪些音发生迁移，二是研究迁移发生的条件，具体解释迁移产生的原因。乐眉云和凌德祥的调查提供了汉语方言区中学生英语发音偏误的基本情况，为语音教学和教材编写提供了比较全面的资料。他们对于不同方言区学习英语发音的难度评定，对于制订语言政策和英语教学的宏观掌握都很有参考价值。

英汉语音对比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即物质属性的对比和功能属性的对比。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完整的对比。现在的研究多为发音方法或声学特征的对比；理论研究占的比重也较小。有些文章研究语音的迁移，只是指出表层现象的存在和分类，没能充分说明语言迁移的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只从纯语言学的角度研究是不够的，还应和心理语言学和社会心理学结合起来，研究学习者的学习和应用过程。

三、语　法

有关英汉语法对比的文章所占比重最大，有 27 篇。

杨自俭纵观了英汉语法学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认为它们具有

共同的发展趋势——从借鉴到描写到解释，从微观到宏观，从静态到动态的过程。这个发展趋势和世界上语言学发展的总趋势是一致的。

王东风、章于炎、牛保义、严辰松、张江云、郝世奇、赵伟河等对英汉语序、存在句、主语、否定形式，方位词、量词的语言结构、意义和功能进行比较。在研究方法上不少文章采用的是单向比较的模式，即以一种语言为基准，用另一种语言与其比较并找出其异同，也就是说，更多偏重于应用性对比。

王寅在语篇衔接、信息配列等九个方面比较了英汉语表达方式的不同，称之为英汉语九大区别性特征。王寅列数的这些现象确实是英汉语的重大区别，它们涉及篇章特征、信息配列、句法、形态、词汇（词义和形式）多个层次和方面。为什么会这样，它们的深层结构上相互关系如何，这是英汉对比分析的一个大研究课题。

刘宓庆用英汉基本句的不同扩展形式对王寅提到的某些方面的内在联系进行解释。他认为英语句子从左向右顺线性延伸，汉语句子从右向左逆线性延伸。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两种语言的内部机制不同。英语在句法上遵从后置规范，汉语则遵从前置规范。他认为英汉语句子延伸的方向不同是因为操这两种语言的民族的思维方式不同。他的这一看法引起了争议。

蒋国辉不同意刘宓庆所说的汉英两种语言在承载思维作线性延伸时，各自具有不同的方向的观点，因为思维过程只能有时间上的延续，不能有空间上的延展。作为思维的载体，言语行为也体现了思维的这一特点，因此不可能有反向延伸的句子。蒋国辉对刘宓庆依据的语言事实的充分性也提出不同意见。他指出，汉语中除了定语和状语外，修饰动词的还有补语，它们有时可以互相转换。同样，英语中前置的和后置的定语都是合乎语法的。此外，句中扩展成分的位置是语法机制提供的可能性，而不是语法机制本身。

有好几篇文章从功能学派的立场对英汉句子进行对比研究。

胡壮麟论述了英汉疑问语气系统的多层次和多元功能，对汉语的疑问句分类从功能及形式区分上加以调整和修正。他根据语料调查，按语义功能及体现形式对疑问句进行分类和频率统计，重点分析了疑问句在词汇、句法和音系层次上的体现，指出在表达一般疑问句义时，音系层的手段比词汇句法层更为重要。他还指出，疑问语气词的语义有的侧重于疑问的本义，可看作是概念功能，有的更倾向于情态，可看作是人际功能。语气系统虽属人际功能，但在深层次上仍可看到其语义分别向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倾斜。

陈脑冲根据一些语料统计探讨了主语和已知信息吻合和不吻合的情况以及不吻合的一些具体原因。周心红比较了英汉语简单句为了重新安排句子信息结构而改变句子的原有主谓结构的几种不同模式。邱述德讨论了语言信息传输对英汉语结构形成的影响。他认为，信息分布英汉大体相同，但语言结构体现有所差异，有时差异很大。雷佳林就英汉语简单句中有标记主位的判断发表了意见。关于主位标记性和标记程序的判断，他认为应该按照韩礼德的以句法分析为依据的观点，不应用语义分析代替句法分析，因此在“台上坐着主席团”中，“台上”应该是无标记主位。

金积令和金旭东从信息结构，句法功能等角度比较英汉语的句子结构。金积令认为英语的主题结构属非正常词序，汉语属正常词序；英语注重主语，汉语注重主题；英语的主题结构是移位生成，汉语是基础生成；英语的主题结构全是有标记的，汉语的主题成分相当一部分是无标记的。金旭东认为应该把汉语的主谓结构称为主题述题（topic-comment）结构以别于英语。汉语句子常省略主题成分，这并不影响交际，但在翻译时应该注意，以免产生语用错误。

关于汉语的主题结构，赵元任先生，Charles Li 和 Thompson 都有过论述。现在大家都承认它是汉语句子的一个显著特征。但它是否基础生成，是否无标记，国内外语言学界仍有不同意见，还

需要对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进行更广泛的研究以求确证。

有数篇论文以转换生成语法的理论模型比较英汉语中的某些语言现象。金积令和李刚分别著文对乔姆斯基的移位规则对汉语的适用度问题发表意见。金积令认为汉语的主题句和特殊疑问句属正常词序,是基础生成的,因此这两种句型不受移位规则的限制。李刚发表了相同的观点,认为汉语的名词可以跨越两个界限节点转换成合格的主题句结构,因此乔姆斯基的领属条件不能限制汉语名词词组的移动。(关于这个问题徐烈炯曾数次在国内外的杂志上著文指出,乔姆斯基的 Wh—移位并不适合所有语言。)李晓光依据乔姆斯基的管辖和约束理论,指出英汉语量词辖域的不同是这两种语言各自的短语内部结构差别造成的。

有关大于句子的单位的对比,只见到葛校琴一篇文章。文章认为句子、段落是语法单位、句群和语篇是语义单位,但句群的研究一直受到忽视。应该比较句群的功能、分类、衔接等。葛校琴的意见具有针对性。语篇分析作为一个学科在我国起步较晚,语篇对比分析的研究更少,有些是从写作的角度研究的。至于段落是否是语法单位,恐怕还需要研究。一般把段落看成是语篇的一个超句单位,介于句子和语篇之间,可以由几个句群构成,也可以由一个句群构成,还可由一个句子构成。段落的划分并无统一原则,可以是语义的,也可以是形式的,而且常常带有写作者的个人特点。

朱徽的"中英诗歌的语法问题比较研究"将英汉古典诗歌中表现出的语法差异和它们造成的美学效果联系起来分析,别具一格。朱徽认为,汉语没有形式变化,词性转换自由,主语常可省略,虚词手段少,词序灵活,和英诗的语法形成明显区别。中国古典诗歌的这些语法特点在时空观念上形成广垠的境界,使读者如同亲临其境,形成诗人与读者的思想情感的乳水交融,从而把诗人个人的、一时的体验变成了普遍的、恒常的经验,产生出超乎时空、任人再想象、再创造的美感魅力。

不少人(刘宓庆、王寅、王东风、章于炎、毕继万)在论及英汉语法差别,如词序、省略、句子扩展、衔接等问题时,都认为这是由于操这两种语言的人的思维方式不同。例如,毕继万认为,自己母语的习惯主要是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制约句子结构。如果学习外语时套用不同思维方式制约的句子就会套错。对于英汉语时间和地点状语及它们内部成分的语序差异,金立鑫作出自己的解释。他认为这只是表面现象,这些成分的心理现实是一样的,如以谓语为中心进行观察,它们恰好成镜像相对,只是在输出时被强制性地排列成线性。

作者们的这些意见表明,我国的英汉对比分析研究由表层向深层,由描写向解释深入发展。关于思维方式和语言表现的关系,推理性的假设较多。笔者还未曾读到过我国语言学界关于汉民族思维方式的专门著述。1991年张岱年先生等人曾发表专著《中国思维偏向》,但那是本哲学著作,并未联系句法结构。英汉语句子结构的某些差异,如主题结构、状语的位置、定语的位置,在多大程度上和怎样反映思维方式的差异,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有人把写信时的时间、地点的排列顺序作为思考方式差异的例证,说中国思考时偏重整体,习惯由大及小,英美人偏重分析,习惯由小及大。但英美人是否确实这样思考?或者是否在所有涉及部分和整体的问题时都这样思考?怎样解释美国人的"月·日·年"和英国人的"日·月·年"写法的顺序差异?汉语的主题结构和主语省略也曾被用作思维方式差异的例子。但古英语中有些无人称动词并不需要主语;如果主语能从上下文中推断出,则任何动词的主语都可省略;主语也可重复两次(先说名词,再说代词),古英语的这些特点和现代汉语很相似,但从中古时期就逐渐消失了。英语的这些变化是服从语言的内部发展规律,还是反映了英民族思维方式的变化?毕继万在探讨英汉语句子结构差异思维方式的关系的同时,提了一系列问题,笔者具有同感。什么是英、汉民族的思维方式,两者有哪些异同,思维方式与语言表现是什么关系,各自遵循什么

发展规律等等，这些问题很复杂，带有根本性，是英汉对比分析研究的大课题。

四、词汇和语义

虽然词义的研究不论在西方还是在我国，2000 多年前就有过，但语言学在语义方面的研究远远落在语法和语音之后。语义学得到充分的重视还只是从 60 年代开始。到现在，现代语义学所能够提供给我们学习的借鉴的东西仍比较少。

我们这次共搜集到八篇有关词汇研究的文章，分别为语义、反义词、构词和选词几个方面。

连淑琴认为抽象表达法在英语中相当普遍，因为英语有丰富的词义虚化手段。汉语用词倾向于具体，这主要是因为汉语没有形态变化，缺乏英语那样的词缀虚化手段，所以用不同的手段表达抽象的意义。

对词义的文化内函进行比较是跨文化语言研究的组成部分。王化鹏的文章着重讨论了由于文化差异而形成的汉、英语词义的民族色彩在地名、人名、动植物名称、颜色等方面表现出的差异，并且指出，在翻译的时候，应该尊重对方社会的风俗习惯，用对方人民喜闻乐见、可以理解的翻译方法。

词的音与义的关系的争论可以追溯到 2000 多年前，可以说已经有了定论。王葆仁著文提出意见。他对比英、汉语的构词规则，用汉语的“六书”解释英语词的构造，并且根据英、汉语一些词的发音相似，做了大胆的推断。他认为词的音与义的结合是有理据的，很多英、汉语辞是同源的。

严辰松指出，由于现代汉语的构词主要是靠词素的组合而且汉字属表意文字，所以汉语词汇的词义透明度高于英语。

邵志洪介绍了英汉语解决动词缺项采用的不同方法，英语可采用名词转化成动词(N—V)模式，汉语则不可。英语构词法的特

有表达思想的方式以及可能发生的语义联想会造成交际障碍。

彭在义和陈萍比较了英、汉语的成对词组，认为它们的作用大体相近，但结构上各有民族特点。他们根据成对词组的内部语义关系，分成对比、重叠和集合三种六类。

庞林林介绍了英汉语反义词的结构、反义关系和应用。

刘双对中美英文报刊各50篇政治方面的文章（近6万字）进行统计，发现在总字频相当的情况下，中国英文刊物的词汇量小，重复率高，“大”词多，长句多。原因可能是由于英语是中国人的外语及遣词造句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关系。他们还发现，在谈论同一内容时，中、美刊物的用词（实词）存在很大差异，反映了社会、政治文化差异对语言的影响。笔者认为，这一工作对英汉对比研究和英语教学都很有价值，遗憾的是调查样本过小，只能反映一种趋势。

五、修　辞

修辞的英汉对比研究起步较晚，这方面的论著不多。我们这次只见到一篇。王伟比较了借代这一修辞手段在英、汉语中的使用，发现在借代方式上英语和汉语共同之处居多，但在借称的选择上，差别是主要的。

六、文化、思维方式和母语迁移

这部分讨论的是所谓“中国式英语”问题。文章的作者们试图用民族文化、思维方式或母语迁移来解释中国人的英语中的汉语影响。

贾德霖认为英汉两民族思维模式不同的一个表现是语言线性序列的差异。例如，英吉利民族反映现实要素的思维序列是主体→行为→客体→行为标志，表现在语言上是主语→谓语→宾语→

状语。汉民族的思维序列是主体→行为标志→行为→客体，表现在语言上是主语→状语→谓语→宾语。

李翔玲根据 Charles Li 和 Thompson 的汉语是突出主题的语言的观点和 Rutherford 的形态迁移假设对中国人写的一些英语句子进行分析，认为确实存在这方面的母语干扰。

宋广友对 160 名学生的英语进行调查，发现大量的错误是汉语中介心理作用形成的负迁移造成的。宋广友认为，除非已达到很高水平，一个外语学习者或使用者不可能不用汉语思维，因为他们的外语与思维的联系总是间接地以母语为中介来实现的。他认为应该参照 Lado 的观点，利用正迁移，防止负迁移。

王墨希、李津把中国学生的构建英语语篇和写作的思维模式与英美本族语作文的语篇思维模式进行比较，发现中国学生在构建英文语篇和写作时缺乏西方典型的"一般特殊型"思维模式，占统治地位的是"隐伏型"思维模式(阐述问题时不从主题入手，而是从多方面给以暗示或明示)或者 Kaplan 说的"迂回法"。

林大津总结了英美教师对我国学生英文作文的批评，一是缺乏严密的推理层次，二是追求华丽的词藻和充塞引证，指出这是汉语文风的负迁移所致。他还综述了 Kaplan、胡曙中等国内外学者对中英文化思维模式的假设和分歧。他认为，英汉修辞对比研究不论从理论还是从教学的角度看都是非常必要的。

榕培和李文中都著文讨论"中国式英语"问题。榕培认为"中国英语"是在中国本土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中国特点的英语。它是英语和中国社会文化的特点相结合的产物。对于"中国英语"要采取分析的态度，因为某些表示中国特点的词语非有不可。李文中认为应该区分："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表达中国社会文化特点，不受汉语干扰的叫中国英语，受汉语干扰，违反英语规范的英语叫"中国式英语"，"中国英语"是必要的，"中国式英语"是种病态语言现象，应该逐步克服。

刘宓庆讨论了思维方式与英汉语表现方式的关系。他认为英

语句子注重严谨、组织性、逻辑性，这种理性素质，即逻辑重于语法，和英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关，西方的哲学通常与逻辑学，自然科学相结合。汉语注重流散，疏放，形式机制弱。这是因为汉民族的主体性思维方式的关系，中国的圣贤讲的多半是为人处世的关系。在翻译的时候，要防止由于思维方式的干扰而影响到表现法的正确或完善。

但汉源认为思维习惯不同导致英语句子结构和语义措辞的不同，它们的表达也就不同。在翻译时应采取一些变通办法(如解释，紧缩等)，以确保原文内容在译文中完整地再现。

朱梅萍对北京外国语学院二系的进修教师的英语作文进行了错误分析，探讨母语对第二语言习得，认知能力和思维方式的影响。调查发现自然错误(与母语无关的错误)和母语迁移造成的错误在学员的过渡语中都存在。学习成绩差的学员除了自然错误总数高于成绩好的学员外，母语迁移造成的错误的总数也大大高于学习成绩好的学员，说明成绩差的学员在学习外语时更多依赖母语，语际错误更多。

好几位学者在对比中国学生的英文作文和英美人写作章法时引证 Kaplan 的观点，对此的态度也不尽相同。Kaplan 于 1966 年发表了他的 Cultural Thought Patterns in Inter-Cultural Education，总结出五种语篇写作模式，并认为写作模式的差异是母语文化思维模式的迁移引起的。Kaplan 的假设曾引起很大轰动并且开创了一个新的语篇对比领域。但是我们这次读到的文章中没有人提及 Kaplan 的观点变化。Kaplan 于 1987 年发表文章 Cultural Thought Patterns Revisited，修正自己 20 年前的观点。现摘引如下：

...Let me say, then that I admit having made the case too strong. I regret having done so, though I in no way regret having made the case.

In fact, it is now my opinion that all of the various rhetorical modes identified in the "doodles article" are possible in any lan-

guage—i. e. in any language which has written text. The issue is that each language has certain clear preferences, so that while all forms are possible, all forms do not occur with equal frequency or in parallel distribution.

思维模式对写作章法影响是个很复杂,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需要进行大量的文化和语言的研究,包括研究各种体裁与题材的文章,才能做出中肯的结论。

关于思维方式与句子结构的关系的研究,在"语法"一节中已经提到,这里不再赘述。

"中国式英语"形成的原因,除了文化,思维方式的迁移外,母语迁移是很重要的因素。

从80年代开始,国外对母语迁移研究又重新热起来。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重新评价行为主义迁移学说的作用,认为认知心理学应该和行为主义心理学携手解释第二语言习得过程;另一方面则是用认知心理学的观点解释迁移,并出现了多种观点和做法。值处注意的是,语言普遍性的种种理论也用来解释第二语言习得中的迁移,如 Eckman 的 Markedness Differential Hypothesis, White 的 Parametre setting 等等。相比之下,我国的研究就显得限于表层分析,理论模式单一,而且一般推断居多,具体研究较少。

七、跨文化交际与语用

跨文化交际是个非常广泛的领域,可以进行多方面的研究。

胡文仲着重讨论了外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必要性,并根据外语教学的需要提出了可以从语言的文化的内涵、语用规则等九个方面进行研究。他还指出,现在亟需编写供外语教师教给学生文化知识所使用的词典和参考书。笔者也深感这方面系统研究材料的匮乏。

何自然论述了中国人用英语同英语是母语的外国人进行交际时产生的“离格”英语和产生“离格”英语的原因。他认为，对“离格”英语，不能一概斥之为中国英语，因为当涉及中国国情时，有些“离格”英语是不可避免的。为防止“离格”英语，除了提高英语水平外，要特别注意学习“第二文化”，否则英语水平虽高，也能犯语用错误。

魏春木从功能学派的角度研究文化交际中的语义问题，他认为语义有两种，一种是语言本身的意义，另一种是语言的文化意义。当交际双方不能共享意义潜势系统（即文化）时，就会发生语义位移，信息传达就会发生偏差。语义位移可能是意义的增值，减损或错认。解决的办法是运用语义标记，深入到跨文化交际的内部，通过比较语义标记找到位移的原因。

王得杏认为跨文化交际的过程既涉及文化的规约，也涉及语言的规约。这两类规约在不同文化里的差异是产生语用失误的根本原因。他对 100 名英语专业的学生进行了调查，发现学生的语用失误出现在称呼、问候、介绍、寒暄等九个方面。

张辉认为有必要把文化这一概念区分为交际文化和知识文化。知识文化并不直接影响交际文化知识，不会引起文化误解。交际文化则不然，它隐藏在语言系统中，反映一个民族的观念、习俗、心理、思维方式等。交际文化差异会造成语用失误，但了解文化差异而缺乏确切的表达方式也会造成语用失误。所以在向学生传授知识文化的同时，还应结合语境讲授应使用的语言形式。

张维友认为，语言的文化内涵和言语行为规则的差异都可造成交际失误。教师不仅要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更要培养他们的交际能力，做到在文化中教外语。

八、结束语

1990至1994年期间还发表了一些概述或综述性的文章，或者介绍国外对比语言学的情况或者评述我国对比语言学，特别是英汉对比的发展，如俞约法、张会森、徐振忠、钱军等人的论文。

笔者参考他们以及其他作者的文章中有关我国英汉对比研究的状况和问题的意见进行归纳，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一、我国的英汉对比分析的研究工作近几年来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正在向着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二、应加强对英语和汉语进行全面的语言和语用描述，尤其应注意对汉语的系统研究，在详尽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比较。

三、进一步拓宽研究范围，增加深度。现在的研究中语法对比较多，语义、修辞对比少；语言表层的研究多，深层的研究少；描述性的研究多，解释性的研究少；微观的研究多，宏观的研究少，有关语用和语言普遍性的研究更少。

四、加紧吸收国外研究成果，但应更注意自己的理论总结，争取提出较大的理论见解。

(1)这九种刊物是《外语教学与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语言教学与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学院)、《现代外语》(广州外国语学院)、《外语教学》(西安外国语学院)、《外语学刊》(黑龙江大学)、《外语与外语教学》(大连外国语学院)、《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解放军外语学院)、《外语研究》(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钱军，对比语言学浅说，《外语学刊》第 1 期，1990。

杨自俭、李瑞华，英汉对比研究综述和构想，《外国语》第 3 期，1990。

方梦之，对比语言学与第二外语教学，《外语学刊》第 4 期，1990。

许余龙，试论应用对比语言学的心理学基础，《外国语》第 4 期，1990。

许国璋，语言对比研究的阶段小结，《外语教学与研究》第 3 期，1991。

俞约法，对比、对比分析、对比语言学和外语教学，《外语与外语教学》第 4 期，1991。

刘宓庆，汉英对比研究的理论问题（上）（下），《外国语》第 4，5 期，1991。

俞约法，对比语言学与外语教学中的对比，《外语学刊》第 5 期，1991。

张会森，对比语言学问题，《外语学刊》第 5 期，1991；

语言对比研究管窥，《外语与外语教学》第 1 期，1992。

杨自俭，英汉对比研究管窥，《外语研究》第 1 期，1992。

俞约法，中国对比语言学一瞥，《外语研究》第 1 期，1992。

刘福长，英语和汉语对待语言变化态度上的差异，《现代外语》第 4 期，1992。

朱永生，试论双语对比研究的若干原则与方法，《现代外语》第 4 期，1992。

许余龙，对比语言学的定义与分类，《外国语》第 4 期，1992。

徐振忠，比较语言学和对比语言学漫话，《外国语》第 4 期，1992。

徐列炯，跨语言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外语教学与研究》第 4 期，1994。

戴炜栋、束定芳,对比分析、错误分析和中介语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外国语》第 5 期,1994。
习晓明,英语普通话与汉语普通话词重音比较,《外语教学》第 1 期,1990。
王桂珍,汉英音幅与基频模式的特点及其对英语语音教学的启示,《现代外语》第 1 期,1990。
龚卞佳,英汉语调对比教学,《现代外语》第 3 期,1991。
乐眉云、凌德祥(执笔),湘方言区学生英语发音调查及常误分析(二),《外语研究》,1993.4。
肖德云,试论中国人学习英语辅音过程中汉语辅音的移入,《外语与外语教学》第 1 期,1994。
李小金,试析中国味英语发音,《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第 3 期,1994。
乐眉云、凌德祥(执笔),汉语各方言区学生英语发音常误分析(三),《外语研究》第 3 期,1994。
朱徽,中英诗歌的语法问题比较研究,《外国语》第 1 期,1990。
邱述德,信息传输与英汉语结构比较,《外语与外语教学》第 2 期,1990。
金立鑫,英汉时地状语语序的一致性,《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2 期,1990。
金积令,从移位规则看英汉语结构上的差异,《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第 2 期,1990。
王寅,英汉语言宏观结构区别特征,《外国语》第 6 期,1990。
金积令,英汉语主题结构的对比研究,《外国语》第 2 期,1991。
李晓光,汉英量词辖域的对比及其解释,《外语学刊》第 2 期,1991。
李刚,论英语词组移动限制条件在汉语中的适用度,《外语教学与研究》第 3 期,1991。
葛校琴,我对英汉句群的一些见解,《外语研究》第 6 期,1993。
张江云,英汉否定形式的比较,《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第 5 期,

1991。
牛保义，英汉语存在句初探，《外语学刊》第 2 期，1994。
刘宓庆，汉英句子扩展机制对比研究，《现代外语》第 1 期，1992。
赵伟河，汉语量词在英语中的表达，《外语学刊》第 1 期，1992。
杨自俭，试论英汉语法学发展的共同趋向，《外国语》第 4 期，1992。
郝世奇，英汉否定语素及否定词的比较，《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第 4 期，1992。
王寅，英汉语言宏观结构的区别特征(续)，《外国语》第 5 期，1992。
全旭东，汉语主题省略与英汉互译，《外国语》第 6 期，1992。
蒋国辉，"汉英句子扩展机制"管见，《现代外语》第 1 期，1993。
严辰松，英汉在空间意义编码上的差异，《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第 1 期，1993。
毕继万，关于汉英句子结构差异，《外语教学》第 1 期，1993。
王东风、章于炎，英汉语序的比较与翻译，《外语教学与研究》第 4 期，1993。
周心红，汉英语简单句信息结构，《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第 5 期，1993。
牛保义，英语的 be－sentence 和汉语"是"字句异同比较，《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第 2 期，1993。
胡壮麟，英汉疑问语气系统的多层次和多元功能解释，《外国语》第 1 期，1994。
牛保义，英汉主语对比，《外语教学》第 4 期，1994。
雷佳林，试论英汉语简单句中有标记主位的判断，《外语研究》第 4 期，1994。
陈脑冲，主语和信息结构，《外语研究》第 4 期，1994。
严辰松，汉英词汇透明度比较，《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第 1 期，1990。
刘双，几种中美报刊杂志用词分析，《外语学刊》第 2 期，1990。
彭在义、陈萍，试论英汉语中的成对词组，《现代外语》第 3 期，

1990。
王葆仁，英汉造词比较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第2期，1992。
王化鹏，论汉、英语词义的民族色彩与翻译，《外语学刊》第1期，1993。
连淑能，英语的“抽象”与汉语的“具体”，《外语学刊》第3期，1993。
庞林林，英汉语反义词异同刍议，《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第4期，1993。
邵志洪，“结合法”构词模式导致的跨文化交际障碍，《外语教学与研究》第2期，1994。
王伟，英汉借代修辞方式比较，《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第2期，1994。
王得杏，跨文化交际的语用问题，《外语教学与研究》第4期，1990。
张维友，Increasing Cultural Awareness in EFL Teaching and Learning，《外语教学》第1期，1991。
胡文仲，试论外语教学中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第1期，1993。
魏春木，跨文化交际中的语义位移研究，《外语教学》第1期，1993。
何自然，跨文化交际中的语言“离格”现象刍议，《外语与外语教学》第2期，1993。
张辉，试论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迁移与语用失误，《外语教学》第3期，1994。
李翔玲，汉语主题化与英语写作，《外语教学》第3期，1990。
朱梅萍，过渡语与语言迁移，《外语教学与研究》第3期，1990。
贾德霖，思维模式与线性序列——汉式英语语序特色，《外国语》第5期，1990。
榕培，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第1期，1991。
宋广友，英语教学中的汉语中介心理问题，《外语教学》第4期，1991。
刘宓庆，思维方式、表现法和翻译问题，《现代外语》第1期，1993。

李文中,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外语教学与研究》第 4 期,1993。
王墨希、李津,中国学生英语语篇思维模式调查,《外语教学与研究》第 4 期,1993。
林大津,国外英汉对比修辞研究及其启示,《外语教学与研究》第 3 期,1994。
但汉源,思维习惯与英汉翻译中的解说方式,《外语学刊》第 6 期,1994。